

R U S S I A N S T U D I E S

# 俄羅斯研究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2年 第3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 目 录

###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 3 杨洁勉 / 中国共产党国际时代观的百年  
发展和深远意义

### 俄乌冲突的多重影响

- 20 王 战, 李永全, 姜 锋, 于运全, 徐明棋,  
冯绍雷 / 俄乌冲突、全球政治经济  
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 55 韩 冬, 钟 钰 / 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  
市场的影响及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  
政策响应

### 欧亚空间研究

- 81 施 越 / 俄帝国史与古今之变：以近代  
俄罗斯与中亚草原关系为中心的  
考察
- 109 孙 超, 吴 靖 / 中立身份下的战略选  
择——土库曼斯坦的中立外交与能  
源战略

### 俄罗斯文学与政治

- 140 郑永旺 / 从三部古代俄罗斯文学作品看  
俄罗斯民族的政治思维
- 170 刘雅悦 / “神话”的祛魅与重塑——当  
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刘 军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本期执编：王海燕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 年 6 月 28 日

# 俄羅斯研究

##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2 年第 3 期 ( 双月刊 )

### Оглавление

#### *Ян Цземянь*

Столетнее развитие и глубо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взгляда на эпоху КПК..... (3)

#### *Ван Чжань, Ли Юнцюань, Цзян Фэн, Юй Юньцюань, Сюй Минци, Фэн Шаолэй*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глоб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и их влияние на Китай..... (20)

#### *Хань Дун, Чжун Юй*

Влия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мировой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й рынок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ответ Китая н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 (55)

#### *Ши Юе*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ё изменен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е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ми степями ..... (81)

#### *Сунь Чао, У Цзин*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в условиях нейтр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Нейтраль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 (109)

#### *Чжэн Юнван*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трёх древнерус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140)

#### *Лю Яюе*

Развенчание и пересоздание «мифа» –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белинскоевед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170)

#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2 年第 3 期 ( 双月刊 )

## Contents

### *Yang Jiemia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Views on the World and the Era: Centennial Development an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3)

### *Wang Zhan, Li Yongquan, Jiang Feng, Yu Yunquan, Xu Mingqi, Feng Shaolei*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Global Politic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hina..... (20)

### *Han Dong, Zhong Yu*

Impacts of Russia-Ukraine Conflict on Global Food Market and China's Policy Responses to Ensure its Food Security..... (55)

### *Shi Yue*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Changes: Center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Russia and the Central Asian Steppe ..... (81)

### *Sun Chao, Wu Jing*

Strategic Choice for a Neutral Country: Turkmenistan Neutral Diplomacy and Energy Strategy ..... (109)

### *Zheng Yongwang*

On Political Thinking of the Russian Nation: A Perspective from Three Works of Ancient Russian Literature..... (140)

### *Liu Yayue*

The Disenchantment and Reshaping of the "Myth": Belinsky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Russia..... (170)



##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 中国共产党国际时代观的 百年发展和深远意义

杨洁勉\*

**【内容提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系统总结了百年来党和国家的内政外交经验教训，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百年来，中国在国际上经历了“战争与革命时代”、“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以及当前正在逐步展开并有待于总结、深化和提炼的国际时代。历史一再证明，对时代的观察、把握和引领，是相互关联和不断递进的认识和实践进程，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特点。在未来30年及以远，中国在继续完成和平与发展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的同时，还将通过与国际社会的积极互动，在时代主题、时代命题和时代愿景等方面塑造和引领新的国际时代。

**【关键词】** 国际时代观 十九届六中全会 外交理论 习近平外交思想

**【中图分类号】**D820**【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3-0003(17)

## 一、引言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总结了百年来党和国家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对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决议》内涵丰富，意义深远，本文仅就其对中国与世界在各个时代和历史时期的互动影响作一初步的阐述和分析，以期达到“学史明德、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目的，并在当前世界动荡变革期

\*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

中认清国际形势和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

中国拥有 5000 多年延绵不断的文明传统，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辉煌和独特的贡献。但是在近代和现代，中国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原因，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几度濒临亡国的地步。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了“站起来”和“富起来”，进而走向“强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sup>①</sup>。与此同时，中国也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当前，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大国、发展中大国和东方大国等多重身份，同国际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成为国际时代的主要推动和创造力量。

《决议》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sup>②</sup>。时代是个常见词汇，从两极时代到后冷战时代，从全球化时代到数字化时代，可谓包罗万象。但就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理论而言，“时代”的含义是反映社会发展某一特定阶段及其基本特征的概念。百年来，中国在上世界上经历了列宁提出的“战争与革命时代”和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以及当前正在逐步展开并有待于总结、深化和提炼的国际时代。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高度重视对时代的认识与把握，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sup>③</sup>。抓住了时代的特征、主题和命题，就是抓住了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明确了阶段性的重点，增强了实现远大目标的自信，提高了理论和实践的自觉性等。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既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更要在此基础上抓住时

---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1 年 11 月 17 日第 1 版。

② 同上。

③ 《列宁全集》（第 2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43 页。

代的主题和命题，发展自己和壮大自己，并推动时代潮流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进。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观察时代”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提高观察的水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为指引，观察和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等时代潮流中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历史目标。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敏锐地观察到时代的重大变化，在认识和善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中顺势而为，实现了“富起来”的战略目标，并继续奔向“强起来”的新目标。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把握时代”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现代和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不断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进步。在革命与战争时代，党把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卓越贡献，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开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中国把握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世界潮流，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促进了国际力量重心东移的速度和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握自身走向富强和国际社会力图全面发展的历史规律，立足于发展中大国的群体合作与机制发展，推动地区和国际合作的机制建设，不断进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引领时代”中，不断总结和提炼时代的新特点和新方向，并随着在革命与建设中自身能力的增强而逐步提升对时代的示范性和引领性。在革命与战争时代，中国主要在认识和理解时代潮流中为未来引领时代奠定基础。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中国主要在顺应和推动时代潮流中为引领时代而积蓄力量和提高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维护时代主题和解答时代命题中开始倡导和引领新的时代，提出新型国际关系、全球发展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全球安全倡议等新理念，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世界共识和力量。估计这一进

程需要未来 30 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艰苦奋斗和不断努力才能基本得以实现。

中国共产党的在百年中观察、把握、引领时代的历史一再证明，这是一个相互关联和不断递进的认识和实践进程，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特点。而且，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时代的观察、把握、引领还有不同的重点和主题。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需要更多地观察时代以确立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向，在成长时期需要更多地把握时代以完成历史使命，在成熟时期则需要更多地引领时代以为人类谋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对于时代的观察、把握、引领，需要在整体统一的大框架下按其内在的逻辑分阶段进行和分层次递进，并能在基本具备嬗变条件时促使其实现质的飞跃，从而真正做到实践和理论的辩证统一。

## 二、在观察时代中认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被迫打开国门，并被动地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互动。此后，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们前赴后继地努力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但都没有成功。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炮声给中国带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同当时的国情和世情相结合，实践和发展了列宁的“战争与革命”时代观，终于在西方独霸的世界开辟了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片新天地。

**（一）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及其中国化和当代化。**马克思主义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进程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视为区分时代的基本标志，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五个时代，即原始时代、奴隶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代。马克思的时代观指导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便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的终极目标。例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

个共产主义的社会”<sup>①</sup>。

列宁在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根据对自己所处时代特点的分析，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的概念。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科学地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sup>②</sup>。斯大林在列宁逝世的当年（1924年）撰写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把列宁的“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结合表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sup>③</sup>这一表述后来被概括为“战争与革命时代”，并为中国共产党所认同。而且，建党初期历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都以相当的篇幅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欧、美、日等帝国主义间的斗争和战争对世界形势的影响。毛泽东自担任党的最高领导后一直认同“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例如，他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sup>④</sup>。又如，毛泽东在1969年春谈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时，仍然认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sup>⑤</sup>。

应当指出的是，列宁的“战争与革命”时代观与其他革命经典理论一样，其基本原理具有普遍和深远的指导意义，但不能生搬硬套地应用于对某些具体事件的判断或预测。其实，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和实践中国革命和世界进步的百年历程中也有过曲折，这些是需要认真总结历史教训的过程中加以纠正并与时俱进的。

**（二）在列宁的“战争与革命”时代观指导下的观察和分析。**革命与战争时代横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新民主主义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16日-23日，上海），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4/4428164.html>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3页。

③ 《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40页。

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先后把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实现国家工业化列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对象和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并尽可能地改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国际环境。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拥护列宁倡导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争取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支持。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及反法西斯联盟并与其共同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二战后的苏美矛盾和美蒋矛盾等有利形势，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精神，仅用三年时间就创建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及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加强合作，并在与美国展开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的同时也与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和半外交关系。中国在 1954 年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和 1955 年的亚非会议上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1956 年召开的党的八大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所有这些都维护和推动了二战后的世界和平与建设运动。

**（三）深刻吸取误判时代的教训并重返正轨。**中国共产党在前进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中期，在时代问题上曾走过一段弯路，没有能够及时观察到世界正在从战争与革命时代朝着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的方向过渡，因而错过了发展并壮大自己的历史机遇。

新中国建立后，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仍在试图反攻大陆，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美苏冷战在东亚地区演变为朝鲜和越南的热战，后来又发生了中苏关系的破裂和边境武装冲突。如此严峻的内外形势，导致当时的党中央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对形势作出全面和正确的判断，没有坚持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以及利用国际上出现了经济发展与政治缓和的有利趋势。结果，“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

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sup>①</sup>。

在“文革”中后期，毛泽东在国内问题上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国际方面则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估计以及“中美苏形成了战略三角关系”等理念。在对外关系上，中国重启中美关系和恢复中日邦交，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迎来了与相当数量的国家建交的新高潮。但从整体上看，极端的“战争与革命时代观”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致使中国还在艰难地等待和呼唤实践和理论性的突破。

### 三、在把握时代中顺势而为并推进时代潮流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时代观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艰难曲折过程，终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实现了质的飞跃。在邓小平提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观后，党和国家在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良好和有利的外部环境。

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国从观察时代向把握时代进行历史性转变。邓小平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多次强调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其有关重要论述和判断，后来被党的代表大会归纳为“时代主题”。这样，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时代观及其实践，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积极互动和相互促进。

**（一）邓小平把握时代发展规律并倡导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中国在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之初，需要对国际形势和趋势进行科学和前瞻的判断。邓小平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为此进行观察、研究、分析和思考，先是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继而提出发展问题是关键，最终把和平与发展列为世界的两大问题，也是后来所说的时代

---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主题。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诞生于革命与战争时代，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战略围堵和战争威胁之下，因此，在对待由“革命与战争”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过渡方面，自然需要思考和解决许多重大问题，既要超越历史的惯性，更需要树立时代进步的前瞻性。邓小平首先观察到世界大战“可以延缓”，后来又作出了“可以避免”的战略判断。邓小平以下的论述逐步而肯定地显示了这一科学判断的历史轨迹：邓小平早在 1977 年 12 月同来访的巴基斯坦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政府首脑齐亚·哈克会谈时就指出，“如果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统一战线搞好了，战争就可以延缓”<sup>①</sup>。1984 年 10 月 10 日，邓小平在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中说道：“一九七四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sup>②</sup>1985 年 6 月 4 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进而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sup>③</sup>。1987 年 7 月 4 日，邓小平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又说：“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sup>④</sup>与此同时，邓小平又逐步强调世界的经济和发展问题，如在 1985 年 3 月 4 日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代表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sup>⑤</sup>。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具有的长期性和反复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sup>⑥</sup>。这是邓小平在其晚年的政治交代，告诫我们要在继续推进和平与发展时始终坚持“两点论”和“长期论”。

**（二）江泽民在冷战结束时坚持和丰富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江泽民在国内“八九风波”、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的特殊时期出任中国

---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24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82 页。

③ 同上，第 127 页。

④ 同上，第 249 页。

⑤ 同上，第 105 页。

⑥ 同上，第 383 页。



党政军最高领导。他在主政期间（1989-2002），在坚信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同时，更加积极和努力地推进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江泽民强调，国际社会争取世界和平环境和避免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较前更为增加。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sup>①</sup>。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sup>②</sup>。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还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sup>③</sup>。

江泽民代表中央所作的判断已为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史所证实，中国在时代主题方面既努力实践，又深化了理论建设。在实践方面，当时的中国在改善与世界大国的关系、稳定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加强以“入世”为主要标志的国际多边合作等方面取得显著进步。中国还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国际合作反恐等非传统安全的国际合作方面，为维护时代主题和解答时代命题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在理论方面，江泽民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背景下我国实现目标战略的正确途径等方面也进行了探索和总结。在时代主题的目标任务方面，江泽民把“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和“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并列为进入21世纪必须抓好的三大任务之一。<sup>④</sup>在国际战略方面，江泽民强调要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在国际上营造有利的战略态势时要着眼于世界战略格局运筹大国关系，着眼于地缘战略态势积极经略周边，着眼于扩展战略空间大力开展多边外交。<sup>⑤</sup>在实现目标战略方面，江泽民强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正确途径是，顺应时代潮流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sup>⑥</sup>

①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1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66页。

④ 同上，第123页。

⑤ 同上，第352-356页。

⑥ 同上，第473页。

江泽民在主政的 13 年里，在中国内政外交方面坚持并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实现香港和澳门回归，成功应对诸如海湾战争、中国入世和国际反恐等重大挑战，全面改善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胜利地把中国带进了 21 世纪，同时也为推进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时代作出了中国的重大贡献。

**(三)胡锦涛在全球化进程中丰富和提升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胡锦涛在主政时期(2002-2012)，沉着应对了非传统安全在世界范围内的多次反复冲击，经受了全球化历史性起伏的考验，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sup>①</sup>。他在党的十八大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sup>②</sup>。

胡锦涛大力提倡和努力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时代思维。他从“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这个根本要义出发，主张各国超越传统观念，“更加注重交流合作、相互借鉴，更加注重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并在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形成“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局面”。<sup>③</sup>

在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开启了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性进程。在实践方面，中国于 2008 年成功主办了北京奥运会，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新形势下，中国还同一些主要经济体共同倡导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金砖国家机制、新开发银行等全球经济治理新机制，充实和丰富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内涵。在思想理论方面，胡锦涛指出，“抓住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我们应对当今世界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适应世界发展大势、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必由之

---

①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649-650 页。

②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651 页。

③ 张晓彤：“胡锦涛时代观的中国主张”，《瞭望》，2009 年第 47 期，第 32 页。

路”<sup>①</sup>。在胡锦涛亲自关心下，中国先后于 2005 年和 2011 年发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白皮书——《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的和平发展》，向世界阐述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和意义。此外，胡锦涛还倡导了诸如科学发展观、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等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新思想和新理念，向进入 21 世纪的世界提供了中国理论和中国智慧。

#### 四、在引领时代中凝聚全球共同的努力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充实、延伸、发展和飞跃。党在这一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在未来 30 年及以远，中国在继续完成和平与发展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的同时，还将塑造和引领新的国际时代。诚然，这个“时代”还处于酝酿和孕育的进程，它的主要性质、内涵、特点等还需要有一个充分发展的过程，但中国无疑将在此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一）时代主题的引领。**从邓小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以来的近 40 年里，国际和国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社会在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进程中继续推进时代的潮流，并积极有为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时代。

中国是代表历史进步的新兴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并将在未来 30 年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因此，中国相对于许多国家、特别是保守的西方国家，更能够看清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把握时代进步的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国际上倡导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代表世界进步力量分析、总结和提炼新的国际时代主题，即世界未来发展的大势和趋势。

习近平特别强调世界公正（公平正义）问题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公平正

---

<sup>①</sup>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651 页。

义既是人类的远大目标，也是当代世界所要追求的理想目标。“习近平国际公平正义观是中国为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以世界人民为主体的国际公平正义观，是对片面维护西方国家自身利益的‘国际公平正义观’的重写，为增强国家间政治互信提供了中国智慧，为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为改善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理论。”<sup>①</sup>国际公正的理念中外历来皆有，而且发展至今，国际平等正义、国际分配正义、国际制度正义等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价值规范。因此，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sup>②</sup>。在国际共同努力方面，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在国际秩序、经济秩序、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等方面的话语权和规制权也在日益增加，正在共同努力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世界共同富裕也是人类早已有之的共同理想。当前的国际社会已经基本具备了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但还需要在财富分配和财富发展上进行长期的努力。经过 70 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为国内共同富裕打下了牢固的物质和理论基础。中国从 2010 年起长期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并在科学概念、基本要义、当代内涵、目标方向等方面系统地确立了共享发展的理念。

习近平在论述中国国内共同富裕时指出，“这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要持续推动，不断取得成效”<sup>③</sup>。这个道理同样适合于整个国际社会，诚然其过程会更加艰巨、复杂和长期。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正在与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启共同发展、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里程碑式的新时期。

国际社会在逐步伸张和坚持公正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走向共同富裕的意义。联合国的《千年计划》以脱贫为重点，而《2030 年发展议程》的重点

---

① 阎德学、高勤：“习近平国际公平正义观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东北亚论坛》，2022 年第 1 期，第 4 页。

② 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10 月 26 日第 2 版。

③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2021 年 8 月 17 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21 年第 20 期，第 8 页。

则是在此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中国在国内全面脱贫后正在走向共同富裕，在国际上也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例如，中国和非洲在推进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时，共同制订了《中非合作 2035 年愿景》。作为愿景首个三年规划，中国正在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共同推进内容务实但又目标前瞻的“九项工程”，即卫生健康、减贫惠农、贸易促进、投资驱动、数字创新、绿色发展、能力建设、人文交流、和平安全等工程。<sup>①</sup>

**（二）时代命题的引领。**如果说，时代主题系指世界未来发展的大势和趋势，那么时代命题则指实现时代主题的主要任务和挑战。中国在推动当今时代深入发展和引领未来新的时代早日到来的历史进程中，清楚地认识到，实现人类社会共同和良好的愿望，还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奋斗。

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既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又是时代的命题的思想。他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需要国际社会以团结、智慧、勇气，扛起历史责任，解答时代命题，展现时代担当”<sup>②</sup>。

中国多方面引领时代命题的解答。在方向目标的引领方面，中国努力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决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坚持造福人类和共同发展道路。在组织机制的引领方面，中国主张建设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进地区和跨地区合作机制，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地区的合作。在平台建设的引领方面，中国推动同国际合作伙伴共建“一带一路”，努力将其建设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在思想理念的引领方面，中国倡导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多边主义等，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

**（三）时代愿景的引领。**历史总在曲折中前进，人类对时代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中进步。国际社会在经历了 40 多年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后，正在展

<sup>①</sup> 习近平：“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21 年 11 月 29 日），《人民日报》，2021 年 11 月 30 日第 2 版。

<sup>②</sup>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二〇一八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2018 年 9 月 3 日），《人民日报》，2018 年 9 月 4 日第 2 版。

望未来的时代发展方向，特别是新的时代主题的引领。

未来数十年的时代主题存在多种可能。一是国际和平与发展力量大幅度地超越战争与贫困力量，国际社会在和平与发展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从而朝着新的时代主题发展。二是国际进步力量与保守力量的对峙相持不下，和平发展的主题处于徘徊踟蹰或小步缓行的量变积聚过程。三是历史在特定时期也有可能发生倒退，国际社会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需要做出更长时期和更加艰苦的努力。

鉴于当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的增长，三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中国只要做好充分准备，就有可能在无论哪种假设中都发挥引领作用。在第一种假设中，中国在时代主题问题上需要动态认识、前瞻思维、压茬前行、适时创新，如提出“公正与共富”或“合作与共赢”等新的时代主题。在第二种假设中，中国要坚决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或以空间、时间的互换最终实现新的时代主题。在第三种假设中，中国要有底线思维，积极应对与有效解答和平发展的时代命题，要有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精神坚决扭转可能的历史倒车和时代逆流。

## 五、结语

在当前动荡变革时期，世界各主要力量、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和全球新兴力量等，都在时代的过渡和变迁方面提出各自的观察分析和相应的努力方向。其中，不乏悲观而无为者或逆时而反动者，但顺应历史潮流和赞同社会进步的毕竟占多数，而勇立潮头和引领时代者正是中国。

中国要引领时代，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富强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而不懈努力，并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加强中国的理论建设，在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中国化和当代化方面更上层楼。在此基础上，中国还要积极主动地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深刻领会世界形势的变化，戮力同心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公正与共富”或“合作与共赢”的时代主题，有效应对时代命题的存量和增量，通过量变的积累迎接质变的到来。

展望未来 30 年及以远，新的时代已经有迹可循。在原则和方向上，国际社会需要不断对接各种建设性的中长期愿景和规划，坚持反对各种开历史倒车或人为障碍，逐步探索可能的体制机制。在具体实践上，国际社会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在现实中增加实践自觉，并善于将历史和现实的实践转化为未来的实践。

新的国际时代需要美好的愿景、良好的愿望、详尽的规划等，但从愿景到实现的路途是漫长而艰巨的。因此，国际社会对于未来 30 年及以远的挑战要有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中国要在未来国际风云变幻中坚持底线思维和战略定力，团结和联合广大中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稳定和平衡大国关系，承认和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前瞻考虑国际关系的新领域和新因素。

即将到来的新的国际时代正在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源于但又高于实践的时代理论将具有全球性指导意义。在战争与革命时代，列宁的相关理论在哺育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也推动了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邓小平的相关理论在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也推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sup>①</sup>。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必定会加快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未来的 30 年及以远，中国在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同时，也将从世界进步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和好处。在当代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中国和世界的互动，需要通过体制机制的规范和理论文化的交流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合作共赢。因此，我们在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进行思考和实践时，需要立体多维和内外统筹，不断朝着国际、世界、全球和外空等方向拓展，而且还要有更为广阔的时空观，反复学习领悟列宁的战争与和平、邓小平的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并在此基础上，以实践和理论上的努力去迎接国际新时代的到来。

<sup>①</sup>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45 页。

**【Abstract】** *The Resolution*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sup>th</sup>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ystematically sums up it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in domestic governance and diplomacy over the past century, emphasizing the necessity to “observe, grasp and guide the era with Marxist positions, viewpoints, and methods”. In the past century,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e era of war and revolution”, “the era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current era which is gradually unfolding and needs to be summarized, deepened and refined. History has repeatedly proved that the observation, grasp and guidance of the era is a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which is interrelated and progressive, characterized by integrity and unity. In the next 30 years and beyond, while continuing to fulfill the historic mission entrusted by the era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China will also shape and lead a new international era through active interac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erms of themes, propositions and visions of the era.

**【Key Words】** Views on the World and the Era,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sup>th</sup> Central Committee, Theories in Diplomacy, Xi Jinping’s Thought on Diplomacy

**【Аннотация】** В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и шест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К 19-го созыва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подытожены опыт и уроки внутренних и внешних дел партии и страны за минувшее столетие, подчеркнута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 на основе способов и методов марксизма соблюдать, управлять и направлять эпоху».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100 лет Китай пережил «эпоху войны и революции», «эпоху мира и развития» и нынешню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эпоху, которая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азворачивается и нуждается в обобщении, углублении и уточнении. История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доказывала, что наблюдение, постижение и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эпохами — это процесс понимания и практики, взаимосвязанный и поступательный, обладающий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и единства. В последующие 30 лет и более, продолжая выполня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миссию, возложенную на него эпохой



мира и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й также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актив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сообществом 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ем,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и видений эпохи будет формировать и возглавлять нову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эпоху.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взгляд на эпоху, шестой пленум ЦК КПК 19-го созыва, теор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 идеи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о дипломатии

---

(责任编辑 宋羽竹)

## 俄乌冲突的多重影响

# 俄乌冲突、全球政治经济转型 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王 战 李永全 姜 锋 于运全 徐明棋 冯绍雷

**【内容提要】**自2022年2月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乌冲突日益成为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走向的重大事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而有情境感的体现。俄乌冲突是世界经济长周期危机激化的结果，是全球转型中地区进程碰撞的结果，对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国际力量对比之变、国际体系与秩序之变、国家发展范式与价值之变的复杂性前所未有。俄乌冲突实际上是一场大国较量，即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利用乌克兰，针对俄罗斯、欧洲甚至“盟友”发动的一场混战，目的是重创俄罗斯，牵制欧洲，绑架“盟友”，威胁中国。这场冲突引起的再意识形态化、再军事化、再集团化正在使全球化的发展步履维艰，重创全球治理机制。战争不应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制裁更不是终止战争的优选。中国愿意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促进发展的方向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内部发展而言，中国要积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制度性开放水平，进而赢得经济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外部环境。从国际传播、对外沟通、对外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应积极推动构建中文舆论阵地，发展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良好互动关系。

**【关键词】**俄乌冲突 全球政治经济转型 俄美关系 俄欧关系 国际舆论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3-0020(35)

\* 2022年5月7日，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俄乌冲突、全球政治经济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学术研讨会。《俄罗斯研究》编辑部选取了部分专家的发言稿加以整理、经发言专家本人确认（或由专家本人提供文字稿），形成了这篇笔谈文章。感谢会议主办方和相关专家授权本刊使用会议发言的内容！

## 俄乌冲突对全球政治经济变局的影响及中国应对

王 战\*

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及其进展，正日益成为左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走向的重大事件。从经济角度看，俄乌冲突的爆发是世界经济长周期危机激化的结果；从地缘角度看，俄乌冲突发生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此我从五个方面谈谈个人看法。

### （一）俄乌冲突将是百年变局的重大历史事件

俄乌冲突爆发在“两个百年”的百年变局之际，怎么从“两个百年”看俄乌冲突？首先是从世界经济长周期看百年未遇大变局中的俄乌冲突。当前我们仍然处于一个世界经济的相对衰退期。在相对衰退期间，各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增长率比较低迷。而增长率比较低迷在民主国家选举时往往会促使矛盾外化，转化为地缘政治冲突的激化，同时国际社会还遭遇着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因此我认为，当前是经济危机、地缘危机、社会危机三个危机的叠加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都未完全结束，因为美国采取印钞的量化宽松办法，在疫情流行后，仍继续在全世界超发货币。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后，更加剧了地缘矛盾与冲突。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比预期更严重，本以为会在2020年年内结束，却持续了两年半，直到现在仍在继续。所有这些事情都会反映在地缘政治矛盾的激化上，这个激化在当前的表现就是俄乌冲突。所以我们认为俄乌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要从百年大格局来看。

俄乌冲突也间接关系到我国如何在世界经济长周期的衰退期实现“百年振兴”。首先要判断当前我们是不是仍然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关于这一问题实际上有过两次讨论。一次是在跨世纪加入WTO的时候，我们处于战略机遇期，目前来看的确是这样的。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吗？在2014、2016年两次中央有关部门召开的座谈会上，我认为还是处于战略机遇期，只是它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已经不是大规模利

---

\* 王战，上海市社联主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分中心理事长。

用外资的战略机遇期，而是一个与危机联系在一起的战略机遇期。每次世界经济相对衰退期里有两个现象特别突出：一是危机，二是创新。所以，要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就看是否能够在危机当中寻找到创新的机遇，这个阶段已经不能再依靠仿制和“消化吸收”，必须要靠自主创新。

## （二）俄乌冲突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俄乌冲突关键要看清楚背后的美国因素。其中有一点我们比较容易看清楚，就是美国要维持世界霸权。居间平衡是美国惯用的战略。拜登上台后，美国在欧亚大陆调整战略，乌克兰成为美国、欧洲、俄罗斯三者的居间平衡新热点。在这个调整中，欧亚大陆被分为“东南西北”四大块。在北面，通过北约控制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居间平衡。在西南面，从阿富汗撤出以后，主要通过印度形成某种战略合作，可惜阿富汗问题没控制好，所以现在紧紧抓住叙利亚来保持居间平衡。在南面，美国通过“印太四国”控制欧亚大陆最重要的点，这也是印度洋、亚太、太平洋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通道。在东面，通过“四海”问题制衡中国，除台海之外，还涉及南海、东海，事实上，在美国的打算中还包括黄海。这就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我们需要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待当前美国为什么挑起乌克兰冲突，并不遗余力地从中挑唆。

美国为什么要挑唆？美国挑唆的目的不仅仅是在帮欧盟或使北约合法性加强，美国国内因素也是重要的原因。现在，从表面上看，美国联合了很多国家，貌似很强大。但是毛主席也曾讲过，“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如果现在仔细观察美国国内的情况，美国已经表现出有些外强中干的样子。我们在研究美国问题时分析过美国目前的十大矛盾，经济方面包括通货膨胀、制造业回归不成功、贸易逆差、收入分配分化、增长速度下降五个矛盾，因此通胀很有可能变成滞胀。同时，疫情等问题使美国在国内政治方面面临另外五大问题：民族矛盾激化、宗教矛盾激化、阶级矛盾激化、政治极化、枪支泛滥。因此，美国领导人在国外做的一系列动作都是为了在国内拉选票。虽然拜登支持率没有上去，但预计在 2022 年 11 月中期选举时，民主党的选票会有所增加，不排除 2024 年奥巴马可能重新上台。所以，分析俄乌冲突的美国因素，既要研究长期适用、服务于美国的海权理论和居间平衡战略，也要观察美国国内选民的诉求。

### （三）俄乌冲突结局直接影响国际政治秩序格局

2022年5月9日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之后，俄乌冲突的两种不同结局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也不同。第一种情况，俄罗斯在战争中占据有利局面，同时能够取得乌克兰去军事化、中立的结果。乌克兰是欧亚大陆的一个交通枢纽，对于俄罗斯向欧洲的能源输出和中国的中欧班列来说，都是很重要的通道。并且乌克兰还可能继续成为欧亚大陆的一个投资、贸易、经济交往的桥头堡。第二种情况，乌克兰在美国的支持下，取得比较有利局面。这个局面对美国是最有利的。一是美国对国内选民有交代，有利于民主党的选举。二是北约地位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实际上，北约合法性的探讨已经出现分歧，但俄乌冲突使得北约找到了存续的理由。三是美国获得巨额石油收益。四是带动美国军工产品的出口。美国至少在这四方面都可能得到好处，在这种情况下，会是最大的赢家。这种结局还会持续影响到国际秩序与国际组织架构的调整，美国将促动包括WTO、WHO、IMF、世界银行、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组织架构调整，改变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格局。

### （四）俄乌冲突拖累国际经济

俄乌冲突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影响经济增长率。按照此前观点，如果抗疫取得成功，世界经济会有一次重启甚至比较大的反弹。但至目前，世界银行、IMF等权威金融机构已将增长率调低至2%左右。所以，世界经济今后将呈现K字形增长，少数国家可能发展比较好，但是对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大多数人民而言，这是一个灾难。所以，经济增长率的前景并不乐观，甚至有出现大问题的可能。

二是导致全球通胀。自2008年起，美国先后实行了三次量化宽松政策。为应对新冠大流行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欧盟、日本等都在印钞。此次俄乌冲突发生以后，各方面问题集中爆发，尤其反映在能源领域，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些问题既是结构性的，也是货币超发推动的结果。当通胀遇到经济增长停滞，就有可能变成滞胀，一边经济发展速度降低，一边通胀进一步加剧。英国最近的数据显示，其通胀率已经达到10%。

三是关注此轮长周期的危机和创新。在危机方面，首要关注三种危机：金融危机、能源危机与粮食危机。其中，粮食危机今后对我国有较大的影响。

危机的另一面是对国家创新的倒逼。谁能够在创新方面领先，谁就有机会摆脱滞胀。我们应抓住机会，推动创新。此轮创新的兴起有可能推动世界经济进入下一个相对繁荣的长周期。这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去研究的问题。

四是战后重建问题。据《经济学人》的报道，乌克兰的战后重建可能需要 6000 亿美元。目前战争仍在持续，整个经济损失可能达到 5000 亿美元。美国支持战争，目的是不遗余力地帮助自身消耗军火库存。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几千亿美元的战后重建资金将由谁来出？美国 B3W 计划需要的几万亿美元投入从何来？如何建设？对于我们而言，乌克兰也是中国“一带一路”的交通枢纽，我们该怎么办？

#### （五）俄乌冲突与中国应对

中国目前处理俄乌冲突的立场、措施是正确的。未来我们应该始终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是一项长期工程，当前要重点考虑推进“一带一路”2.0 版。“一带一路”2.0 版不应该把战线拉得太长，应更多着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在周边国家、沿线 65 个国家当中以健康“一带一路”、绿色“一带一路”、数字“一带一路”等新理念来推进发展，例如推动建成几个“四小龙”。如果我们能够借助“一带一路”促进部分国家“起飞”，将进一步凝聚更多国家共同发展的信心。同时，要坚持多边合作，这是欧盟、中国等绝大部分国际组织和国家一直强调的。在坚持多边合作的同时，我们也特别要处理好中美、中俄、中欧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做强我们自己。新时代是强起来的时代，强起来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自主创新。从鸦片战争到现在，我们第一次站在第一梯队，尤其是在数字经济领域，这是自主创新的突破。无论美国怎么打压，我们都不能放弃 5G 技术、区块链、量子通信等方面的发展。二是制度创新。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市场经济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例如农村土地到现在都没有流转。如果通过生产要素市场化使中国农村土地（特别是宅基地）流转起来，那么对中国的新一轮制度创新将会发挥重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俄乌冲突也使我们看到国际舆论阵地的重要。中文还不是世界上普遍使用的传媒文字，国际上每天 80% 的传播量都产生于主要的英文报刊。中国如何争取国际舆论阵地，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和研究。

## 俄乌危机折射的大国博弈与百年变局

李永全\*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俄乌冲突已持续了几个月，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5月2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命令，将战时状态延长3个月，这或许说明短期内这场战争不会结束。俄乌冲突或俄乌国家间关系危机，已经不仅仅是这两个国家的关系问题。这场危机牵动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折射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深度调整。人类社会将为这场动荡付出多大代价仍是未知数。

### （一）俄乌冲突背后是一场大国较量

乌克兰与俄罗斯是斯拉夫兄弟，一起生活和发展的历史达300余年，曾经共同生活在超级大国苏联，而今却兵戎相见……战争打到现在，善良的人，正直的人，都希望立刻停火，防止大规模人员伤亡。可事实是，一方面谈判刚刚出现达成协议的苗头，另一方面立刻出面干预，向弱者提供各种先进武器，鼓励打下去，打到“最后”一个人。“文明的欧洲”，明知战争的部分目的是针对自己的，依旧信誓旦旦支持打下去。各国大幅增加军事预算，德国把军事预算从500亿欧元提高到1000亿欧元，美国仅两个月就向乌克兰提供了136亿美元的战争经费。在这136亿美元即将用尽之时，2022年4月28日，拜登总统表示，要求国会批准向乌克兰追加金援330亿美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其中至少204亿美元用于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的军事援助，另有约85亿美元用于反俄宣传等短期经济援助，30亿美元用于人道主义援助。拜登声称，“我们已经以创纪录的速度向乌克兰运送了武器和装备，只要战争继续下去，我们就会持续提供军事援助”。<sup>①</sup>

表面上，战争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的，是俄罗斯向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谁是这场战争的真正推手。

---

\* 李永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

① “两月打光136亿美元，拜登：充钱！”京报网，2022年4月29日，<https://news.bjd.com.cn/2022/04/29/10079543.shtml>

这场冲突实际上是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地位，为了军工资本、金融资本、能源资本集团的利益，利用多年培植的战略棋子乌克兰，针对俄罗斯、欧洲甚至“盟友”发动的一场混合战争，包括热战（动用各种先进武器的常规战争）、经济战（制裁俄罗斯和威胁制裁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国家或地区）、信息战、心理战……战争的结果是毁掉了乌克兰，重创了俄罗斯，伤害和牵制住了欧洲，绑架了盟友，威胁着中国……

但是，这次俄乌冲突，俄罗斯并非在不利于自己的时机被美国拉入一场战争。作为外交经验丰富且历史悠久的大国，俄罗斯了解美国的战略目标，了解美国对乌克兰的战略意图，并且有自己的战略构想和实现构想的行动纲领。从 2014 年起，俄罗斯就在为突发事件做战略准备。这些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准备包括：（1）通过宪法修正案，保证普京执政的稳定性；（2）通过修改宪法，重申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内法高于国际法；（3）发展尖端军事技术，与美国实现非对称战略平衡，2018 年普京总统在发表国情咨文时宣示了新式战略武器；（4）出兵叙利亚，维护合法选举产生的阿萨德政权，打出了军事强国的气势，遏制了美国和北约的军事气焰；（5）进一步密切俄白联盟国家关系；（6）随时掌握美国战略动态，时刻准备实施战略反攻。这次俄乌冲突，如果美国是利用乌克兰打一场代理人战争的话，那么对俄罗斯来说，就是对美国和西方多年来反俄、遏俄政策的一次大反攻。

只有了解有关大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特点，才能了解这场战争的性质。

## （二）大国战略目标与特点

美国实际上是这场战争的幕后推手。战前，美国一再放出俄罗斯要攻打乌克兰的消息，同时表示，美国和北约不会与俄罗斯交战。美国知道俄罗斯的战略底线是“绝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却一直在鼓励乌克兰加入北约，使乌克兰在 2019 年修宪时将加入北约的目标写入了宪法。美国的这种做法为战争的引发埋下了祸根。

美国的这些做法是由其制度决定的。第一，美国社会依靠塑造敌人来实现团结。美国实行高度自治的联邦制，各联邦主体有很大权限。因此，美国依靠对外政策联合各联邦主体。第二，美国要维护超级大国地位、霸主地位，必须控制世界上最发达的欧洲。控制欧洲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成为欧洲安全的



保护者。冷战时期，另一个军事政治阵营的领袖——苏联成了美国最“理想”的敌人。久而久之，美国形成了军工利益集团，需要不断发动战争才能满足其日益膨胀的需求。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民主自由国家，把这种理念通过软实力传播给全世界，博得一大批学者、青年人的推崇。实际上，美国是一个暴力主义国家，资本用各种手段把美国制度的丑陋进行了包装。美国的历史就是对外战争史、对外干涉史。在 1776 年美国建国以来的 240 多年历史中，有 220 年处于战争状态。二战以来，美国至少对 2000 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对其中 1000 万-1500 万人死亡负有直接责任。美国使用贫铀弹轰炸前南联盟地区和伊拉克，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健康问题。美国从阿富汗狼狈撤出后，另一场战争就在策划中。俄乌冲突不过是美国策划的一场代理人战争而已。

这个代理人就是乌克兰。美国对乌克兰的经营由来已久。在遏制俄罗斯复兴、阻止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进程等方面，美国把乌克兰视为最佳的棋子予以培育和操纵，取得了显著效果。根据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的论述，乌克兰从 300 多年的俄罗斯帝国历史脱离出去，意味着俄国失去了一大块潜在的富裕的工农业经济和在同种族与宗教上同俄罗斯极为接近的 5200 多万人口，而这些原本足以使俄国成为一个真正庞大而自信的帝国。乌克兰的独立也使俄罗斯失去了在黑海的主导地位，因为黑海的敖德萨是俄罗斯与地中海地区甚至距离更远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从地缘政治上看，丢掉乌克兰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这使俄国的地缘战略选择受到极大的限制。即使失去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依然控制着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充当一个自信的欧亚帝国的领袖，主宰原苏联境内南部和东部的非斯拉夫人。但是，丢掉了乌克兰及其 5200 多万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欧亚帝国的图谋，均有可能使俄罗斯陷入与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经觉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冲突中……任何没有乌克兰而仅建立在俄罗斯力量之上的新欧亚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欧洲化色彩将不可避免地减弱，并且会日趋亚洲化。<sup>①</sup>

乌克兰，一个富饶而美丽的国度，曾经是原苏联继俄罗斯联邦后第二大

<sup>①</sup> 参见[美]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1-123页。

加盟共和国，独立后就土地、人口规模而言仍然是欧洲大国。乌克兰拥有 60.3 万平方公里国土，冲突爆发前有 4500 万人口。除自然资源外，从苏联继承了庞大的科技力量和人力资源；乌克兰是苏联和欧洲粮仓，70% 的国土是黑土地，约占全球黑土面积的 30% 左右。乌克兰具有雄厚的科技和制造业基础，在造船、航空、航天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和人才。乌克兰地处俄罗斯与欧洲之间，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和纽带，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资源。

乌克兰理应发展成富足的欧洲大国，人民享受美满的生活。但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国家建设过程出现了扭曲。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国家财富迅速聚集到少数人手中，出现了若干可以在政坛和实业界呼风唤雨的寡头。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充满寻租行为，甚至多有暴力和血腥。寡头和所谓的政治精英都有国外背景。实际上，是资本势力在控制乌克兰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

为了控制乌克兰，美国在三个方面采取了行动：（1）20 世纪 90 年代起，华盛顿积极培植乌克兰政治精英，支持居民中的积极社会阶层。乌克兰社会上有密集的亲美的非政府组织，其任务就是制造美国需要的各种舆论。

（2）美国与西乌克兰右翼激进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积极合作。实际上，这些运动在二战后期就已存在。俄罗斯认为，美国在乌克兰建立了具有新纳粹特点的极端主义团体，正是这些团体在独立广场事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3）华盛顿实施了积极的外交努力，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分裂在制度上不可逆转。为此，美国推动乌克兰与欧盟签署成为欧盟联系国的协定，并以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诱饵，使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日益恶化。

最终，乌克兰不幸地沦为美国的战略棋子。

对于乌克兰在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意义，俄罗斯与美国的认识有相似之处，但立场不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不仅极度惋惜超级大国的坍塌，也深感失去统一经济空间，即统一经济联系、统一产业链和统一市场的痛苦。俄罗斯孤军奋战很难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只有与欧亚国家（至少是主要国家）实现一体化，才能够在多极世界中站稳脚跟。因此，乌克兰是欧亚一体化中不可或缺的国家。多年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政策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1）动之以情，即双方是斯拉夫兄弟，彼此应该友好地相处；

(2) 晓之以理，即乌克兰保持不反俄也不反西，在美欧和俄罗斯之间实行平衡外交；(3) 施之以武，即双方关系不断恶化，乌克兰要加入以俄罗斯为敌的北约，迫使俄罗斯以极端的方式解决双方之间的问题。

遗憾的是，俄乌关系出现了最坏的结局。在这种结局当中不会有赢家，只有输家和更大的输家。

### (三) 俄乌战争与未来世界

俄乌战争何时结束？以何种方式结束？将对未来世界产生什么影响？虽然战争还在继续，但是有些结论已经逐渐清晰。

谁是这场战争中的赢家？严格意义上说，枪声一响，俄乌两国都输了，因为兄弟相残没有赢家。表面上看，美国赢了，赢了一场可以“袖手旁观”“坐享其成”的代理人战争。形式上看，欧洲也输了，因为欧洲被与美国的关系绑架了，距离战略自主的目标更遥远了。不仅欧洲，所有美国盟友都被绑架了，美国还想在道德上绑架中国。其实，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对于美国来说，所有的国家都是棋子，美国利益高于一切。那么从长远看，美国这种卑劣的手段究竟能够持续多久？

战争尚未结束，但是影响已经非常深远：

(1) 2022年2月24日以前的那个乌克兰不复存在，只有历史和时间会知道乌克兰将分裂至何种程度。

(2) 扩员后的欧洲，虽然经济一体化是成功的，但是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和雅尔塔体系瓦解的风险，可能使欧洲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动荡。

(3) 美国制度的丑陋、美国资本的贪婪已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无论怎样包装都无济于事。这种模式还能够持续吗？

(4) 俄罗斯欧亚一体化不会因战场上的胜利而加快，也不会因美国和西方的反对而终止。俄美间在欧亚一体化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将长期存在，影响两国关系和整个欧亚的地缘政治局势。

(5)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关系将以更大深度和广度进行调整，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将日益严峻。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坚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中华民族5000多年传承的智慧和新中国积累的战略定力迎接挑战。

## 从欧洲的角度看俄乌冲突

姜 锋\*

俄乌冲突影响巨大，在国际关系层面，不仅深刻冲击了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也强烈动摇了冷战后欧洲一度出现的和平主义憧憬；在内政方面则从各国不同的认识和应对中显露出欧洲各国社会层面受到的震荡，即俄乌冲突不仅是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的重大事件，也事关各国内政中的价值取舍。这其中，外交决策内政化或者说内政格局决定外交决策，是重要的特点。可以说，俄乌冲突深刻影响着欧盟各国的内政和社会，欧洲的主要国家正经历着再意识形态化、再军事化、再大西洋化以及去全球化的“全球化”过程。

### （一）德俄关系破裂，经济丧失“压舱石”功能

对于德国人乃至俄罗斯以外的欧洲人来说，二战之后欧洲长期处于和平状态，没有人能想到欧洲将再次成为战场。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没有哪位有影响的欧洲政治领导人或学界人士预见到，俄罗斯会大规模地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有意思的是，这个普遍误判是基于符合实际的判断，即一旦这场战争爆发，就会引起极其惨烈的后果，对欧洲和世界政治都将产生剧烈影响，甚至决定俄罗斯未来若干年里的国运走向，中国也将被牵涉入局，可能面临艰难的选择。但，最纠结的国家是德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尤其是联邦德国，对战争有着深刻的反思。“永不再战”被写入德国宪法，成为立国之本。这种自我约束不仅体现在法律方面，还表现在整个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例如，战后德国学界深刻反思战争，形成一个共识：即便未来有战争，即便这场战争会毁灭德国，德国人也要让自己的子孙后代知道，德国不是战争的根源——这种信誓旦旦已经到了“宁亡不战”的程度，可以称之为“绝对的和平主义”。可以说，“永不再战”已经成为德国文化的精神之本。这是从二战结束到俄乌冲突之前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反战生态，俄乌冲突也因此对欧洲国家的社会心态产生了极深刻、极剧烈的冲击。对一个国家内政和国家整体变化影响最大的就是

---

\* 姜锋，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

战争和战争威胁，在所有可能的改变力量中，战争对国家制度和国民生活的改变最为强烈，也因此最令人不安和恐惧。

没有想到战争却真的爆发了，而且愈演愈烈。不过，所谓“意料不到”的俄乌战争，只是主流舆论不想承认、不敢预料，人们倾向于在想象中回避自己不愿见到的事件。其实德国是有一些人士很确切地认为这场战争一定会打起来的，因为普京在德国待过7年，关于他这段历史不多的记录中，包括普京一些朋友的回忆——普京被认为是一个言必有信的人，说出的事情一定会做到，沉着冷静，不容置疑。战争爆发以后，德、法等欧洲国家在道义上很支持乌克兰，但他们都跟着美国的定调并不参战。对于如何支持乌克兰，德国人的反应空前矛盾：一开始表现得十分犹豫，虽然认为应该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出于历史原因”，表示不会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这不仅让乌克兰和美国十分不满，也受到德国国内舆论的抨击，恰恰是起源于和平主义的绿党和年轻一代强烈呼吁政府武装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被逼无奈，德政府很快改变政策，许诺援助乌克兰防御性武器。到了2022年4月28日，根据俄乌冲突的发展情况，联邦议会才最终通过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的决定。这意味着，德国跨越了战后自我设定的不向战争地区输送武器的“和平政策门槛”。

许多事情的发生都逐渐超出预期。战争爆发之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德国继续需要俄罗斯的能源供给，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不会断。各种研究预测，如果德国放弃了俄罗斯的能源，年度损失至少在1200亿欧元左右，年经济总量会下降2%-3%，有的预测甚至估算到6%，这个数字意味着非常巨大的损失。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中，德国是很不情愿的；即便后来SWIFT系统把俄罗斯的部分银行排除在外，俄罗斯真正负责石油天然气交易的银行实际上没有受到制裁。这使大家以为德国不会停止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然而，就2022年4月28日之后的情况来看，德国人的态度是宁可不要俄罗斯的天然气，也不能做西方集团的特殊一员。德国已做了充分准备面对压力，不仅要在道义上面对乌克兰人，还要面对在背后撑腰的美国人，德俄关系全面破裂正在变为现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经济是压舱石的学说，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检验。

## （二）再意识形态化，对抗变得不惜代价

欧洲明显在经历“再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如果说冷战时期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那么现在则变成欧洲人自己定义的“民主阵营”和“非民主阵营”之间的对抗。“再意识形态化”容易导致的惨烈后果就是冲突不计后果，不以可定义的利益作为底线，冲突一旦爆发，就难见终结。俄乌冲突使德国的天然气供应受到巨大的冲击，甚至有中断的可能，但德国宁肯“断臂”也要这样做，说明上述再意识形态化过程在欧洲非常明显。

俄乌冲突还没有爆发之前，2021 年 9 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柏林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一起线上回答记者“怎样对待与俄罗斯的关系”这一提问时，他提到，“我们和俄罗斯有共同的文学，我们和俄罗斯有共同的历史……”，给人的印象是，矛盾再大，俄罗斯也是欧洲文明大家庭的成员，大家依旧是自家人。这一点，俄罗斯的精英阶层也多持同样看法，普京总统曾明确表示，俄罗斯是欧洲大陆和欧洲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罗斯人把自己当作欧洲人。<sup>①</sup>然而如今看来，俄乌冲突使这种历史、文化的连接出现了断裂。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也曾表示，“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应该维持正常。按照默克尔的逻辑，“北溪-2”不应该被停掉，就算是在冷战时期德国也使用苏联的石油和天然气，为什么现在反而要暂停？从这些具体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这场俄乌战争在欧洲引发的意识形态冲突，要远远大于冷战时期。此番“再意识形态化”的冲突程度，比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还要严重。因此，“新冷战”的概念应该谨慎使用，因为当前显然已不仅是冷战的问题，俄乌军事冲突给欧洲和世界政局带来的剧烈震荡，可与核聚变造成的破坏力相比较。

## （三）再军事化，欧洲彻底告别“文明力量”学说

俄乌战争爆发后，德国除将每年常规军费开支 GDP 占比提高到 2% 外，还宣布额外增加 1000 亿欧元的军费，扩大联邦国防军的规模，提升国防军的军备。与此同时，在德国已经开始讨论恢复废除多年的征兵制。法国也有政要表示，俄乌战争使欧洲战略自主的梦想破产了。欧洲的政治家们认为，

---

<sup>①</sup> 参见《普京文集（2012-2014）》，《普京文集（2012-2014）》编委员编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14 页。

欧洲需要军事化，要有自己的军队，这至关重要，否则不可能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欧洲、有抵抗力的欧洲。此外，欧洲再军事化有一定的基础。全球五个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有两个在欧洲。欧盟数据显示，2020年欧盟成员国在武装部队上的总支出接近2000亿欧元，超过俄罗斯和中国。2022年3月，欧盟发布了一项新的“安全战略指南针”计划，认为“欧洲面对日益敌对的环境，必须跨越式地提升军事实力并增强其韧性”。欧盟同时还公布了组建国防快速反应部队的措施，计划到2025年新增5000名应急军事人员。俄乌战争爆发后，关于欧洲需要提升军事实力以增强防御能力的讨论不绝于耳，说明欧洲再军事化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由此可见，欧洲将进入再军事化的进程。

冷战结束后，欧洲学者认为欧洲未来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是发挥非军事的“文明力量”，把欧盟一体化作为人类走出战争与和平历史困境的榜样树立起来。虽然这一学说不断受到学界质疑甚至讥讽，但在战后和平主义影响下的欧洲“文明力量”“制度优势”还是有大量的信奉者。例如以德国为首的社会民众就对任何军事发展都保持着警觉，“军事化”或“军事的欧洲”是政客们竭力躲避的话语。但俄乌冲突打破了这一禁忌，军事、武器、战争、提高军费、增加兵力等军事词汇充斥着议会和媒体的各种辩论之中，有学者称，崇尚战争的词句也开始登堂入室了，进入公共话语，没人再提及“欧洲作为文明力量”了。

#### （四）再大西洋化，欧洲短期内将更加依赖美国

再大西洋化通常表现为再美国化。原来欧洲的态度是保持自身的独立，并使自己成为在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这组关系中有塑造性的国际力量。对于欧洲人来说，在与美国、俄罗斯、中国的关系中，至关重要的分别是：美国的安全保护、俄罗斯的能源供给和中国的销售市场。随着俄乌冲突的发展，欧洲人可能失去俄罗斯的能源，中国的市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尚不明确；剩下的只有美国的安全支撑，欧洲人很难不依靠美国。支持乌克兰的武器有许多是美国提供的，虽然是在欧洲土地上发生的战争，但主导方却是美国。这是从欧洲的外部来观察。

就欧洲内部的情况来分析，例如一些政党（德国的绿党等）曾经是反对

北约、反对美国的和平主义力量，现在的态度却转变成向往和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这体现了欧洲年轻一代政客的再大西洋化、再美国化。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所在的绿党是和平主义的政党，此次在推动德国介入俄乌战争方面却表现得非常积极。贝尔伯克访问美国时，曾提及自己年轻时在美国的学习生活经历——美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像施罗德等较为理性、周全、从欧洲自身利益出发的老一辈政治家，被逐渐边缘化甚至妖魔化，他们所代表的政治思考也被社会边缘化了。

俄乌冲突的变化发展让我们很难以静态的眼光去判断欧洲未来的走向。不排除德国对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態度会在将来出现新变化。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在美国的率领下，大多数欧洲国家、北约国家总体上表现出了团结一致的特征：一开始犹豫不决的土耳其现在也与北约站在了一起。曾被认为北约中“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德国，此番也顺应了美国的率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危机的变化，欧洲也会发生变化。因为俄乌冲突这一受到欧洲各国内政高度关注的议题，在欧洲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感受。例如，2022年4月，马克龙总统连任，但他在这次大选中获得的票数与上一次相比要低很多；而与马克龙相竞争的政治力量是主张退出北约的，从票数上看，这一主张背后的力量也有一定的规模。还有一些德国人，包括从原苏联、俄罗斯回到德国的德裔人士，他们当中有相当数量的普京支持者，因而反对乌克兰；乌克兰难民到达德国时，德国也出现了反乌克兰的游行。德国东欧问题专家乌姆兰德（Andreas Umland）甚至认为，如果俄罗斯回归民主传统道路，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俄罗斯甚至可以重返八国集团和欧洲委员会，还可以与欧盟缔结联盟协议，甚至加入北约。这样的预测可能过于乐观，其前提是俄罗斯会发生领导层和制度性变化，这一点美国已经期待太久了。虽然俄罗斯始终没有出现美国所期待的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抛开美国因素，欧洲始终怀着与俄罗斯和平相处的愿望，毕竟这符合欧洲的最大利益。

### （五）去全球化的“全球化”

俄乌军事冲突引发和加速欧洲政治、社会和对外关系，在美国的推动下再意识形态化、再军事化、再集团化、内政化，这令迄今为止以经济和科技



为牵引的全球化发展步履维艰。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通过“分化”“脱钩”和“围猎”等方式实施“去全球化”战略正在全面展开，对此，我使用了一个听上去很矛盾的、有反饰修辞的短语——去全球化的“全球化”。欧洲是美国分裂性全球化战略的重要环节，俄乌战争是美国充分利用欧洲战略安全恐惧促成大西洋集团“空前团结”的工具。目前看，其“成功”的显著标志，是定义了对欧洲形成安全威胁和制度威胁的来源，在欧亚大陆的东方树立了共同的敌人或是对手，找到了可以自圆其说地在欧洲和亚洲开展军事扩张的理由。

在这样复杂的情势下，中国该如何应对？我们需要时间去思考，去静观其变。有两点是必定要坚持的，一是对世界和平的爱好不变，二是始终站在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上，其核心是人类的命运是共同的，无论你是何种肤色，来自哪个国家。欧洲有一些人想让中国在俄乌冲突中扮演更有分量的角色，例如“调停人”这样的功能；然而就实际情况而言，有许多美国人、欧洲人、俄罗斯人对此并不情愿。在俄乌冲突还没有进行到双方（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疲惫不堪的时候，在各方依然表现出“恋战”意愿的时候，其他人都难以真正做些什么；只有厌战的主观意愿达到一定程度时，“调停”才有机会发生。焦虑导致的非理性是当下国际政治中随处可见的行为风格，世界由此变得更加不确定，也更加危险。

中国是真正爱好和平的大国，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所强调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事实再次证明，冷战思维只会破坏全球和平框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危害世界和平”。习近平主席特别指出，“集团对抗只会加剧 21 世纪安全挑战”，并提出了新的全球安全倡议：“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

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sup>①</sup>在一个战争和冲突不断加剧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是稳定的力量，能够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促进发展的方向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也是真正爱好和平的。我们学校有一批来自乌克兰的学生，俄乌冲突发生之后，我们向这些学生以及一些在乌克兰的朋友发送了慰问邮件，希望他们平安，不要在这场冲突中受到伤害。爱好和平不仅是中国国家层面的意愿，而且也是社会、学界、普通人的意愿，这些层面对于和平的爱好是整个中国精神的有机组成。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有机会在意识形态化、军事化、集团化之外，观看到关系人类共同命运的部分，而以这些部分为对象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有助于我们得出更接近关于事件本质、历史事实的看法与判断。

## 从国际舆论看俄乌冲突的影响

于运全\*

国际舆论的复杂性表现在通常说的媒体以及国际受众，还有很多从事研究的机构、智库参与其中。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国际舆论对俄乌冲突关注的热度，以及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 （一）媒体报道方面

首先，从这次冲突本身来说，烈度并不是太大，最多是一场局部、可控的冲突，但是它引发的舆论关注或者话题讨论是巨大的。这是本次冲突新的特点。有人说在社交媒体时代、元宇宙时代，这是一场被全方位关注、全球热烈讨论的军事冲突，这是和以前战争不一样的地方，跟十年前、二十年前

---

① 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2 日第 2 版。

\* 于运全，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

很多同样烈度的冲突不一样的地方。仅从传统的英文媒体报道量看，从2月24日到4月21日俄乌冲突持续近两个月时，我们做过一个统计，报道量关注度以及每日报道量的关注度，最高每天有2万篇，已经成为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国际舆情事件。烈度不大的地震却引发了国际舆论大海啸。

第二，整体上虽然是俄乌双方发生的冲突，他们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舆论还关注两个要素：一是美国，美国是这场冲突最受关注的外部因素；二是中国，与中国相关的内容，媒体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

围绕中国的关注度，最近我院的研究团队做过一个统计分析，涉华内容大约占有报道量的15.8%，最高时接近20%。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虽然没有身临其境，但是其实一直被牵扯在其中的媒体作用。关于中国的很多讨论，涉及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态度。看到中国政府对此有多次的表态，包括联合国的四次投票，外交部发言人以及驻美大使、外长，甚至最高领导人在很多外事会见时，都谈到对此事的态度，国外媒体对此非常关注。国际舆论对中国态度的高关注度，是这次事件的鲜明特点。

另外一个鲜明特点是，许多人使用“舆论战”“信息战”等说法形容此次事件。在社交媒体时代，俄乌冲突被全程直播。可以看到CNN、BBC等传统西方媒体派驻了很多前方报道力量，我们中国的媒体CGTN、凤凰卫视等也有大量的现场画面和报道的传输。整体而言，这次冲突相当于一个在全球各个媒体全程、全员、全息直播的过程，大家都在参与讨论。甚至有很多人因为观点和看法不同影响到现实的人际关系。虽然这场战争好像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每个人却在媒体时代、信息爆炸时代参与其中——获取信息，传播信息，参与讨论，共同在这场国际舆论的焦点事件当中，用自己的认知参与事件的塑造，而自身也被塑造。很多研究国际传播的学者在讨论这场俄乌冲突对全球舆论格局、全球民众认知的塑造，这些视角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美国《时代周刊》的态度倾向明显，2022年3月2日刊出了一则致敬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的报道；4月4日发表了关于乌克兰痛楚的文章，描写了一个士兵和一个孩子受伤的母亲，表明乌克兰在这场冲突、战争当中所承受的苦难。英国《经济学人》的角度是将俄乌冲突阐述为由普京升级的战争，

世界必须直面它；将普京和泽连斯基做对比，包括描述俄罗斯的“斯大林化”，把俄罗斯的领导人塑造成独裁者的形象，强调为什么乌克兰必须要赢。西方主流媒体的倾向或者议程设置的导向比较清晰。西方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话题更多，基本呈现为一个体系性的、对俄罗斯的舆论上的攻击、打击，一边倒地支持乌克兰。《华盛顿邮报》有文章指出，这场俄乌冲突的战争效果本身是有限的，但西方信息战精准出击，渲染意识形态对立，讨论正义和非正义、民主和威权，来自媒体的报道会对民众的态度产生巨大影响。

我们还观察到，2022 年 3 月至 4 月，有十几家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民调机构发布了近 30 组各有侧重的民意调查数据。例如，有九成美国人赞成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对俄制裁。有西方国家民调显示，西方人对普京的好感度在下降，对泽连斯基的好感度在上升；而俄罗斯的民调数据则是 80% 的俄民众对总统普京表示信任，其支持度在国内是上升的。欧洲的一些民调数据显示，在难民问题上，讲道义可以，但是在乌克兰难民的接收问题上，考验着普通民众对自身利益与道义的平衡：表达情绪容易，但当接收难民与现实利益密切相关时，许多民众的态度莫衷一是。在对待北约的态度上，许多欧洲受访者持相对赞同的态度。在牵涉与中国台湾地区相关问题方面，则显示出对冲突会对台湾产生溢出效应、中国会在台湾问题上使用武力等的担心。

这些调查本身也是设置议题、影响民意的方式，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但冲突期间、战时的民调具有暂时性。类似网上的热议事件，民众情绪易于短时间内被调动起来，往往会在更大热点事件出现后趋于平静，并转向理性思考。媒体报道、议程设置和民意呈现相互交织，只能暂时参考，不能依此判断中长期发展趋势。因此，上述民调结果的持久性有待进一步观察。

## （二）智库与研究机构方面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胶着的战事给智库界带来一场热仗，各大智库推出很多研究报告，学者也写作了大量文章。我们关注了西方六七十家比较重要的智库关于俄乌冲突的研究，主要涉及俄乌冲突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对欧美关系的影响、欧洲战略自主、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变化等问题。智库研究成果还关注了世界经济复苏的相关问题，包括由冲突引发的全球通货膨胀、欧洲经济安全和能源结构的变化、欧洲能源替代的出路、欧洲和中国的经贸

关系等。在政治领域，比较多的智库认为这场战争加剧了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关于北约的探讨更加热烈，许多专家提出“再北约化”，这尤其是欧洲等西方国家智库热烈讨论的方面。

期待中国在调解俄乌冲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也是热点话题。欧洲智库，尤其是德国的智库研究，对于自身的对华经济依赖表示担忧，甚至有调查结果表达了德国现在应减少对中国市场依赖的希望，认为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加多元主义的策略，减少中国在德国和欧洲经贸关系中的比重。

目前在评述俄乌冲突时出现的关于中国的负面舆论可以细分出几十种，总体而言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要承担责任，尤其要承担道义的责任。理由是普京总统于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访华，中俄签署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协议，据此将中国认作“知情者”，渲染中国要对这场冲突承担责任，至少是道义上的责任。二是渲染所谓的民主国家和“威权”主义冲突的问题，要求中国一起制裁俄罗斯，并认为中国如果不这样做就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要对中国进行连带制裁。三是认为中国应该从这场战争中汲取教训，一些欧洲人认为这场冲突是对中国的两岸政策包括未来台海关系走向的警示，尤其是让中国看到了西方制裁的威力，并对自身所处的现有的政治经济格局有正确的认知。

然而，这些负面舆论中所谓的“承担责任”“历史错误”“汲取教训”，实际上都是在着意显示西方对现代世界经济格局包括国际舆论格局，有很强的掌控力，认为这是他们的实力，要中国以此为基础重新对现状进行所谓的正确评估。

### （三）对中国的启示

俄乌冲突对全球的影响广泛而深刻，是历史分水岭事件，使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更具有现实的情景感，近期发生的许多国际事件都不如俄乌冲突这样使人身临其境。国际力量对比之变、国际体系与秩序之变、国家发展范式与价值之变等问题的紧迫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美国拉帮结派，逼迫很多国家选边站队，俄乌冲突成了二战后突出的地缘政治挑战。

印度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虽然一直被西方要求站队，但印度很好地保持了自己的战略中立，趁机购买了很多俄罗斯的石油。有统计显示，印度

在 2022 年 3 月至 4 月间购买的俄罗斯能源，接近 2021 年总购买量的 85%。印度既没有站队、保持了中立，又没有受到国际舆论的严重谴责。在目前的国际舆论场上，中国往往与俄罗斯捆绑在一起，被推上西方所谓的道德审判的法庭，被抹黑、攻击……甚至将中国作为所谓的“威权”一方加以审视。俄乌冲突客观上造成的世界大国之间的分化，更是一个需要警惕的现象。

目前很难评估俄乌冲突对中国的影响。冲突发生之初有西方媒体渲染中国是最大赢家的论调——讽刺中国表面上置身事外，其实从中受益。法国《费加罗报》的记者曾表示，中国是俄乌冲突最大的赢家——他们冷静地观察，注意到这不是文明的战争，而是血腥的家庭争吵，他们乐意学习各种课程，看到俄罗斯军队遇到的困难，钦佩乌克兰人在沟通方面的才能……

论及俄乌冲突的启示，首先，战争与冲突其实是大国竞争的悲剧。俄乌冲突事件陷入了许多人没有料到的持续，俄罗斯政府身陷其中。泽连斯基以及乌克兰精英人士在国际沟通方面较为突出的表现赢得了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舆论的高度认可。从短期收益来说，美国这一届政府获取了一定的现实利益，尤其是军工集团获取了巨额利益。但是，作为全球性的大国，美国的做法实际上是在过度使用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而仅凭借软实力方面的优势就想获得硬实力收益的做法是短暂而不可持续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对美国的国家声誉是一种损害。中国也面临很多现实的困难，尤其是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现在许多西方国家民众的对华态度出现了波动，造成很多沟通困难。欧洲是更大的受害者……目前看不到这场冲突的赢家，可以看到的更多是皆输的格局。

从国际传播、对外沟通、对外关系的角度来观察，在构建新时代的中国和世界的良好互动关系方面，俄乌冲突提醒我们需要深入思考。作为大国，需要做到言行一致，义利兼顾，占据道义的高点，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美国过度消耗自己历史形成的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这样的做法不可持续。做好自己的事情、经营好周边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错综复杂，俄乌冲突有待深入观察与研究。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抓住至 2035 年的发展战略机遇期，以及一些可能的重要战略窗口期……这些关键性的战略变量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

## 俄乌军事冲突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徐明棋\*

2022年的俄乌军事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导致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受阻；第二，助长和促进了逆全球化思潮高涨；第三，使全球经济治理陷入困境。

### （一）拖累世界经济复苏

俄乌冲突令世界经济复苏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障碍。如果俄乌冲突持续较长的时间，正在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衰退中走出来的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可能被打断，复苏的前景将变得更加艰难。俄乌军事冲突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冲击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第一，军事冲突导致能源、粮食价格上涨，使得全球通货膨胀压力雪上加霜。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原油出口国，也是第二大粮食出口国，乌克兰亦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和出口国。西方虽然没有对俄罗斯的能源和粮食出口进行全面限制，但是军事冲突引发的恐慌和金融制裁，以及俄罗斯对不友好国家的出口限制和应对西方国家金融制裁采取的措施，导致石油、天然气和粮食的出口有所下降，致使全球石油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目前石油价格仍然在每桶 110 美元以上徘徊，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了一倍多，粮食价格现在也是高位运行。能源、粮食是最基础的商品，一定会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美欧毫无节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导致美国和欧洲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 2022 年 3 月 CPI 同比上升至 8.5%，创下自 1982 年 1 月以来 40 年的历史新高。包括石油在内的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使全球通胀雪上加霜，毫无疑问会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俄乌军事冲突导致对世界经济普遍的悲观预期。尤其是在欧洲，陷入再次衰退的悲观情绪在蔓延。欧洲经济复苏势头原来就比美国差，在欧洲大陆内部爆发的战争不仅刺激欧盟增加军事开支，安置难民、支援乌克兰、

---

\* 徐明棋，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等，都进一步增加了欧盟的财政和金融负担。全球经济的预期增长幅度不断下调，2022 年 4 月，IMF 已经将 2022 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从 1 月份预测的 4.4% 下调至 3.6%，而欧元区更是从 3.9% 下调至 2.8%，是下调幅度最大的区域。根据目前的情况判断，2022 年下半年 IMF 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还会进一步下调，3.6% 的增长或许无法实现，而欧盟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跌至 2% 以下。一些金融机构甚至预测，2022 年欧盟的经济会出现衰退。经济预期与悲观情绪对经济的影响，历来有着前导和自我实现的机制，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的这一影响不可忽视。

第三，冲击国际贸易并导致全球经济下滑。不仅俄罗斯、乌克兰两国的国际贸易活动因为战争受损，金融制裁还导致很多其他国家与俄罗斯、乌克兰的贸易受阻。因为制裁会增加贸易成本，从而对贸易开展产生不利影响。跨国公司在俄乌的经营活动开始重组，纷纷撤出俄罗斯，减少投资，减少经营活动。原本的投资和经营活动会带动国际贸易，现在的撤资和退出经营将直接导致国际贸易活动减少。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为了减少未来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收缩投资、重组生产链和供应链会在更加广泛的区域展开，这也会对全球贸易产生负面影响。IMF 对 2022 年全球贸易增长率的预测，1 月份时为 6%，到 4 月份时下调到了 5%，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速下调了 1 个百分点，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增速更是下调了 1.7 个百分点。2022 年的出口增长速度还有进一步下调的可能。国际贸易是经济的重要推动力，贸易增长大幅度下滑，必然导致全球经济陷入低迷状态。

第四，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加剧。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将导致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避险情绪进一步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国公司、跨国的金融机构将会重新对全球的投资和所持有的资产进行风险评估和定价，从而引发相应的资产组合的调整和重新布局。这将引发主要国际货币汇率更多的波动。受通货膨胀高企的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转向，欧洲央行也将会跟进，这会导致美欧自身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的大幅度波动。俄乌冲突引发的跨国金融机构进行的资产组合调整与美联储以及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转向的影响叠加，将使得美欧乃至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债市更加动荡。金融市场动荡将对实体经济的活动产生



负面冲击。一些欧洲的金融机构受俄乌冲突的冲击已经发生严重亏损，欧洲的金融脆弱性将会进一步暴露，全球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必然是整个复苏进程放缓。

## （二）推动逆全球化的进程

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另外一重影响是推动了逆全球化的进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西方国家以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名义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组，现在获得了新的动力。跨国公司也不得不选边站，逆全球化的思潮在地缘政治冲突下进一步高涨。国际战略研究界和国际关系研究界的许多人都担心，全球将来可能会分化成两个集团、两个平行的市场。我虽然没有那么悲观，但是在一些特殊的产业，原来存在的全球供应链可能会被碎片化，逐步分化成不同集团的供应链，美欧设想的“朋友圈供应链”虽然无法全面推开，但是在一些被泛化了的国家安全相关性高的产业，如半导体芯片、新能源、机器人等，碎片化的倾向不能忽略。从全球的视角来看，这实际上就是逆全球化的过程。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注重的是效率优先。现在由于地缘政治的冲突，风险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安全性、政治正确对整个贸易投资产生了极大的反作用。经济基础受制于上层建筑，全球化将遭遇更多的阻力。

第二个层面是金融制裁导致很多非西方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对本国金融安全的担忧加剧，由此引发的直接反应就是推动更多区域、双边支付协定和支付渠道的安排。支付和金融的区域化、集团化，一定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负面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有两大动力，一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投资和生产活动，二是资金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流动。如果全球的资本流动因为西方的金融制裁以及衍生出来的安全风险和支付、金融的集团化倾向，必然会阻滞全球资本的流动，使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和流通都变得不便利。缺失了资本流动的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将大幅度下降，经济全球化也将因此受阻。

## （三）重创全球治理机制

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第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是重创全球经济治理。不少专家都提到，2022年的G20峰会可能会因为俄乌战争而难以召开。虽然2022

年 G20 峰会的主办国印尼在做努力，既邀请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又邀请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但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不想和俄罗斯坐在一起参加 G20 峰会，导致 2022 年的峰会能否顺利召开成为问题。即便最后能顺利召开，估计要取得成果也非常困难。G20 之所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平台，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世界各国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认识到我们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全球问题的冲击和挑战，如果不合作来共同应对，将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世界主要的经济体愿意暂时把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分歧搁置起来，共同努力来应对全球挑战，以寻求最大的共同利益。G20 因此逐渐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发挥了全球治理的重要作用。比如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防范和 risk 管控方面，在 G20 推动之下达成了具体的成果，成立了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将全球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纳入统一的监管框架。如果全球的金融市场因为地缘政治的冲突逐渐分割成碎片化、区域性、集团性的市场，G20 的作用必然难以继续发挥。这种负面冲击和影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 （四）俄乌军事冲突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不是冲突的当事方，但是受到了间接的冲击和负面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的影响是能源和粮食进口价格大幅度上升，导致中国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陡增。中国是全球石油和粮食第一大进口国，俄罗斯则是石油和粮食第二大出口国。虽然俄罗斯对我们的供应可能不会减少，但是价格在全球恐慌背景之下大幅度上涨，中国一样要承担高额的成本。举个简单的例子，2021 年中国进口了 5.13 亿吨的石油，如果每桶石油涨价 10 美元，中国就要多付出 360 亿美元的代价。现在石油价格在 110 美元之上徘徊，与 2021 年平均 70 多美元的价格相比上涨了 30-40 美元/桶。简单计算一下，2022 年中国将要因此多付出 1000 多亿美元的代价。2021 年中国进口天然气 1.21 亿吨，其中液化天然气 7893 万吨。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平均每吨天然气进口价格为 350 美元，2022 年 1-4 月，天然气的价格大约上涨了一倍。以每吨天然气价格上涨 350 美元计算，如果仍然维持 2021 年的进口规模，就要多付出 423 亿美元。由于能源在生产成本中的基础性地位，能源涨价给中国的 PPI 带来了很大的上涨压力，2022 年第一季度的 PPI 累计同比为 8.7%，

超过 2021 年全年的 8.1%。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扩散的影响，供应链不畅引起的价格上涨和能源价格上涨将使 2022 年下半年的 PPI 在高位运行，向 CPI 传导的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大。

粮食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进口成本大幅度上升，这对 CPI 有更加直接的传导作用。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国内已经有物价上涨的压力；俄乌冲突导致能源、粮食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使输入性的通胀与国内自身的通胀压力叠加，导致 2022 年下半年中国控制通胀的任务更加艰巨。

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是美国及其盟友利用俄乌冲突将中国渲染成地缘政治威胁，从而恶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的环境。现在中国被西方，尤其是美国，描绘成俄罗斯的盟友，与俄罗斯一样被认作威胁他们安全的敌手。曾经，中国崛起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当中还仅仅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最多把中国界定为制度对手；现在，西方却利用俄乌冲突把中国描绘成了未来的敌人，渲染所谓西方的威胁“今天是俄罗斯，明天是中国”。美欧利用这样的说辞，未必真的在寻找对中国开战或者采取极端措施的理由，但的确是在引导和带动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短期内的直接影响就是西方政客为了讨好民众，会对中国更加不友好。因此，对中国而言，在试图维持与西方国家合作共赢的关系时，尤其是在维持与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时，面对的难度和所需的成本都在增加。

第三个方面的影响与第二个负面影响相关，那就是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会考虑规避地缘政治风险，重组产业链、供应链的动机在增加，这对我们也是不利的。原本他们在中国的投资经营只是考虑经济利益，但现在受到一些媒体和反华势力利用俄乌冲突进行的鼓动，跨国公司要表现政治正确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有一些本来就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美欧公司高管们，很可能不再纯粹从经济利益和狭义的经营风险管控角度出发来决定投资和营运，他们将会更多地从地缘政治和所谓的安全角度考虑，夸大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亚太地区的冲突风险，从而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重组，进而损耗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

第四个负面影响是美国西方舆论试图把俄乌冲突与台湾问题联系起来，陷中国于被动。中国外交部已经明确表态，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没有任何

可比性。但是俄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给了西方反华势力有意混淆这两个问题的机会，引导亚太国家对我们采取更多的不利行动。

因此，俄乌军事冲突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基本上都是负面的，我不认为中国会从中获利。

当然，我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外部环境变化也并不十分悲观。我认为关键在于中国如何应对。中国仍然有足够的空间来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机会。如果中国能够保持定力，秉持对外开放、推动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即使外部的世界处于相对混乱的过程之中，中国也可以积极探寻很多推动经济合作的机会与空间。

现在大家似乎都忙于关注俄乌冲突，而事实上，非洲、东盟、拉美很多非西方国家并不想牵扯到俄乌冲突事件当中，他们在这一问题上与中国有着相同的观点和利益。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推动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来扩大经济利益，要积极推动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上一个新的台阶，通过更多的双边贸易投资协定，来巩固和发展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我们要继续发挥自身擅长的经济合作。在对外宣传和舆论攻势方面，我们要改进、要学习，但这不是短期内马上能取得突破和改观的。当前及今后，中国可以积极发挥自身在推动经济合作方面的专长，改变俄乌冲突这一危机事件对我们形成的不利影响。而这个专长能够得以发挥的机遇，就是中国进一步开放庞大国内市场的潜力，对绝大多数非西方（包括西方）国家仍然具有重大的吸引力。

美国目前试图在所谓“印太地区”推动“印太经济框架”，东盟、韩国和日本虽然都对此表示了加入的兴趣，但是他们也明确表示“这一经济框架”缺少美国市场准入和进一步开放美国市场的内容，因此，这个框架并不能取代 RCEP 和 CPTPP。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试图利用俄乌冲突来推动与中国脱钩之时，美国有力不从心之虞。美国两党目前甚嚣尘上的重商主义情绪，不允许美政府签署任何扩大美国市场准入的自由贸易协定，而这却是大多数亚太国家所期望的内容。

中国正好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提高自身的制度性开放水平，进一步放宽中国市场对亚太国家的准入，中国完全可以赢得经济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外部环境。

## 俄乌冲突与全球转型

冯绍雷\*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这场战争，与“转型”问题有着密切关联。

从国内转型来看，战争爆发后，有一些国际文献强调俄、乌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内涵的社会转型，前者强调本土，后者着眼欧美，这被认为是引发此次战争的动因之一。从区域角度来看，2014年后我曾经在自己的写作中提出，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各自推进的一体化虽然符合市场原则，但是也在不同程度上关注内部平等；对乌克兰的争夺，体现出各自为政的排他式区域建构，这也是克里米亚危机的诱因。而从全球的层面来看，伦敦经济学院的巴里·布赞教授的观点值得参考，他曾提出，从19世纪的殖民化、二战后的美国主导、冷战后美国的短暂独霸、一直到世纪之交后“去中心化”全球转型趋势的出现，很可能是俄乌冲突的深刻背景。因为，俄罗斯要终结单极世界，但是美欧则竭力维护西方主导，于是重启结盟，强劲反制。终于就在国际建构最为脆弱的安全领域——以乌克兰为聚焦点的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上——爆发了军事冲突。

这还仅仅是从当前危机的动因角度观察到的国内、区域、全球不同层面的转型起到的重要作用。动因，反映事态本质。但黑格尔也提示我们，本质不等于存在，而更应是一种反思。而转型研究就是要经过反思来探寻事态的深层本质。事实上，“转型”这一个术语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指涉，“改革”就是其中的一项内涵。首先，从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向以市场、民主、法制为内涵的体制，学习西方乃是其主要内容；同时，原苏联、东欧国家如何从事改革也是需要着重考察的内容。这也是四十多年前，中国的俄罗斯、欧亚研究的一大起源。

世纪之交的2001年，我在J.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我所在的欧洲系主任、美国的欧洲问题研究权威戴维·卡莱欧在一次谈话

---

\*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

中间我：你总是提到“转型”，那么，美国是否需要“转型”呢？事实上，当时不仅是卡莱欧，还有一批美欧学者都发出了西方社会本身需要一场改革的呼吁，其中包括大量深刻严肃的学术批评。由此看来，“转型”竟是一个全球过程。“9·11”事件爆发以后，尤其是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之后，一方面，西方社会的自我批评进一步深化；而另一方面，以新保守主义为代表、持相反主张的弘扬意识形态、回归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呼声高涨。而且，伴随着后者，在俄罗斯与欧亚地区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颜色革命”。围绕转型逐渐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的竞争与争议。

当前的俄乌战争，相当程度上是这一场全球转型及其争议的延续。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内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而言，全球转型类似于经济学领域经常提到的“外部性”——指的不仅是一种外部环境，还包括对内部转型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全球层面——作为一种治理体系，或者作为一种力量架构——本身也同时在发生着深刻、广泛的转型。国际、区域的转型与国家内部的转型，它们之间既各有特点，然而又密切相关。

就全球秩序的目标模式而言，一个关键问题是：当今世界将会延续美国或者西方的霸权秩序，还是会走向一个多元化、多样化、多极化的新时代？我认为，从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815 年《维也纳条约》、1945 年《雅尔塔协定》历次国际秩序构建的原则与实践来看，后者乃是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历史归宿。基辛格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是“欧洲内部的多元化”；而维也纳体系是不那么“民主”的、君主体制的欧亚诸列强之间的“大国协同”，但却大体维持了“百年和平”；至于雅尔塔体系就更是美苏等不同社会制度的大国之间的共处并存。虽然每一次重大的国际秩序转型几乎都指向了多元、多样、多极的趋势，但是就当下而言，在新旧体制力量对比呈现犬牙交错的过渡阶段，在虽有局部战争、但全球和平还没有被摧毁的历史条件下，尽可能地争取以和平与改革的方式实现新老共存、互补过渡，乃是合宜之举。

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当今世界是否必定要走向重新结盟与对抗？一方面，在欧洲和亚洲都实实在在地出现了美国重新结盟施压的新格局，甚至中国还被认为排名在俄罗斯之前的头号对手。于是有的观点认为，

在此拉帮结派的狂潮之下，中国只能以结盟进行回击。另一方面，鉴于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几年的巨大成就以及延续至今的中国与欧美之间巨大而深刻的经济、科技、社会、人文联系，因此也有的观点主张回到 20 世纪 80 年代，重新“韬光养晦”。两种不同的意见各执一词。然而，从俄乌战争关键时刻的实践来看，中国既没有轻易地走向结盟对抗，也没有重新“韬光养晦”。中国在尝试走一条既独立自主、不结盟，又恪守原则、并最大限度地将本国意向与国际稳定相关联的战略路线。与上述两种意见相比，这种战略路线会经受更多复杂环境的考验，操作上也需要更为细致微妙，从而也更为艰难。但是从长远来看，以中国目前国际地位所应承担的责任和自身的能力来看，这是一个更为允当的历史性选择。

结盟与不结盟看似是外交路线的问题，但事实上反映的却是全球转型的路径选择问题。值得关注的是，如《经济学人》刊发的文章所指出的，俄乌战争中，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主张不选边、不制裁的国家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二。这其中包括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国家、绝大部分东盟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就金砖国家而言，不仅这一次不选边、不制裁，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时、2008 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战争时也如此。尤其是印度，甚至早在 1956 年，当时印度谴责美英出兵苏伊士运河，但是并不谴责同年 10 月苏联出兵匈牙利。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国际史现象。

与全球转型相关联的国家内部转型进程，是转型研究的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但当前紧迫的是如何在出现国际对抗局势之下，选择国内转型路径的问题。老一辈专家学者经常会向我们提及，他们的同代人中很多人正是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不选择速胜路线，更不做投降派，而是下定坚忍不拔地打持久战的决心投入抗战的。我们当前面临着前所未见的强劲挑战，需要对若干种可能的前景做出重大选择，《论持久战》的原则依然是我们的重要理论与战略思想依据。要打好这场持久战，首先要勇于持续不懈地“自我革命”。借鉴大国历史经验，20 世纪 20 年代晚期大萧条背景下，若没有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就不会有美国摆脱危机和在大战中的获胜，更没有而后的主导世界。用《凯恩斯传》一书作者、斯基德尔斯基教授的话来说，

凯恩斯当时显然受到了早期苏联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同理，当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再次身陷困境时，若没有撒切尔与里根所倡导的私有化政策，就不可能掀动全球化进程，又一次引领世界潮流几十年。对于中国而言，若没有历史上的几次全面而深刻的“自我革命”，很难想象我们能够真正为世界事务、为人类做更大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太多内容需要在转型研究（包括后进转型国家经验教训的研究和欧美工业国家的当代转型研究）的过程中去反思和总结，以推进我们的现代化建设。

当代转型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但转型的基本面还有待继续推进：

第一，在全球化遭逢挑战而不得不改弦更张的情况下，是退守“堡垒”、隔绝交往，还是继续开放、改革？从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情况来看，连如此艰难条件之下的俄罗斯都不愿意开历史倒车。虽然说到容易做到难，但是我相信，20 世纪 90 年代曾有机会在莫斯科专家研究所就近了解的纳比乌琳娜（现任俄央行行长）首先不愿意这样做；而她背后的最大支持者就是普京。

第二，当代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重掀波澜，但两者是否水火不相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明确宣示，当今时代，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取代另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的时代。苏共二十大曾提倡“和平共处”，却未能避免在联合国大会上敲皮鞋，也未能避免古巴导弹危机，归根结底在于没有消除“埋葬意识”。因此，如果我们真正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切实付诸实践，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虽然其中必定还会包含着不可避免的竞争与博弈，但是最终完全有可能“化腐朽为神奇”。

第三，多年来强调的从高度集权体制向市场、法制、民主的转型，在现今条件下，内外环境、结构、取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转型的方向远非线性的，内涵也更复杂，但必定蕴含新的机遇和空间。比如，俄乌战争后，能源危机遍及全球。但是，随着俄罗斯能源供应从欧洲向亚洲的转移，这也意味着一个以能源为锚定物的国际货币计价格局，正在逐步发生变化，总体的转型路线如何与之相适应？另一个问题，从较长时间来看，减排去碳要求各国（包括俄罗斯）减少传统能源的比重。危机中的欧洲甚至连煤炭也得重新启用，但从长时间来看，当前的能源紧缺能否变坏事为好事，为减排去碳助力？尤其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疯狂制裁的背景下，被制裁国的进口



替代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在已出现较为普遍“脱钩”的态势下，新兴国家间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应该如何构建？根据最近关于实务交往的调研结果来看，在尽量减少既有欧美市场合作份额损失的前提下，通过尽可能多边、合规、创新的市场方式，从长计议地深化中俄经济合作，势不可免。但是目前上述合作还处在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中，有些困难并非来自西方的制裁，而是来自双方有待提升的认知水平。这是转型的新内涵。

最近，我浏览了一些比较严肃的国际学术出版物中有关转型研究的新成果。虽然一如既往地充满争议，但对三十年转型所做的总体评价更为具体而细致了。不仅 J.萨克斯那样的当年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代表性人物对“华盛顿共识”有着深刻反思与批判，而且关注转型初始条件、内外动力、绩效评估等实证考察也得出了更为多样化的结论。另外，长时段因素越来越介入转型进程。文明历史因素的切入使得转型更富纵深感。透过俄乌冲突，我们可以感受到，罗马帝国分裂千年以来东西方文明错综复杂的相互博弈仍在继续。海陆地缘政治的介入，使得转型研究超越了价值观的单一背景，处于与地缘政治经济的密切互动之中。世纪之交以来世界经济下行周期的出现，无疑大大加剧了全球转型中的大国激烈竞争。尤其需要强调，将各类转型融入全球转型的宏观结构之下加以叙述，这是新的进展。比如巴里·布赞和茨冈科夫关于全球转型研究的作品，侧重于大历史下各国转型过程的总体描述，侧重于国内、国际转型，以及连接两者的对外战略的多面向之间的互动。这非常有助于在一个更为宏阔的视野之下，对转型进程作出相互关联的、系统性的、而不是碎片化的分析。

多年来，欧美学界对西方俄苏学术研究的传统范式也进行了深刻反思。二十年前，欧美学术界一再自问：为何对苏联解体这么大的事件一无预见？进入 21 世纪后，西方出现大量反思：“转型研究”因何未能使原苏联东欧改革全都获得预期的效应？在国家体制转型过程中（如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是否不能摆脱必经战争的路径？最近很多欧美权威学者都对自己未能准确预见俄乌战争的突发而公开自我批评。这一切都预示，很有必要对以往三十年俄罗斯欧亚转型做一番认真的总结与反思：有哪些正面的经验，有哪些需要调整到一个更为宽广和务实、深入且有效的转型研究的新范式。

转型研究本身，也需要转型。

在思考俄乌战争时，我曾尝试把战争与体制转型相关联地加以观察。

在最近两百年的历史中，每次世界规模的大战（1812 年欧洲反拿破仑战争、一战、二战）总是以俄苏获胜告终（一战中苏联的脱颖而出也可视为一次重大成功），然后国力增长，国际地位上升；而与此相反，近两百年来俄国每次周边战争几乎都失利，并激起了俄罗斯国内的重大改革。如，19 世纪 50 年代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导致了 1861 年农奴制改革等绵延几十年的重大变化；1904 年日俄战争失败导致了 1905 年宪政改革；1920 年波苏战争失败间接导致了 1921 年的新经济政策；1979 年阿富汗战争导致戈尔巴乔夫改革。由此我提出假设：如果本次俄乌战争以既不胜、也不败的结果告终，俄乌双方（实际上是俄罗斯与北约）大体打成平手，那么将可能导致俄罗斯社会既不是国力大增、地位提升，也不是失败背景下激起国内的重大改革、特别是自由化改革，而是比较长长期地延续目前体制状态，所谓或软、或硬的“威权主义路线”。换言之，俄罗斯既不会回到高度集权的原苏联，也不会走向西方民主；既不会完全封闭，而且还会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追求开放与合作，但也不会回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放任式自由经济”。总之，会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在两者之间徘徊。这样一种尚不成熟的假设的提出，是尝试对战争与国内转型这两件事情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一番初步的逻辑推演。

由此，当下的俄乌冲突事件和世界局势的变化，实际上需要转型研究的与时俱进，需要在更为宽泛的视野中将更多研究对象与对象间的关系纳入我们的知识架构。中国需要保持定力，需要对与当前各类争端、基本走向相关的各种基本理论、基本范畴有深刻的研究，并对当前形势、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客观合理、公平公正的中国见解。

---

**【Abstract】** Since Russia began the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in the Donbas region in February 2022,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major event affecting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It is a realistic and situational embodiment of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conflict is also the result of intensification of the long-term crisis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collision of regional processes during global transformation. It has an impact of extreme importance on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plexity of changes are unprecedented either in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ower or in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order or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paradigms and values. Meanwhile,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is actually a contest between great powers, that is,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hegemonic position,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s Ukraine to wage a hybrid warfare against Russia, Europe and even its “allies”. The purpose is to hit Russia, contain Europe, kidnap “allies” and threaten China. The re-ideologicalization, re-militarization, and re-groupization caused by this conflict are making globalization difficult, severely damaging global governance mechanism. Wars should not be the way to solve problems, nor should sanctions be the first choice to end wars. China is willing to play a bigger role in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security 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 Domestically, China should actively enhance it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institutional openness, so as to win a st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xternal commun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relations, China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language global media and develop good interaction with the world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Russia-Ukraine Conflict,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Russia-U.S. Relations, Russia-Europ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Аннотация】** С тех пор, как в феврале 2022 года Россия начала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на Донбассе,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всё больш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важным событием, влияющим на тенденции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и ситуативное воплощение крупных невидимых перемен в столетии.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являет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обострения многолетнего кризиса в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и результатом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переходном периоде и оказывает всестороннее влияние на глобаль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балансе сил, изменени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е и порядк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парадигмах и ценностях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ы по слож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фактическ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состязание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то есть для сохранения своего гегемонистск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Соединённые Штаты Америки используют Украину для начала схватки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Европы и даже «союзников» с целью сильно ударить по России, сдержать Европу, похитить «союзников» и угрожать Китаю. Повторная идеология,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я и повторная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вызванные этим конфликтом, затрудняют развитие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и наносят серьёзный ущерб механизму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Война не должна быть способом реш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и санкции не являются первым средством решения войны. Китай готов играть более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поддержании мир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действии развитию во всём мире.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й должен активно укреплять свой независимый инновацио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и повышать уровень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открытости, с целью завоевать стабильную внешнюю среду, необходимую дл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общения и постро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итай должен активно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позиц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и развивать хорошие интерактив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миром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глоб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США,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Европ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

(责任编辑 宋羽竹)

# 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市场的影响 及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响应\*

韩冬 钟钰\*\*

**【内容提要】**俄罗斯与乌克兰是国际上重要的粮食生产与出口大国，在全球粮食市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2022年年初开始的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价格、供求和种植等方面均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暴露出中国油料作物、饲料作物在进口环节所面临的潜在风险。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地缘矛盾对于中国保障粮食安全具有较强的警示意义。中国要警惕全面制裁带来的粮油供应不足，重新评估利用国际市场维护粮食安全的风险和难度，防备种子、能源、物流等因素对粮食市场的溢出效应等。为此，中国应当牢牢树立粮食安全主动权思维，积极采取进口来源多元化、参与全球粮食贸易规则制定等措施，全面提升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

**【关键词】**俄乌冲突 全球粮食市场 中国粮食安全 中国粮食生产与贸易

**【中图分类号】**F326.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3-0055(26)

## 一、引言

粮食安全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中国政府历来重视粮食问题，多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将“粮食”作为政府核心工作之一。当前，中国粮食生产能力极大提升，粮食产量站稳了1.3万亿斤台阶，不仅解决了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还提升了中国人民的满足感、安全感，更成为实现“中国梦”的物质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耕地-技术-政策融合视角的‘两藏’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A056）、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项目批准号：10-IAED-01-2022）、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新发展格局下河南省粮食产业安全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22240041018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审稿人和编辑部的修改建议！

\*\* 韩冬，河南工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钟钰（通讯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  
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基础和精神底气。然而，中国粮食产业和粮食安全深受国际市场影响，不仅存在对外依存度高、进口来源集中、国内外价格倒挂等问题，而且地缘冲突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不容忽视。地缘冲突多表现为战争、恐怖主义以及国家间的紧张局势，<sup>①</sup>其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往往容易导致政策失效与市场失灵，进而引发粮食市场动荡，对各国粮食产业发展和国际贸易造成负面影响。

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影响，国际经济仍未完全复苏，全球粮食生产与贸易尚未回暖，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大粮食出口国之间爆发的剧烈军事冲突，再次给全球粮食市场带来了严重不利影响。2022 年 2 月 24 日俄乌冲突爆发，随后国际局势震荡、全球股市下挫、汇率波动、油价上涨，全球粮食价格也一路攀升。俄乌冲突爆发前一日，美国芝加哥期货市场小麦、玉米报价分别为 891.40、681.00 美分/蒲式耳，爆发当日即上升至 930.20、692.00 美分/蒲式耳。<sup>②</sup>且随着冲突持续，全球谷物价格指数超过 170，达到该指数创立以来的最高点。俄乌两国为北非、中东、南亚等地区多个国家提供了大量粮食，是维护国际粮食供需平衡的重要力量。冲突爆发后，俄乌两国政府执行严格的粮食禁运措施，其他传统的粮食出口国，如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匈牙利、印度等也采取了粮食出口管制措施，全球粮食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更加深刻，<sup>③</sup>全球饥饿问题更为严重。<sup>④</sup>

国际粮食市场异常波动，势必会通过供应链向中国市场传导。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粮食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中国大豆始终依赖国际市场，玉米供需近年来也出现较大缺口，进口量持续攀升。<sup>⑤</sup>俄乌冲突引发的国际环境动荡、全球粮食价格剧烈波动，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粮食供给与价格稳定。现有研究指出，地缘冲突会造成粮食市场紊乱、价格剧烈波动，<sup>⑥</sup>但对中国

① D. Caldarad, M. Iacoviello, “Measuring Geopolitical Risk”,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 2018, Vol.1222, No.3, pp.4-5.

② 数据来源：布瑞克农产品数据库。

③ R.N. Womdim, *Sustainable Crop Production and COVID-19*, Rome: FAO, 2020, p.1.

④ FAO, IFAD, UNICEF, et al.,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21*, Rome: FAO, 2021, pp.4-7.

⑤ 刘慧、钟钰：“更高水平开放下我国玉米进口增加的驱动因素与应对建议”，《经济纵横》，2022 年第 2 期，第 92 页。

⑥ J.R. Tarrant、李晨曦、吴克宁：“粮食能不能作为武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粮食贸易禁运”，《世界农业》，2016 年第 12 期，第 65 页。

粮食市场受到的冲击以及应对措施缺乏系统性的探讨。本次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市场、中国粮食市场造成了何种影响？其他国家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中国应当如何保障自身粮食安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评估地缘冲突对全球及中国粮食市场的系统影响，也有助于探讨地缘政治风险下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响应。本文拟首先分析俄乌在全球粮食市场中的地位，接着探讨冲突对俄乌两国、全球粮食市场、中国粮食市场的影响，最后在总结他国应对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防范地缘政治风险、维护粮食安全提出建议。

## 二、俄罗斯、乌克兰在全球粮食市场中的地位

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市场的巨大影响，与两国在其中的地位密不可分。俄罗斯、乌克兰对于全球粮食市场的重要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从产量看，是全球重要“粮仓”

俄罗斯地域辽阔，是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农业用地约占国土面积的13%，并且拥有全球面积最大的黑土带，农业生产先天条件优越。近年来，俄罗斯持续增加农业投入、扩大播种面积和推广农业技术，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占据国际小麦出口量的近五分之一。小麦是俄罗斯的主要粮食作物，2021年俄罗斯粮食产量达1.21亿吨，其中小麦产量为0.76亿吨。如图1所示，近十年来俄罗斯小麦产量上升趋势明显，增幅达100.16%；占全球小麦产量的比重也快速上升，2017年达到11.17%的最高点，2021年为9.72%。除小麦外，黑麦、大麦等也是俄罗斯的主要农作物。

乌克兰地处平原，土壤肥沃，农业用地占国土面积的近70%，还拥有世界近30%的黑土地，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的生产。乌克兰被誉为“欧洲粮仓”，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大量粮食。玉米和小麦是乌克兰的主要粮食作物。近十年来，乌克兰占全球玉米产量的比重在2.5%-3.5%之间，2021年达到3.47%，产量为4190万吨；乌克兰占全球小麦产量的比重在2.5%-4%之间，2021年达到4.25%，产量为3300万吨。<sup>①</sup>

<sup>①</sup>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数据库（<https://apps.fas.usda.gov/psdonline/app/index.html#/app/home/statsByCountry>）。



图 1 俄罗斯小麦产量及占全球小麦产量比重 (2012-2021 年)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库(<https://apps.fas.usda.gov/psdonline/app/index.html#/app/home/statsByCountry>)的数据整理绘制。

## (二) 从出口量看, 向全球多个地区输出粮食

俄乌不仅是粮食生产大国, 也是粮食出口大国, 这与两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和消费量相对有限有关。即, 两国农作物特别是粮食产量高, 但是消费量低, 因此能够用于出口的货物量多。

从表 1 可见, 近十年来, 乌克兰占全球玉米出口量的比重在 15% 左右, 乌俄两国共出口了全球近六分之一的玉米。俄罗斯占全球小麦出口量的比重为 20% 左右, 乌克兰为 10% 左右, 俄乌两国共出口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小麦。按照 2020 年世界人均粮食消费量 353 公斤计算, 俄乌两国玉米和小麦出口量可以养活全球近 2.4 亿人口。除小麦和玉米外, 2021 年俄乌在大麦、油菜籽、葵花籽和葵花油等重要农产品的出口规模上, 位居全球前三,<sup>①</sup>其影响也不可忽视。

① “粮农组织提醒防范全球粮食供应风险”, 中国商务新闻网, 2022 年 3 月 24 日, [https://www.comnews.cn/content/2022-03/24/content\\_4576.html](https://www.comnews.cn/content/2022-03/24/content_4576.html)



表 1 俄乌占全球玉米、小麦出口量比重（2012-2021 年）

| 年度   | 占全球玉米出口量比重（%） |       |       | 占全球小麦出口量比重（%） |       |       |
|------|---------------|-------|-------|---------------|-------|-------|
|      | 俄罗斯           | 乌克兰   | 合计    | 俄罗斯           | 乌克兰   | 合计    |
| 2012 | 2.02          | 13.38 | 15.40 | 8.22          | 5.24  | 13.46 |
| 2013 | 3.20          | 15.26 | 18.46 | 11.19         | 5.88  | 17.07 |
| 2014 | 2.27          | 13.87 | 16.14 | 13.87         | 6.85  | 20.72 |
| 2015 | 3.92          | 13.85 | 17.77 | 14.78         | 10.09 | 24.87 |
| 2016 | 3.49          | 13.29 | 16.78 | 15.16         | 9.87  | 25.03 |
| 2017 | 3.72          | 12.13 | 15.85 | 22.68         | 9.72  | 32.40 |
| 2018 | 1.52          | 16.69 | 18.21 | 20.65         | 9.22  | 29.87 |
| 2019 | 2.37          | 16.85 | 19.22 | 18.01         | 10.97 | 28.98 |
| 2020 | 2.19          | 13.13 | 15.32 | 19.29         | 8.32  | 27.61 |
| 2021 | 2.25          | 13.76 | 16.01 | 16.93         | 11.61 | 28.54 |

资料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库 (<https://comtrade.un.org/data/>) 的数据计算整理。

2020 年俄乌两国大麦、油菜籽、葵花籽和葵花油的出口情况，如表 2 所示，可见这两个国家还是全球重要的大麦及油料出口大国，出口量排名靠前，占全球总出口量的比例较高，尤其是葵花油，两国相加贡献了全球 76.68% 的出口量。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大麦、葵花籽的出口量占比之和也分别达到了 28.70%、22.38%。

因此，俄乌两国不仅在全球粮食市场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在油料市场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表 2 俄乌两国 2020 年度大麦及油料作物、葵花油出口情况

| 类别  | 出口量（万吨） |        | 出口量全球排名 |     | 占全球总出口量的比例（%） |       |
|-----|---------|--------|---------|-----|---------------|-------|
|     | 俄罗斯     | 乌克兰    | 俄罗斯     | 乌克兰 | 俄罗斯           | 乌克兰   |
| 大麦  | 496.34  | 504.63 | 3       | 2   | 14.23         | 14.47 |
| 油菜籽 | 64.69   | 238.25 | 7       | 2   | 2.70          | 9.97  |
| 葵花籽 | 136.99  | 18.79  | 2       | 10  | 19.68         | 2.70  |
| 葵花油 | 249.49  | 620.58 | 2       | 1   | 21.99         | 54.69 |

资料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库 (<https://comtrade.un.org/data/>) 的数据计算整理。

### （三）从供应对象看，维持了北非亚洲等地区的粮食稳定

俄乌是全球粮食出口大国，主要出口至北非、中东、南亚地区的低收入缺粮国，对于维持这些国家的粮食供给起着重要作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指出，全球约 50 个国家和地区高度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供应，包括非洲、亚洲等地一些最不发达国家或低收入国家。<sup>①</sup>从表 3 中部分国家对俄乌两国小麦的依赖度可见，孟加拉国、埃及、土耳其、苏丹等均是小麦净进口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这些国家主要的小麦进口来源，其大部分消费量由俄乌两国提供。2020 年，孟加拉国小麦消费量的近 80% 来源于俄乌两国，埃及、土耳其、苏丹约 50% 的小麦消费量自俄乌两国进口，菲律宾为三分之一，南非、韩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为 10% 左右。

表 3 2020 年部分国家对俄乌小麦的依赖度

| 国家    | 消费量  | 小麦（万吨） |       | 进口量/消费量（%） |       | 合计    |
|-------|------|--------|-------|------------|-------|-------|
|       |      | 进口乌克兰  | 进口俄罗斯 | 乌克兰        | 俄罗斯   |       |
| 孟加拉国  | 438  | 152    | 194   | 34.57      | 44.30 | 78.87 |
| 埃及    | 2060 | 308    | 823   | 14.93      | 40.07 | 55.00 |
| 土耳其   | 2060 | 100    | 790   | 4.87       | 38.35 | 43.22 |
| 苏丹    | 338  | 11     | 133   | 3.24       | 39.43 | 42.67 |
| 菲律宾   | 353  | 63     | 56    | 17.91      | 15.72 | 33.63 |
| 尼日利亚  | 526  | 0      | 100   | 0.00       | 18.98 | 18.98 |
| 南非    | 368  | 6      | 55    | 1.63       | 15.06 | 16.69 |
| 韩国    | 355  | 32     | 8     | 9.08       | 2.31  | 11.39 |
| 巴基斯坦  | 2620 | 124    | 117   | 4.75       | 4.48  | 9.23  |
| 沙特阿拉伯 | 350  | 6      | 25    | 1.83       | 7.04  | 8.87  |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库(<https://apps.fas.usda.gov/psdonline/app/index.html#/app/home/statsByCountry>) 的数据计算整理。

从表 4 中部分国家对俄乌两国玉米的依赖度可见，伊朗、埃及、荷兰、黎巴嫩等均是玉米净进口国，且其大部分消费量由俄乌两国提供。2019 年，来源于俄乌两国的玉米进口量，在伊朗市场超过当年消费量的 148.40%，在

<sup>①</sup> “冲突持续制裁加码 警惕‘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新华网，2022 年 3 月 28 日，[http://www.news.cn/world/2022-03/28/c\\_1128511041.htm](http://www.news.cn/world/2022-03/28/c_1128511041.htm)

埃及为近 90%，在荷兰与黎巴嫩为 60% 以上，在西班牙为三分之一，在土耳其、阿塞拜疆为五分之一，在韩国、以色列为 10% 左右。

表 4 2019 年部分国家对俄乌玉米的依赖度<sup>①</sup>

| 国家    | 玉米（万吨） |       |       | 进口量/消费量（%） |       |        |
|-------|--------|-------|-------|------------|-------|--------|
|       | 消费量    | 进口乌克兰 | 进口俄罗斯 | 乌克兰        | 俄罗斯   | 合计     |
| 伊朗    | 183    | 96    | 176   | 52.48      | 95.92 | 148.40 |
| 埃及    | 437    | 388   | 0     | 88.82      | 0.00  | 88.82  |
| 荷兰    | 509    | 379   | 0     | 74.35      | 0.00  | 74.35  |
| 黎巴嫩   | 45     | 27    | 2     | 60.25      | 4.17  | 64.42  |
| 西班牙   | 1320   | 410   | 0     | 31.08      | 0.00  | 31.08  |
| 阿尔及利亚 | 344    | 95    | 0     | 27.57      | 0.00  | 27.57  |
| 土耳其   | 1557   | 284   | 57    | 18.24      | 3.65  | 21.89  |
| 阿塞拜疆  | 36     | 0     | 7     | 0.00       | 19.21 | 19.21  |
| 韩国    | 839    | 91    | 15    | 10.88      | 1.75  | 12.63  |
| 以色列   | 1126   | 127   | 0     | 11.30      | 0.00  | 11.30  |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库（<https://www.fao.org/faostat/zh/#home>）的数据计算整理。

#### （四）从生产资料看，是全球重要供应者

俄乌不仅是主要的粮食生产与出口国，还是农作物肥料的主要供应国。氮磷钾肥是粮食生产的基础肥料，2019 年俄罗斯氮磷钾化肥生产量为 756.57 万吨，约占全球产量的 30%，为第二大氮磷钾化肥生产国。<sup>②</sup>从表 5 中可见，2019-2021 年，全球化肥出口金额分别为 564.60、523.18、416.21 亿美元，俄罗斯占全球化肥出口金额的比重分别为 14.88%、13.35%、24.76%，俄乌两国合计为 15.28%、14.08%、24.91%。俄罗斯、乌克兰两国占全球化肥出口贸易总额的近四分之一，是全球化肥供应的主要力量。此外，俄罗斯还是世界重要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出口大国，为全球粮食生产和加工提供必需的生产资料。

① 因为美国农业部没有公布各国的玉米消费量，故采用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库（<https://www.fao.org/faostat/zh/#data>）的最新数据（2019 年）。

②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库（<https://www.fao.org/faostat/zh/#data/RFB>）的相关最新数据计算所得。

表 5 2019-2021 年俄乌化肥出口情况

| 年度   | 化肥出口金额（亿美元） |        |      | 占全球出口金额比重（%） |      |       |
|------|-------------|--------|------|--------------|------|-------|
|      | 全球          | 俄罗斯    | 乌克兰  | 俄罗斯          | 乌克兰  | 合计    |
| 2019 | 564.60      | 84.02  | 2.25 | 14.88        | 0.40 | 15.28 |
| 2020 | 523.81      | 69.95  | 3.77 | 13.35        | 0.72 | 14.07 |
| 2021 | 416.21      | 103.06 | 6.33 | 24.76        | 0.15 | 24.91 |

资料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库 (<https://comtrade.un.org/data/>) 的数据计算整理。

### 三、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市场的影响

从上文分析可见，俄乌不仅是全球重要的粮食生产地和出口地，在保障全球粮食供需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还是粮食生产资料，如化肥、能源的出口大国。也正因为如此，俄乌冲突不仅对俄罗斯、乌克兰两国的粮食市场造成了不利影响，还形成了对全球粮食市场的溢出效应。

#### （一）俄乌冲突对两国粮食产业的影响

##### 1. 冲突损毁、劳动力流失等阻碍粮食收获与播种

冲突造成乌克兰冬收粮食减少。由于农作物直接损毁、进入农田通道受限或缺乏收获作物的手段，乌克兰至少 20% 的冬季播种面积可能无法收获，冬小麦的情况尤为突出。<sup>①</sup>被誉为“欧洲粮仓”的乌克兰，大部分小麦种植在东南部，该地区也是遭受炮击最严重的地方。冲突持续跨越乌克兰冬收与春耕时期，大量种粮农民撤离至其他国家，劳动力短缺限制了粮食冬收与春耕工作的开展。乌克兰农业政策和粮食部将 2022 年全国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从 1692 万公顷下调至 1344 万公顷，玉米播种面积预计为 330 万公顷，比上年减少近 40%。<sup>②</sup>美国农业部预测，受冲突持续的影响，2022/2023 年度乌克兰小麦产量预计为 2150 万吨，比 2021/2022 年度减少 1150 万吨。<sup>③</sup>

##### 2. 港口封锁、经济制裁等限制粮食运输与出口

冲突爆发后，乌克兰重要港口如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等均被封锁，

① “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三月大幅跃升”，2022 年 4 月 8 日，<https://www.fao.org/newsroom/detail/fao-food-price-index-posts-significant-leap-in-march/zh>

② “燃料肥料短缺 粮食面临大幅减产”，《经济参考报》，2022 年 4 月 15 日。

③ “World Agricultural Supply Demand and Estimates - May 2022”，USDA, May 12, 2022, <https://www.fas.usda.gov/data/briefing-slides-may-2022-wasde>

乌国内陆路运输出现中断，粮食仓储和农产品加工等基础设施也遭到破坏，严重阻碍了粮食运输与出口。由于产量减少、物流严重受限，预计乌克兰2022/2023年度的小麦出口量为1000万吨，与上年度相比大幅下降。此外，俄罗斯遭受西方诸多制裁，粮食贸易也受到影响。如西方国家将部分俄罗斯银行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之外，并对俄罗斯央行实施限制措施，还禁止对俄罗斯出口相关设备等，严重阻碍了俄罗斯正常的粮食出口贸易。冲突引发的港口封锁、金融及贸易制裁等多方面的影响，致使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粮食出口受阻，2021/2022年度全球谷物贸易量将比2020/2021年度低2.6%。<sup>①</sup>

### 3. 限制种子贸易，制约粮食增产

2022年3月14日，德国拜耳集团宣布将停止在俄罗斯的“所有非必要业务”。德国拜耳是世界知名的种子生产与销售商，2020年在全球种业市场的份额为20%，居于首位。拜耳公司长期向俄罗斯销售农作物种子，包括玉米、大豆、油菜和小麦种子。俄罗斯种子对外依赖度较高，玉米种子进口份额占播种量的比例约为60%，油菜籽为88%，甜菜近100%。俄罗斯农业部门预计，如果制裁持续，未来俄罗斯甜菜、玉米和向日葵等作物种子可能会出现困难。西方企业限制与俄罗斯的种子贸易，可能会对俄罗斯的粮食种植与生产造成影响。即使俄罗斯能用国产种子替代，短期内也会因质量不佳而造成产量下降。<sup>②</sup>

## （二）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市场的溢出效应

### 1. 生产资料减少

一方面，俄乌两国受冲突、经济制裁等因素的影响，粮食产量和出口量下降已成定局。另一方面，俄乌两国对化肥、能源等生产资料的出口限制可能导致多个国家粮食减产。2022年3月10日，俄罗斯表示将禁止向“对俄不友好”的国家和地区出口化肥；3月12日，乌克兰宣布暂时禁止出口所

<sup>①</sup> “2022/23年度世界谷物产量、消费量、库存量与贸易量预计均将收缩”，联合国粮农组织官方网站，2022年6月3日，<https://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csdb/zh/>

<sup>②</sup> “俄罗斯种业遭西方‘卡脖子’，许钦铎：俄罗斯种业对西方公司的依赖性特别大”，央视网，2022年4月19日，<https://news.cctv.com/2022/04/19/VIDE7dAhxelXWJMiTBeje3NO220419.shtml>

有类型的化肥，包括氮、磷、钾化肥和复合肥料。叠加此前白俄罗斯钾肥被禁止出口，全球合计约 30% 以上的钾肥供应受到影响。化肥是保障粮食产量的关键生产资料，俄罗斯、乌克兰及白俄罗斯对化肥出口进行限制，导致国际化肥价格上涨、供应量短缺，势必给全球粮食生产带来长期不利影响。目前，埃及尿素离岸价达 1100 美元/吨，美国新奥尔良港尿素离岸价为 900 美元/吨，均创历史新高，磷肥、钾肥价格也大幅上涨。<sup>①</sup>严重依赖从俄罗斯进口肥料的国家包括粮食和高价值农产品出口大国，如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哈萨克斯坦等（见表 6）。随着化肥价格大幅上涨，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者已经无法平衡成本收益，2022/2023 年度春播的不确定性较大。

表 6 2020 年部分国家进口俄罗斯化肥占进口总量的比例（%）

| 国家    | 2020 年 |       |       |
|-------|--------|-------|-------|
|       | 氮肥     | 磷肥    | 钾肥    |
| 巴西    | 21.25  | /     | 27.40 |
| 阿根廷   | 13.73  | /     | 20.77 |
| 澳大利亚  | 8.22   | /     | /     |
| 加拿大   | 22.39  | /     | 11.90 |
| 哈萨克斯坦 | 81.05  | 38.24 | 34.81 |

资料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库 (<https://comtrade.un.org/data/>) 的数据计算整理。

## 2. 粮食供求趋紧

(1) 贸易中断引发供应减少与区域供需失衡。俄乌冲突爆发后，受到供应链中断影响，俄乌两国粮食对外供应量大幅减少。从全球范围看，粮食生产量与消费量虽能够保持平衡，<sup>②</sup>但从具体区域来看，部分地区将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一方面，俄乌粮食长期出口至北非、中东和南亚地区最不发达国家，两国对外粮食供应的减少，对这些国家的粮食供应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如苏丹国内的小麦供应依赖从黑海地区的进口，俄乌冲突爆发后，苏丹小麦进口受限，国内小麦价格同比上涨 180%。2022 年，苏丹国内将有 30%

① 周和平：“今年春耕肥价历史最高”，《中国石油和化工产业观察》，2022 年第 4 期，第 55 页。

② “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四月有所回落”，联合国粮农组织官方网站，2022 年 5 月 6 日，<https://www.fao.org/newsroom/detail/fao-food-price-index-eases-in-april/zh>

左右的人口难以维持生计，1090 万民众急需援助，人数为近十年来之最。<sup>①</sup>也门所需粮食也几乎完全依赖进口，进口小麦中的 30% 来自乌克兰。2022 年下半年，也门面临灾难性饥饿状况的民众人数，将从目前的 3 万人扩大到 16 万人。<sup>②</sup>另一方面，一些粮食主产国纷纷出台粮食出口限制措施，进一步压低了全球粮食市场的供应量，导致粮食净进口国失去了稳定的进口来源。对俄乌两国粮食依赖较强的国家，短期内难以找到合适的进口替代国以弥补俄乌缺口，因此这些国家将面临严重的缺粮问题。除此以外，全球能源价格快速上涨，为了缓解能源价格的上涨压力，美国政府已经允许销售混合乙醇含量更高的汽油，这将导致更多的玉米被用于生产乙醇。<sup>③</sup>粮食用途结构的改变，进一步增加了全球粮食的供应压力。

表 7 俄乌冲突爆发后部分国家粮食等出口限制措施

| 国家   | 时间        | 措施                     |
|------|-----------|------------------------|
| 俄罗斯  | 2022.3.10 | 禁止向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出口谷物、糖类     |
| 俄罗斯  | 2022.3.10 | 禁止向“对俄不友好”国家和地区出口化肥    |
| 乌克兰  | 2022.3.8  | 禁止出口燕麦、小米、荞麦、糖、盐、小麦、牛肉 |
| 乌克兰  | 2022.3.12 | 禁止出口化肥                 |
| 白俄罗斯 | 2022.3.12 | 禁止出口大米、面粉及面食           |
| 阿根廷  | 2022.3.13 | 停止豆油和豆粕的出口销售登记         |
| 塞尔维亚 | 2022.3.10 | 禁止出口小麦、玉米、面粉和食用油       |
| 埃及   | 2022.3.11 | 禁止出口扁豆、意大利面、小麦、面粉和蚕豆   |
| 埃及   | 2022.3.12 | 禁止出口植物油和玉米             |
| 印度   | 2022.5.13 | 禁止出口小麦                 |
| 印度   | 2022.6.1  | 食糖出口管制                 |

① “联合国粮农组织加大行动力度，努力消除乌克兰战争的潜在影响，应对急剧恶化的重度粮食不安全形势”，联合国粮农组织官方网站，2022 年 5 月 31 日，<https://www.fao.org/newsroom/detail/the-sudan-fao-scales-up-response-to-soaring-acute-food-insecurity-exacerbated-by-potential-impacts-of-the-war-in-ukraine/zh>

② “也门：救助资金告急，重度饥饿状况空前严峻”，联合国粮农组织官方网站，2022 年 3 月 14 日，<https://www.fao.org/newsroom/detail/yemen-acute-hunger-at-unprecedented-levels-as-funding-dries-up/zh>

③ “对俄制裁使美国食品价格涨幅创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之最”，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网站，2022 年 4 月 27 日，<https://sputniknews.cn/20220427/1041137939.html>

(2) 政策干预引发出口限制与供应短缺。地缘冲突爆发后, 各国政府实施政策干预粮食市场, 会改变原有的粮食供需关系。<sup>①</sup>在俄乌冲突、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下, 全球粮食生产与价格面临严重不确定性, 多个主要粮食生产国开始限制出口, 以优先保障本国需求量、抑制国内价格波动。除俄乌两国外, 白俄罗斯、阿根廷、塞尔维亚、埃及、印度等国纷纷出台了粮食出口限制措施(见上表 7)。政府间的粮食出口限制措施, 降低了全球市场上的粮食供应量, 导致预期短缺变成实际短缺, 并进一步推高国际粮食价格, 从而形成对全球粮食市场更为严重的冲击。

### 3. 粮食价格飙升

(1) 地缘冲突引发价格异动。地缘政治风险, 尤其是战争等突发事件, 往往会对粮食市场造成异常影响。冲突带来粮食禁运, 并沿国际贸易链条影响国际粮食供需, 引发国际能源价格上涨从而推动粮食价格上涨。全球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快速提升, 导致粮食加工、物流等多环节成本增加。在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 全球粮价出现了新一轮的快速上涨。从表 8 中可见, 全球粮食市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价格上涨现象。与 2022 年 2 月 23 日相比, 2 月 24 日俄乌冲突当天, 各类农产品期货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小麦涨幅最高, 为 5.65%。2022 年 2 月 24 日至 6 月 1 日期间, CBOT 小麦、玉米主力合约价格涨幅分别为 11.41%、5.94%, 大豆、豆粕、豆油、稻谷和棕榈油涨幅分别为 2.19%、-11.23%、8.53%、11.15% 和 5.38%。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1 日, CBOT 小麦、玉米报价涨幅分别已达 37.36%、23.72%, 大豆、豆粕、豆油、稻谷和棕榈油涨幅为 24.70%、-2.64%、38.44%、17.08% 和 34.21%, 小麦、稻谷价格涨幅位居前列。

中国农产品价格同样出现了快速上涨, 除粳米价格变化不大外, 其他农产品价格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尤其是中国每年需大量进口的大豆、豆粕、豆油, 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至 6 月 1 日期间, 主力合约成交价格涨幅分别为 22.23%、3.89%、11.24%;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1 日涨幅分别为 44.85%、27.63%、30.89%, 环比涨幅分别为 48.44%、16.86%、35.88%。

---

<sup>①</sup> 李俊茹、石自忠、胡向东: “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影响”,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6 期, 第 17 页。



表 8 国内外农产品期货市场主力合约涨跌（2022 年上半年）

| 市场  | 品种   | 单位  | 涨幅(%)     |          |         |                                  |       |
|-----|------|-----|-----------|----------|---------|----------------------------------|-------|
|     |      |     | 2.23-2.24 | 2.24-6.1 | 1.1-6.1 | 环比涨幅(%)<br>2021.6.1<br>-2022.6.1 |       |
| 国际  | CBOT | 小麦  | 美分/蒲式耳    | 5.65     | 11.41   | 37.36                            | 63.35 |
|     | CBOT | 玉米  | 美分/蒲式耳    | 1.32     | 5.94    | 23.72                            | 6.19  |
|     | CBOT | 大豆  | 美分/蒲式耳    | -1.02    | 2.19    | 24.70                            | 9.16  |
|     | CBOT | 豆粕  | 美元/短吨     | -1.32    | -11.23  | -2.64                            | 3.51  |
|     | CBOT | 豆油  | 美分/磅      | 1.97     | 8.53    | 38.44                            | 15.91 |
|     | CBOT | 稻谷  | 美元/英担     | 0.46     | 11.15   | 17.08                            | 28.97 |
|     | BMD  | 棕榈油 | 令吉/吨      | 2.43     | 5.38    | 34.21                            | 62.01 |
|     | 国内   | DCE | 大豆        | 元/吨      | -1.25   | 22.23                            | 44.85 |
| DCE |      | 豆粕  | 元/吨       | 3.15     | 3.89    | 27.63                            | 16.86 |
| DCE |      | 豆油  | 元/吨       | 3.46     | 11.24   | 30.89                            | 35.88 |
| DCE |      | 粳米  | 元/吨       | 0.00     | -2.23   | 0.30                             | -5.57 |
| 郑商所 |      | 强麦  | 元/吨       | 9.43     | 6.56    | 19.25                            | 27.82 |
| 郑商所 |      | 普麦  | 元/吨       | 0.00     | 21.29   | 21.29                            | 18.65 |
| 郑商所 |      | 菜籽  | 元/吨       | 0.32     | 12.27   | 13.59                            | 16.31 |
| 郑商所 |      | 菜油  | 元/吨       | 3.15     | 9.32    | 15.36                            | 33.97 |
| DCE | 棕榈油  | 元/吨 | 3.69      | 4.27     | 36.54   | 56.28                            |       |

资料来源：根据布瑞克农产品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2）供应偏紧导致粮价持续高位运行。俄乌冲突与气候危机、经济危机、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多重因素叠加，无疑加重了全球粮食供应压力，并导致粮价持续高位运行。而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的蔓延导致交通管制、市场分割等也影响了全球粮食供应。<sup>①</sup>此外，草地贪夜蛾持续在全球快速扩散引发粮食减产，<sup>②</sup>热浪与干旱的复合并发导致粮食产量下降。<sup>③</sup>如美国南部农业

① 胡迪、杨向阳：“后疫情时代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取向与策略选择”，《农业经济问题》，2021年第1期，第42-43页。

② “草地贪夜蛾防控全球行动扩大范围并延期至2023年年底”，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2021年7月25日，<https://www.fao.org/newsroom/detail/fao-global-action-for-fall-armyworm-control-extended-to-end-of-2023-with-broader-scope/zh>

③ 王婉：“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愈发复杂”，《中国气象报》，2022年3月10日第3版。

主产区得克萨斯州正面临 2011 年以来的最严重的干旱，法国小麦主产区 2022 年 1-5 月平均降水量只有以往年度的 70%。印度正面临持续极端热浪天气。病虫害、极端气候影响着多个国家的粮食生产，俄乌冲突则暴露出全球粮食体系的相互关联性和脆弱性。在多重因素导致粮食供应偏紧的情况下，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在 2022 年 3 月创下历史最高水平，尽管 2022 年 4 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较 3 月下降了 0.8%，但仍较上年同期高出 29.8%。<sup>①</sup>

(3) 粮价高企形成传导效应。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带来了更为严重的传导效应。首先，全球粮价持续高位运行，引发了下游产业发展受阻。随着全球粮价持续上涨，以小麦、玉米等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动物饲料也出现了价格上涨，给下游养殖业、畜牧业发展带来较大影响。如意大利畜牧业，因其主要饲料玉米进口自乌克兰而面临严重的经营危机。其次，粮价持续高位运行引发低收入国家更为严重的饥饿问题。俄乌冲突爆发前，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已蔓延两年多，诸多发展中国家本就面临严重的经济下行压力，俄乌冲突所导致的粮价大幅上涨，进一步加大了这些国家的粮食进口成本，也加重了贫困人口获取粮食的经济负担。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预测表明，到 2023 年，由于俄乌冲突造成的长期食物不足的人数可能将增加 1880 万，全球将有约 2 亿人面临粮食危机。<sup>②</sup>

综上所述，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作为生存之源，粮食产业波动影响着全球的稳定与发展；作为百价之基，尽管粮食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较低的位置，但粮食价格变动必然引发其他产业共振。粮食贸易将世界各国联系在了一起，区域冲突所引发的粮食危机容易蔓延至全球。由于农作物播种、生长与收获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势必还将持续。

俄乌冲突在对全球粮食安全与贸易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到中国的粮食安全。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难以置身事外。

① “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四月有所回落”，联合国粮农组织官方网站，2022 年 5 月 6 日，<https://www.fao.org/newsroom/detail/fao-food-price-index-eases-in-april/zh>

② “农业是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保障：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并讲话”，联合国粮农组织官方网站，2022 年 5 月 19 日，<https://www.fao.org/newsroom/detail/un-security-council-meeting-agriculture-is-key-to-lasting-peace-and-security-fao-says/zh>

## 四、俄乌冲突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及警示

### （一）中国与俄乌两国的粮食贸易情况

俄乌是中国重要的粮食及生产资料外部来源。如表 9 所示，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粮食及生产资料包括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化肥等，从乌克兰主要进口玉米、大豆等。乌克兰是中国重要的玉米进口国之一，占中国玉米进口总量的比例一度超过 80%。中国对俄罗斯化肥的依赖也较强，近三年来，化肥进口量的约四分之一来源于俄罗斯。氮肥、磷肥、钾肥是粮食生产中最重要的一种化肥，中国氮肥、磷肥已自给自足，但钾肥需要进口。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钾肥需求国，2021 年的产量、进口量分别为 650 万吨、756.6 万吨，进口量的 80% 以上来自加拿大、俄罗斯和白俄罗斯。<sup>①</sup>此外，2021 年中国石油进口量的 15.5% 来自俄罗斯，<sup>②</sup>且随着中俄天然气管道的建成与投入使用，俄罗斯也成为中国重要的天然气来源国。由此可见，俄乌既是中国重要的粮食来源，也是化肥、能源等生产资料的外部来源，其供应环境的稳定是中国粮食稳产保供的外部因素之一，对中国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表 9 俄乌在中国粮食、化肥进口市场的占比（单位：%）

| 年度   | 稻谷   |      | 小麦   |       | 玉米   |      | 大豆    |     | 化肥  |     |
|------|------|------|------|-------|------|------|-------|-----|-----|-----|
|      | 俄罗斯  | 乌克兰  | 俄罗斯  | 乌克兰   | 俄罗斯  | 乌克兰  | 俄罗斯   | 乌克兰 | 俄罗斯 | 乌克兰 |
| 2019 | 0.02 | 1.46 | 1.45 | 86.36 | 0.83 | 0.02 | 21.55 | /   |     |     |
| 2020 | 0.01 | 0.88 | 1.22 | 55.76 | 0.69 | 0.06 | 22.73 | /   |     |     |
| 2021 | 0.00 | 0.50 | 0.31 | 29.05 | 0.57 | 0.00 | 27.92 | /   |     |     |

资料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库 (<https://comtrade.un.org/data/>) 的数据计算整理。

### （二）俄乌冲突对中国粮食市场的影响

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全球粮食价格不断上涨，供应紧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更是加剧了全球粮食市场的混乱。“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俄乌冲突及其对全球粮食市场的溢出效应，势必对中国粮食市场造成一定影响。

① 李琳佳、青木、倪浩、柳玉鹏：“俄白化肥出口受限，谁的粮食歉收？”《环球时报》，2022 年 4 月 21 日第 11 版。

② 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库 (<https://comtrade.un.org/data/>) 的数据计算整理。

### 1. 玉米等粮食进口稳定性受到冲击

中国超过一半以上的进口玉米来自乌克兰，而 2022-2023 年乌克兰玉米的产量和出口量下降已成定局。近年来中国玉米需求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2020 年玉米进口量首次突破关税限额，供需缺口还可能继续扩大。中国亟须找到新的贸易伙伴以填补乌克兰在中国玉米市场中的缺失份额，这增加了中国玉米进口来源的不确定性。乌克兰玉米出口量下降已经导致国际玉米价格上涨，这也影响到了中国进口玉米的成本。中国化肥对俄罗斯的依赖较强，俄罗斯化肥出口限制也可能对中国进口化肥数量和来源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 2. 油料、饲料用粮等进口价格大幅上涨

中国油料、饲料用粮对国际市场依赖性较强，其价格容易受到国际市场因素影响。以大豆为例，中国进口大豆约占大豆消费总量的 85%，且进口大豆主要用于榨取豆油和生产豆粕，是油料、饲料用粮的主要来源。如表 8 中所示，国内大豆、豆粕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至 6 月 1 日期间，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涨幅为 22.23%、3.89%；1 月 1 日至 6 月 1 日涨幅为 44.85%、27.63%（同期的豆油主力合约价格涨幅也高达 30.89%）。豆粕价格上涨沿产业链条波及下游饲料企业、畜牧业和养殖业等。国内尿素期货价格已从 2022 年 2 月 24 日的 2376 元/吨上涨至 6 月 1 日的 3161 元/吨，涨幅为 33.04%。<sup>①</sup>国内饲料行业已对饲料价格进行了三次价格普调，累计涨幅达每吨 200 元，但仍然难以抵消每吨 350-400 元的成本涨幅，<sup>②</sup>饲料业、畜牧业和养殖业面临运营困难。此外，国内菜籽油、棕榈油 2022 年 2 月 24 日至 6 月 1 日期间，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也分别出现了 9.32%、4.27% 的涨幅。

俄罗斯是中国葵花籽油的主要进口来源，2020、2021 年，俄罗斯占中国葵花籽油进口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37.68% 和 28.33%。<sup>③</sup>2022 年 4 月，进口葵花籽油的价格指数相较于上年均值已上涨了 39.2%。<sup>④</sup>

① 数据来源：国泰安数据库（<https://www.gtarsc.com/>）。

② 邵海鹏：“今年饲料价格已上调至少三次 豆粕涨价带来哪些连锁反应？”《第一财经日报》，2022 年 4 月 1 日第 7 版。

③ 根据 UN COMTRADE 官方网站（<https://comtrade.un.org/data/>）的数据计算所得。

④ “2022 年 4 月份全国进口商品贸易环比指数（HS4 分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官方网站，2022 年 5 月 25 日，<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gk/2799825/302274/myzs75/zgdwmyzs/4244121/4356865/index.html>

### 3. 粮食生产成本快速上涨

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提高了中国的粮食生产成本。一是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粮食生产过程中耗费的水、电、燃料等成本明显上涨，增加了粮食生产投入。二是化肥价格上涨加大了农民的种粮成本。作为粮食种植中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化肥价格持续上涨无疑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截至 2022 年 3 月底，国内尿素、氯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 37.95% 和 86.64%。<sup>①</sup>农药、农膜的价格也在走高，例如，草甘膦价格较往年上涨了 200%。<sup>②</sup>三是持续的通胀压力导致粮食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农用机械等价格均出现上涨。在美元持续放水、境外通胀不断输入的情况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并传导至国内，使得农用机械、劳动力成本随之上升。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中国的粮食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实现“保障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目标将面临更多挑战。

### 4. 国际市场环境恶化

中国粮食供给长期处于“紧平衡”，维护中国粮食安全需要依靠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力量。<sup>③</sup>从国际市场来看，当前国际环境不断恶化，供需结构性失衡更为严重，主要粮食生产国纷纷采取措施限制粮食出口，势必影响到中国粮食外部来源的稳定性，中国利用国际市场维护本国粮食安全的难度和风险都将进一步加大。

综上所述，俄乌冲突及其对全球粮食市场的溢出效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粮食安全，尤其是中国油料、饲料用粮进口风险大幅提升。中国油料、饲料用粮面临市场价格上涨、进口稳定性下降等诸多问题。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动物源性食物将是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风险敞口。<sup>④</sup>

① 田耿文：“化肥价格大幅上涨 多方协力稳价保供”，《农村金融时报》，2022 年 4 月 11 日第 4 版，<http://epaper.zhgnj.com/html/2022-04-11/42827.html>

② 张琳、王国刚、毛世平：“俄乌冲突对我国农业生产资料的影响”，《中国发展观察》，2022 年第 4 期，<https://cdo.developpress.com/?p=12955>

③ 韩冬、李光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格局演变与影响机制——基于社会学视角”，《农业经济问题》，2020 年第 8 期，第 24 页。

④ 李国祥：“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农业影响”，《东岳论丛》，2020 年第 4 期，第 25 页。

### （三）俄乌冲突对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警示

俄乌冲突给全球粮食市场带来诸多负面冲击，也影响到中国粮食市场的稳定。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局势不稳、地缘冲突频现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全面制裁，部分国家管制粮食出口，对中国持续保障自身粮食安全具有明显的警示作用。

#### 1. 警惕西方国家全面制裁带来的粮油供应不足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了新一轮制裁，包括冻结外汇、没收海外资产、禁止使用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等多种方式，给俄罗斯开展粮食贸易带来了严重限制。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的范围之广、手段之多，需要中国予以高度警惕。

中国与俄罗斯国情不同，俄罗斯是粮食生产与净出口大国，在西方的制裁与封锁下粮食能够自给自足。但中国长期粮食净进口，粮食供需处于“紧平衡”。中国人口多、耕地少，为保障口粮绝对安全，油料作物、饲料作物不得不大量依赖进口。中国大豆对外依赖度长期保持在 80% 以上，<sup>①</sup>玉米替代品也需大量进口。<sup>②</sup>油料、饲料作物对外依赖性强，国际市场已经成为保障中国粮食供需平衡的重要渠道。中国粮食和油料的自给率只有三分之二，如果全球出现物流停摆等现象，中国粮食供给将面临巨大压力。<sup>③</sup>当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粮食贸易往来正常，但中美之间经贸摩擦不断，中国同样面临一定的地缘政治风险。若中美对抗加剧，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方位制裁，中国无法正常开展国际贸易活动，中国粮食供给势必受到严重影响，继而可能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自 2018 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国对中国高科技领域“卡脖子”已持续至今，即使未来西方不对中国全方位制裁，也须警惕在种业、绿色农药等农业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限制。

① 李光泗、韩冬：“竞争结构、市场势力与国际粮食市场定价权——基于国际大豆市场的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20 年第 9 期，第 34 页。

② 焦玉平、崔守军、焦长权：“加入 WTO 二十年：玉米进出口贸易格局变迁及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学术论坛》，2021 年第 6 期，第 28 页。

③ 曹宝明、唐丽霞、胡冰川、赵霞：“全球粮食危机与中国粮食安全”，《国际经济评论》，2021 年第 2 期，第 11 页。

## 2. 重新评估中国利用国际市场维护自身粮食安全的风险和难度

自加入 WTO 以来，中国逐步加深了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全球多数国家维持着良好的贸易关系，国际市场也已成为中国粮食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中国人民对于“吃得好”的需求逐渐旺盛，海外优质食品正逐步融入中国人民的日常饮食中。但是，国际市场环境日趋复杂，西方国家与中国在意识形态、贸易往来中的冲突愈发增多且有长期化的趋势。西方国家“抱团”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全方位的，若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类似制裁措施，如限制中国开展国际粮食贸易、没收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粮食业务投资等，中国粮食的稳定供给将面临很多困难。面对潜在的各类冲突，中国应当将地缘政治风险纳入到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中，重新评估利用国际市场维护自身粮食安全的难度。同时，也应当认识到，随着当前及今后世界范围内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增多，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以及全球粮食金融化和能源化属性增强，中国利用国际市场维护自身粮食安全的风险和难度还会继续加大。

## 3. 防备种子、能源、物流等因素对粮食市场的溢出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超过 1.3 万亿斤，良种的保障作用不容忽视，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超过 45%。<sup>①</sup>德国著名种子集团拜耳集团限制对俄罗斯、白俄罗斯的种子出口业务，对俄白粮食生产造成不利影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种子市场，也是种子净进口国，2021 年中国种子贸易逆差 3.5 亿美元。<sup>②</sup>另外，能源市场对粮食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值得关注。粮食生产、流通、加工等环节都离不开能源，能源价格是粮价上涨的重要推手，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极易传导至国内并推动粮食价格上涨。此外，流通渠道受限对粮食市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乌克兰港口被封锁直接限制其粮食出口，并造成了国际粮食市场供应不足。面对可能发生的地缘冲突、西方国家与中国经贸合作的“硬脱钩”，中国应当重视种子、能源、物流等因素对粮食市场的溢出效应。若西方国家限制对中国的种子出口、能源出口业务，切断中国粮食海外流通渠道，势必对中国粮食生

① 郁静娴：“种子是粮食安全的关键”，《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15 日第 18 版。

② 丁玎：“维护粮食安全，中国扩大种子基地”，《环球时报》，2022 年 4 月 27 日第 6 版。

产、流通、加工等全产业链造成影响，带来粮食产量下降、生产成本上升、进口受限等多重负面效应，最终影响中国粮食的稳定供应。

#### 4. 重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引发的进口困难

面对日益不稳定的全球供应链，为保障本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多国出台了粮食出口限制政策，以优先保障自身粮食安全。除俄罗斯、乌克兰外，印度、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等国也开始禁止小麦出口。随着地缘冲突的持续，粮食和食用油短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将会推动更多的国家实行贸易保护措施。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尤其是全球主要粮食出口国的贸易限制措施，势必增加中国进口粮食以及食用油的难度。因此，若再次出现重大地缘冲突、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各国秉持“本国优先”原则而引起贸易保护的全球性蔓延，中国大豆、玉米及玉米替代品、能源等大宗商品从哪里进口，是必须予以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 5. 关注粮食危机向其他领域的扩散

粮食种植与生产是一个经济再生产（投入/产出）和自然再生产（作物生长）相互交织的过程，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也正因为如此，军事冲突造成的粮食损毁，进而形成的供给不足将是长期的。俄乌冲突对 2022/2023 年度全球粮食供给的危害是肯定的，如果冲突持续，2023/2024 年度全球粮食生产与贸易将继续受到严重危害。<sup>①</sup>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粮食安全相互依赖，<sup>②</sup>区域性的粮食危机很可能传导至全球，形成更加严重的政治经济难题。目前，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粮食供需结构性失衡、价格上涨已经造成了低收入国家饥饿人口不断增加。若粮食供给不足持续、饥饿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妥善解决，就极易转化成更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全球性粮食危机与政治经济问题都有可能通过产业链传导至中国国内，给中国维护粮食安全造成不利影响。此外，若因地缘政治冲突、经济制裁等导致中国粮食供应的不稳定，还容易带来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

① 易小准、李晓、盛斌、杨宏伟、曹宝明、徐坡岭：“俄乌冲突对国际经贸格局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22 年第 3 期，第 30 页。

② 王国敏、侯守杰：“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粮食安全：矛盾诊断及破解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第 120 页。



## 6. 提防国际因素对动物源性食物安全的影响

在中国“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指引下，中国稻谷、小麦完全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但是受制于资源环境约束、水土耕地承载压力，中国油料和饲料作物长期依赖进口。且随着中国居民饮食需求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人均谷物消费量已经逐步下降，肉蛋奶消费量持续上升，动物源性食物在中国居民饮食中所占的比例日益提高。尽管中国主粮价格变动较为平稳，但食用油、豆粕等油脂油料和饲料价格上涨极为明显，也导致了下游畜牧业、养殖业面临着较大的成本压力，这一事实深刻反映出国际因素对中国动物源性食物安全的显著影响。提防国际因素向中国动物源性食物的传导，是中国维护粮食安全的关键之一。

## 五、地缘政治风险下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策略选择

俄乌冲突不仅凸显了国际粮食供需体系的脆弱，也反映出地缘冲突对全球粮食市场的重大影响。为应对俄乌冲突引发的粮价上涨与供给不足，部分国家出台了多项应对措施。如埃及宣布从2022年3月11日起禁止小麦、蚕豆、扁豆、意大利面和各种面粉出口三个月，同时拓展包括美国、阿根廷、加拿大、巴拉圭在内的更多小麦进口渠道，还将出售带有国家补贴性质的食品以降低民众负担。土耳其政府宣布降低基本食品增值税，同时大幅提高每月最低工资和退休人员养老金。<sup>①</sup>印度、阿尔及利亚、约旦和摩洛哥等国正在积极寻找新的进口来源。<sup>②</sup>2022年3月23日欧盟委员会决定临时允许农户使用休耕地扩大耕种面积，增加欧盟农业生产，减轻乌克兰农作物减产对市场的影响。此外，欧盟还将向27个成员国分发5亿欧元，帮助受到俄乌冲突影响的农业生产者。<sup>③</sup>上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应对措施，为地缘政治风险下中国如何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参考。尽管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整体有保

① “多重因素致中东粮食涨价 主要进口国布局粮食安全”，新华网，2022年3月21日，[http://www.news.cn/fortune/2022-03/21/c\\_1128488589.htm](http://www.news.cn/fortune/2022-03/21/c_1128488589.htm)

② “冲突持续制裁加码 警惕‘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新华网，2022年3月28日，[http://www.news.cn/world/2022-03/28/c\\_1128511041.htm](http://www.news.cn/world/2022-03/28/c_1128511041.htm)

③ “全球粮食市场正出现一些新变局！”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官方网站，2022年3月28日，[http://lswz.hebei.gov.cn/ljsc/sczx/202203/t20220328\\_54302.html](http://lswz.hebei.gov.cn/ljsc/sczx/202203/t20220328_54302.html)

障，但作为油料、饲料作物及能源净进口大国，中国必须重视地缘政治风险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完善自身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以应对国际环境的恶化。

第一，牢牢树立粮食安全主动权思维。在全球经济增长复苏势头放缓、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和俄乌冲突走势不明朗的大环境下，全球粮食供需不平衡性加剧，饥饿人口持续增多，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也愈演愈烈。为此，必须认识到国际市场存在诸多风险，利用国际市场保障自身粮食供需平衡的难度和风险在不断加大。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在粮食、能源方面的自给自足，是其得以应对西方国家制裁的关键。因此，中国必须将粮食安全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具体而言，首先要坚持“口粮绝对安全”战略不放松，确保“中国碗主要装中国粮”。其次，全方位评估中国与西方经贸关系“硬脱钩”对中国粮食市场的影响，并提早采取响应防范措施，如主动选择地缘政治风险较低、与中国友好相处的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从源头上降低国际市场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再次，加强对国际风险的监测、预警和评估，及时采取防范措施，降低自然灾害等其他突发事件通过国际市场传导至中国粮食市场，主动化解国际循环对国内循环的压力，利用好国际市场，持续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第二，继续积极参与全球粮食贸易和规则制定。首先，面对不确定的外部市场，中国应当更积极地参与全球化，做全球化的坚定推动者，坚持促进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贸易伙伴关系，达成“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贸易格局，降低西方对我国实行全方位制裁的可能性。其次，中国还应当积极参与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加快促成更多的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贸易协定，提升中国在全球粮食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降低可能的西方制裁对中国的影响。再次，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发展友好经贸关系的典范，推动更多国家加入，发挥中国在区域贸易关系中的引导地位，能够为中国提供更多稳定的粮食来源。同时，积极向面临饥饿威胁的地区提供农业技术支持。一方面，可以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向饥饿地区提供一定数量的粮食援助；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粮食供需处于紧平衡，难以为饥饿地区直接提供大量粮食，但可以向面临饥饿威胁的地区提供种粮技术援助。如中国已经在非洲开展了多年技

术援助，不断提升非洲国家粮食自主生产能力和农业技术水平，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推动减贫，贡献了中国力量。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未来中国可向更多面临饥饿威胁的地区提供农业技术支持，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爱心为维护全球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第三，着力解决粮食产业的“卡脖子”问题。种子是粮食生产的源头，也是粮食产业发展的关键，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离不开粮种国产化。因此，中国必须着力于种业科技攻关，不断推出优质粮种，避免在粮食生产环节被西方“卡脖子”。能源安全也是维护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促进能源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稳定化，同时加快提高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科技水平，降低中国能源的对外依赖程度，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坚持进口来源多元化不动摇。在现有资源、技术水平的约束下，中国依赖国际市场满足油料作物、饲料作物需求的趋势难以改变，因此，要格外重视进口来源的多元化。除大豆对外依存度高达 85% 左右且进口来源高度集中外，国内玉米供求关系已经从过剩转向短缺，2020 年供需缺口超过 1500 万吨。<sup>①</sup>中国玉米进口高度依赖乌克兰，同样面临较大的国际市场风险。中国坚持进口来源多元化不动摇，尤其需要注重大豆和玉米进口的多元化，继续拓展大豆、玉米等作物新的进口渠道，降低进口集中度，避免因一国或几国减产、断供导致中国大豆玉米供需失衡。俄罗斯是粮食生产与出口大国，中国可以继续加强与俄罗斯的粮食贸易往来，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此外，降低大豆、玉米的对外依存度，也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方面。

第五，优化粮食流通和储备体系。作为粮食进口大国，中国需要加强粮食流通保障措施，尤其是保持海外运输渠道的通畅。要重点关注全球粮食贸易动向和航运条件变化，及时评估流通渠道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经巴拿马运河运输的大豆占中国大豆进口总量的近 40%，经马六甲海峡运输的大豆比例高达 40% 以上。<sup>②</sup>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是保障大豆进口安全的关键运输节点，必要时中国可增强在这些地区的护航力量，保障大豆等进口流通

<sup>①</sup> 黄季焜：“对近期与中长期中国粮食安全的再认识”，《农业经济问题》，2021 年第 1 期，第 20-23 页。

<sup>②</sup> 朱晶、臧星月、李天祥：“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粮食安全风险及其防范”，《中国农村经济》，2021 年第 9 期，第 10 页。

的稳定。另外，在中国仍需依靠国际市场维护粮食供需平衡之际，必要的粮食储备是稳定中国社会与民心的“定海神针”。本轮粮食危机再次证明了中国保有粮食储备的必要性。因此，中国要继续完善粮食储备制度和储备体系，优化粮食储备技术与设备，降低储备成本，同时增加成品粮储备，保证在突发事件下粮食“供得上”。

此外，政府还要积极关注国内市场动向，及时向居民提供信息，谨防市场恐慌和居民大量囤粮行为，消解信息不完全带来的市场失灵，全力避免粮食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

第六，坚定不移推动“两藏”战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为中国发掘粮食生产新动能、推动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首先，城镇化进程客观上使得耕地资源越来越稀缺，中国粮食产量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逐步缩小。本轮粮食危机中，欧盟启用休耕地扩大耕种面积以实现粮食增产的举措也再次提醒我们，提升土地质量、完善土地休耕轮耕制度，确保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保障一国粮食长久安全的重要预备。其次，继续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实施大豆扩种行动，推进粮豆合理轮作，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再次，继续提升科技在粮食产业中的贡献率，如推广无人机应用、研发草地贪夜蛾防范技术等等，以科技带动粮食单产提升和增强抗风险能力。

因此，要坚定不移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将耕地的可持续生产与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作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动能。

第七，引导居民树立健康的饮食观念。中国是粮食消费大国，也是油料、饲料作物的进口大国，近年来中国居民对肉蛋奶消费需求的快速提升，是中国油料、饲料作物大量进口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方面，鼓励居民减少食物浪费、践行“光盘行动”，减少高油高糖高盐食品摄入、平衡膳食，引导居民树立健康的饮食观念；另一方面，引导粮食加工企业、餐饮企业减少过度加工、降低加工中的损耗，提供“小份”餐食。通过需求端的节约，降低中国油料、饲料作物的对外依赖程度。

2022 年的俄乌冲突给全球粮食市场、中国粮食安全带来的警示意义是明显的。关键在于推出周全的应对政策并践行，以维护国家长期的粮食安全。

**【Abstract】** As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xport powerhouses, Russia and Ukraine have important positions in global food market.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which began in early 2022, has had extremely negative consequences on global food prices, supply and planting. It has also exposed potential risks in China's oil and feed crops during importation. The geographical contradiction, represented by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has strong implications for China to ensure its food security. China should be alert to the shortage of grain and oil supplies caused by comprehensive sanctions, re-evaluate risks and difficulties in maintaining food security via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prevent spillover effects of such factors as seeds, energy, logistics on the grain market. To this end, China should firmly establish the idea of taking initiatives in food security, and actively take measures including diversifying import sources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formulation of global grain trade rules,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capabilities in taking advantage of "two markets and two resources" to ensure its food security.

**【Key Words】** Russia-Ukraine Conflict, Global Food Market, China's Food Security, China's Food Production and Trade

**【Аннотация】** Россия и Украина являются важными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ями и экспортёрами зерна в мире и занимают важное место на мировом рынке зерна.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начавшийся в начале 2022 года, оказал серьёзное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мировые цены на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е, спрос и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посевные площади, а также выявил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е риски, с которыми сталкиваются китайские масличные и кормовые культуры в процессе импорта.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ое конфликтом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предупредите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Китая в плане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итай должен быть готов к нехватке зерна и нефти, вызванной всеобъемлющими санкциями, должен переоценить риски и трудност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рынка для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предотвратить побочные эффекты влияния семян, энергии, логистики и других факторов на зерновой рынок. С этой целью Китай должен твёрдо утвердить идею взять на себя инициативу в област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ктивно принимать такие меры, как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я источников импорта и участие в разработке правил глобаль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зерном, чтобы всесторонне улучшить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два рынки и два ресурса»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глобальный рынок зерна,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Кита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и торговля зерном в Китае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欧亚空间研究

## 俄帝国史与古今之变： 以近代俄罗斯与中亚草原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施 越\*\*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帝国”概念生发的诸多理论成为讨论俄罗斯史的重要框架。国内外学界对帝国的论述可分为文明帝国论、资本帝国论和多元帝国论三类范式。多元帝国论为冷战后欧美学界书写俄帝国史的基本史观。本文从18-20世纪初俄国与中亚草原地区互动的具体历史经验出发，指出多元帝国论存在忽视帝国近代转型的问题。在回顾18世纪30年代、19世纪20年代、19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初四个主要历史时段俄国对中亚草原政策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俄国在征服和统治中亚草原的进程中，并未刻意在该地区维持多元治理架构，而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管理体制改革和19世纪末的移民政策之下，将草原地区逐步整合入帝国版图。从上述历史事实出发，本文尝试以近代转型视角补充现有的帝国理论，强调区分讨论“古典帝国”与“现代帝国”的必要性及理论意义。

**【关键词】**俄罗斯帝国 帝国理论 帝国研究 中亚草原 “欧亚革命”

**【中图分类号】**K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3-0081(28)

2014年6月4日，在访问法国的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并没有恢复俄罗斯帝国的计划，相反，俄罗斯只希望在自己的边界内发展国家：“我们想发展我们的国家，当然了，在自己的国境线内。但是，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也想同世界许多地区其他国家一样，能利用现代手段，包括通过经济一体化，来提高我们的竞争力。我们是在后苏联空间海

\* 本文系2020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哈萨克斯坦近代历史研究”（项目批准号：20LSC01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审稿人的建议！

\*\* 施越，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关联盟框架内，现在也是在欧亚联盟框架内，（我们）正是这样做的。”<sup>①</sup>与此相呼应，2015 年欧亚经济联盟启动后，普京在 2015 年 4 月 16 日与俄罗斯民众举行年度“直播连线”时再度表示，“俄罗斯没有帝国野心”。<sup>②</sup>尽管俄当局避免将本国的外交政策与帝国概念挂钩，但随着近年来俄罗斯周边地区热点事件不断，各国学界难免从帝国视角出发阐释时局。<sup>③</sup>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学界围绕“帝国”一词形成了诸多探讨俄罗斯历史与当下的学说。由开篇普京总统的言论可见，部分学说通过媒体渗透入国际舆论场，对俄罗斯联邦当局的内外政策形成了一定的话语压力。历史研究既是对过往某一具体人物、事件或进程的考察，其在客观上也就为理解当下的现象提供概念工具、理论框架和参照观点。因此，研究以帝国理论探讨俄罗斯史（下文简称“俄帝国史”）这一学术潮流，既有益于从理论层面思考各类视角的利弊，也有助于理解当下国际政治中话语与外交政策之间的互动。首先，本文将围绕帝国概念衍生的各类话语区分为三类理论，并着重探讨“多元帝国论”对俄罗斯史的解读。其次，本文以 18-20 世纪初俄国与中亚草原地区互动的重要历史片段为例，强调 18 世纪后半期“欧亚革命”对于俄帝国与中亚草原的关系以及对俄帝国自身的塑造作用。由此，本文认为，以多元帝国论为史观的俄帝国史研究，须在理论层面重视“古今之变”的问题，即 18 世纪后半期以降欧洲的地缘政治变动、工业革命和观念变迁实际上推动着俄罗斯从“古典帝国”转型为“现代帝国”。

## 一、三种帝国理论视角下的俄罗斯史

欧美学术语境下的“帝国”概念可上溯到西方历史的古典时期，但围绕

① Путин заявил об отсутствии планов возрож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4 июня 2014 г. <https://www.interfax.ru/russia/379666>

②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е собирается создавать империю. 16 апреля 2015 г. <https://ria.ru/20150416/1058934753.html>

③ 如封帅：“大陆帝国邂逅海洋文明：英俄关系的历史逻辑与当代意义”，《俄罗斯研究》，2017 年第 5 期，第 87-117 页；雷建锋：“帝国继承国身份与俄罗斯外交”，《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3-36 页；季莫费·博尔达切夫：“最后的帝国及其邻居——俄罗斯周边安全与地区秩序”，《俄罗斯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106-120 页；张昕：“作为帝国间冲突的俄乌战争”，《文化纵横》，2022 年第 3 期，第 40-48 页。



帝国概念开展的社会科学理论建构，则是 19 世纪以来的现象。<sup>①</sup>以英文为例，英文中的“帝国”（empire）和“皇帝”（emperor）两个词均源自拉丁文词汇“imperium”（统治、支配），指代一定地域空间内的最高统治权。这一词汇最初指古罗马包括战争指挥与行政司法在内的、在特定范围内行使的权威，因凯撒到屋大维时期的改制又增加了君主的含义。即使在西罗马陷落之后，自诩为罗马继承者的拜占庭和“神圣罗马帝国”均以“皇帝”为君主的称号。罗马帝国晚期，在基督教上升为罗马的官方意识形态后，为了将罗马历史纳入基督教的普遍历史叙述中，教会知识分子建构了各类帝国正统权力转移的谱系，由此为“帝国”注入了普世内涵。<sup>②</sup>

“帝国”一词在近代的重新活跃，首先与 19 世纪初拿破仑称帝及其在欧洲各地的征战有关。这一时期，欧洲的德、奥、俄、英、法和奥斯曼等国君主均在不同时段采用“皇帝”称号，并以“帝国”为政权的对外名称。19 世纪 60 年代俄罗斯出版的达利词典，将俄文“империя”（帝国）一词解释为“由皇帝以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统治的国家”，而不加任何具体的时空界定。<sup>③</sup>19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初俄罗斯出版的《布罗克豪斯和叶夫龙百科全书》，则直接引用屋大维时期之后罗马的政治制度来解释“帝国”。该词条末尾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的概念改变，开始指称单一权力所统治的土地，因此帝国的称呼包括罗马、拜占庭和其他”。<sup>④</sup>由此可见，在近代以前，西文语境中“帝国”一词与对罗马的历史和普世想象密不可分，指代统治者头衔为皇帝、管辖广袤地域和众多人口的国家。

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列强在亚非各地大举扩张，“帝国”一词由此逐渐与对外扩张的外交政策产生联系。和“帝国”密切相关的术语“帝国主义”正是产生于这一时期。19 世纪 30 年代，法语作者使用“帝国主义”指代试图恢复拿破仑帝国政体和对外扩张政策的主张。据考证，英文“帝国主义”

① 关于帝国一词及其相关概念的意涵辨析，参见 Krishan Kumar, “Colony and Empire,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A Meaningful Distinc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21, Vol.63, No.2, pp.280-286.

② 孙璐璐：“西方‘帝国正统论’之流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 年第 5 期，第 60-66 页。

③ Даль И.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жив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Пб., 1880. «Империя».

④ Брокгауз Ф.А., Ефрон И.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Брокгауза и Ефрона. Т.13. СПб., 1894. С.14-15.

(Imperialism) 一词最早出现在 1858 年《威斯敏斯特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 杂志上一篇讨论法国政治的时评里。这一概念随着 19 世纪下半叶欧洲列强在非西方世界的扩张而频繁见诸报端。<sup>①</sup>

尽管“帝国”的词源至少可以上溯至古罗马时代, 但将“帝国”概念以社会科学的方式理论化, 则是 19 世纪后半期才出现的现象。本文将 19 世纪后半期以来出现的帝国学说大致区分为“文明帝国论”“资本帝国论”和“多元帝国论”三类。<sup>②</sup>从时间顺序来看, “文明帝国论”较早出现。这一学说继承 18 世纪启蒙时代以来欧洲思想界盛行的文明等级观念, 以“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 作为欧洲列强扩张的核心辩护依据, 将帝国扩张视为“文明化”和“普世价值”传播的过程。此类论点的前提, 是启蒙时代欧洲知识分子建构的文明与野蛮、欧洲与亚洲、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文明等级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观念: 欧洲代表自由、理性、自主、主动、活跃、进步和繁荣, 而亚洲和其他地区则代表着专制、感性、服从、被动、懒惰、停滞和贫穷。按照文明等级论的说法, 欧洲列强的扩张为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理性的行政管理, 消弭了本地人群之间的争斗, 传播了欧洲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促进了全球贸易和经济繁荣。此类论点反映了美洲殖民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欧洲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带有鲜明的为列强殖民扩张辩护的立场。1876 年, 《皇家头衔法案》通过,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与此相应, 英国上层对如何处理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系列辩论。1883 年, “英帝国史”的创始人、剑桥大学现代历史讲席教授约翰·希里(John R. Seeley) 在《英格兰的扩张》中强调殖民地对于维系英国霸权地

① 曹龙虎: “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概念的输入及衍化”,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7 年第 4 期, 第 112 页; Richard Koeber, Helmut Schmidt, *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ld, 184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1-26.

② 前人学者多以某一形容词加上“帝国主义”为各类帝国理论冠名, 如本文所称“资本帝国论”在西文文献中多称为“经济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 “防御帝国论”称为“防御性帝国主义”(defensive imperialism)。笔者认为, 中文“主义”一词包含理论学说、思想作风和政治经济体系等多重意涵, 前置的形容词如无法直指学说的本质, 则难以有效向读者传达意涵。故笔者以相关学说的关键概念, 如“文明”“资本”“多元”等词汇创新上述概念, 希望能更有效地指涉学说的核心内容。关于汉语中“主义”一词的含义,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 第 1780 页, “主义”词条。

位的重要性，宣扬将英国本土与殖民地联合为新的“帝国”政治架构，形成“更大的不列颠”。<sup>①</sup>与此相应，这一时期英语学界对罗马史的研究也更多地强调罗马帝国在同化殖民地臣民、传播希腊罗马文化方面的“功绩”。<sup>②</sup>

文明等级观念和英语学界阐发的“文明帝国论”，随着英俄大博弈的展开而被俄国军政官员和知识分子所吸纳。例如，19世纪下半叶俄国著名地理学家、长期担任帝俄地理学会副主席的谢苗诺夫（П.П. Семёнов）在回忆录《天山游记》一书中声称：“根据我的统计，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起，西欧各国的殖民化向这个大陆总共输送了9000万欧洲人，与此同时，俄国向东方和东南方的殖民化，向人种学上的亚洲部分迁移了不少于4600万欧洲人。1892年在热那亚召开的一次哥伦布国际纪念会上，我曾有机会指出了俄国的这一历史功绩。”<sup>③</sup>19世纪中期以降，围绕“文明”概念，俄国政界和学界衍生出各类为俄国在亚洲各地扩张辩护的学说，包括“内部殖民论”，即强调俄国的扩张不同于英法的海外殖民，其开发的领土为核心区域的自然延伸；“欧亚融合论”，即强调俄罗斯文明兼具欧亚或东西方特征，主体人群与被征服人群并无本质差异，趋向于自然融合。<sup>④</sup>俄国版本的“文明帝国论”在20世纪20-50年代被苏联史学界激烈批判，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一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所谓的“绝对美德论”复活。“绝对美德论”强调19世纪后半期中亚与高加索各类人群“自愿归并”于俄罗斯，在英俄博弈的背景下避免被英帝国殖民剥削，而在俄国的开发下进入文明开化轨道。<sup>⑤</sup>苏联解体后，这一学说以多种形式存在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舆论之中，是为各国地缘政治利益和外交政策辩护的重要话语资源。

作为“文明帝国论”的论战对手，“资本帝国论”同样形成于19世纪

---

① J.R.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 London: Macmillan, 1883, pp.1-2; Duncan Bell, *The Idea of Greater Britain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1860-19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熊宸：“19世纪罗马‘帝国主义’问题在西方学术界的缘起与发展”，《世界历史》，2021年第2期，第122-124页。

③ 彼·彼·谢苗诺夫著：《天山游记》，李步月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④ Seymour Becker, “Russia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Intelligentsia,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Asian Borderlands”, *Central Asian Survey*, 1991, Vol.10, No.4, p.50.

⑤ 孟楠：《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27页。

后半期，以霍布森（John Hobson）的《帝国主义》（1902 年）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 年）两部作品为代表。这一学说旨在批判 19 世纪末欧洲列强以资本增殖为目标的领土扩张政策。霍布森批判的主要对象正是希里笔下不断扩张的英帝国。霍布森认为，这一时期英帝国海外扩张的根源是国内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海外扩张的收益为权势阶层所占有，而引发冲突的代价却由平民阶层来承担。此外，以资本增殖为目标的扩张，导致帝国的财政过度用于军费开支而非教育和社会福利，故而败坏了民主政治。在文化层面，扩张政策必然会助长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文明等级观念。列宁同意霍布森对帝国主义根源的判断，即 19 世纪 60-70 年代工业大生产的集中和垄断使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各国的垄断集团为寻求海外市场 and 原材料产地而瓜分世界，形成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和金融联合。列宁与霍布森的主要分歧在于所谓的“理性统治”是否可能实现世界和平。在列宁看来，霍布森尽管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本质，但其解决方法则无异于否认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sup>①</sup>近代欧洲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为苏联所继承。在苏联的官方历史话语中，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俄国被称为“帝国主义时期”，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则被称为“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sup>②</sup>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史学界将 19 世纪后半期俄国对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征服和统治视为“绝对灾祸”，强调其资本剥削性质和殖民带来的族际冲突。这一史观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逐渐转为“较小灾祸论”，在批判殖民统治负面后果的同时也阐述其“积极影响”。<sup>③</sup>20 世纪中期以降，欧美和第三世界的左翼学者所使用的“帝国主义”概念以及对冷战后全球帝国的批判，整体上延续了资本帝国论的范式。<sup>④</sup>

在 20 世纪下半叶欧美学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部分学者从反思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

② 安·米·潘克拉托娃等编：《苏联通史》（第三卷），上海：三联书店，1980 年，第 1-9 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162、178-182 页。

③ 孟楠：《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第 19-24 页。

④ Krishan Kumar, “Colony and Empire,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A Meaningful Distinction?”;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民族国家体制的立场出发，将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融合到对帝国的阐释中，形成“多元帝国论”。在 20 世纪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下，近代欧洲殖民体系逐渐崩解，新独立的国家加入了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部分学者由此认为，帝国象征自古以来自然形成的对广土众民的统治形态，内在包含以君主为核心的轮辐状等级制统治和多族群结构，以及与此相应的“不同法治不同人”的多宗教、多法域治理传统，是人类古典历史的“自然状态”。与此相对，“国族”（nation-state）则起源于近代欧洲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强调内部的单一均质、国内民众的平等和各国之间的平等。帝国和国族恰好构成文化多元主义视野下多元与一元的对立。多元帝国论认为，1789 年法国大革命以降，在民族主义的不断挑战下，帝国裂解为众多国族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国族天然追求实现边界内部人群的同质性，巴尔干、西亚、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区的民族、宗教和教派冲突正是因此类国族建构引发的矛盾而起。相比较而言，历史上多数人群往往共同生活在多元的政治体中。这种与国族相对的、“自觉维系被征服人群多样性”的政治体被定义为“帝国”。<sup>①</sup>以多元帝国论为史观的著作往往强调帝国因其灵活的治理方式而“国祚绵长”，关注帝国统合新征服人群的策略、帝国内部各类异质人群间的关系、帝国代理人、帝国想象和帝国间关系等问题。

随着二战后大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由直接的领土控制转为对金融、产业和贸易等领域之标准的引领，多元帝国论在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逐渐取代资本帝国论，塑造着人们对“帝国”这一概念的印象。在多元帝国论的框架下，帝国指称的对象，逐渐从资本帝国论所针对的 19 世纪末的欧洲殖民帝国，扩展为古往今来跨地域的大型政治体。比如，近年来较有影响的帝国研究作品往往将古代中国王朝、“蒙古帝国”、奥斯曼土耳其、美国甚至是近代科曼奇人等政体类型五花八门的政权均纳入“帝国”的考察范围。<sup>②</sup>与此相应，

<sup>①</sup> Jane Burbank, Frederick Cooper,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

<sup>②</sup> Jane Burbank, Frederick Cooper,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Stephen Kotkin, “Mongol Commonwealth?: Exchange and Governance across the post-Mongol Space”,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2007, Vol.8, No.3, pp.487-531; Karen Barkey, *Empire of Difference: The Ottom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ekka Hamalainen, *The Comanche Empi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在研究议题的选择上,当下的帝国理论往往不再关注特定历史时段的政治经济现象及其根源,而较多探讨抽象意义上的中心-边缘关系和多元治理下的“宽容”,并视之为民族国家的一种历史替代品。<sup>①</sup>由此,20世纪后半期欧美学界所谈论的“帝国”转而泛指各类历史上存在的跨地域君主制政权。而与“帝国”相对应的“殖民地”以及“殖民主义”等此前意涵相对明确的词汇,在多元帝国论下也逐渐脱离近代欧洲资本海外增殖的语境,泛指古往今来被帝国所征服的边缘地区。

在多元帝国论与新发掘史料的结合下,欧美学界兴起了一股“俄帝国史”的研究潮流。<sup>②</sup>苏联的解体在两个层面促进了这一潮流的兴盛:其一,苏联以民族共和国为单位分裂成15个国家的现象,进一步激发了欧美人文社科各界对帝国和民族主义的探讨;其二,新独立各国对欧美的开放使得此前难以获得的在地化研究素材大规模地被欧美学界获取。俄帝国史的特点,是以“帝国”为关键词重新审视自古代至20世纪的俄罗斯历史,以各阶段俄罗斯的帝王权力形象、族群关系、宗教政策等文化层面的要素为研究对象。在英国俄裔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对手们》一书中,列文所定义的“帝国”至少包含三方面要素:广土众民、专制君主统治和普世宗教。广土众民引申出为控制地理空间和协调异质人群而产生的多元治理架构和多法域特征;专制君主统治意味着帝国往往是非民主政体;普世宗教则是帝国整合内部和吸引外部资源的必要手段。<sup>③</sup>他尝试以帝国概念塑造莫斯科公国、沙皇俄国、苏联和1991年以后的俄罗斯

---

①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萨义德、安德森和盖尔纳关于民族主义和族群政治的作品受到欧美人文社科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这些作品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多元帝国论”在历史学、政治学和文学研究领域的出现,参见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1978;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3.

② 关于欧美学界“俄帝国史”研究的综述,参见Michael David-Fox, Peter Holquist, Alexander M. Martin, “The Imperial Turn”,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2006, Vol.7, No.4, pp.705-712.

③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xi; Dominic Lieve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9-10; 封帅:“多米尼克·列文与俄罗斯研究中的帝国视角”,《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5期,第42页。

联邦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强调四个政权在地理上均处于欧洲边缘，且共同包含上述“帝国”三要素。处于欧洲边缘的俄罗斯帝国既有条件承接 16 世纪以降欧洲科技和文化发展的成果，又直面欧亚大陆腹地广阔的地缘政治真空地带。<sup>①</sup>而关于帝国“宿命”，列文认为，法国大革命之后，随着主权在民观念和民族主义学说借助新兴的通信和交通技术迅速传播，19 世纪以降的俄罗斯帝国与其他帝国一样，均面临民族国家在规范层面的挑战。列文认为，这种现代帝国所必然面临的挑战从 19 世纪延续至 21 世纪，故而俄帝国史对帝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历史境遇均有解释力。<sup>②</sup>

综上所述，从 19 世纪下半叶至今，“帝国”长期以来是西方学界讨论内外关系的重要概念。但上述三类围绕“帝国”展开的理论有着截然不同的论辩立场。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无论是为帝国辩护的希里还是批判帝国的霍布森和列宁，他们都见证了世纪之交欧洲列强殖民扩张和瓜分亚非各地区的狂潮；出于不同立场，其论述焦点或为“文明使命”带来的“白人负担”，或为资本增殖造成的累累罪行。20 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多元帝国论与 70 年代兴起的文化多元主义一脉相承。如果说文明帝国论代表 19 世纪欧洲政治和文化精英对自身优越性的建构，那么资本帝国论和多元帝国论则分别代表 20 世纪初和 20 世纪后半期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对此的批判和反思。多元帝国论和文明帝国论尽管互为论战对手，但在历时性维度上共同塑造了俄国历史的延续性，即将从莫斯科公国时代到 1917 年视为连续的历史。在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背景下，多元帝国论在一定程度上与资本帝国论存在竞争关系。

脱胎于多元帝国论的俄帝国史是当前欧美学界关于欧亚地区族群、宗教和俄帝国的边疆统治、外交战略等研究的主流范式。但俄帝国史存在将“帝国性”本质化的倾向，即默认存在超越时空的帝国特性和以维持多元治理架构为目标的统治技艺。对“帝国”历史延续性的过度强调，使得这一范式难以区分前现代技术条件下政权对跨地域统治困难的妥协和现代技术条件下对多元性的创制与保存。帝国与国族的两分法，则容易使研究者将 19-20 世

<sup>①</sup> Dominic Lieven, “Empire on Europe’s Periphery: Russian and Western Comparisons”, in Alexei Miller and Alfred J. Rieber eds., *Imperial Rule*,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36.

<sup>②</sup>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299-300.

纪简单视为帝国裂解为国族的进程，而忽视新技术条件下帝国的现代转型。下文将从近代俄国与中亚草原关系的具体历史经验出发，呈现俄帝国在近代扩张过程中出现的转变，引出俄帝国史所应深入探讨的“古今之变”命题。

## 二、“欧亚革命”与 19 世纪上半叶俄国对草原地区的征服

18-20 世纪初俄国与中亚草原的关系可作为观察俄罗斯帝国近代转型的窗口。以 1730 年哈萨克小玉兹阿布勒海尔汗遣使俄国为标志，这一时期俄国与中亚草原的关系一般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讨论：（1）18 世纪 30 年代至 19 世纪 20 年代；（2）19 世纪 20 年代至 19 世纪 60 年代；（3）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初。在第一阶段，俄国借助与阿布勒海尔汗的交涉介入草原地区事务，并在草原地区北部依托河流修筑要塞线，利用各部落之间的矛盾和游牧民对贸易的需求，维持从伏尔加河流域至鄂毕河流域的政局稳定。第二阶段以 1822 年《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的颁布为开端，以 1865 年俄军攻取塔什干为终点。这一阶段俄军在草原东西两路南下，在瓦解本土游牧首领的抵抗后完成对草原地区的征服。在第三阶段，俄当局建立了覆盖整个草原地区的统治体制，并在后续的改革中将其逐步与欧俄地区的体制接轨，以便引入资本和移民开展大规模垦殖。本节将引入“欧亚革命”的概念，重新审视第一和第二阶段俄罗斯与中亚草原的关系，以凸显俄帝国在扩张过程中自身的转变。

在探讨 18 世纪初俄国与中亚草原各部落的交涉之前，需要对该地区的自然条件 and 政治格局进行简要回顾。中亚草原根据自然地理特征可分为东西两路。西路北起乌拉尔河、恩巴河、伊尔吉兹河和图尔盖河一带，南至锡尔河下游和咸海。草原西路水土条件较为恶劣。西路北部尚有山谷河流分布，而南部主要为荒漠地区，人口稀少。草原东路北起托博尔河、伊希姆河和额尔齐斯河，南至天山西部和锡尔河中游。得益于阿尔泰山和天山山脉接收的大西洋和北冰洋水汽，东路的山脉河谷地区有着较为丰沛的水源和较多适于避风放牧的冬牧场。18 世纪初，俄军在东路的额尔齐斯河下游建立鄂木斯克要塞，在西路的乌拉尔河中游建立奥伦堡要塞。此两地成为 18 世纪初至



19 世纪 60 年代俄当局与草原东西两路各游牧部落交涉的前线军政中心。

1730 年，为解决与邻近人群的冲突，哈萨克小玉兹首领阿布勒海尔遣使俄国，请求女皇安娜调停其与俄属巴什基尔人的关系。俄当局视此为在乌拉尔河地区扩张影响力的机遇。在派遣特使捷夫克列夫（Кутлу-Мухаммед Тевкелев）探查小玉兹内部政治形势后，任命五等文官基里洛夫（И.К. Кирилов）率军前往乌拉尔河中游修筑奥伦堡要塞。1743 年，奥伦堡要塞最终定址建成。以西路的奥伦堡和东路的鄂木斯克为中心，俄当局在 18 世纪中期沿乌拉尔河、乌伊河（Уй）和额尔齐斯河修筑要塞线，控制中亚草原地区深入西伯利亚的交通。<sup>①</sup>

要塞线的功能并不仅限于防御游牧民的侵袭。近代火器、要塞线和哥萨克军团的结合，使俄当局能以有限的军力对西起伏尔加河下游、东至阿尔泰山、北至乌拉尔河上游的各类人群施加影响。俄当局可根据整个草原地区的政治形势控制各部的渡河权限，利用各游牧集团对草场资源的竞争选择性地挑起冲突，阻止各地区的游牧部落形成跨地域联盟，抑制其军事潜力。同时，俄当局利用邻近游牧部落对农牧物产交换的需求，通过建设大型贸易集市加深其对俄军政中心的依赖。除了战略层面的意义之外，草原北部的要塞线一定程度上成为 18 世纪中后期至 19 世纪初俄国的亚洲边界，承担对出入要塞的异国人（иноземцы）签发票照、对过境放牧的牧团和商旅征税的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18 世纪中期至 19 世纪初，除伊戈利斯特罗姆（О.А. Игельстром）短暂的改革之外（1785-1790 年），俄当局并未投入资源继续向南扩张。其主要的活动是笼络小玉兹和中玉兹的汗王和苏丹，维持要塞线邻近地区的稳定。尽管前人学者一般将俄国征服草原地区的开端定于 18 世纪 30 年代，但实际上俄军大举兼并草原地区是从 19 世纪 20 年代才开始的。为何中间存在近一个世纪的“停滞”？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提出的“欧亚革命”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俄国 19 世纪 20 年代在草原地区的扩张，以及这一时期俄国自身的转变。“欧亚革命”是达尔文对一系列前人研究的总结归纳，指代

<sup>①</sup> 1730 年阿布勒海尔遣使俄国事件的相关档案史料，参见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КазССР. Казахско-рус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XVIII веках: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Алма-Ата, 1961. С.35-44.

18 世纪下半叶欧洲在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领域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剧变。在地缘政治领域，七年战争（1756-1763 年）、北美独立战争（1776-1783 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803-1815 年）将整个欧洲的权力格局洗牌，18 世纪初法国精心维系的大西洋、欧陆和东地中海三条战线上的均势格局被彻底打破。这一系列战争之后，法国无力阻挠英国成为海上霸主。而缺少了法国支持的波兰和奥斯曼土耳其成了俄奥德三国扩张的牺牲品。1815 年英法俄普奥五强共治格局（pentarchy）形成后，英俄两国向东方的扩张较少受到其他欧陆国家掣肘。19 世纪中后期俄英博弈的格局也由此显现。<sup>①</sup>经济层面的革命主要是指第一次工业革命及其政治经济影响。从 18 世纪下半叶至 19 世纪初，工业革命、欧陆战争以及全球化的贸易活动交织在一起，共同促进了“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的形成，即国家、资本和工业更为紧密地结合，军事工业技术在金融化的战争刺激之下迅速迭代。文化层面的革命，指的是这一时期欧洲各地的知识分子以商业、理性和文明等概念阐发各类学说，共同支撑起“欧洲人”的身份和所谓“文明使命”的普遍信念。就俄国而言，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使俄国上层强化了作为俄罗斯贵族的身份，同时也提升了作为欧洲列强的自信。值得注意的是，参加 19 世纪中期征服草原重要战役决策的中央机构官员和前线高层军官，大多经历过抗击拿破仑的战争，往往难以容忍俄军在“亚洲人”面前失败，故而默许前线军官的军事冒险行为。<sup>②</sup>

俄国对中亚草原地区的征服带有鲜明的后欧亚革命时代特征。这一进程以 1822 年俄当局颁布《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下文简称“1822 年条例”）为开端。该条例由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 年在位）时期的重臣斯佩兰斯基起草并推动落实。斯佩兰斯基熟谙西欧的行政管理体制，且于 1809 年随沙皇会见过拿破仑。他早年曾试图效仿法国改革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但遭到保守派排挤而被贬到地方任职。1819 年，他转任西伯利亚总督，由沙皇授意系统性地改革整个西伯利亚地区的统治体制，推动颁布了一系列涉

① 约翰·达尔文著：《帖木儿之后：1405 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黄中宪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年，第 159-217 页。

② Alexander Morrison, *The Russian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 a Study in Imperial Expansion, 1814-19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20-24.

及行政机构、异族（инородец）管理、商贸、税收和流放制度的法令。作为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列席包括外交、财政和内务三部大臣加上陆军总参谋长在内的“亚洲委员会”，协助制定和执行俄国对草原地区的政策。

1822年7月22日，沙皇谕令正式颁布《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单方面规定草原东路中玉兹牧地的管理体制。该条例共计十章319条，其重点在于建立草原统治体制、划分边界和引导游牧民定居。该条例首次尝试在草原地区建立融合俄国和游牧社会传统的管理体制。斯佩兰斯基设想将草原东路从额尔齐斯河到巴尔喀什湖北地区均纳入新设立的鄂木斯克省辖境，在省之下建立区（округ）、乡（волость）和阿吾勒（аул）三级行政机关。其中，区是在草原上设立的常驻行政单元，为俄罗斯政府和本地人群之间的枢纽。区的管理机关为区衙（окружный приказ），区衙由大苏丹（старший султан）担任主席，由鄂木斯克省省长指定的2名俄罗斯人代表（заседатель）及2名选举产生的哈萨克人代表为区衙成员。区衙按照条例规定的编制配备书吏、翻译和口译员以及1-2个连的哥萨克卫队。区下辖的乡和阿吾勒两级行政机构根据氏族和牧团的构成而设，其主官命名为“乡苏丹”（волостной султан）和“阿吾勒长”（аульский старшина）。

在司法领域，1822年条例将涉及游牧民的司法案件分为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三类。刑事案件包括叛国、谋杀、抢劫、抗法以及牲畜扣押（барымта）等等。此类案件一概由区衙审理，并受省法院监督。包括盗窃在内的轻微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则由1822年条例创制的基层法官“毕官”审理。这一新的职位以哈萨克社会中掌握习惯解释权的长老“毕”（бий）为基础，旨在将草原习惯法整合入俄国司法体制之中。此类案件均以口头方式审理，并在判决后立即执行。毕官的资格可因审判不公而随时被中止。

受同时期启蒙思潮影响，斯佩兰斯基尝试将当时难以在欧俄省份推行的基层选举制度应用到草原边疆，并将其改造为介入游牧社会的有效手段。1822年条例规定了大苏丹、区衙哈萨克人代表、乡苏丹、阿吾勒长的选举规则、任期和核准机构，将游牧社会推举首领的习惯纳入俄国的统治体系之下，以选举制度介入游牧社会，使其内部的权力关系“可视化”。选任之后，为强化区-乡-阿吾勒三级哈萨克官员对俄国官僚制的认知，1822年条例独

辟一节规定哈萨克官员的行政级别：大苏丹在当选之日即获得俄国陆军少校军衔（相当于八等文官），且在服务三个任期之后，有权向当局申请俄国贵族（дворянство）身份。区衙其他官员均不得获得高于九等文官的品级。乡苏丹的级别相当于十二等文官。阿吾勒长和毕官则相当于村长（сельские головы）。1822 年条例第 50 条明文规定：“所有被选任的首领，在没有上级政府的同意下，均不得自行确定权责。他们仅仅是上级政府授权统治民众的地方官员。”<sup>①</sup>

以区-乡-阿吾勒三级行政机关为基础，1822 年条例尝试在草原东路划设各级行政边界，限制游牧民季节性转场的活动范围和跨区域的人员流动。与行政边界相匹配的是一系列推广定居生活方式、引导游牧民定居的举措。书面化的行政程序是重要的变革。而书面文件的保存和流通，必然需要相对固定的办公空间和逐渐定居化的生活方式。1822 年条例规定区衙须设立永久驻地，且以书面公文处理日常案件，以俄语和鞑靼语为书面语言登记簿册。乡和阿吾勒两级的主官在日常行政中主要以口头方式下达政令，但涉及国家经费开支的活动，区、乡和阿吾勒三级均须以简便方式依法记账。书面化的行政管理必然要求熟谙俄文公文的人员充实各级机构。19 世纪初，哈萨克贵族普遍不识字，这便为俄当局向各氏族派遣书吏提供了基本的理由。1822 年条例规定，每个区配备 1 名书吏、2 名笔译员和 3 名口译员，每个乡配备 1 名笔译员和 1 名口译员。充实这些职位的人员主要是来自鄂木斯克亚洲学校（Омская азиатская школа）的毕业生或掌握哈萨克语的西伯利亚哥萨克，其薪资均由俄当局拨发。这些吏员将成为俄当局与哈萨克社会沟通的中介，也是俄国在游牧社会基层的触角。此外，1822 年条例要求区衙定期统计辖境内人口和土地信息，鼓励区衙官员和哥萨克卫队作为开垦区衙周边土地、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先驱，并要求边疆当局拨款修筑房舍、官粮铺、诊所、教堂、学校和其他商业设施，吸引各阶层游牧民定居。<sup>②</sup>

① Масевич М.Г.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Казахстана. Т.1. Алматы, 1960. С.95.

② 施越：“沙俄对哈萨克草原东部地区统治政策初探——以 1822 年《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为中心”，载庄宇、施越主编：《俄罗斯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年，第 107-111 页。

1822年条例规划的一系列机构，在接下来的40余年逐渐成为现实，且成为19世纪60年代俄当局在整个中亚地区建立统治制度的蓝本。这一时期，哈萨克中玉兹内部汗权的衰落为俄军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1819年中玉兹的瓦里汗死后，斯佩兰斯基于1821年单方面宣布废除中玉兹汗位，强行推动他所设计的草原行政管理制度。1822年条例颁布后，草原东路的鄂木斯克当局选派谙熟草原事务的要塞线军官率军赴邻近牧场，劝诱各民族加入俄国的草原管理体制。部分首领或希冀从俄当局获得权力和财富，或期望借助俄军的调停解决与邻近氏族之间的牲畜扣押积案，消弭冲突，获得稳定的水草资源。在俄当局的积极拉拢下，草原游牧社会分化为加入俄统治体制和抵抗俄国扩张的两派。后者主要由卡瑟姆苏丹家族领导。在与抗俄运动的长期战争中，俄当局逐渐控制了草原腹地，先后在东路设立7个区，至19世纪60年代基本控制了草原东路。

与上述政策转变同步展开的是“欧亚革命”引发的观念变迁。18世纪30年代，阿布勒海尔汗与安娜女皇的交涉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是俄方能否向其提供保护，尤其是限制巴什基尔人对小玉兹的袭扰。与此相应，阿布勒海尔汗承诺宣誓效忠、缴纳贡赋、保护俄国属民过境并交还被俘的俄属臣民。事实上，阿布勒海尔汗并无能力管束小玉兹各部落，更不是所谓的所有哈萨克人的汗，因此无力兑现保护俄属臣民过境和交还所有俄属俘虏的承诺。同样，当时俄方并无能力约束邻近的巴什基尔和卡尔梅克各部。对于本文的主题而言，重要的是18世纪30年代的外交往来并未触及一个世纪以后俄当局关注的主权、边界、科层管理、定居化等议题。“欧亚革命”之后，俄国军政高层和知识分子对草原地区人群的认识呈现显著变化。例如，在1832年出版的关于草原地区历史的重要著作《吉尔吉斯-哈萨克各帐及各草原的叙述》中，廖夫申（А.И. Лёвшин）在评论草原游牧社会中的复仇习惯时如此评述：

不可能不注意到上述法律与欧洲民族婴儿时期的法律之间的相似性：残酷但贴近未开化人的自然状态。复仇法（*Droit du taillon*）存在于几乎所有民族的婴儿时期。我们可以在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日耳曼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我们自己祖先——斯拉夫人历

史上找到……摩西确认过复仇法。梭伦也下令让雅典人这么做。罗马人也是如此。人群愈粗鄙，血亲复仇的习惯就愈加根深蒂固。随着性情的软化，习惯法的效力衰减，被更加精细的法律替代。由此，偿命可以由财产交换替代。肢体偿还也可以以类似的方式补偿。<sup>①</sup>

廖夫申的这一论述体现了同时期欧洲知识分子在理解非西方社会时常见的“将空间差异转化为时间差异”的思考方式。其背后是近代欧洲“文化革命”所塑造的线性进步史观和文明等级论。<sup>②</sup>因此，一些一个世纪以前习以为常的现象，对于 19 世纪 20-30 年代的俄国军政精英而言则变得无法容忍，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俄国奴隶问题。

与斯佩兰斯基一样，佩罗夫斯基（В.А. Перовский）也属于“拿破仑一代”，是尼古拉一世的密友。佩罗夫斯基在 1833-1842 年和 1851-1857 年两度担任奥伦堡地区的主官，<sup>③</sup>参与制定并执行对草原西路的政策。1839 年失败的希瓦远征正是由他率领的。前人学者较多从后勤角度分析这一军事行动失败的原因，<sup>④</sup>但同样重要的是佩罗夫斯基以及其他俄国高层对战争理由的分析。早在 1835 年，他致信沙皇尼古拉一世，请求组织对希瓦的远征：

阿尔及尔酋长对法国国王的罪行与历代希瓦汗王对俄罗斯皇帝所犯下的罪行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在那里（阿尔及尔），有的只是对（法国）领事的一次性的、短暂的、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侮辱；在这里，整整一个世纪，背信弃义、蓄意的恶意、抢劫、掠夺和对沙皇陛下的侮辱不断增长；在这里，整整一个世纪，俄罗斯人的鲜血四溅、肆意流淌……成千上万的人现在在奴隶的枷锁下受苦受难……法国要求用数百万法郎来征服阿尔及利亚，并且不计成本地一直保留征服的领土。对于俄罗

① Лёвшин А.И. Описание Киргиз-Казачьих или Киргиз-Кайсацких орды степей. Т.3. СПб., 1832. С.178-179.

② 唐晓峰：“地理大发现、文明论、国家疆域”，载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北京：三联书店，2016 年，第 18-20 页。

③ 1833-1842 年佩罗夫斯基担任奥伦堡省督军（военный губернатор），1851-1857 年则担任奥伦堡总督区总督（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主官名称的变化与俄当局对奥伦堡所在地区行政区划的调整有关。

④ 捷连季耶夫著：《征服中亚史》（第一卷），武汉大学外文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165-203 页；李硕：《俄国征服中亚战记》，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 年，第 29-54 页。

斯来说，征服希瓦不会花费其十分之一，但整个中亚都会随着受过启蒙的良好统治的引入而从麻木僵化的状态中复苏。<sup>①</sup>

除了将文明等级论作为战争理由之外，佩罗夫斯基和其他俄国军政高层自然也会将与英帝国的竞争性博弈纳入战略视野。1839年3月，一个由佩罗夫斯基、外交大臣涅塞尔罗德和陆军大臣车尔尼雪夫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在审议希瓦远征方案时提出，建立和巩固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并限制英国的经济霸权是远征的主要目标，而同年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进程则是俄方在制定战略目标时的重要参考。<sup>②</sup>

对比欧亚革命前后俄国对中亚草原地区的政策，18世纪俄当局以封赏部落首领、提供军事庇护、索要汗裔质子和征收实物贡赋为与草原各部交涉的主要形式。其目标是以有限的军政资源投入来维系从乌拉尔河流域到额尔齐斯河流域各部政治力量的平衡，避免该地区出现有能力挑战俄国东南防御体系的跨地域政权。而19世纪20年代以后，以斯佩兰斯基为代表的“拿破仑一代”（the Napoleonic Generation）借助“欧亚革命”之后的新地缘政治格局和俄国的国家能力，在中亚草原地区强行建立以欧俄行政制度为基础的草原统治体制。在观念层面，欧亚革命之后，俄国军政高层和知识分子已然接受了文明等级论的世界观，一个世纪以前被定义为“交还俘虏”的问题在新的语境下成为不可容忍的民族尊严问题，上升为重要的战争理由。而在战略层面，欧亚革命后英俄在亚洲多条战线上的博弈，成为19世纪中期俄国处理与中亚各人群关系的基本前提。

### 三、草原统治政策的变迁与俄帝国的近代转型

如果说俄国对草原地区的征服主要呈现的是欧亚革命后地缘政治格局和政治观念对俄国的影响，那么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俄国在草原地区

---

① 此段引文中括号内的文字为本文作者添加，参见 Серебrenников А.Г. ред.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для истории завоевани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го края. Т.1. Ташкент, 1908. Док.6, 28. 转引自 Alexander Morrison, *The Russian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 A Study in Imperial Expansion, 1814-19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88.

② Alexander Morrison, *The Russian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 A Study in Imperial Expansion, 1814-1915*, pp.90-91.

的统治政策，则能充分体现俄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民族主义思潮压力下的近代转型。19 世纪 60 年代，俄国改革草原地区统治体制的进程与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同时展开。而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俄国在草原地区推行的移民政策则与同时期欧洲在俄国的大举投资密切相关。本节将从这两个历史片段切入，从俄国统治草原地区的政策变迁出发，来理解俄罗斯帝国的近代转型。与多元帝国论的设想不同，这一时期的转型实际上是以建立统一市场和扩张资本活动为导向，逐步废除 19 世纪中期以前的多元治理架构。换言之，19 世纪中期以前的多元治理架构未必等同于俄罗斯帝国的本质，而更多是俄当局与不同时期技术条件、特定边疆地区自然环境和本地传统的妥协。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 年）失败后，亚历山大二世领导下的俄国军政高层在不触动君主专制原则的前提下，开启涵盖农奴制、军事、司法、地方自治和城市管理等领域的大改革。农奴制改革旨在将地主与农奴之间的封建生产关系以赎买的方式加以改造，推动农奴转变为自耕农、手工业者和工人。军事改革旨在将军队的招募、服役期限、训练、军官培养等领域理性化，组织更为专业的常备军。国家财政制度改革试图将财权集中，加强对部门和地方的审计，并以工商业为财政优先支持的对象。而传统俄国史研究较少关注的是同时期进行的草原地区统治体制改革。1868 年草原地区统治体制的改革，同样秉承这一时期削弱封建传统、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思路。

1868 年草原统治制度改革的标志性文件是《草原地区临时管理条例》（下文简称“1868 年临时条例”）。<sup>①</sup>在 1865 年俄军夺取塔什干之后，整个草原地区基本为俄国所控制。当时草原东路以 1822 年条例为基础，已设立了一系列由哈萨克部落首领和俄军军官任职的区，有相对明晰的基层管理体系。但在草原西路，受到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俄当局始终未能建立与东路相当的有效控制。西路在名义上划分为东、中、西三部（часть），分别由三位阿布勒海尔家族男性后裔成员担任“执政苏丹”（султан-правитель），并无与东路的区衙类似的常驻军政和司法机构。划分边界和引导定居的政策则付诸阙如。<sup>②</sup>在俄军扩张至锡尔河以南后，原先以鄂木斯克和奥伦堡管辖

① 该条例的文本参见 Масевич М.Г.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Казахстана. Т.1. Алматы, 1960. С.323-340.

② 孟楠：《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第 72–74 页。



东西两路的政治格局不便于后续深化行政司法管辖、经济开发和边疆整合。因此，1868年临时条例改革的目标，是提升行政效率、增强财税汲取能力和推广文教。

在行政体制方面，1868年临时条例将整个草原地区划分为乌拉尔斯克、图尔盖、阿克莫林斯克和塞米巴拉金斯克四个省份，下设县、乡和阿吾勒三级行政机构。1868年临时条例废除了1822年条例设计的由大苏丹领导的区，改设由俄罗斯军官领导的县（уезд），将哈萨克人担任主官的行政层级压缩到乡和阿吾勒两级。此外，1868年临时条例参照同时期欧俄省份管理条例的标准，大幅扩充省、县两级机构的人员规模，着重强化其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省级机关下设医务官、建筑师、矿务工程师和林务官等职位；县级机关设1位县医和1位助产士，为县境居民提供无偿医疗和药品服务，并在哈萨克人中推广疫苗接种。在基层管理方面，1868年临时条例大幅细化了1822年条例中关于乡长、阿吾勒长和毕官的选举、任职和履职程序，初步明确基层长官的职权及其任免的权限。

在司法体制方面，1868年临时条例设计了参政院、军事司法委员会、省公署、县法官和民族法庭（毕官）五级司法体系。1822年条例中负责处理基层民事和部分刑事案件的毕官被整合进俄国的司法体系中。每个乡根据游牧民户数确定毕官的人数，一般在4至8人之间。毕官从25岁以上、得民众尊敬和信任且未有过法庭指控的本乡人中选出。受1864年俄国司法改革的影响，该条例强调毕官的选举和任免程序应独立于乡长：其选举过程由县长监督，而选出后需得到省督军批准方可上任。不同于乡长的是，俄当局并不向毕官发放薪俸。毕官有权从案件被告处获得不高于案件争议金额10%的报酬（бийлык）。在毕官选任规则的基础上，该条例设计由多名毕官联合审案的乡会谘（волостный съезд биев）和特别会谘（чрезвычайный съезд），负责审理争议度较高或跨乡域、跨县域的案件。

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1868年临时条例推动了赋役和土地制度的历史性变革。该条例以货币税取代草原东路实行的实物税。1822年条例颁布后，草原东路对加入俄统治体制的游牧部落征收实物税（ясак），即对除骆驼以外的畜养牲畜值百抽一。根据每三年一次各乡编制的牲畜统计数据，当局每

年夏季以乡为单位开展征收。各省根据要塞线和哥萨克各团的预算分配征收的牲畜，多余的部分变卖后存入国库。<sup>①</sup>1868 年临时条例将整个草原地区的税收形式统一为帐篷税<sup>②</sup>和护照费两类。帐篷税按照每游牧帐每年 3 卢布计算，根据每三年一度的户数清点计算各省和各县的税额，然后由各乡长和阿吾勒长摊派税负。相比实物税，货币税既有利于当局进行更加精确的财税管理，促进牧民经济生活的货币化，又加深了游牧社会对俄国商品的依赖，客观上推动了俄国商贸网络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扩张。

在土地制度方面，该条例的第 210 条宣布哈萨克人所有土地为国有，哈萨克人仅有权集体使用。这一条文为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俄当局向草原各省迁徙农民并挤占牧地奠定了法律基础。而哈萨克人仍有两条途径可获得对某一地块的私有产权：其一是拥有由沙皇或其他机关向特定个人颁授的地契；其二是在冬牧场上建设住宅或其他建筑。俄当局认定冬牧场上的建筑及占据的土地为建筑所有人可继承、可交易的私人财产，其社群不得要求拆除。鉴于冬牧场对于牧团经济生活的重要意义，1868 年临时条例规定哈萨克牧团的冬夏牧场及转场路线应尽可能处于单一县域以内，且各乡和阿吾勒以帐篷数目和占有的牲畜规模为基础分配冬牧场。如出现争议，则当局介入分配。在 19 世纪下半叶技术条件演进的背景下，上述涉及土地产权的条文将成为草原游牧社会大规模定居化的重要制度因素。

最后，1868 年临时条例还设计了一系列社会身份和文教政策，以促进游牧地区与俄国的融合。在俄国的社会阶层（сословие）制度下，哈萨克人被列为“异族”（инородец），享有豁免兵役的权利。条例规定，哈萨克人如加入其它社会阶层，可继续享受兵役豁免，且免除加入后五年的纳税义务；哈萨克人若信仰东正教，则有权在任何俄罗斯城市或村落登记定居。条例规定草原各省的小学应面向所有族群招生，且各省公署应拨款修建更多学校。哥萨克镇和俄罗斯村庄的学校在村集体同意的前提下，可招收哈萨克学童。

1868 年临时条例是 19 世纪中期俄罗斯帝国现代转型的诸多表象之一。除了大改革和俄军在中亚的推进之外，19 世纪 60-70 年代一系列内政外交

① Масевич М.Г.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Казахстана. Т.1. Алматы, 1960. С.99-100.

② 此税种被称为“帐篷税”（кибиточная подать），因游牧民以毡帐数量计算户数。

变动也迫使俄罗斯帝国进行更为深入的转型。在帝国西部，1863年的波兰起义和以1870年普法战争为标志的德国统一进程，使得俄帝国内部俄罗斯军政高层与波兰和日耳曼贵族的关系逐渐疏远。同一时期铁路、电报和蒸汽船在俄国的大规模应用，使得俄帝国拥有整合广袤疆域的技术能力。彼得一世时代开启的以沙皇与各族裔贵族联盟为基础、以波罗的海、黑海和东欧为主要战略方向的政治格局，至19世纪中期出现了调整的契机。中欧地区德国的崛起和交通通信技术的飞跃，共同促成了各类民族主义运动的活跃。而俄帝国自身也在潜移默化中朝着以东正教、俄语和俄罗斯族为主体的方向重新整合。这一时期，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的传统社会精英开始失去他们的特权与政府职位。<sup>①</sup>而在1868年临时条例颁布后，此前俄当局册封的哈萨克贵族和汗王后裔也逐渐面临社会阶层跌落的境遇。<sup>②</sup>

1868年临时条例标志着草原地区与俄国融合进程的开始。此后草原地区管理条例的改革以及19世纪末开启的大规模移民浪潮，均为这一趋势的延续。下一轮重要改革，即1891年《阿克莫林斯克省、塞米巴拉金斯克省、七河省、乌拉尔斯克省和图尔盖省管理条例》（简称“1891年条例”）的颁布，进一步削减了草原统治体制的特殊性，使其行政和司法机构设置、财税制度、土地制度和文教制度进一步与欧俄省份接轨。该条例再度明确草原地区的土地和森林为俄国的国家财产，游牧民有权无限期“公共使用”土地，但不能占有；对于牧民而言，多余的土地将由国家财产部管理。在公地私有化方面，该条例规定冬牧场地块上种植的作物和修筑的建筑物，均为私人财产；只要作物和建筑存在，其所在的地块就可被继承和租让。<sup>③</sup>在上述条文的规制下，草原地区的游牧民将不得不通过开垦土地、建筑房舍和将土地租让给俄罗斯移民开发等手段争夺冬牧场使用权，并争取俄当局的庇护。

<sup>①</sup> Austin Jersild, *Orientalism and Empire: North Caucasus Mountain Peoples and the Georgian Frontier, 1845-1917*, McGill-Queen's Press, 2002, pp.32-33.

<sup>②</sup> 例如，出身中玉兹末代汗王后裔的瓦里汉诺夫家族，尽管在19世纪上半叶积极为俄当局提供服务，且部分成员得到当局优待，但是其社会经济地位并没有依凭血统而承袭。19世纪下半叶，随着其重要男性家族成员的离世，家族的牧场逐渐被邻近氏族占有，家族的社会地位渐渐回归到普通牧民。参见 Валиханов Ч.Ч.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5. Алматы, 1985. С.8-51.

<sup>③</sup> Масевич М.Г.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Казахстана. Т.1. Алматы, 1960. С.395-397.

1891 年条例所代表的制度改革是 19 世纪 90 年代俄国对草原地区移民政策的一环。同一时期，因欧俄地区人地矛盾尖锐，俄当局逐步放宽了农民向边疆地区移民的限制，并为移民提供土地和资金的支持及税收和兵役的减免政策。1896 年，俄当局在内务部下设统筹移民事务的机构——移民局，并在各省份设立其分支机构，负责落实各地的土地划拨和资金发放等工作。上述制度改革的物质基础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延伸。1892 年，西伯利亚大铁路西段从车里雅宾斯克开始向东修筑，并于 1896 年修至鄂木斯克。电报和蒸汽船早已在草原地区应用，各省的省府均已开办印刷机构。由此，鄂木斯克成为大铁路和额尔齐斯河的水陆交通枢纽，其周边地区成为欧俄移民迁徙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在这一系列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的叠加作用下，19 世纪末至 1916 年，超过 100 万欧俄移民涌入草原诸省，使其人口规模从 1897 年的 345 万余人飙升至 1916 年的 550 万人以上。这一移民浪潮由欧洲和俄罗斯资本共同驱动。大规模的人口和资本的涌入，重塑了草原地区的族裔结构、生产方式和产业格局，并显著推动了游牧民的定居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亚草原千百年来游牧社会的形态。在人口的族裔结构方面，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广义上的俄罗斯族人口占草原诸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在产业格局方面，草原诸省从“蛮荒”的内边疆一跃成为俄国重要的谷物和畜产品基地，经西伯利亚大铁路与欧俄乃至欧洲市场连接在一起。在游牧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方面，草原统治体制下大多数游牧民的季节性放牧范围显著缩小，转为定居和半定居的生活方式，兼营农耕与畜牧。但游牧社会所生产的农牧产品规模在新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呈现显著增长，且在市场化的导向下，畜产构成中牛的比重逐渐上升，以满足欧俄市场对奶制品的需求。最后，在社会关系方面，游牧社会内部阶层出现显著变动，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权威逐渐瓦解，而依附于俄国草原统治体制的群体则成为新的权力中心。

#### 四、余论

自莫斯科公国时代开始，俄国凭借东欧和西伯利亚的水系向各方扩张，

至 19 世纪末形成了疆域面积超过 2000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25 亿的大型跨地域政权。在 19 世纪中期之前，俄国以沙皇与各族裔的贵族形成联盟来扩大版图，但同时根据具体情况推动部分贵族子嗣改宗东正教、接受欧式教育并掌握俄语或法语。西部的德意志和波兰贵族在俄贵族社会和军政体制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在 19 世纪中期以前的多数时段，俄国境内存在着显著的多元治理特征，即同时存在行省和诸如王国、大公国、哥萨克军团、汗帐属地（如 1801-1845 年间伏尔加河下游的布凯汗帐）等。

但历史上存在多元治理的政治实践并不等于应当将多元治理作为界定帝国的要素之一。上文回顾了 18 世纪初以降俄国与中亚草原地区在三个时段的关系，意在强调 18 世纪下半叶以降俄国在扩张过程中自身经历的变迁。早在 19 世纪下半叶，已有俄国知识分子注意到第一时段（18 世纪 30 年代至 19 世纪 20 年代）和第二时段（19 世纪 20 年代至 19 世纪 60 年代）俄国对中亚草原政策的巨大差异。这一时期俄国著名的东方学家格里高利耶夫在 1874 年发表的论文《俄罗斯对中亚的政策》中生动地描述道：

15-17 世纪，东正教俄罗斯实质上处于鞑靼人的深刻影响之下。当时被鞑靼王国充斥的程度，不亚于今天西欧思想泛滥的程度……在过去二百年，我们的祖先受着鞑靼人的影响，最初不是自愿的，之后习惯了这种从伏尔加河上的萨莱传来的声调、仪态、最后是道德，萨莱扮演的角色和现在的法国很像。金帐汗国消亡后，在整个莫斯科公国时期到彼得大帝，俄罗斯沙皇的治理术和政治管理继续在各方面表现得非常像鞑靼人……我们并没有在 17 世纪进入中亚，因为那时候我们比之后几个世纪更加了解它，因为草原的特征和游牧人群对我们来说是完全熟悉的……考虑到 17 世纪在中亚扩张的计划不可能且无利可图，莫斯科统治者对中亚的政策首先是维持俄国力量的声望，通过征服最遥远的穆斯林东方地区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其次，尽可能阻止邻近的游牧民对其边界进行劫掠攻击；关心其臣民的商业利益，同时也关心（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从穆斯林手中赎回那些在各种情况下沦为奴隶的东正教徒。<sup>①</sup>

<sup>①</sup> Григорьев В.В. О рус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Сборни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знаний. 1874. Т.1.

在格里高利耶夫笔下, 15-17 世纪“鞑靼人”影响下的外交政策以维持威望、阻止游牧民劫掠、发展商贸和赎回属民为主要目标, 反对深入草原地区。而“西欧思想”影响下的外交政策则以征服和建立草原统治体制为目标。受文明等级论的影响, 格里高利耶夫将这一差别理解为“亚洲”与“欧洲”两套外交传统的差异。通过引入“欧亚革命”这一概念, 笔者强调, 这两个时期政策的差异主要源自 18 世纪下半叶欧洲出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剧变。对草原地区政策的前后差异, 实际上是俄帝国自身变化的表征之一。

第三时段(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初)俄帝国对草原地区的政策, 同样与同时代欧俄地区的改革以及欧洲范围内资本和技术的扩散密切相关。在草原地区并入俄国之后, 俄当局不仅强化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压缩部落首领任职的空间, 而且限制了部落法律习惯的适用领域和季节性游牧的迁徙范围。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移民政策的推动下, 草原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呈现显著变化。在当局政策、技术扩散和市场力量的配合下, 传统游牧社会面临强大的定居化、商业化和城市化压力。由此可见, 在 19 世纪下半叶, 俄帝国并未刻意维持边疆地区的多法域统治, 反而在资本和技术扩散的背景下积极改革制度, 推动边缘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政治、文化整合。

在各类帝国理论的视角下, 草原地区毫无疑问是俄帝国的边缘地带, 其居民是与帝国主体人群差异显著的异质族群。从文明帝国论的视角看, 俄国与中亚草原的关系是后者“自愿归并”、在前者引导下文明开化的过程。从资本帝国论的视角看, 19 世纪 90 年代之前的俄罗斯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帝国, 而是封建军事资本主义国家, 尚未培育出本国的垄断资本集团。至 19 世纪末, 俄帝国成为“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 其中亚草原的移民政策正是国际资本大规模投资西伯利亚铁路的副产品。而从多元帝国论的视角看, 从 18 世纪初以降沙皇与游牧首领的交涉到 19 世纪末俄当局与接受俄式教育的革新知识分子的合作, 均可视为俄罗斯作为多元治理帝国的论据。

上述理论传统形成于不同的时空背景, 因此对于帝国概念的界定和阐发角度大相径庭。通过论述俄帝国与中亚草原的历史经验, 本文尝试强调帝国理论的时间维度。在三种帝国理论中, 文明帝国论和资本帝国论均有着相对清晰的时间上限。文明帝国论以近代西方的文明等级论为基础, 大致以 18

世纪上半叶为开端。资本帝国论明确其批判对象为 19 世纪末以降发达国家出现的垄断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及在其影响下奉行扩张主义的国家政权，后引申为对以资本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批判。相比之下，多元帝国论界定帝国的方式缺乏明确的上限，故出现一系列将古代跨地域政权与近代欧洲帝国类比的作品；但大致以 20 世纪为下限，因一战和二战后各殖民帝国相继裂解为民族国家。文明帝国论和资本帝国论讨论的主要是欧亚革命以后的现代现象，但多元帝国论在时间维度上跨越古今，理应将“古今之变”的问题纳入理论建构的视野之中。

这里使用“古今之变”而非更为常见的“现代化”一词指称 18 世纪以来欧洲和世界经历的变迁，是因为 20 世纪中期诞生的现代化理论大多将论题局限在一国政府的政策和国内各主体之间的互动，而较少探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形成和体系之下国家间的关系。<sup>①</sup>“古今之变”则尝试涵盖 18 世纪以来国际秩序的形成、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历次工业革命和现代科学对社会关系的重塑，工商业阶层兴起对政教关系的冲击，各类世俗意识形态与政治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多元帝国论若将自身讨论的时空边界延伸至古代世界，则有必要回应“帝国”在近代是否出现变化。若简单将古今之变理解成帝国分裂为民族国家的过程，那多元帝国论无疑将丧失对 18-20 世纪复杂历史进程的解释权，也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被称为“帝国”的各类跨地域政权的调适能力和相互之间的博弈。

在俄国与中亚草原关系这一场景中，俄帝国的扩张与其自身的近代转型同步展开。以 18 世纪中叶为界，我们大致可区分作为“古典帝国”和作为“现代帝国”的俄罗斯。在 18 世纪 30 年代，沙皇与小玉兹的交涉围绕宗主权、贡赋、质子、换俘等问题展开，俄当局介入草原西路政局的目标是建立东南边疆的安全机制，在巴什基尔、卡尔梅克、乌拉尔哥萨克以及哈萨克小玉兹之间打入楔子以使各方相互制衡。这一时期的交涉内容和扩张理由仍停留在古典时代的政权安全层面，中亚草原至黑海北岸诸游牧部落的联合仍然是这一时期俄国需要提防的隐患。在 19 世纪 20 年代，欧亚革命之后的俄国

<sup>①</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3-51 页。

面临着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拥有了显著提升的军事能力，其军政大员和前线军官在新的世界观影响下变得更倾向于军事冒险。斯佩兰斯基设计的草原统治体制也带有鲜明的欧陆官僚制特征。在 19 世纪 60 年代，俄帝国在完全征服草原地区后并没有因其异质特性而刻意维持多元治理。1868 年临时条例建立的统治体制进一步压缩了部落首领的政治特权，而将行政和司法机构尽可能覆盖整个地区。至一战前，在新的交通和通信技术支持下，草原诸省的行政、司法、赋役、土地和文教制度进一步与欧俄省份接轨，数以百万计的欧俄移民随铁路的扩展而迁入草原地区。这一进程本身带有显著的资本增殖目的，也使得草原北部和东部地区逐渐失去其异质色彩。在中亚草原的场景中，作为现代帝国的俄罗斯遵循军事-财政国家的逻辑，从地缘政治和资本增殖两重视角界定中亚草原在帝国中的位置，以现代的器物、技术和文化，改造着新纳入的边疆地区以及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最后，加入古今之变视角的帝国理论，有助于我们跳出经典俄罗斯史叙事中的“俄西之争”，即将彼得一世以降的俄罗斯史解读为西方派与“非西方派”（保守派、斯拉夫派、民粹派和旧礼仪派等）之间的思想和发展道路竞争，重新思考俄罗斯史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在新的视角下，古典帝国时期俄罗斯的中央-地方关系、政权-军权关系、农耕-游牧关系、君权-教权关系都具有新的研究意义；现代帝国时期俄罗斯的军事与财政关系、国家与国际资本关系、官僚与各社会阶层的关系以及内地与边疆的关系，均值得在比较的视野下深入探究。

---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various theories derived from the concept of “empire”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framework for discussing Russian history. Within domestic and foreign academic circles, discourses on empire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adigms, namely, the civilization empire theory, the capital empire theory and the pluralistic empire theory. The pluralistic empire theory has provided a basic historic horizon for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to interpret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Empire since the Cold War. According to specific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Central Asian steppe from the 18<sup>th</sup> century to early 20<sup>th</sup> centur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pluralistic empire theory has ignored empires' transformation to modernity. Based on reviewing the four main historic periods of Russia's policies towards the Central Asian steppe in the 1730s, 1820s, 1860s and early 20<sup>th</sup> centur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Russia did not deliberately maintain a pluralistic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this region when it conquered and dominated the Central Asian steppe. But instead Russia gradually integrated the steppe into its territor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management reform in the 1860s and immigration policy in the late 19<sup>th</sup> century. According to the above historic fact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upplement the existing empire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emphasizing the necessity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classical empires" and "modern empires".

**【Key Words】** Russian Empire, Empire Theories, Empire Studies, the Central Asian Steppe, "Eurasian Revolution"

**【Аннотация】** С 1990-х годов многие теории, основанные на понятии «империя», стали важной основой для обсуждения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Дискурсы об империи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 и зарубежных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кругах мо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три парадигмы: теор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й империи, теория капитальной империи и теория плюр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Теория плюр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ны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подходом к написанию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кругах пос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Опираясь на конкрет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России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х степей в XVIII и начале XX вв., в статье отмечается, что плюр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мперская теория имеет проблему игнориров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империй. На основе обзора четырёх основн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периодов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их степей в 1730-х, 1820-х, 1860-х годах и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в статье указывается на то, что в процессе завоевания и господства Росс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х степях Россия сознательно не поддерживала

плюр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структуру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регионе, а степной регион постепенно интегрировался в империю в рамках управленческих реформ 1860-х годов и им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конце 19 века. Исходя из приведённых выш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фактов,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делается попытка дополнить существующие теории импери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подчеркивая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ую значимость разграничения «классических империй» и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империй».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имперская теория, импер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е степи,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中立身份下的战略选择 ——土库曼斯坦的中立外交与能源战略\*

孙超 吴靖\*\*

**【内容提要】**土库曼斯坦是联合国承认的永久中立国，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永久中立”，既涉及国家安全，也关乎国家发展。土库曼斯坦能源出口战略基于两个现实需要，一是获得能源经济的独立自主，二是推动国内经济的稳步增长、维护体制安全。土库曼斯坦积极调整中立身份的内涵，推动能源出口战略变革。同时，依据中立身份要求，土库曼斯坦将能源合作伙伴分为可信赖国家、中间国家和不友好国家三种类型，发展出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与此相关，土库曼斯坦的中立外交和能源战略在不同时期（天然气出口单一时期、合作伙伴构建时期和能源出口多元化时期）形成了各自的阶段性特点。当前，土库曼斯坦谋求以更积极的姿态处理地区能源争端，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和油气地缘政治博弈中发挥重要作用，不断提升地区和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中立身份 中立国 土库曼斯坦中立外交 土库曼斯坦能源战略  
**【中图分类号】**D836.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3-0109(31)

## 一、问题的提出

中立（neutrality）指的是国际法中的一种地位，不介入他国战争和冲突的国家被称为中立国（neutral states）。在国际关系中，当国家作出战时不介入其他国家的军事冲突、在和平时期不改变其中立状态的承诺，可以被视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冷战后欧亚地区民族分离运动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19CGJ01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和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崔珩博士的中肯意见，文责自负。

\*\* 孙超，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吴靖，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为“永久中立”。<sup>①</sup>对小国而言，中立地位非常诱人，一方面可以避免卷入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又可以用较小的成本维持地区权力均势。土库曼斯坦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油气运输依赖苏联时期的管道设施，受俄罗斯能源政策的影响较大。同时，由于其地处内陆，对外输送天然气易遭遇更多的地缘政治障碍。<sup>②</sup>这使得土库曼斯坦必须奉行一种更加周全的政策。建国初期的“建设性中立”，将土库曼斯坦的发展同地区和全球进程联系在一起，符合该国的地理、历史与族群-文化现实。<sup>③</sup>这种中立地位可保障土库曼斯坦避免陷入任何不平衡的联盟。但正如沙利文（Charles Sullivan）所言，中立外交虽然为土库曼斯坦政府在处理国际问题上提供了相当大的自由度，但同时也成为其政治精英保持国家的政治、经济与世界拉开距离的方式。<sup>④</sup>

中立身份除了能维护独立自主之外，也塑造着国家的政治价值、国际形象与发展目标。<sup>⑤</sup>通过对外行为展示和平且友善的国际形象，中立身份往往让人看到的是该国的理想主义形象，从而遮掩了中立国也在追求权力的真实特质。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安全环境愈加复杂，中立所依赖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学术界日益倾向将中立概念带入世界政治中，讨论更为现实的权力议题。<sup>⑥</sup>正如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所言，通过“抽象阶梯”（ladder of abstraction），对学术概念进行适当延展，有助于发展该概念不同程度的包容性或特殊性。<sup>⑦</sup>在本文看来，正是中立这一概

① Christine Agius, Karen Devine, “‘Neutrality: A Really Dead Concept?’ A Repris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2011, Vol.46, No.3, pp.267-268.

② Luça Zs. Vasánczki, “Gas Exports in Turkmenistan”, *Institute franc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IFRI)*, November 2011,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note\\_energielvasanczki.pdf](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note_energielvasanczki.pdf)

③ Boris O. Shikhmuradov, “Positive Neutrality as the Basis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urkmenistan”, *Percep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7, Vol.2, No.2, p.1.

④ Charles J. Sullivan, “Neutrality in Perpetuity: Foreign Policy Continuity in Turkmenistan”, *Asian Affairs*, 2020, Vol.51, No.4, pp.779-794.

⑤ Laurent Goetschel, “Neutrality, a Really Dead Concep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1999, Vol.34, No.2, p.121.

⑥ 具体参见 Christine Agius, Karen Devine, “‘Neutrality: A Really dead Concept?’ A Reprise”, pp.265-284.

⑦ 在萨托利的经典概念研究范畴中，概念结构可通过向上延伸或向下延伸而改变。向上则减少概念的特征并拓展概念的外延，向下则扩大概念的特征并减少外延，正如“抽象阶梯”。具体参见 Giovanni Sartori,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0, Vol.64, No.4, p.1044.

念的灵活性，造成了中立身份研究的复杂性。不如使中立概念从“抽象阶梯”上走下来，使之易于进行具体的国别研究分析。因此，基于国别研究的需要，本文将中立身份解读为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外交战略。

土库曼斯坦的中立身份与其天然气出口存在密切的关系。中立身份必然要求土库曼斯坦在对外交往中采取平衡战略，以此捍卫自主性与国家安全。土库曼斯坦地处欧亚大陆油气资源的核心地带，也是世界油气通道的桥梁。优越的资源禀赋和地缘位置，为土在国际油气贸易中赢得了高额的收入，也给其国民带来了稳定富足的生活，这是其国家政权得以长期存在的关键因素。<sup>①</sup>然而，土库曼斯坦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能源运输只得沿用原苏联时期修建的油气管网，没有自主的出口渠道，在油气出口量、出口价格和过境运输方面均受制于俄罗斯。俄罗斯利用能源方面的这种影响，保持对土库曼斯坦的间接控制力，例如通过限制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出口来调整两国关系。<sup>②</sup>1997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因过境费支付问题，拒绝土库曼斯坦利用其管道出口天然气，使当年土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25.7%。<sup>③</sup>因此，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和管理能力薄弱固然是影响土库曼斯坦能源资源潜力转化为经济实力的重大瓶颈，但是更大的困难却是如何把丰富的油气产品输送到国际市场。<sup>④</sup>狭窄的能源出口通道，削弱了土库曼斯坦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竞争力，能源依赖型国家的脆弱性上升，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作为资源国，油气出口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也是土库曼斯坦内政外交的核心。为了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同时确立自己在国际能源体系中的影响力，形成有利的能源战略格局，土库曼斯坦认识到：推动能源出口多元化是降低政治经济双重风险、保证出口经济效益的唯一途径。<sup>⑤</sup>因此土库曼斯坦

---

① 田野：《国际贸易与政体变迁：民主与威权的贸易起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58页。

② Kathleen J. Hancock, “Escaping Russia, Looking to China: Turkmenistan Pins Hopes on China’s Thirst for Natural Gas”,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2006, Vol.4, No.3, p.71.

③ 赵龙庚：“土库曼斯坦：改革开放走新路”，《和平与发展》，2008年第2期，第61页。

④ 王海运、许勤华：《能源外交概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91页。

⑤ 张磊：“‘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能源合作”，《经济问题》，2015年第5期，第10页。

谋求天然气出口多元化,努力寻找潜在可行的天然气消费市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出口虽然摆脱了对俄罗斯的依赖,却又面临新的担忧。

能源出口复杂的地缘政治性质,使得土库曼斯坦的管道修建面临双重挑战。一是土库曼斯坦所在的里海地区,以控制油气资源为目的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一向激烈。对能源的控制成为国际政治的一种重要权力,企图控制世界的大国,往往把掌握世界资源贮藏最丰富和开发条件最好的地区作为自己的目标。<sup>①</sup>土库曼斯坦所在的里海地区国家都有大量可供出口的天然气,域内多个国家在资源议程上存在竞争。欧盟、俄罗斯、伊朗、阿塞拜疆、土耳其和中国都对发展与土库曼斯坦的关系极感兴趣,也愿意同土库曼斯坦合作建设长距离油气管道。<sup>②</sup>为保证本国获得充足可靠的能源供给,各国总是极力涉足世界主要能源产地与重要运输路线,从而赢得主动地位。二是能源运输方式较为有限,油气运输极其依赖基础设施网络。土库曼斯坦没有通往公海的直接通道,无法同买家直接联系,这就决定了其贸易方式大多要采取管道运输。跨国油气运输管道将油气输出国、过境国、消费国的能源经济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同时也要求相关国家分摊风险。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地区冲突、恐怖活动等都会对管道运输的安全构成威胁。

土库曼斯坦对油气产业的依赖,使之更容易受到世界市场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很显然,土库曼斯坦并不希望对外关系受制于外部环境。通过“永久中立”战略,土库曼斯坦逐步实现了在大国间的权力平衡关系,在当前的能源竞争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sup>③</sup>土库曼斯坦的“永久中立”与能源战略显然存在复杂的联系。那么,两者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联?换句话说,中立外交战略内涵的改变是否推动着土库曼斯坦能源战略的变革、其中的联系机制是什么?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探究土库曼斯坦的中立外交与能源战略的互

① 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4页。

② Annette Bohr, “Turkmenistan: Power, politics and petro-authoritarianism”,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me*, Chatham Hous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search Paper, 2016, p.2.

③ İshak Turan, “Turkmenistan’s Energy Independence Policy Regarding Sino-Russian Competition: The Role of Permanent Neutrality in The New Great Game”, *Avrasya Sosyal ve Ekonomi Araştırmaları Dergisi*, 2021, Vol.8, No.2, p.347.

动关系，对其天然气出口通道自独立以来的发展变化进行过程追踪，并以土库曼斯坦与能源合作国的双边关系构建为例，解释其中立外交内涵的改变如何影响能源战略的变迁和能源外交的施展空间。

## 二、文献分析与理论框架

土库曼斯坦是中亚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在独立之后很快就宣布了“永久中立”的政策。自永久中立身份被承认以来，土库曼斯坦的中立外交一直受到各方欢迎，也为本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土库曼斯坦以中立为荣耀，举国上下珍视中立身份，认同中立原则，以中立谋发展。外交实践也证明，土库曼斯坦的中立政策为其处理国际事务提供了重要帮助。永久中立国的地位使土库曼斯坦成为本地区的维和中心，在敦促各方通过政治外交途径，采取必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协调利益、解决各种矛盾方面，具有建设意义。20世纪90年代，根据土库曼斯坦的提议，在其首都阿什哈巴德成功举行了塔吉克斯坦政府与反对派、阿富汗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和平谈判。<sup>①</sup>这些都是土库曼斯坦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成功例子。

永久中立不仅可以被视为土库曼斯坦的国家身份，更可被看作土库曼斯坦实现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政治选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政治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作为能源出口国，土库曼斯坦若要利用资源禀赋发展经济，往往只能通过国家间的协议和国际组织来实现，这就要求土库曼斯坦在对外交往中采取更加主动积极的行为。同时，反对大国干涉、维护政权的需求，也使得土库曼斯坦不能抛弃其传统的中立原则。因此，维护体制安全和实现经济独立，是土库曼斯坦对外战略的两大目标。在实践中，以中立外交来实现这两个目标，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西方国家对中亚的政策经常表现出经济外交与价值观外交相互叠加的特点。<sup>②</sup>西方国家希望

<sup>①</sup> [土库曼斯坦]齐纳尔·鲁斯捷莫娃：“中立的土库曼斯坦——稳定与和平的保障”，《光明日报》，2015年12月12日，第5版。

<sup>②</sup> 徐刚：“欧盟中亚政策的演变、特征与趋向”，《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2期，第18页。

通过经济合作达到价值输出的目的，将合作对象国打造成“民主国家”。<sup>①</sup>这使得土库曼斯坦的中立外交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接近尊重本国独立自主的国家，同时在大国之间小心行事，避免失去自主性。<sup>②</sup>

能源合作对资源国而言，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外交关系，必然受到国家对外战略的指导。合作中的“绝对收益”并不能自然推动信任，这是因为国家财富的增长也往往会带来更多的怀疑和安全焦虑。正如华尔兹（Kenneth Waltz）所言，“关心自我”是国际事务中的律令，对安全的考虑迫使经济收益服从于政治选择。<sup>③</sup>土库曼斯坦的“关心自我”具体表现在中立外交的自主性上，这反过来又对能源合作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中立身份往往使土库曼斯坦在对外交往中带有天然的保守色彩。这也是为什么同为里海地区的天然气资源国，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出口通道远比不上阿塞拜疆多元的原因。<sup>④</sup>虽然安妮特·波尔（Annette Bohr）曾提出，中立外交的“不定特性”（amorphous nature）可使土得以灵活解释这一概念以适应外部环境，<sup>⑤</sup>而安塞奇（Luca Anceschi）却认为，土的中立外交核心是维护体制安全、实现自主的对外政策，因而不利于能源出口战略的调整。<sup>⑥</sup>保罗·斯特罗斯基（Paul Stronski）也直接指出土库曼斯坦的中立地位阻碍了能源出口，使其在与邻国的竞争中处于劣势。<sup>⑦</sup>格雷森（Gregory Gleason）进一步提出，

① 包毅：“中亚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危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1期，第93页。

② İshak Turan, “Turkmenistan’s Energy Independence Policy Regarding Sino-Russian Competition: The Role of Permanent Neutrality in The New Great Game”, p.334.

③ [美]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3页。

④ Rovshan Ibrahimov, “Energy strategy development of Azerbaijan, Turkmenistan and Uzbekista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Khazar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8, Vol.21, No.2, pp.84-85.

⑤ Annette Bohr, “Turkmenistan: Power, politics and petro-authoritarianism”,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me*, Chatham Hous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search Paper, 2016, p.64.

⑥ Luca Anceschi, *Turkmenistan’s foreign policy: Positive neutrality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Turkmen regi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Luca Anceschi, “Integrating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Cases of Turkmenistan and Uzbekistan”, *Central Asian Survey*, 2010, Vol.29, No.2, p.149.

⑦ Paul Stronski, “Turkmenistan at twenty-five: The high price of authoritarianism”,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7, p.12,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Stronski\\_Turkmenistan.pdf](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Stronski_Turkmenistan.pdf)



无论土库曼斯坦政府改变中立外交内涵的意图为何,天然气出口仍存在无形的限制。<sup>①</sup>图兰(İshak Turan)也指出土中立外交与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之间存在矛盾,这是其能源出口多元化之路十分艰难的一大原因。<sup>②</sup>

虽然土库曼斯坦的中立身份不会改变,但随着土国内形势的变化,中立身份的内涵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转变。土特殊的政治生态使得识别这种转变较为困难,却也能从其与各方的互动和一些具体的政策变化中窥得一二。

一些研究尝试对尼亚佐夫时期与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时期的“中立”作出区分,强调其差异。在尼亚佐夫时期,土中立外交主要是为民族-国家构建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是“建设性中立”,探索如何同外部世界相处。土库曼斯坦在独立之初宣布“永久中立”,既可以保持政治的自主性,有机会采取私有化和投资等必要步骤,以保护本国的能源安全,同时又能阻止自身卷入地区的激烈冲突。土库曼斯坦独立不久就认识到了天然气出口高度依赖俄罗斯的问题。俄持续购买土天然气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主要是维系与土的双边关系。<sup>③</sup>这也与土库曼斯坦外部形势的变化相符。随着俄罗斯与乌克兰等国在天然气问题上的博弈愈演愈烈,中亚国家普遍认识到,只有能源出口多元化,才是降低政治经济双重风险、保证出口经济效益的唯一途径。<sup>④</sup>庞昌伟通过数据分析认为,在多元化格局未形成时,土库曼斯坦倾向于寻找新市场;而在格局形成后,消费国需求量的重要性高于价格。<sup>⑤</sup>由于过度依赖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并不急于同俄方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未来双方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能否在油气领域达成一致的看法。<sup>⑥</sup>

① Gregory Gleason, “Natural gas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Turkmenistan”, in I. Overland, Heidi Kjærnet and Andrea Kendall-Taylor, eds., *Caspian Energy Politics: Azerbaijan, Kazakhstan and Turkmenist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78.

② İshak Turan, “Turkmenistan’s Energy Independence Policy Regarding Sino-Russian Competition: The Role of Permanent Neutrality in The New Great Game”, *Avrasya Sosyal ve Ekonomi Araştırmaları Dergisi*, pp.332-349.

③ Dmitrieva Elena, “The Key Role of the Energy-Related Factors in Current Russian-Turkmen Relations”, *Russia and the Moslem World*, 2020, Vol.310, No.4, pp.59-70.

④ 张磊: “‘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能源合作”, 《经济问题》, 2015年第5期, 第10页。

⑤ 庞昌伟: “里海油气管道地缘政治经济博弈态势分析”, 《俄罗斯研究》, 2006年第2期, 第58-61页。

⑥ Elena G. Garbuzarova, “Russia in Turkmenistan: the Policy of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Post-Soviet Issues*, 2020, Vol.7, No.1, pp.63-72.

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就任后，土库曼斯坦宣布在永久中立的基础上实行积极开放的政策。<sup>①</sup>土库曼斯坦一改过去低调的行事风格，推行积极、开放的中立外交。<sup>②</sup>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尼亚佐夫总统去世后，新总统确实采取了更加开放的对外政策。<sup>③</sup>塞巴斯蒂安·佩鲁斯（Sebastien Peyrouse）也明确指出，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上台以来，土库曼斯坦已经修正了“建设性中立”的外交方向，放松了永久中立政策，并认为，这将使该国有机会在地区结构中明确自己的位置。<sup>④</sup>佐恩（Igor Zonn）等学者考察了 2015 年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出口情况，认为积极、开放的中立外交是其天然气出口通道取得突破的原因之一。<sup>⑤</sup>

至此，结合上述文献，可以得出分析土库曼斯坦中立外交与能源战略关系的框架（参见图 1）。土库曼斯坦的中立外交与能源出口战略存在密切的相关性，并通过两种途径发挥作用：一是中立身份内涵的改变（从建设性中立到开放中立），能够直接影响能源出口战略的调整；二是中立身份影响与能源合作国双边关系的构建，从而影响能源合作倾向性的调整。

当前，中亚地区能源博弈加剧，能源合作亟需多边协调机制。<sup>⑥</sup>土库曼斯坦的中立身份和能源战略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出口从依赖俄罗斯到出口多元化、构建新的能源合作格局，与其中立外交身份内涵的调整关系甚大。下文将对土库曼斯坦构建双边能源合作关系进行类型分析和过程追踪，分析其中立外交对能源战略的影响。

---

①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土库曼斯坦（2020 年版）》，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等，2020 年 12 月，第 8 页。

② Charles J. Sullivan, “Neutrality in Perpetuity: Foreign Policy Continuity in Turkmenistan”, *Asian Affairs*, 2020, Vol.51, No.4, p.2.

③ Martha Brill Olcott, “Turkmenistan: Real Energy Giant or Eternal Potential?” Harvard University’s Belfer Center and Rice University’s Baker Institute Center for Energy Studies, December 10, 2013, p.11, <https://www.bakerinstitute.org/media/files/Research/360e14e8/CES-pub-GeogasTurkmenistan2-121013.pdf>

④ Sebastien Peyrouse, *Turkmenistan: Strategies of power, dilemmas of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195.

⑤ Igor S. Zonn, Sergey S. Zhiltsov, Aleksandr V. Semenov, “Export of hydrocarbons from Turkmenistan: Results and perspectives”, in Zhiltsov eds., *Oil and gas pipelines in the Black-Caspian Seas Region*,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e-book, 2016, p.137.

⑥ 王海燕：“中国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的新进展与新挑战”，《国际石油经济》，2016 年第 7 期，第 74-7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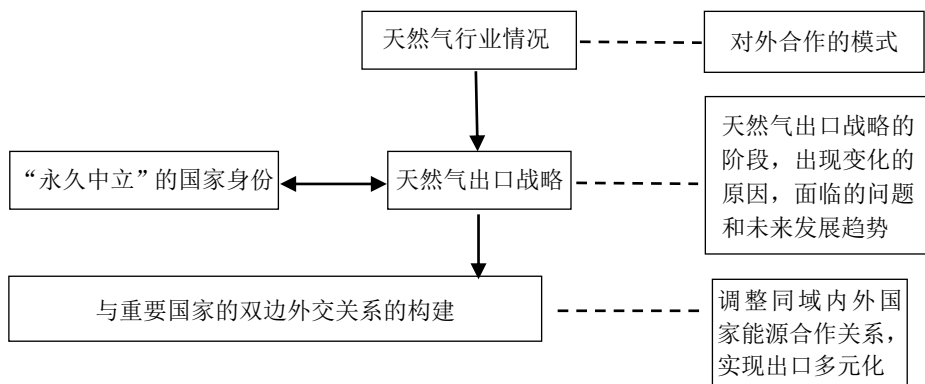


图1 土库曼斯坦的中立外交与能源战略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三、中立外交下土能源合作国的类型划分

土库曼斯坦的“永久中立”身份，要求根据自身角色定位和需求，对能源合作者进行层次区分，以此确认双边能源合作的内容和深度。在合作过程中，土库曼斯坦逐步重构对一些合作者的身份和利益的认知，据此动态调整各个双边能源合作的地位和模式。可见，就土库曼斯坦而言，仅有共同的利益但缺乏对于对方“正面”的认知并不必然形成合作；即便存在合作，也可能是机会主义的或短期的互动。为了维护本国的中立自主，土库曼斯坦将能源合作国设定为三类，即可信赖国家、中间国家、不友好国家。

表1 土库曼斯坦的能源合作国家类型

| 合作国家类型 | 代表国家              | 特征                          | 方式                    |
|--------|-------------------|-----------------------------|-----------------------|
| 可信赖国家  | 中国、伊朗、俄罗斯         | 支持土政局稳定，信任充分，合作空间大          | 加强合作，构建稳定可信赖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
| 中间国家   | 土耳其、阿塞拜疆以及南亚管道过境国 | 拥有共同利益，能源经济存在竞争，文化相似性强      | 合作，在能源合作领域寻找更大的空间     |
| 不友好国家  | 欧盟各国、美国           | 出于政治目的进行能源合作，信任不够，合作存在工具性倾向 | 谨慎合作，能源合作领域保持在一定的范围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一）可信赖国家

可信赖国家的特点是，对土库曼斯坦政权稳定不构成冲击或威胁，同时又拥有较大的消费市场，合作空间大。虽然双方也存在战略差异，在合作中偶有龃龉，但是在处理差异和管控分歧中，彼此信任感得以逐渐加强，形成了合作文化。这类国家有：政治制度相似的邻国伊朗、传统的能源合作国俄罗斯，以及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水平不断提升的中国。

在能源供给方面，土库曼斯坦是俄罗斯的竞争对手，面对全球能源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土库曼斯坦和俄罗斯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如果说当土库曼斯坦加大对中国、印度等国家的能源供给时，它与俄罗斯的冲突隐患将逐渐增大，那么当土库曼斯坦尝试建立新的通道来扩大与欧洲国家的能源贸易时，俄罗斯必然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保障自身的经济利益与能源出口优势：或加强与土的合作，拉拢土库曼斯坦；或设置种种障碍，控制其能源运输通道。土库曼斯坦则不可避免地陷入俄欧平衡的困境中。长期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欧盟各国，致力于同其他能源国家开展更深入的能源合作，以追求能源供给的稳定。俄罗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以及对西方国家天然的谨慎心理，一方面紧紧把握欧洲国家的能源通道，一方面又警惕周边国家与欧盟走近。

尽管如此，土库曼斯坦与俄罗斯依然存在一致的战略利益。土库曼斯坦在独立以后并没有像其他中亚国家那样与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但彼此在各个方面维持着稳定的关系。尤其是在 2002 年针对尼亚佐夫的暗杀事件发生之后，俄罗斯对土库曼斯坦的声援，使得双边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同为资源国，双方也曾两次爆发天然气危机，但对彼此的需要使得俄罗斯与土库曼斯坦的关系依旧稳固。<sup>①</sup>如果说早期俄罗斯从土库曼斯坦进口天然气是为了获得这类资源，那么 2019 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重返土库曼斯坦市场，政治意义则远高于经济利益。俄罗斯将中亚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需要通过稳定与中亚五国的关系维持自身对后苏联空间的掌控，避免土脱离控制，引发羊群效应。因此，两次天然气危机后，俄罗斯仍然保持从土进口天然气，甚至鼓励其能源出口多元化，以维持双方的友好关系。

---

<sup>①</sup> 梁萌、彭盈盈、张燕云等：“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油气过境运输现状及启示”，《油气储运》，2019 年第 10 期，第 1087 页。

中国目前是土库曼斯坦天然气最大的消费国。双方油气产业和大型油气公司均为国家所有，政府意志主导着油气产业的发展与国际合作，政策制定和执行高度一致。这些因素使得两国的合作更为契合。过去，中国与土库曼斯坦油气合作主要集中在天然气领域，两国在天然气勘探开发和生产领域都有深入合作。随着中国石油公司积极在里海区域进行油气布局，中土油气合作“重气轻油”的状况将会有所改变，形成“油气并行、东西并进”的能源投资格局。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土两国油气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13年两国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中土油气合作与其他领域经济合作提供了保障。目前看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土的能源合作呈现三个趋势：第一，由天然气主导到油气并行；第二，多边合作逐渐取代双边合作；第三，多产业领域合作格局逐步形成。同其他国家的油气合作一样，中国石油公司更注重国内油气安全，而将在土库曼斯坦区块的利润作为次要因素。基于此，中国过去与土库曼斯坦进行油气合作，主要集中在油气勘探、开发、生产和运输等领域，以保障国内油气需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两国在石油装备、能源金融、行业服务等领域的合作也逐步加强。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土库曼斯坦第一时间表达对中国抗疫的支持，随后建立了疫情防控工作联系机制，相互通报信息，并两次通过视频会议分享防治新冠肺炎的经验。<sup>①</sup>同年，两国又与有关各方一致决定建立“中国+中亚五国”外长沟通机制，定期举行会晤，<sup>②</sup>并于当年7月16日举行首次视频会议。双方在推进经贸合作的基础之上，大力拓展非资源领域的合作。然而，天然气出口对中国的依赖，也引起了土库曼斯坦方面的警惕。目前中国享有低于天然气市场价格的优惠关税，如果继续加深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土库曼斯坦很难提高天然气价格。<sup>③</sup>

① “驻土库曼斯坦大使孙炜东就抗击疫情问题接受土‘东方网’专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馆，2020年5月21日，[http://tm.china-embassy.org/sgdt/202005/t20200521\\_9490200.htm](http://tm.china-embassy.org/sgdt/202005/t20200521_9490200.htm)

② 王术森、曾向红：“大国中亚地区外交新态势”，《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0期，第47页。

③ Sebastien Peyrouse, *Turkmenistan: Strategies of power, dilemmas of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184.

## （二）中间国家

“中间国家”指的是一些具有共同利益、同时不对土政权体制提出异议的国家，如土耳其、阿塞拜疆以及南亚的一些管道过境国。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土耳其三国同属突厥民族，在宗教、文化、语言和习俗等方面渊源极深；<sup>①</sup>这些国家政治上联系密切，互信程度高，具有稳定的协商机制；三方同为突厥国家组织成员，<sup>②</sup>在促进相互贸易和投资方面已形成共识。土库曼斯坦向西出售天然气和投资建设相关管道，都离不开这两个国家的支持。2020 年，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签署了关于里海友谊油田的协议。<sup>③</sup>这项历史性协议与近期土库曼斯坦、伊朗、阿塞拜疆三国天然气互换协议的签署，有望推动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向西销往欧洲。

巴基斯坦、印度和阿富汗拥有巨大的天然气消费市场，对土库曼斯坦的油气需求迫切，四国在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线项目（下称 TAPI 项目）上具有共同的利益。<sup>④</sup>TAPI 项目推进的最大阻力是南亚的地区安全，特别是阿富汗局势和印巴关系。土库曼斯坦作为中立国，曾举办过多次阿富汗和平协商会议，一直致力于促进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同南亚地区国家现政府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尤其是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地区政府间的良好关系和巨大的合作利益，有助于 TAPI 项目的推进。

## （三）不友好国家

土库曼斯坦与其认定的“不友好国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谨慎合作。这些国家大多出于政治目的，通过经济合作插手地区事务，试图削弱俄罗斯、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阻止伊朗崛起为地区大国，并输出西方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比如利用民主、人权问题干涉中亚地区内政的欧盟国家，以及被视为中亚国家“颜色革命”推动者的美国等。

---

① 王四海、秦屹：“中亚国家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重要作用——以土库曼斯坦为例”，《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 年第 5 期，第 114-115 页。

② 土库曼斯坦是“永久中立国”，2021 年 11 月以观察员国的身份加入突厥国家组织，对该国和突厥国家组织而言都不同寻常。参见冯源：“突厥语国家加速一体化进程”，《光明日报》，2021 年 11 月 18 日第 15 版。

③ “土库曼斯坦与阿塞拜疆签署共同开发里海争议油气田备忘录”，兰州大学土库曼斯坦研究中心，2021 年 2 月 8 日，<http://tkmst.lzu.edu.cn/detail.php?aid=12869>

④ Ramakrushna Pradhan, *Geopolitics of Energy in Central Asia: India's Position and Polic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241.

鉴于欧洲是土库曼斯坦西向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则为南亚项目和欧洲项目提供了外交和经济支持，土政府积极与相关国家展开接触。然而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态度和一些行为让土库曼斯坦难以放下防备。欧盟以援助的方式介入中亚事务，其外交手段带有明显的政治诉求和价值观色彩。<sup>①</sup>双方更多是基于各自的利益而产生的合作，范围和程度有限。

美发布新版中亚战略后，对土兴趣加大，着手加强美土军事合作，推动 TAPI 天然气管道和跨里海天然气管道项目。2019 年 3 月，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借纳吾鲁孜节致函土库曼斯坦总统，表示美国实业界将继续探寻巩固双边经济合作的新方向，希望土库曼斯坦以《里海法律地位公约》的签署为契机，加快跨里海天然气管道建设。<sup>②</sup>2019 年 12 月 6 日，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在内阁扩大会议上指出，土库曼斯坦将积极开展与美国的对话，开放、建设性的双边政治关系为两国加强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sup>③</sup>然而，这一年美国公开表示支持影射土库曼斯坦总统的电影，此举被视为对土内政的干涉，给两国本就脆弱的关系蒙上了阴影。在 2020 年美国新中亚战略的设计中，阿富汗的重要程度下调，美国不再将其视为中亚、南亚地缘政治的中心。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在该地区地缘政治重心北移，明确将中俄视为遏制对象，可能在中亚与中俄一争高下。<sup>④</sup>从过往的经验看，一旦美国决定加大在中亚地区的战略投入，或许会以 TAPI 和跨里海天然气管道项目等经济合作为切入口，这将有助于土库曼斯坦推动相关方向的管道建设。

土库曼斯坦与欧盟及欧洲国家的关系发展稳定。欧盟支持土库曼斯坦奉行能源出口多元化政策，并积极推动跨里海输欧天然气管道项目。2019 年，欧盟中亚事务代表彼得·布里安（Peter Burian）在里海经济论坛上表示，欧盟

① 鞠豪：“欧盟的中亚战略解析：规范与利益”，《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 年第 6 期，第 126 页；孙超：“上海合作组织与欧盟中亚治理的比较——构建命运共同体还是规范性改变”，《俄罗斯研究》，2021 年第 6 期，第 140-164 页。

② “特朗普希望土库曼斯坦实施跨里海天然气管道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9 年 3 月 27 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e/201903/20190302847012.shtml>

③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土库曼斯坦（2020 年版）》，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等，2020 年 12 月，第 9-10 页，<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tukumansitan.pdf>

④ 曾向红：“美国新中亚战略评析”，《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41-42 页。

与土库曼斯坦正在讨论如何将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运往欧洲。<sup>①</sup>土库曼斯坦也定期举办土库曼斯坦-欧盟联合委员会会议，商讨合作项目与合作机遇。<sup>②</sup>然而在具体行动上，各方的合作仍然局限在固有的领域，未见深入。比如在公共卫生合作方面，欧盟制定了 CACCR 计划，旨在帮助土实验室和医院更好地为预防疫情作准备；<sup>③</sup>欧安组织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市举办了根据国际标准和协定实现海关和运输程序数字化的研讨会，旨在向土传授“数字化海关程序”，在疫情大背景下通过运输和贸易便利化加强世界各国的互联互通，有助于增进互利经济合作。<sup>④</sup>

在中立战略的指导下，土库曼斯坦根据对三类国家的认知判断，形成了自己的合作偏好：与可信赖国家积极联系，密切合作；与中间国家拓展合作；与“不友好国家”谨慎合作。在双边和多边互动中，各方逐步形成了相互之间的战略认知，推动或阻碍着彼此进一步的合作。土库曼斯坦倾向于选择有过合作历史的外国企业进行再合作，<sup>⑤</sup>因此这种合作偏好得以在互动中强化，最终造成土库曼斯坦在构建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时，优先选择那些尊重本国政权、能源合作空间大的国家。

这种偏好束缚了其能源外交的施展空间，最终出现对某些国家的天然气出口依赖。因此在现行的中立战略中，土库曼斯坦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消解美国、俄罗斯、中国、伊朗、欧盟、印度等行为体在其天然气出口贸易中的依赖性，扩大自身油气的地缘优势，巩固中立地位，必须最大限度发挥能源供应国的主导地位，转变能源合作模式。

下文将对土库曼斯坦能源伙伴的构建进行过程追踪，讨论土库曼斯坦中立外交如何影响其能源伙伴关系的发展。

---

① “欧盟与土库曼斯坦就建设跨里海天然气管道恢复谈判”，新华丝路，2019 年 8 月 16 日，<https://www.imsilkroad.com/news/p/381528.html>

② “土库曼斯坦-欧盟联委会召开第 20 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1 年 10 月 29 日，<http://tm.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110/20211003212814.shtml>

③ 2020 年 7 月，欧盟启动《中亚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措施》（CACCR, the Central Asia COVID-19 Crisis Response）援助计划，预算资金为 300 万欧元。

④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土库曼斯坦（2020 年版）》，第 10 页。

⑤ 土库曼斯坦在各领域都有相对固定的外资承包工程合作企业，在油气开发和技术服务方面的主要合作伙伴为中国、意大利、俄罗斯、马来西亚、美国等国的企业。



#### 四、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出口通道的建设

随着 2006 年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推出“开放中立”战略，中立身份内涵逐渐发生变化。与以往的“建设性中立”内涵相比，“开放中立”在对外交往和能源合作方面的优势逐渐显现。不仅吸引了大量外资和外国石油公司进入土国内开展天然气工业建设，<sup>①</sup>同时也加快了出口通道的建设，这大大拓展了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地缘空间。根据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出口市场和运输管道建设情况，本文将天然气出口通道的建设划分成三个阶段。

表 2 土库曼斯坦的对外战略与天然气出口阶段

| 永久中立        | 出口阶段                         | 面向市场                         | 管道项目                               | 运行情况                          |
|-------------|------------------------------|------------------------------|------------------------------------|-------------------------------|
| 建设性中立       | 天然气出口单一（1991-1997）           | 俄罗斯、乌克兰                      | 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                         | 在运，1997 年一度停止供气               |
|             | 合作伙伴构建（1997-2009）            | 伊朗                           | 科尔佩杰-库尔特-库伊（土伊西线）                  | 在运                            |
|             |                              | 中国                           |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 在建                            |
| 开放中立        | 合作伙伴构建（1997-2009）            | 俄罗斯                          | 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                         | 在运，2009 年曾停止供气                |
|             |                              | 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                  | 土-阿-巴-印天然气管道（TAPI）                 | 全线规划                          |
|             |                              | 欧洲                           | 跨里海天然气管道                           | 规划                            |
|             | 出口多元化（2009 年至今）              | 中国                           |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A/B/C/D 线               | A/B/C 线在运，D 线在建               |
|             |                              | 俄罗斯                          | 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                         | 少量在运                          |
|             |                              | 伊朗                           | 多夫列塔巴德-罕格兰（土伊东线）、科尔佩杰-库尔特-库伊（土伊西线） | 2010 年建成土伊东线管道；2017 年两条管道停止输气 |
| 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 | 土-阿-巴-印天然气管道（TAPI）           | 土国内部分在建，其他部分搁置               |                                    |                               |
| 欧洲          | 东-西天然气管道（土库曼斯坦国内部分）、跨里海天然气管道 | 2015 年建成东-西管道，跨里海天然气管道仍然在规划中 |                                    |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Martha Brill Olcott, “Turkmenistan: Real Energy Giant or Eternal Potential?” p.11.

第一阶段为天然气出口单一时期（1991-1997年），此时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出口通道仅有一条：经由“中亚-中央”天然气输送管道，过境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销往俄罗斯，少量过境俄罗斯销往乌克兰。第二阶段为合作伙伴构建时期（1997-2009年），这一时期土库曼斯坦分别与伊朗、中国、南亚三国以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天然气出口意向，并于1997年向邻国伊朗供气，2009年建成通往中国的“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 A/B 线并通气。第三阶段是出口多元化时期（2009年至今），土库曼斯坦完成了“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 C 线、土国内的“东-西”天然气管道建设，正在建设 TAPI 管线土国段、“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 D 线。

### （一）天然气单一出口阶段（1991-1997 年）

这段时间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出口完全依赖俄罗斯，通过原苏联时期修建的“中亚-中央”天然气输送管道向俄罗斯出口天然气来换取外汇和商品，并向俄罗斯支付大笔过境费用，将少量天然气转卖到东欧国家。后期由于乌克兰工业萎缩，天然气需求量大幅下降，相应地影响到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产量。1997 年，因为天然气过境费用支付问题，俄罗斯停止从土库曼斯坦进口天然气，两国能源贸易陷入僵局。由于当时国内能源出口高度依赖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的经济受到较大冲击。土库曼斯坦立国以来，一直强调不偏不倚的中立身份，经济难以自主，更难实现“建设性中立”。为打破俄罗斯控制下的天然气出口困境，扩张油气地缘空间，同时也在重要的能源领域与俄保持距离，尼亚佐夫政府转变能源出口战略，谋求开辟多元出口通道。

### （二）能源伙伴构建阶段（1997-2009 年）

为实现天然气多元出口格局，尼亚佐夫和别尔德穆哈梅多夫都作出了努力，与周边天然气消费国构建合作关系。然而，尼亚佐夫时期的中立外交与其他国家保持距离，在避开一系列危及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的风险的同时，也将合作伙伴拒之门外。尤其是在一个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时代，“建设性中立”给土带来的收益小于预期。开国元首尼亚佐夫执政期间很少出国，外长甚至几年也不出国访问一次。<sup>①</sup>因此，尼亚佐夫虽然提出了能源出口多元化

<sup>①</sup> 赵龙庚：“土库曼斯坦：改革开放走新路”，《和平与发展》，2008 年第 2 期，第 60 页。

战略，也与南亚和欧洲市场建立了联系，但却没能在管道建设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仅实现了对伊朗的出口。直到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上任后秉持积极开放的原则，与中国签订了天然气合作项目，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出口对俄依赖的局面才开始发生转变。与此同时，土库曼斯坦在构建能源合作伙伴方面确立了可信赖国家、中间国家和不友好国家三种类型。这一时期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出口通道建设，在以下方面取得了突破。

### 1. 开通伊朗方向的天然气输送管道

伊朗油气资源丰富，但集中在南部地区，其北部地区属于不同的地质构造，油气开采的技术难度和成本较大。与其修建由南到北的天然气管道，不如直接从北部邻国土库曼斯坦进口天然气。因此，在 2017 年以前，伊朗北部山区的天然气供应全靠从土库曼斯坦进口。1997 年，由伊朗出资，以土库曼斯坦向伊朗免费提供三年天然气作为交换，土库曼斯坦建成了第一条通往伊朗的“科尔佩杰-库尔特-库伊”（Korpeje-Kord-Kuy）天然气输送管道，全长 197 千米，从土库曼斯坦西部边境通往伊朗北部，设计输气能力为 80 亿立方米/年。<sup>①</sup>这是土库曼斯坦第一条不经过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被认为是其多元出口战略的第一步，尼亚佐夫对此寄予厚望。对当时的土库曼斯坦而言，过境伊朗，将天然气卖往土耳其乃至欧洲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既不得罪邻国，又能开辟新的出口通道。伊朗方面对此也十分积极，乐于担当中亚国家向世界市场出口油气的过境国。无论双方意图如何，1997 年土库曼斯坦正式向伊朗出口天然气。

### 2. 修建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 A/B 两线

1994 年中土两国开始在天然气领域接触，并签署合作意向书。2000 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土库曼斯坦期间，中石油与土库曼斯坦当时的石油部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中国能源企业开始进入土国能源领域。2002 年中石油与土库曼斯坦石油康采恩签署《古穆达克油田提高采收率技术服务合同》，获得古穆达克油田 100% 的权益，合同期 5 年。2007 年，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当选总统后访华，其间双方签署了建设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的协议，中亚天然气合作项目正式启动。根据协议，未来 30 年内，土库曼斯坦将通过中亚天然

<sup>①</sup> 梁萌、彭盈盈、张燕云等：“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工业与出口多元化”，第 144 页。

气管道每年向中国出口 40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sup>①</sup>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 A/B 两线从 2007 年开始动工，于 2009 年年底完工并投入运营。

### 3. 与南亚和欧洲建立合作意向

1995 年尼亚佐夫提出修建 TAPI 项目，向南亚出口天然气。TAPI 管道起于土库曼斯坦东部加尔金内什（Galkynysh）气田，终于印巴边境的印度城市法季尔卡（Fazilka），全长 1814 千米，土库曼斯坦境内 214 千米，阿富汗境内 774 千米，巴基斯坦境内 826 千米，设计年输气能力为 330 亿立方米，每年供应阿富汗 50 亿立方米，印度和巴基斯坦各 140 亿立方米。<sup>②</sup>同年，欧盟与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国家建立合作意向，开展能源技术合作项目《跨国向欧洲输送石油和天然气计划》<sup>③</sup>。2002 年，中东欧五个国家的能源企业发起“纳布科计划”，提议建设一条由里海-中亚气源地通往欧洲消费地的天然气管道，受到欧盟的欢迎，而从土库曼斯坦到阿塞拜疆的跨里海天然气管道是“纳布科计划”的一部分。<sup>④</sup>欧洲能源长期依赖俄罗斯，双方的地缘政治矛盾使得欧洲国家致力于寻求俄罗斯以外的天然气供应渠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来自里海地区和伊拉克的天然气。<sup>⑤</sup>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天然气储量被欧洲视为摆脱俄罗斯垄断气源供给的最佳依托。从这一方向获取能源，不仅可以摆脱对俄依赖，还能利用能源合作向该地区渗透。土库曼斯坦自 1991 年独立之后奉行中立外交，迫切需要开拓多元的能源出口来发展国内经济。共同的对俄立场<sup>⑥</sup>和能源买卖需要，使得土库曼斯坦被视为“欧盟和中亚之间任何商业天然气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国家”<sup>⑦</sup>。美国出于自身在中亚的能源战略考虑，大力支持后两项绕开俄罗斯和伊朗的输气管道建设，两条管道遂

① 徐小杰：《俄罗斯及中亚西亚主要国家油气战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 95 页。

② 同上，第 94 页。

③ Interstate Oil and Gas Transport to Europe (INOGATE)。

④ 李冉：《天然气管道外交与地缘政治博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第 74 页。

⑤ İbrahim Arınç, Süleyman Elîk, “Turkmenistan and Azerbaijan in European gas supply security”, *Insight Turkey*, 2010, Vol.12, No.3, p.190.

⑥ 庞昌伟、褚昭海：“土库曼天然气出口多元化政策与决策机制分析”，《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6 期，第 103 页。

⑦ Michael Denison, “The EU and Central Asia: Commercialising the Energy Relationship”, *EU-Central Asia Monitoring Working Paper*, 2009, No.2, p.9.

成为该地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一部分，跨里海管道尤甚。美欧积极将能源贸易视为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内容，在同土库曼斯坦的合作中始终带有遏制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因此，尼亚佐夫政府对这两个项目较为谨慎，与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一直没有实际开展，始终停留在意向阶段。

#### 4. 继续保持与俄罗斯的天然气合作

1997年俄土天然气危机后，两国之间的能源贸易虽有所恢复却已不可同日而语，贸易量急剧下降。普京执政后主动改善与土库曼斯坦的关系，两国在2003年签订了《天然气领域25年合作协定》，开始了新阶段的天然气合作。俄罗斯的政策有此转变，不仅是因为需要土库曼斯坦丰富且低价的能源，来保持俄罗斯在欧洲能源市场乃至世界能源市场的影响力，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更是希望借此号召成立独联体天然气联盟，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巩固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依赖性，<sup>①</sup>彰显其对后苏联空间的掌控力。因此，即使俄罗斯自身的天然气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的出口需要，也不可能完全放弃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市场。<sup>②</sup>

这一时期土库曼斯坦从五个方向努力，与周边绝大部分消费国顺利建立联系。然而，在管道的实际建设上困难重重，尤以欧洲和南亚两个方向为甚。土库曼斯坦与欧盟和南亚三国沟通了天然气出口的意向，但相关管道铺设的走向却搅入大国能源战略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中。受制于“建设性中立”的对外战略，土库曼斯坦必须避开俄、美两国的纷争，另寻出路。最终，邻国伊朗和遥远的中国成为其建设天然气多元出口通道的两个重要突破口。<sup>③</sup>土油气地缘空间没能在西、南两个方向推进，却得以向东延伸至亚太地区。然而从出口量来看，当时土伊管道输气量完全无法与过去通过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的出口量相比。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还未步入正轨<sup>④</sup>，暂时无法缓解其出口压力。因此，这一时期土库曼斯坦的油气出口实际上还是依赖俄罗斯。

① 杨宇、刘毅、金凤君：“能源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与中亚-俄罗斯国际能源合作模式”，《地理研究》，2015年第2期，第214页。

② Dmitrieva Elena, “The Key Role of The Energy-Related Factors in Current Russian-Turkmen Relations”, *Russia and the Moslem World*, 2020, Vol.310, No.4, pp.59-70.

③ Arslan Vepayev, Ozan Deniz,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rends of Natural Gas of Turkmenistan the Years from 2009 to 2019”, *Journal of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2020, Vol.4, No.4, pp.237-244.

④ A/B两线在2009年年底完工，此后才正式运营输气。

### （三）加速天然气出口多元化阶段（2009 年至今）

2006 年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继任总统，为减少对大国和单一能源进口国的贸易依赖，在永久中立的基础上实行开放政策，提出了“以发展促和平”的理念，<sup>①</sup>积极主动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能源贸易关系，在深化已有合作的基础上，不断商讨落实一直处于规划中的几条管道建设。此外，土库曼斯坦还积极筹办国际天然气行业的相关会议，利用国际会议和商业论坛等多边外交场合，充分展示土库曼斯坦油气领域的国际合作潜力，推出有经济效益的合作项目。<sup>②</sup>同时，通过《外国特许权法》等法规，以里海-土库曼斯坦一侧的大陆架油气资源吸引外资及合作伙伴。<sup>③</sup>可以说，围绕天然气开展的外事活动成了土库曼斯坦的外交重心。

面对能源出口带来的国家间摩擦，土库曼斯坦也表现出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态度，主动提请国际组织予以仲裁，竭力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相较于尼亚佐夫时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上任后，推行的天然气出口多元化之路更宽，措施也更为得力。<sup>④</sup>这一时期，土库曼斯坦对外能源合作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 1. 伊朗方向的天然气出口

在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政府的努力下，2010 年土库曼斯坦与伊朗之间建成了另一条天然气输送管道，从多夫列塔巴德到罕格兰（Dauletabad Donmez-Khangiran），气源地是土库曼斯坦东部的多夫列塔巴德气田。该管道长 30.5 千米，设计输送量为 60 亿立方米/年，实际输送能力为 15.24 亿立方米/年。然而因为价格和历史债务等问题，从 2017 年开始，通往伊朗的两条天然气管道均停止输气。<sup>⑤</sup>经过漫长的谈判，双方仍未就有关问题达成共识，土库曼斯坦被迫向国际仲裁法院（ICA）提出索赔。2020 年，ICA 宣布了对伊朗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争端的裁决，最终结果对土库曼斯坦较为有利，伊朗需

①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土库曼斯坦（2020 年版）》，第 8 页。

② 高焱迅：“土库曼斯坦”，载孙力主编：《中亚黄皮书：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331 页。

③ 罗英杰：《国际能源安全与能源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2020 年，第 126 页。

④ 赵龙庚：“土库曼斯坦：改革开放走新路”，《和平与发展》，2008 年第 2 期，第 61 页。

⑤ 王四海：“土伊天然气纠纷有玄机”，《中国石化》，2017 年第 1 期，第 75 页。

要付清相关的债务。可以看出，相比此前同俄罗斯的天然气纷争，土库曼斯坦在与伊朗的出口矛盾中表现得更具竞争性与主动性。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政府积极游走于各大国与国际组织之间，为本国争取更多的支持。

虽然双方在能源输送问题上存在争端，但并没有对土、伊两国关系产生根本影响。<sup>①</sup>伊朗在同土库曼斯坦合作的过程中较为理性积极，这使得两国之间的合作水平逐步提升。2021年伊朗国家天然气公司（NIGC）宣布，双方将重新进行天然气贸易，并努力向欧洲出口天然气。伊朗石油部部长贾瓦德·奥吉（Jawad Ogi）表示，伊朗、土库曼斯坦与阿塞拜疆已达成三边互换协议，伊朗将从土库曼斯坦获得天然气，并向阿塞拜疆出售等量的天然气；土库曼斯坦每日将向阿塞拜疆出售500万-60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sup>②</sup>此举充分表明伊朗进口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希望充当土库曼斯坦到欧洲的天然气运输走廊，毕竟使用现有管道过境伊朗，是土库曼斯坦天然气通向欧洲最快捷最便宜的方式，<sup>③</sup>三国天然气互换的协议又将省下一大笔管道建设的费用。而伊朗可以凭此增强其地区话语权，并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伊朗，加速国内建设和发展。此外，互换协议有助于石油公司避开美国的制裁。<sup>④</sup>但据俄罗斯媒体的消息，2021年8月，在里海伊朗水域发现了巨型天然气气田。<sup>⑤</sup>随着该气田的深入开发，在伊朗北部将形成新的天然气开采、储运和调配中心，有可能威胁到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在欧洲市场的地位。

伊朗一直试图成为中亚-里海地区天然气出口的中转站，对土库曼斯坦规划的两大天然气出口项目——跨里海管道和TAPI管道都提出了相应的竞争方案。伊朗尤其警惕土库曼斯坦绕开伊朗向欧洲方向的油气出口，一直以各种理由阻挠跨里海管道的建设。然而受欧美国制裁的影响，伊朗对自己

① Amanberdi Begjano, "Turkmenistan's Energy Exportation Deals With Ir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 2021, Vol.5, No.1, pp.69-80.

② “伊朗、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签署天然气互换协议”，澎湃新闻，2021年11月29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600311](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600311)

③ 张霞：“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出口多元化面临的挑战”，《国际研究参考》，2016年第7期，第27页。

④ Gawdat Bahgat, "Pipeline diplomacy: The geopolitics of the Caspian Sea reg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2002, Vol.3, No.3, p.325.

⑤ “里海伊朗水域发现巨型天然气气田”，兰州大学土库曼斯坦研究中心，2021年8月23日，<http://tkmst.lzu.edu.cn/m/detail.php?aid=13347>

相关管道的建设力不从心。通过三国互换天然气的方式，伊朗得以用最小的代价向欧洲输送天然气，既与欧洲市场搭上关系，又能够作为过境国参与土欧天然气贸易。从长远来看，来自中亚的油气资源将受到欧洲和南亚的欢迎，俄罗斯不可能独占欧洲市场。虽然通过转运天然气售往欧洲的前景尚不明朗，2021 年 12 月，土伊两国总统互通电话，表达了对未来合作的信心，这也是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时期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出口多样化的关键一步。

## 2. 中国方向的天然气出口

中国是土库曼斯坦目前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更是土库曼斯坦值得信任的国家。2020 年土库曼斯坦 86% 的天然气出口到中国。中土主要的运输管道是中国-中亚 A/B/C 线，A/B 两线的起点位于土库曼斯坦的阿姆河沿岸地区，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到霍尔果斯，全长 1792 千米，不仅向我国供气，还能为途经的哈萨克斯坦南部供气。C 线起于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格达依姆，同时作为气源地的还有沿线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土、乌、哈三国通过该线向中国的年供应量分别为 100 亿立方米、100 亿立方米和 50 亿立方米。<sup>①</sup>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主力气源区位于土库曼斯坦境内，是我国目前在海外最大的天然气合作项目区块。三条管道全线设计输气能力为每年 550 亿立方米，2010 年后陆续通气。此外，在建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D 线的设计年输气能力为 300 亿立方米，气源也为土库曼斯坦东部气田。

与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由中国主导不同，奥卡雷姆-阿拉山口天然气管道规划，由土库曼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两国主动提出，目的是避免中俄东线天然气贸易影响土在中国天然气市场的占有率。这充分表明，土、俄两国在东亚市场上已经形成了竞争态势。为确保目前最大的市场不受威胁，且对中国信任程度较高，土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积极性和竞争性，因此才有 2019 年土、哈共同提出的奥卡雷姆-阿拉山口过境天然气管道方案。<sup>②</sup>目前该管道方案仍处于概念阶段，设计全长为 3615 千米，年输气量 300 亿立方米，气源寄希

① 苏华、王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的我国与中亚能源合作新模式探析”，《经济纵横》，2015 年第 8 期，第 23 页。

② 赵守义、赵传海、屈志强等：“跨国天然气管道与中国选项——中亚各国及蒙古国博弈管道过境国分析”，《国际石油经济》，2020 年第 10 期，第 7 页。



望于里海大陆架区块气田。该区块目前由俄罗斯的两家公司负责勘探，开采前景还无法判断。此项目的优点是能将已停输的土伊东西两条管道重新运用起来，但增加了哈萨克斯坦作为过境国，项目成本回收较难，削弱了竞争力。

### 3. 南亚方向的天然气出口

在美国的外交斡旋下，2010年12月，土库曼斯坦总统、阿富汗总统、巴基斯坦总统、印度石油部部长以及亚洲开发银行行长联合签署了《政府间协议》和《天然气销售购买协议》。2014年，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康采恩、阿富汗天然气公司、巴基斯坦跨国天然气系统公司和印度天然气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立了TAPI管道建设和运营财团。该财团原计划选取具有资金和技术实力的国际石油公司作为管道建设和运营的牵头人，但埃克森美孚等国际石油公司对此管道缺乏信心，希望土库曼斯坦政府提供陆上油气区块开采权作为保障。该提议遭到土库曼斯坦拒绝，坚持外资企业仅可以通过技术服务合同的形式进行陆上油气开采。最终，没有大型国际石油公司参与TAPI项目，只能以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康采恩作为牵头人。然而该公司既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来建设这一跨国项目，也没有组织建设和运营跨国管道的经验，<sup>①</sup>这加大了项目建设的难度。以土库曼斯坦境内段的修建为例，工程由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公司主持，于2015年12月开工建设，完工时间一拖再拖，开工6年多仍未完工，预计要到2023年才能完工，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是“只存在于话语中的项目”<sup>②</sup>。印巴境内虽已建成接驳管道所需的基础设施，然而管道建设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土库曼斯坦作为该项目的牵头人并没有足够的经济和技术实力承担责任，在融资方面没有得到积极回应，项目动工缺乏资金。<sup>③</sup>同时，四国没有相关跨国管道建设经验，项目进展艰难。第二，过境国阿富汗政治军事局势动荡，印巴关系不稳定。冲突频发的社会环境给管道建设以及后期的运营带来极高的风险。<sup>④</sup>尤其是阿富

① 王海燕：“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多元化出口战略（1991-2015）：一项实证主义分析”，《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5期，第89页。

② Luca Anceschi, “Turkmenistan and the virtual politics of Eurasian energy: the case of the TAPI pipeline project”, *Central Asian Survey*, 2017, Vol.36, No.4, p.410.

③ 梁萌、彭盈盈、张燕云等：“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工业与出口多元化”，第141页。

④ Meena Singh Roy,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urkmenistan for India”, *Strategic Analysis*, 2011, Vol.35, No.4, pp.661-682.

汗的和平进程严重影响着管道建设和运营安全。塔利班上一次当政时期曾批准过该项目，土库曼斯坦政府也一直保持与塔利班的关系。随着美军撤出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握阿富汗政权，前阿富汗政府签订的关于该管道的协议内容也已得到塔利班当局的承认，并承诺将积极参与其中。<sup>①</sup>然而该地区三股势力活动猖獗，在实际运作中，沿线政府能否保证管道途经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仍难确定。<sup>②</sup>第三，伊朗针对性地提出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项目（IPI），计划通过这条天然气管道从伊朗南部输送天然气到印巴边界。该项目不仅不用经过阿富汗动荡地区，而且相较于 TAPI 线路距离更短，耗资更少，对印度和巴基斯坦颇有吸引力。<sup>③</sup>此外，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已同意加入该项目，并担任管道运营商和项目建设的承包商。<sup>④</sup>然而，受制于美伊关系的反复和资金、环境等因素，该项目未能得到国际资本的青睐，进展缓慢。美国也对印度施加压力，要求其退出 IPI 项目。<sup>⑤</sup>

TAPI 管道建设和南亚市场是土库曼斯坦新时期的重点关注对象。TAPI 曾被称为“梦想管道”，动荡的中亚、南亚希望这条管道能使国家间的合作更加紧密，给地区带来和平与发展。一旦中亚和南亚之间出现能源通道，两个区域的能源合作将改变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出口乃至中亚能源出口的格局，给欧亚大陆能源供需局势带来长期且深远的影响。

TAPI 管道和南亚市场的开发，充分表现出土库曼斯坦新时期对外战略的转变。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出口的传统是将天然气运至边境，接下来的管道建设、投资及输送均由消费国负责。其本意是避开与周边国家的纷争，减少风险，然而这种合作方式已经不适合如今的能源市场了。<sup>⑥</sup>目前的 TAPI 管道

① “塔利班有意参与 TAPI 天然气管道建设”，兰州大学土库曼斯坦研究中心，2021 年 8 月 18 日，<http://tkmst.lzu.edu.cn/detail.php?aid=13343>

② Sayed Masood Sadat, “TAPI and CASA-1000: Win-Win Trade between Central Asia and South Asia”, *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SCE Academy*, 2015, No.25, p.18.

③ Adil Rana Rajpoot, Sharyl Naeem, “Geopolitics of Energy Pipelines: Case Study of TAPI and IP gas Pipel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Integrated Education*, 2020, Vol.3, No.8, p.20.

④ 陈本昌：“21 世纪以来俄印能源合作的进展、动因及影响分析”，《东北亚论坛》，2020 年第 6 期，第 113 页。

⑤ Sebastien Peyrouse, *Turkmenistan: Strategies of power, dilemmas of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186.

⑥ 梁萌、彭盈盈、张燕云等：“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工业与出口多元化”，《油气储运》，2020 年第 2 期，第 145 页。

建设由过境四国组成的财团负责，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公司作为牵头人，独占85%的份额。这说明土库曼斯坦正在逐渐改变自己的合作方式，以迎合市场，满足自身能源出口战略的需要，对土而言，这是巨大的转变与挑战。

#### 4. 欧洲方向的天然气出口

2009年7月，土库曼斯坦同纳布科财团股东之一的德国莱茵（RWE）集团签署了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长期合作备忘录，其中提到经由里海海底的天然气运输管道，该管道将成为纳布科输气项目的一部分。<sup>①</sup>然而在规划气源地时，发现真正可行的只有阿塞拜疆沙赫杰尼兹油气田（Shah Deniz Field）每年100亿-200亿立方米的供气<sup>②</sup>，其他里海-中亚资源国尽管有出口意愿，却难以提出相应可实施的管道方案。尤其是跨里海管道，遭到了里海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

纳布科管道项目在2013年中期因为气源问题正式宣布流产，随后欧盟将“南部天然气走廊”（Southern Gas Corridor）计划提上日程。跨里海天然气管道作为计划中的拓展性管道，成功的关键在于该计划能否获得充足的气源。<sup>③</sup>2015年，土库曼斯坦在境内修建了“东-西”天然气输送管道，以保证西售气源的充足稳定，为后续向欧供气作准备。<sup>④</sup>“东-西”管道于当年通气，设计运力为每年300亿立方米。天然气离开土库曼斯坦后的管道过境线路，是土欧天然气贸易的主要问题。目前土库曼斯坦天然气西售有以下三条可能的线路。

第一条是往北过境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沿里海管道（Caspian Coastal Pipeline）。为防止欧洲绕过俄罗斯直接获得中亚气源，俄罗斯提出修建一条沿着中亚-中央3号管道（因年久失修已停止输气）平行铺设的新管道，计划于2009年上半年开工建设。然而该方案违背土库曼斯坦和欧盟摆脱对俄出口依赖的意愿，因此没能得到土、欧方面的主动回应，至今没有下文。

① 李冉：《天然气管道外交与地缘政治博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98页。

② 同上，第110页。

③ 潘楠：“欧盟南部天然气走廊计划及其影响”，《国际石油经济》，2016年第9期，第58页。

④ Yusin Lee, “Turkmenistan’s East-West Gas Pipeline: Will It Save the Country from Economic Decline?”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2019, Vol.66, No.3, pp.211-223.

第二条是过境伊朗和土耳其的管道线路。土库曼斯坦-伊朗-土耳其天然气输送项目由伊朗提出,绝大部分管道在伊朗境内。跨里海管道项目搁置后,2017 年土库曼斯坦提议过境伊朗向土耳其、伊拉克出口天然气,遭到伊朗国家天然气公司的拒绝,但伊朗随即称土库曼斯坦可过境伊朗向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出口天然气。随着伊朗、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三国天然气互换协议的达成,这条运输线路将成为跨里海管道项目有力的竞争对手。

第三条则是一开始计划的跨里海管道路线。该路线在 1998 年由美国最先提出,计划铺设穿越里海海底的天然气输送管道,将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的天然气运输到欧洲,对接欧盟与土耳其、阿塞拜疆等国近年来大力推动的“南部天然气走廊”项目。此项目旨在将阿塞拜疆的天然气经格鲁吉亚、土耳其等国输入欧洲,主力气源是包括阿塞拜疆沙赫丹尼兹气田在内的整个里海区域气田,目前该项目下阿塞拜疆境内的管道已经开始向西供气。

理论上,这条跨里海天然气管道的修建不仅能使阿塞拜疆成为一个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能通过转运中亚天然气成为东西方天然气运输枢纽,增强阿塞拜疆在能源市场上的话语权,极大提高其国际影响力。从出口量来看,虽然 2020 年阿塞拜疆和俄罗斯对土耳其的天然气出口量不相上下,但在欧洲市场,阿塞拜疆的出口量不及俄罗斯的十分之一,很大原因是阿塞拜疆自身的气源供给不足。实际上,在欧洲提出的“南部天然气走廊”计划中,阿塞拜疆只作为能源中转点,更关键的供应源是土库曼斯坦、伊朗、伊拉克等国。因为当时这些国家还无法为此管道提供足够的天然气,而阿塞拜疆恰好发现了沙赫丹尼兹气田,便暂时成了主要气源地。跨里海天然气管道的修建受到了沿线各国的欢迎,然而该管道至今没能建成,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是管道建设难度大,成本惊人,各方在出口合作模式上存在分歧。阿塞拜疆此前斥巨资参与“南部天然气走廊”境内管线的建设,短期内无力进行东边跨里海的建设项目,且同为气源国,阿塞拜疆对竞争者的天然气过境难免抱有一定迟疑。而土库曼斯坦一向不承担境外管道的建设任务,况且土本身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不足,技术落后,缺乏资金,根本没有足够能力承担该项目的建设。卢克石油公司曾提出在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的两个大

型气田之间建设一条输气管道，仅 78 千米，成本约为 5 亿美元，<sup>①</sup>这比建设整条里海管道的成本低了三分之二。然而两个气田之间的互通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例如，在开采后、供气前，需要对天然气进行加工以提取氦气等珍稀资源，<sup>②</sup>相应的加工厂一般要建在岸上的安全地带，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两国气田互通这个方案难度较高。

其次，美国和欧盟将里海地区视为地缘政治的要冲，希望借能源合作参与到里海地区的事务之中。修建跨里海天然气管道不仅能加强与里海地区国家的能源合作，削弱俄罗斯在欧洲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更能在俄罗斯控制下的后苏联空间撕开一道口子，制衡俄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同时，近年来中国和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贸易量攀升，支持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出口欧洲，将削弱中土两国的贸易合作，遏制“一带一路”倡议在欧亚地区的推进。

由于跨里海管道一直处于规划状态，这使更多的国家得以参与管道铺设的博弈中，尤其是阿塞拜疆和土耳其。阿塞拜疆希望为已有的俄-阿天然气管道引入新的气源，实现其建设东西运输枢纽的计划。土耳其扼守欧洲南部门户，目前进入南欧的天然气绝大部分都需要经土耳其中转。管道建成后，中亚-里海地区与欧洲的天然气贸易量的提升，有利于土耳其建设能源运输和贸易中转中心，增加在能源市场上的议价能力。<sup>③</sup>

#### 5. 俄罗斯方向的天然气出口

继 1997 年俄土天然气贸易摩擦后，2009 年双方再次因管道爆炸以及气价等矛盾，降低了天然气交易量，两国关系也降至冰点，<sup>④</sup>2016 年土库曼斯坦彻底停止了向俄罗斯供应天然气。2018 年，俄罗斯主导签订《里海法律地位公约》，两国再次握手言和，随后俄罗斯的天然气公司宣布重返土库曼斯坦能源市场。2020 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从土库曼斯坦实际采购了 38 亿立方米天然气，占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出口的 12%。两国的天然气

<sup>①</sup> Luke Coffey, “Oil and Gas Exports from Central Asia Should Bypass Russia and Iran-What the U.S. Can Do”,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March 23, 2020.

<sup>②</sup> 潘楠：“欧盟南部天然气走廊计划及其影响”，第 64 页。

<sup>③</sup> Amir Jafarzadeh et al., “Possibility of potential coalitions in gas exports from the Southern Corridor to Europe: a cooperative game theory framework”, *OPEC Energy Review*, 2021, p.20.

<sup>④</sup> Indra Overland, “Natural gas and Russia-Turkmenistan relations”,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2009, Vol.56, No.9, pp.9-13.

贸易至今仍在进行，也取得了很多合作成果，但是双方关于天然气出口通道的矛盾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作为地区内两个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俄土的目标市场高度重叠，双方既相互需要又不得不彼此防备。

俄罗斯高价从土库曼斯坦购买天然气以维持自己在地区能源出口中的主导权，然而国际天然气市场价格的低迷使其无法承担其中的差价，两国的天然气危机大多在天然气价格大幅降低的年份发生。虽然 2009 年年底两国达成新的价格协议，约定共同建设相关输气管道向欧洲供应天然气，还达成了根据市场原则<sup>①</sup>购买天然气的共识，然而俄罗斯在经济上已无法大量购买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土库曼斯坦也不愿意再次陷入依赖俄罗斯出口天然气的局面，最终两国只是维持着一定的贸易额。

从“建设性中立”到“开放中立”，土库曼斯坦建成了通往中国、伊朗等可信赖国家和中间国家的天然气出口通道，获得了更多的能源合作伙伴，合作水平逐渐提升。随着与中国天然气贸易量的增加，土库曼斯坦认为出现了新的出口依赖风险，因此开发南亚和欧洲市场的紧迫性上升。这与其中立外交战略同样密不可分。虽然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施行的“开放中立”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土库曼斯坦能源出口通道的单一性，为本国天然气开辟了东亚市场，但其中立外交的内在排他性没有得到根本转变。油气管道建设对国家间的互信水平和战略密切程度要求很高，土库曼斯坦中立身份对自主性的维护限制了其与一些国家的深度合作，这是土库曼斯坦在南亚和欧洲方向的管道项目难以取得进展的一个因素。

## 五、结语

中立国和资源国的双重国家身份，决定了土库曼斯坦外交政策的基本导向。自独立以来，土库曼斯坦在中立身份的指引下，依托丰富的资源，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天然气出口通道从单一走向多元，逐步构建起多层次的能源合作伙伴网络，形成了能源出口的多元化格局。本文追踪土库曼斯坦天然气

---

<sup>①</sup> 俄土双方形成的定价机制，根据的是“净倒算法”（Net Back）原则，以欧洲市场均价减去运输费和一般“合理”费用之后的价格为实际购买价格。

出口通道自独立以来的发展变化，指出中立身份内涵的变化，即从较为强调独立自主到积极开放，是天然气出口多元化取得显著成果的一大原因。与此同时，土库曼斯坦的积极开放仍是在中立身份的框架下，表现出保守、独立的一面，这限制了部分对外能源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较其他国家更容易形成出口依赖。因此，中立身份对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出口的多元化，既是助力也是需要调整内涵的动态因素。

中亚-里海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从19世纪沙俄和英帝国为争夺该地区控制权展开“大博弈”以来，长期是地缘政治竞争十分激烈的区域。苏联解体以来，该地区事务一直处于大国博弈的氛围之中，因此各国都需采取必要的方式维护本国的独立自主。作为这一地区的中立国，土库曼斯坦一直大力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在争取国际社会对其永久中立地位支持期间，土库曼斯坦多次充当地区冲突调停者的角色。在处理地区冲突方面的经验证明，土库曼斯坦具有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中心的实力。随着中立地位得到承认，虽然每年仍有一些国际和地区性会议在阿什哈巴德召开，但土库曼斯坦在处理地区争端上不再像过去那么主动。可以发现，冷战后中小国家采取中立身份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如土库曼斯坦希望通过将能源出口与中立外交链接起来，形成独特的中立特质，以此从国际社会获取对本国永久中立地位的承认，同时维护出口利益并扩大影响。

土库曼斯坦开国元首尼亚佐夫指出，“亚洲大陆任何时候都找不到不附加任何条件就能解决尖锐国际问题的场所……新的政治现实使得有必要在我们这个地区建立类似的中心”。<sup>①</sup>中亚需要一个协调国际能源问题的多边机制。土库曼斯坦身兼地区能源出口大国和中立国家的身份，通过主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以更积极的姿态运用自身中立优势，与相关大国一道，在处理地区能源争端、建设国际油气治理体系和维持全球油气地缘政治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此，土库曼斯坦灵活改变中立身份的内涵，不仅能为解决本国能源出口的依赖危机创造条件，还能在国际社会中塑造正面的负责任形象，进而在国际体系和地区事务中确立自身的地位。

<sup>①</sup> [土库曼斯坦]萨·阿·尼亚佐夫：《永久中立 世代安宁》，赵常庆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Abstract】**Turkmenistan is a permanent neutral country recogniz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The “permanent neutrality” as a country’s foreign strategy, it involves both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urkmenistan energy export strategy is based on two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which one is to obtain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of the energy economy, and the other is to promote the steady growth of domestic economy and maintain institutional security. Turkmenistan actively adjusts the connotation of its neutrality and advances changes in its energy export strategy. Meanwhile,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neutrality, Turkmenistan defines its energy partners as three types: trustworthy countries, intermediate countries and unfriendly countries. Then it develops cooperative relations of different degrees. Accordingly, Turkmenistan neutral diplomacy and energy strategy have forme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stages, namely, the period of natural gas export, the period of partnership building and the period of energy export diversification. At present, Turkmenistan seeks to deal with regional energy disputes in a more active manner,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oil and gas geopolitical games, and continuously enhancing its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Key Words】** Neutral Status, a Neutral Country, Turkmenistan Neutral Diplomacy, Turkmenistan Energy Strategy

**【 Аннотация 】**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 является страной с постоянным нейтралитетом, признан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Объединённых Наций, «постоянный нейтралитет» во внешней стратегии страны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как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так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тратегия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 по экспорту энергии основана на двух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потребностях, одна из которых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получен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а другая — в содействии устойчивому росту внутренне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поддержани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 активно корректирует содержание своего нейтралитета и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своей стратегии экспорта энергоресурсов. При этом, согласно требованию нейтралитета,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 делит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нёров на три типа: благонадёжные страны,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е страны и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е страны — и развивает отношен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азной степени.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нейтраль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 в разные периоды (период единого экспорта природного газа, период выстраивания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и период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и экспорта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ей) формировали свои поэтап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 стремится более активно решать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е споры, играет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е управления энергетикой и в нефтегазовых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грах, постоянно наращивает своё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влияние.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Нейтральный статус, нейтральная страна, нейтраль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俄罗斯文学与政治

# 从三部古代俄罗斯文学作品 看俄罗斯民族的政治思维\*

郑永旺\*\*

**【内容提要】**文学作品有其内在的政治思维，民族和国家的意志借助文学的前文本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方面。俄罗斯古代文学的三个源文本《古史纪年》《伊戈尔远征记》和《伊万雷帝与库尔布斯基的通信集》，解释了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国家道路选择的内在动因。《古史纪年》对基辅罗斯的诗意叙述，显示了历史与文学的紧密关系和建立在神学逻辑之上的政治正确。12世纪《伊戈尔远征记》的问世，标志着俄罗斯民族史诗的诞生。《伊戈尔远征记》宣扬崇战尚武精神，讴歌勇士荣耀，以文学的方式使“罗斯大地”的观念得以进一步深化，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内容的相似和思想的接近，使两种文本成为俄罗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处于思想场域的中心地位，俄罗斯的西欧派、斯拉夫派以及平民知识分子纷纷以文学为工具表达自己对国家现实和未来的关注，这是文学中心主义持续兴盛不衰的内驱力。20世纪以来，虽然俄罗斯的文化语境几经变化，但是作家依然是思想和政治舞台的重要角色，文学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传统得到了完整继承。古代俄罗斯文学关于历史的记录与书写，体现了文学对现实的模仿与塑造，为理解俄罗斯民族、国家文化形态和价值取向提供了参考。“俄罗斯的特殊使命”和政治思想有机会在了解俄罗斯历史记忆的过程中得到明晰与判断。

**【关键词】**俄罗斯政治思维 古代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国家构建 国家意志

**【中图分类号】**I512.0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3-0140(30)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流派研究”（项目批准号：17BWW04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郑永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教授。

文学与政治有紧密的联系。柏拉图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模仿，这种模仿的成品也保存了已经成为历史的现实，是民族意识的组成部分，并反过来影响现实。此外，文学本身也能对思想、文化和政治进行塑形。世界上很多文明都通过文学来表达民族对于世界的诗意感受，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以历史和文学的混合型文本讲述本民族的使命，并在与其他民族的对比中来确定自己的文化优越感。

在白银时代的别尔嘉耶夫看来，俄罗斯知识分子通过文学表达自己对于国家发展的设想。他们也像很多政治家一样，将自己的理想投射于文学中，但他们“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被处死”<sup>①</sup>，这种通过文学证明其道路选择的执着，使得“俄罗斯民族是特殊的民族”<sup>②</sup>。回望古代俄罗斯文学，就能发现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成因。孔子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sup>③</sup>来描述文学和国家政治的关系。“观”，按东汉郑玄的解释，“观风俗之盛衰”，是诗人“言志”的形式和内容，折射出时代的图景或国家（当权者）的意志。在这一点上，古代俄罗斯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sup>④</sup>有相似之处。在各个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文学的使命多以诗歌形式传达人们最朴素的感情，同时，以文学证明历史的尝试，使得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相互渗透，承担相同或类似的使命。因此，古代俄罗斯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在这方面是接近的和相似的。

## 一、《古史纪年》确定了俄罗斯民族的神正义

《古史纪年》是有文学价值的史学文本，其史学性在于强调，“古罗斯帝国以神性起源、合理版图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自我定位，以此构建初始的

① [俄]尼·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5页。

② 同上，第32页。

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8页。

④ 事实上，这也是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古代文学的共同特征。如《荷马史诗》不仅仅是关于英雄的颂歌和神与神之间争斗的叙述，也反映出古希腊人的思想诉求和政治思维。

古罗斯帝国形象”<sup>①</sup>，也为后来的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思想提供了历史依据，即神正义与俄罗斯民族是捆绑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

历史是融合了意识形态元素的文化想象，既有无法更改的事实，也有包含民族对这些事实的充满情感的虚构。《古史纪年》以事实为经，以文学为纬，讲述了基辅罗斯大公及其众多子孙、兄弟，外与日耳曼人及拜占庭帝国、内与统治阶层内部的异己势力，为利益展开的政治博弈。《古史纪年》大致成书于 11 世纪下半叶至 12 世纪初，其史学性按利哈乔夫（Д. Лихачев）的说法，“是为了刻画那个时代性格禀赋大同小异的俄罗斯诸大公，这些人的名字很容易混淆”<sup>②</sup>，此语意在表现历史的传承性和人物性格的家族类似性。历史学家卡拉姆辛认为，《古史纪年》的文学性主要表现为对雷同性的突破。他遗憾地指出，《古史纪年》中缺少伊万四世这样有性格的人物，“伊万雷帝的性格让人想起野蛮的非洲草原，看着伊万雷帝的画像，我下意识地想到，这是多适合表现历史的肖像画啊”<sup>③</sup>。但是卡拉姆辛的说法有失偏颇，因为奥莉加的狡诈、奥列格的英勇和迷信，实际上都为《古史纪年》增添了文学的虚构情调。并且历史从来不仅仅是为了记录过往，“善以诫世，恶以示后”也是俄罗斯历史学家们（当然，很多编年史的作者都是宗教人士）重要的史德，编年史的文学性亦是为政治和宗教服务的。所以，“《古史纪年》以及类似编年史的出现，与俄罗斯早期封建社会爱国主义精神和意识形态的确立关系密切，统治阶层想借助历史巩固国家政体的合法性，维持俄罗斯土地的完整”<sup>④</sup>。

《古史纪年》（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有一个能概括这部史书内容的、冗长的全称：“这是对往年历史的记载，记述罗斯民族从何而来，谁是基辅的开国大公，以及罗斯国家如何形成”<sup>⑤</sup>。编年史从“神圣书写”（Великое

① 史思谦：“论《古史纪年》中的古罗斯帝国形象建构”，《俄罗斯研究》，2016 年第 5 期，第 3 页。

② Лихачев Д.С. Человек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М.: Азбука-Аттикус, 2015. С.11.

③ Там же. С.10.

④ Кусков В.В. 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9. С.42.

⑤ 在《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以及后来的《伊帕齐耶夫编年史》《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中，都可以看到《古史纪年》逐渐完善的过程。参见 Кусков В.В. 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43-44.

писание) 的时代开始写起, 作者涅斯托尔 (Нестор) 借助《圣经》中大洪水的传说, 把俄罗斯民族与挪亚之子雅弗联系在一起。在修订后的第三版里, 史书记载截至 582 年, 涵盖了基辅罗斯最重要的时期, 并涉及了罗斯人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等问题。19 世纪的斯拉夫派和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都曾以《古史纪年》为据, 确立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意识”“莫斯科是第三罗马”以及“神圣罗斯”等俄罗斯思想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核心元素存在的前逻辑。从历史学的角度看, 书中的“记录”有很多想象的成分。卡拉姆辛认为, 当时东斯拉夫各个部落在兵器铸造技术方面远远逊色于周围的日耳曼等异族。生产工艺的落后意味着文明的落后, 他进一步指出, “北方的斯拉夫人穿着松鼠皮的衣服, 所谓的工业生产只能局限于满足眼前的生活需要”<sup>①</sup>。这也意味着, 正因为文明和生产的双重落后, 才使得确立神正义的任务更加刻不容缓。利哈乔夫断定, 《古史纪年》是各种题材和体裁经由多个作者拼凑在一起的史学和文学拼盘, 其文学价值远大于史学价值。<sup>②</sup>但利哈乔夫也承认, “那个时期的历史文本都是在两种基本原则统摄之下完成的, 一是‘观点的统一性’ (единство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原则, 二是‘事件话题的统一性’ (единство темы) 原则”<sup>③</sup>。文学书写的虚构性使神圣文本的内容得以形象化地移植到俄罗斯文化文本之中, 神圣文本 (the Text) 被人为地与民族历史嫁接, 成为民族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 史学家普里谢尔科夫 (М.Д. Приселков) 认为, 该书记录的事件有别于真实的历史事件, “《古史纪年》的人为痕迹明显, 作为史料不是很可靠”<sup>④</sup>。这也间接地证实了《古史纪年》的文学属性, 即虚构性, 但这并不影响民众和精英们出于现实需求、爱国情怀和寻根意识, 将此书奉为文学和史学的经典, 并在古代俄罗斯文学中寻找能解释当下文化现象的依据, 这已经成为俄罗斯思想界的一种共识。俄罗斯

① Карамзин Н. Полная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 одном томе. М.: АСТ, 2016. С.69.

② См. Лихачев Д. 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Великое наследие. Классиче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в 3 томах. Т.2.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7. С.342.

③ Лихачев Д.С. Человек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С.15.

④ Приселков М.Д. Киев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 в. по византий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 Л.: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ЛГУ, 1941. С.216.

学者从编年史作者的心理机制出发来解读这种“人为痕迹明显”的历史文本，达尼列夫斯基说，“个人印象与社会集体经验相符合，就是编年史作家的标准”<sup>①</sup>，其中的社会集体经验就是该民族被优化的价值取向。其结果是，编年史家在书写历史的时候，也在不断扪心自问并苦苦追寻答案：“如果事件这样发展会怎么样？”涅斯托尔的原则正是依据这种理念将俄罗斯人与神谕结合，赋予俄罗斯历史以神正义的灵氛。

涅斯托尔把《古史纪年》的开端和神圣文本（the Text）联系在一起。大洪水中存活下来的挪亚及其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在雅弗众多的后代中，有一支是俄罗斯人。这种基于价值判断的“事实判断”，使得俄罗斯民族在创世之初便在整个基督教文明中拥有了无可争辩的优越地位。但是，如果所有民族都是上帝的子民，理论上上帝对所有子民的赐福都应该是一样的。不过，俄罗斯因为是雅弗的子孙而当仁不让地获得了比闪和含更多的机会。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严酷的自然、常年的对外战争和曾经被外族侵略的历史、宗教信仰等所有正面的和负面的东西都是上帝赐予的，而这些必然和偶然的因素造就了这个民族“不受时间影响，在一切形势一切气候中始终存在的特征”<sup>②</sup>。丹纳把这个特征称为“永久的本能”。俄罗斯人之所以缺少日耳曼民族那种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沉迷于艺术思维，皆是因为俄罗斯民族“永久的本能”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这并没有使俄罗斯神秘到“对俄罗斯只能信仰”的地步。俄罗斯人是如何在诸多民族中确定自己的先天优势的呢？为什么直到今天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思想依然盘踞在俄罗斯民族的意识里？为什么丘特切夫（Ф.И. Тютчев）言之凿凿地说“理智无法理解俄罗斯……对俄罗斯只能信仰”？信仰什么样的俄罗斯？为什么对俄罗斯只能信仰？对俄罗斯民族而言，宗教不完全是关于信仰的造型，而是巧妙地借助历史文本，通过文学的加持，来确立民族优势地位的政治策略。

①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И. Добру и злу внимая равнодушно?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императивы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го летописца). <http://aliom.orthodoxy.ru/arch/006/006-danilev.htm>

②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47-148页。

正如《古史纪年》的全名所表述的那样，该历史文本所要解决的，首先是俄罗斯民族极为关切的“俄罗斯（罗斯）民族从何而来”的问题，而这也深深地影响民族的未来：这是历史问题，也是神学问题，同时也是俄罗斯文学的问题；答案包含在俄罗斯民族关于自己在历史空间中的定位以及对自身文化特质的沉思中——昨天“谁之为我”，今朝“我之为我”，明日“我之为谁”。今天的俄罗斯，从国家的顶层设计到社会的底层逻辑，都致力于民族复兴大业，关注本国人民的生存空间。正如俄罗斯文学“高加索俘虏”主题所反映的情况，从19世纪普希金的《高加索俘虏》、莱蒙托夫的《高加索俘虏》、列夫·托尔斯泰的《高加索俘虏》，到20世纪90年代马卡宁（В. Маканин）的《高加索俘虏》（Кавказский пленный, 1994），无不充满着俄罗斯人焦虑于民族未来的表达。

这种焦虑最初在基辅山洞修道院的涅斯托尔的笔下表现出来，他将《旧约》故事巧妙地与历史文本嫁接，通过《古史纪年》赋予俄罗斯民族神正义的合法性。俄语词汇 *славянин*（斯拉夫人）源自拉丁语 *sclavus*，与现代英语中的 *slave*（奴隶）是同根词。早年的斯拉夫人常被日耳曼人掠去为奴，这也是东斯拉夫人请罗斯人（北欧人的一支，即早年的瓦兰人，又称瓦良格人）治理国家的原因。即便是今天，一些欧洲发达国家仍然拒绝俄罗斯加入欧洲俱乐部，称俄罗斯为东方人，这里的“东方人”暗喻了俄罗斯人的亚洲属性，并包含了野蛮习性、官本位、等级观念等负面因素。

因此，为俄罗斯人的历史提供神正义的起点，包含了改变自身命运的考量，是俄罗斯人对自身特殊神性品格的史学和文学的想象。《圣经》故事对非教徒而言不过是神话或假说，但对于整个基督教文明而言是不证自明的历史本身，是事实的沉淀，是“真实的故事”，所以能为文化的建构提供坚实的支撑，并深刻影响着俄罗斯人的自然观、哲学思想以及文学艺术。涅斯托尔巧妙地把俄罗斯民族的起源和大洪水之后的挪亚家族联系在一起：

大洪水之后，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划分了世界。<sup>①</sup>

其中，雅弗分得了世界的北部和西部，也就是今天的欧洲大陆。在《旧

<sup>①</sup> [俄]涅斯托尔：《古史纪年》，王松亭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页。

约·创世记》中，雅弗独享耶和華恩寵，是因為當他和閃知道父親赤身裸體時，就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進去，給他父親蓋上；而當閃和雅弗用衣服蓋住赤身裸體的挪亞之時，天空中傳來了神諭：

耶和華閃的神是應當稱頌的，願迦南作閃的奴仆。願神使雅弗擴張，使他住在閃的帳棚里，又願迦南作他的奴仆。<sup>①</sup>

緊接着，涅斯托爾開始了大膽的推理，即他發現在雅弗眾多的後代中，有一支就是俄羅斯人，“在雅弗的領地內居住着俄羅斯人、楚德人和其他各種族”<sup>②</sup>。但這已經不是《聖經》中的神諭，而是涅斯托爾為後來的“俄羅斯心靈”“莫斯科是第三羅馬”“神人類”等彌賽亞意識提供的神學上的學理依據，也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羅斯思想”的理論基石。

陀氏曾在《作家日記》中寫道：“俄羅斯思想，歸根到底只是全世界人類共同聯合的思想。”<sup>③</sup>這裡的“俄羅斯思想”沒有直接體現哲學內涵，尚不能成為唯心論中那種先於物質存在的“理式”的等價物；它是作家的主觀願望，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全人類在基督的引導下完成一個人類和平共處的終極理想。所以，陀氏的俄羅斯思想更接近俄羅斯理想（Русский идеал），它的產生作為一種時代應答，回應了《古史紀年》中俄羅斯民族意識的復蘇。

涅斯托爾的三段論是：因為耶和華眷顧雅弗，所以作為神的意志，“使雅弗擴張”具有合理性；也因為俄羅斯人是雅弗的後代，所以俄羅斯應該承襲上帝的賜福；“俄羅斯是上帝特選民族”是有神學依據的。然而，對於神學邏輯的特別關注往往忽略了歷史事實，甚至可以說是有意無視。這種對俄羅斯是上帝特選民族理念的認同，在很多思想家、文學家和哲學家的話語中都有所體現。19 世紀出生於烏克蘭、成名於俄羅斯的作家果戈理，在《死魂靈》中以抒情插筆（лирическое отступление）的方式盛贊俄羅斯民族的偉大和不同凡響。他把俄羅斯比作全速飛馳的三套馬車，所過之處，“只聽見美妙悅耳的馬車鈴聲，空氣在呼嘯，三套馬車在乘風飛去。大地上的一切都從它身旁飛過，其他國家和民族都閃到一旁，一邊用疑惑的眼光望着它，

① 《舊約·創世記》，第 9 章 25-27 節。

② [俄]涅斯托爾：《古史紀年》，第 2 頁。

③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в 30 томах, том 25. Л.: Наука, 1983. С.20.



给它让出一条路来”<sup>①</sup>。

果戈理的理想充满了大俄罗斯主义的情怀，是大国意志的文学阐释。在主人公乞乞科夫拜访了懒惰的、狡猾的、吝啬的、病态的地主们后，果戈理的确感到茫然，不知道俄罗斯这架三套马车到底要去往何处，但他知道，凡阻拦其前进者一定会被消灭。与果戈理同时代的思想家、作家阿克萨科夫（К.С. Аксаков）在《再论俄罗斯观点》一文中提出了俄罗斯人拥有全人类的依据：“俄罗斯人民作为一种人民，直接有权而无须经过和得到西欧的允许才能拥有全人类。”<sup>②</sup>20世纪初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认同感，声称“俄罗斯人很早就具有一种感觉——比意识更敏锐的感觉——这就是：俄罗斯有着特殊的使命，俄罗斯民族是特殊的民族”<sup>③</sup>。

但是，俄罗斯思想家也注意到了使俄罗斯民族具有特殊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无根基性。这种无根基性同样源自东斯拉夫民族、维京人以及日耳曼等民族之间复杂而又无法厘清的关系。如果认为维京人是东斯拉夫人的统治者，就等于承认北欧海盗优于本土的东斯拉夫人，德意志人优于俄罗斯人……于是别尔嘉耶夫写道：“留里克（Рюрик）实际是普鲁士人的后代，是以普鲁士为根基的恺撒的兄弟，作为普鲁士人后裔的伊凡（伊万）雷帝喜欢自称为德意志人，沙皇的王冠戴到了罗斯头上。”<sup>④</sup>根据《古史纪年》的叙述，东斯拉夫人受日耳曼人<sup>⑤</sup>欺辱，常常被掠为奴，于是，“他们到瓦兰人的一支——罗斯人居住的地方。这一支瓦兰人称为罗斯人，其他支派称为瑞典人、诺曼人、盎格鲁人和哥特人。楚德人等对罗斯人说：‘我们那儿地大物博，但缺少规章律条。请你们来当大公，治理我们。’”<sup>⑥</sup>

这段话透露出以下信息：第一，东斯拉夫人和楚德人等民族混杂在一起，是东斯拉夫的一支名为楚德人的部落邀请罗斯人治理他们；第二，东斯拉夫

① [俄]果戈理：《死魂灵》，郑海凌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63页。

② [俄]阿克萨科夫：“再论俄罗斯观点”，载 Вл.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陈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③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32页。

④ 同上，第9页。

⑤ 德意志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

⑥ [俄]涅斯托尔：《古史纪年》，第9-10页。

部落在政治制度构建等方面落后于瓦兰人；第三，俄罗斯国家在形成初期就有北欧海盗的基因；第四，俄语 *варяги*（瓦兰人）一词有“外援”<sup>①</sup>之意，瓦兰人受邀治理当时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东斯拉夫人的部族。这意味着，在基辅罗斯甚至后来的莫斯科公国的民族基因和政治体系中，包含了“外援”瓦兰人对东斯拉夫人精神世界的民族意识植入。人数不多、民风彪悍、身体素质优秀的民族在文明程度不高、族群关系复杂、人口众多的群体中成为领导者，这在世界文明史上并不鲜见。在瓦兰人与当地族群融合的过程中，外来的基因和生产、生活方式被保留了下来，这一过程也是人的生存生态演进的过程。<sup>②</sup>《古史纪年》记载了许多发生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的各个族群之间的血腥而残暴的战争。一方面，后期的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持否定态度，比如“纵然是现在，波洛韦茨人依然保持其祖先的风俗：随意杀人，并以此为荣；吃人，吃不洁的食物——狷鼠和黄鼠等；与母辈或晚辈乱伦等等”<sup>③</sup>。另一方面，涅斯托尔着意称赞俄罗斯民族：“我们是基督教徒，我们信仰神圣的三位一体，信仰唯一的真神上帝，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律法，因为我们为耶稣而受洗礼，并且蒙受耶稣基督的恩惠。”<sup>④</sup>强调俄罗斯民族代表神正义，具有优越性。但是在冷兵器时代，这种正义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神的意志是值得怀疑的。毋庸讳言，《古史纪年》中很多与神学的、民族思想有关的传说和传奇，随着俄罗斯民族的壮大而进入历史文本，变成弥赛亚意识的养料和文学想象的土壤，一定程度上也是思想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们在著书立说时有意夹带的能够表现俄罗斯民族神正义的“私货”。

① *Варяги* 译为瓦兰人或瓦良格人，*варяги* 一词在竞技比赛中表示“外援”的意思，指被邀请来帮助、支援的外来人士，参见 Ожегов С.И.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82. С.63.

② 俄罗斯思想中“神圣罗斯”（*Святая Русь*）理念的形成逐渐清除了瓦兰人的印记，“神圣罗斯”发展成为神赐的、被基督教光辉照耀的俄罗斯土地的隐喻，也指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文化空间；“神圣罗斯”也不再是具体地理位置的概念，不强调国家的政体性和族群性，而是以东正教为核心价值的神学概念。另外，“俄罗斯大地”还与多神教概念“大地润泽的母亲”（*Мать-Сыра-Земля*）有关，现在这一概念已经完全俄罗斯化，并有了“祖国母亲”这样的爱国情怀。

③ [俄]涅斯托尔：《古史纪年》，第 8 页。这里的波洛韦茨人即《伊戈尔远征记》中的波洛夫人。

④ 同上。

这部历史著作中能够体现俄罗斯性格的还有基辅大公奥列格。根据《古史纪年》的叙述，公元907年，当时的罗斯人和我们今天所称的东斯拉夫人尚处于民族融合阶段，涅斯托尔指出，攻打希腊人的大军中有瓦兰人、斯拉夫人、楚德人等多个种族，“罗斯人对希腊人还做了很多坏事，正如战时常见之情形”<sup>①</sup>。时间让东斯拉夫人和瓦兰人（早年的罗斯人）逐渐融合在一起，《古史纪年》的作者在满怀深情地讴歌奥列格功绩的同时，也揭示了英雄人物不可避免的宿命。而宿命论思想是俄罗斯民族与自然照面时的悲剧性的世界感受，这种感受在奥列格的死亡方式上体现得非常明显，<sup>②</sup>而且直到今天，依然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发现俄罗斯人的具有多神教因素的世界感受。

在奥列格的时代，虽然基督教的微风已经吹进基辅罗斯<sup>③</sup>，但在政坛上，巫师和术士仍然掌握话语权，就信仰的生态而言，这还是多神教的世界。奥列格之死的宗教内涵是，多神教巫师的诅咒没有因基督教信仰而失去威力，这种死亡叙事在民族早期的历史文本中往往具有明显的文学属性。<sup>④</sup>最后，涅斯托尔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认为巫师的预言虽然准确，但更像诅咒，而非预言。比如谈及阿波洛尼时，《古史纪年》对此人的预言之应验提出质疑，因为他“给人们带来损害乃至死亡。不仅在他活着时这样，就是在他死后，鬼怪仍在棺材旁以他的名字使愚夫愚妇们鬼迷心窍”；摆脱宿命的最好办法是信仰上帝，“我们崇高的信仰都能经受住考验，因为我们信仰坚定，与上帝同在，决不受人类之敌和凶神所施魔法与邪恶所诱惑”<sup>⑤</sup>。

《古史纪年》中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是奥莉加，奥莉加是奥列格大公之子伊戈尔的妻子。伊戈尔显然继承了父亲能征善战的性情，公元944年，他率领大军进攻希腊，人们惊呼，“罗斯人来犯，战船无数，不见边际”<sup>⑥</sup>，

① [俄]涅斯托尔：《古史纪年》，第15页。

② 关于奥列格之死，参见[俄]涅斯托尔：《古史纪年》，第19页。

③ 在奥列格代表的罗斯人和利奥代表的希腊人签署的长期和平条约中，双方就谈及信仰问题。

④ 这种情况在很多早期历史著作中都有反映，比如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既是历史文本，也是文学文本。

⑤ [俄]涅斯托尔：《古史纪年》，第20页。

⑥ 同上，第23页。

这样能征善战的瓦兰人依然在一次战斗中被德列夫利安人所杀，他的死亡让人们见识了他的妻子奥莉加的智谋和过人的胆识。丈夫伊戈尔死后，奥莉加和她的儿子面对强大的德列夫利安人，竟然运用计谋三次屠杀德列夫利安人，第一次是“坑杀”，第二次是“烧杀”，第三次是“砍杀”。她一次又一次违背承诺，让所谓的野蛮人吃尽苦头，甚至在接受洗礼这样神圣的事情上，她也施展诡计，使在察里格勒执政的巴格良诺罗德内伊对她的美貌和智慧垂涎三尺，但在奥莉加巧妙的设计下，也只能承认其为教女。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生态，“共性是，任何民族中的任何个体都有爱的意识、复仇的渴望……人是自然之子，也是文化的动物，更是现实的存在”<sup>①</sup>。如果把人的生存置于某种文化生态中考量，美更多地体现在人的物性一面，即人的生物属性，强调快意恩仇。将俄罗斯的文化生态纳入审美的领域，就不难看出，“美是事物的某种属性或性质之间的某种关系，从而着重在事物的感性特征和自然形式、结构、性能中去寻找美的本质和规律，把美的本质最终归结为自然事物本身的某种性能或属性”<sup>②</sup>。俄罗斯思想家则热衷于宣扬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强调“用理智无法理解俄罗斯”。难道俄罗斯真的无法理解吗？奥莉加的背信弃义、雅罗斯拉夫娜（《伊戈尔远征记》中伊戈尔大公的妻子）的善良和神性、海伦娜（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美丽的心机女）的放荡与狡诈，均是人性中某种共性元素的折射。但是索洛维约夫为什么仅仅强调俄罗斯女性身上所具有的“永恒的温柔”（вечная женственность）呢？其实，丘特切夫已经给出了答案：“俄罗斯的真正捍卫者是历史，它在 300 年间不知疲倦地帮助俄罗斯人承受神秘命运带给它的各种考验。”<sup>③</sup>但丘特切夫的逻辑存在问题，因为世界上很难找到两个历史发展脉络完全相同的民族，任何民族的文化 and 历史都应该是独特的，“这个自明性的问题在丘特切夫那里反倒成了俄罗斯民族的胎记”<sup>④</sup>。

① 程相占等：《西方生态美学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 年，第 570 页。

② 王朝闻：《美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2 页。

③ [俄]丘特切夫：“俄国与德国”，载 Вл.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73 页。

④ 郑永旺：“文化哲学的俄罗斯思想之维”，《学术交流》，2018 年第 12 期，第 32 页。

《古史纪年》中，作者涅斯托尔也意识到作为民族代表的奥莉加的行为明显有严重失德之嫌，所以对她的所作所为进行了美化，指出她在察里格勒接受洗礼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sup>①</sup>，她经常对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说：“我的孩子，我信奉上帝，感到无比快乐，如果你信奉上帝，你也会感到幸福的。”<sup>②</sup>但能否因此认为，如果在伊戈尔被杀之前她就信仰基督，那么“坑杀”“烧杀”“砍杀”就不会存在？当然不能。在俄罗斯的民族性中，教理规章是用来制约他人的工具，而俄罗斯则是神正义大旗下教理规章的书写者及解释者，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奥莉加必在行不义后才会去信仰基督，在为自己洗清罪恶的同时，又可以以此信仰约束他人。按涅斯托尔的逻辑，俄罗斯人是雅弗的子孙，而天选之子拥有正义，神永远站在俄罗斯人一边。

## 二、《伊戈尔远征记》：俄罗斯民族军人文化的发端之一

《伊戈尔远征记》（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以下简称《远征记》）是基辅罗斯时期东斯拉夫人共同的民族史诗，但从国民认同的具体情况来看，相较于乌克兰人与白俄罗斯人而言，俄罗斯民族对《远征记》的认可度更高。基辅罗斯、脱胎于金帐汗国的莫斯科公国、短暂“混乱时期”（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罗曼诺夫王朝、苏联和当代的俄罗斯联邦，构成了千年俄罗斯的发展脉络。俄罗斯的历史虽然几经周折，但大体上因循了留里克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的发展方向，政治策略和政治思维也因此保持了接续性和完整性。历代沙皇都以开疆拓土、捍卫“俄罗斯大地”（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为至高荣誉。《远征记》的发现尤其为俄罗斯人强悍坚韧的民族性格和崇军尚武精神找到了文化根源。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中的 слово 一词指的是古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一种体裁，与传说（сказание）、传奇（повесть）、寓言（поучение）有时可以相互替换。凯达（Л.Г. Кайда）认为，“слово 作为体裁和 16 世纪欧洲兴起

<sup>①</sup> 公元 955 年，奥莉加皈依了基督教，这为公元 988 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正式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奠定了基础。

<sup>②</sup> [俄]涅斯托尔：《古史纪年》，第 33 页。

的随笔 (эссе) 有关, 随笔与 ‘传说’ (слово) 外在的相似之处在于, 古代俄罗斯作家和欧洲的随笔作家均把 ‘传说’ 当做思考哲学、宗教和存在等问题的文学表达形式; 内在的相似性在于, 两者都是历史发展进程中自发形成的言语行为”<sup>①</sup>。但《远征记》的出现时间要早于欧洲的随笔, 因此, 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 即 слово 作为体裁, 而且是 “自发形成的”, 最初不具有表现哲学问题的功能, 而是作为 “传说” 或 “传奇” 来表现 “俄罗斯性” (русскость)。

史学界普遍的共识是, 该史诗成书于 1185–1187 年间, 作者不详, 1795 年被穆欣-普希金<sup>②</sup>在雅罗斯拉夫尔发现。苏联历史学家季明 (А. Зимин) 认为, “《远征记》写于 18 世纪, 作者伪称自己是 12 世纪的人, 因此, 作品变成民族史诗可能是偶然的事件”<sup>③</sup>。这个观点比较有代表性。

《远征记》对俄罗斯人, 乃至对整个东斯拉夫人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民族记忆, 而且这种记忆携带了 “传说” (слово) 的内容, 其重要性在于, 任何民族都试图借助不同的文本来呈现该民族在人类或某一地区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不同的民族之魂、文化之根, 有的民族通过创世神话 (如犹太人), 有的民族假托传说 (如中国盘古开天地说), 来说明本民族的起源。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不可思议的, 民族历史的记录形式可以是文学文本, 也可以是历史文本, 还有可能是神话文本。文明的早期, 人们对历史的记录往往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 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之间往往没有明显的界线。《尼伯龙根之歌》和《贝奥武甫》虽然神话色彩浓厚, 却都是德意志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自己生命轨迹和文化成因有效的解读方式之一。《远征记》为俄罗斯民族解决了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的问题, 并为 “我到哪里去” 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远征记》之所以能回答这个问题, 在洛谢夫看来, 是因为该作品中有俄罗斯民族之所以存续至今并成为一庞大帝国的答案, 即这部作品是俄罗

① Кайда Л.Г. Эссе.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М.: Наука, ООО Флинта, 2008. С.68.

② 穆欣-普希金 (А.И. Мусин-Пушкин, 1744–1817), 俄罗斯著名考古学家、俄罗斯古代历史文献收藏家、科学院院士。

③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Википедия. [https://ru.wikipedia.org/wiki/Слово\\_о\\_полку\\_Игореве](https://ru.wikipedia.org/wiki/Слово_о_полку_Игореве)

斯民族的“象征符号”（символика）。“象征符号”是区分不同民族特征的重要标记，具体来说，“我们都清楚，任何神话都是象征符号，但并不是所有的象征符号都是神话”<sup>①</sup>，洛谢夫进一步指出，崇军尚武的文化之所以顽固地栖息在俄罗斯民族的意识里，是因为“成为象征符号的神话是实体性的、具体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其中事件之发生是不可以更改的，更不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随意物化。通常来说，在一个人身上，成为象征符号的神话表现出整个民族对某些事物高度的认同感”<sup>②</sup>。这就意味着，那些看似玄妙的、不可思议的超验之物，在已经成为象征符号的神话当中，人们是不能也不会质疑的。《远征记》之所以能够解释俄罗斯民族心智（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менталитет）的成因，是因为该民族史诗凸显了俄罗斯民族的审美取向和集体无意识。《远征记》间接描绘了俄罗斯民族经历的苦难岁月，为俄罗斯民族是诗意的、有悲剧色彩的崇高的存在提供了证据。按照利哈乔夫的观点，文学艺术“产生于对混乱、丑陋的克服，因为，丑陋恐吓世人并且使他们恼怒。艺术是与混乱的斗争，是将某种秩序引入混乱的尝试”<sup>③</sup>。利哈乔夫的观点能够说明，文学对于某种秩序的追求可以治疗一个民族的创伤，因为文学更重要的作用是使民族历史得以保存，固化由历史事件生成的记忆、精神和意志，凭借这种认同去证明历史存在的真实性或者相对真实性，而这些民族的特定因子也会在特定时刻被激活，比如战斗精神。利哈乔夫认为，《远征记》的重要文学价值之一，是其中存在一个“轻灵的世界”。首先，“《远征记》是时间完整压缩的众多的范本”<sup>④</sup>；其次，这部作品保存了民族之殇，正如利哈乔夫在论述“轻灵的世界”时所指出的，“大公们感受更多的是肉体的撕裂，而不是精神的痛苦”<sup>⑤</sup>。所以，“《远征记》就是成为象征符号的具有实体性结构的神话”<sup>⑥</sup>。

① Лосев А.Ф. Проблема символа и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95. С.145.

② Там же.

③ [俄]德·谢·利哈乔夫著：《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3页。

④ 同上，第167页。

⑤ Лихачев Д.С. Человек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М.: Азбука, 2015. С.51.

⑥ Лосев А.Ф. Проблема символа и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 С.145.

对于《远征记》的作者而言，日食的发生和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是真实的（实体性的），“他对别人痛苦和欢乐的理解如此敏感，以至于他感觉，连周围的事物也分享了这些情感。动物、树木、芳草、鲜花、所有大自然甚至连城市的稚墙都慷慨地分担了人的情感……”<sup>①</sup>这种实体性意味着，自然界不再是冰冷的物件，而是蕴含生命的存在者，自然等同于世界，与俄罗斯人的世界感受实实在在地联系在一起。而世界（мир）和俄罗斯人早期的米尔制（мир，氏族公社）的生活方式渐渐重合，所谓的世界在俄罗斯人的意识里就是人类日常生活所有形式的总括，和日常世俗生活相对应的是教会的、僧侣的和宗教的生活，也就是说，“俄语中的 мир 更强调这个空间中的任何人的生活”<sup>②</sup>。《远征记》中的风雨雷电都是传达雅罗斯拉夫娜帮助被困丈夫突围的有生命质感的可思之物，它们在索洛维约夫的哲学里被视为“世界心灵”（мировая душа）<sup>③</sup>的代表，自然现象和代表自然之物的树木森林、河流大地只有和人共心共情时才能证明“世界心灵”的在场。雅罗斯拉夫娜在普季夫尔城墙上的哭诉，以超自然的方式唤醒了上帝对伊戈尔的爱，于是，“上帝给伊戈尔公指示/从波洛夫土地/归罗斯故土/到父亲黄金宝座的道路”<sup>④</sup>。《远征记》中尽管伊戈尔贸然军事行动没有得到大公的赞许，尽管胜利还要归功于上帝，但这种对战争过程的叙述显然已经在彰显伊戈尔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对罗斯大地的爱。

《远征记》中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情怀在俄罗斯思想史上刻下的印记就是崇尚战斗的军人文化（вои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俄罗斯对武力崇拜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是欧洲诸国的噩梦。俄罗斯人的尚武精神来源是多方面的，包括维京海盗的抢掠习性，蒙古人统治时期带给俄罗斯的杀戮回忆，以及对扩张领土的执念。土著的东斯拉夫人与维京人的融合，金帐汗国对俄罗斯的统治过程，

① [俄]德·谢·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第 171 页。

② 郑永旺：“从‘美拯救世界’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美学”，《哲学动态》，2013 年第 9 期，第 81 页。

③ 在索洛维约夫的哲学中，世界心灵是指大自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可以视其为拥有诉求的、表象的和情感的生命体。参见 Соловьев В.С. Мировая душа. Статья из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http://www.odinblago.ru/soloviev\\_10/4\\_11](http://www.odinblago.ru/soloviev_10/4_11)

④ 《伊戈尔远征记》，魏荒弩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5 页。



通过战争攫取利益最大化的成功案例，就是加固这种文化记忆的过程。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建功的渴望和对战斗的痴迷，他特别喜欢“勇敢的”一词，利哈乔夫指出，“‘勇敢的’在他的作品里不只是姆斯基斯拉夫、伊戈尔、鲍里斯·维亚切斯拉夫，不只是军队、奥列格儿子们，才被称为‘勇敢者’，而是所有俄罗斯的儿子们——‘罗斯人’——甚至罗曼·姆斯基斯拉夫的思想本身也是‘勇敢的’”<sup>①</sup>。这种对军人荣誉的渴望一直持续到今天，动力之一就是通过对战功实现阶级跃升，成为家族的骄傲。12-14世纪，“在俄罗斯的贵族中还有一类被称为军功贵族的人……他们都是王公、领主的亲兵和侍卫，属于自由差役，受王公、领主庇护却无人身附属关系”<sup>②</sup>。战争需要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持，对军人荣誉的追逐被《远征记》的作者表现为暴力审美的艺术。“罗斯人，我希望同你们一道，或者抛下自己的头颅，或者就用头盔掬饮顿河的水”<sup>③</sup>。冷兵器时代，被称为蛮族的东斯拉夫人和后来的罗斯人一直以武力来确定个体在族群中的地位，勇气和获得荣誉的能力被罗斯人伊戈尔和他的弟弟以更为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sup>④</sup>，那就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快意恩仇。当下，虽然俄罗斯人未必都喜欢“战斗的民族”的称谓，但至少反映了如下事实：俄罗斯人敢于“亮剑”，多次在战争中击败了外敌入侵，或开拓了疆土。勇气是成为英雄的先决条件，也是对脚下这片土地热爱的表现形式，敢于面对死神是伊戈尔备受称颂的原因，为荣誉而战一向是俄罗斯历史悠久的战争文学热衷表现的主题。与虽然失败却能得到无上荣誉的伊戈尔相比，莱蒙托夫《波罗金诺》中的老兵并没有得到如伊戈尔一样的荣光，但作为士兵的他把“在地下长眠不醒”当成对自己军人职业最大的尊重。于是才有了指挥官下面的一段话：

他（团长）目光炯炯地说：“兄弟们，  
莫斯科不就在我们后边？”

① [俄]德·谢·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3页。

② 张政文：“普京时期俄罗斯文化政策的历史视角”，《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1期，第41页。

③ 《伊戈尔远征记》，第3页。

④ 这段时间，罗斯人（维京海盗）和东斯拉夫人逐渐融合。

要死在莫斯科城下，  
要像我们兄弟死去一般！”  
我们都许下决死的宏愿，  
我们在波罗金诺战役中  
谨守这忠诚的誓言。<sup>①</sup>

历史有惊人的巧合之处。与“莫斯科不就在我们后边”类似的话，1941 年卫国战争时期的政治指导员瓦西里·克洛奇科夫也曾在杜博谢科沃之战中说过：“伟大的俄罗斯，我们无法再退了，因为后面就是莫斯科。”<sup>②</sup>死亡、无尽的忧伤是战争带来的必然后果，但在《远征记》中，这些苦难也变得崇高起来，而这种崇高首先是通过万物有灵的自然观表现出来的，尽管在故事中作者暗示东正教已经成为当时的国教。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格奥尔吉耶娃认为，“作者广泛运用了表现大自然的主题形式，使大自然充满了灵性，再现了各种古老的神灵”<sup>③</sup>，其目的在于表现“古斯拉夫人与哥特人作斗争的叙事主题”<sup>④</sup>。从天象的修饰语和在文本中的作用来分析，作者在很多情况下体现的是崇高，而不是美。

美和崇高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两者进行了细化：

自然界的美是建立于对象的形式，而这形式是成立于限制中，与此相反，崇高缺失也能在对象的无形式中发现，当它身上无限或由于它（无形式的对象）的机缘无限被表象出来，而同时却又设想它是一个完整体；因此美好好像被认定是一个不正确的物性概念的，崇高却是一个理性概念的表现。于是，在前者愉快是和质结合着，在后者却是和量结合着。<sup>⑤</sup>

① [俄]莱蒙托夫：《波罗金诺》，载《莱蒙托夫文集》，余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年，第 121 页。

② Душенко К. История знаменитых цитат. [www.livelib.ru/book/212987/readpart-istoriya-znamenitih-tsitat-konstantin-dushenko/~29](http://www.livelib.ru/book/212987/readpart-istoriya-znamenitih-tsitat-konstantin-dushenko/~29)

③ [俄]T.C. 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焦东建、董茉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49 页。

④ 同上。

⑤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83-84 页。

朗加纳斯在《论崇高》中并未给予这些概念具体的界定，他只是赋予崇高混合性的内涵，认为崇高是一种伟大、雄浑、宏丽、惊世骇俗的壮美，崇高的事物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正因为崇高能作用于人的心灵，所以很多人把崇高理解成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康德指出美和崇高有相同和不同之处，而不同才是两者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和更加强烈的喷射，是一种基于个人感官的“力学的崇高”和“数学的崇高”。《远征记》的作者深知如何将思想、辞藻、情感捆绑在一起，通过朗加纳斯所说的“堂皇的结构”，实现作用于人心灵的效果。史诗中，杀戮、死亡、恐惧等要素以极其专横的方式展现出来，构成了“力学的崇高”。《远征记》不乏“庄严伟大的思想”，伊戈尔和符塞伏洛德征战波洛夫人既是“为自己寻求美名，为王公寻求荣光”<sup>①</sup>，更主要的，是因为“罗斯的国土！你已落在岗丘的后面！”<sup>②</sup>。而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的“金言”升华了简单以追求荣誉为目的的思想，号召罗斯人要像“野牛那样咆哮”，去“为了今天的耻辱，为了罗斯的国土，为了伊戈尔的、那勇猛的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的创伤”<sup>③</sup>而战。强烈的情感和藻饰的技巧也表现在对自然现象和自然景观这些意象夸张的描写上，比如“他们（罗斯士兵）像利箭似地散布在原野上”，“血的朝霞宣告了黎明/黑色的乌云从海上升起/想要遮住四个太阳/”<sup>④</sup>等。依据柏克的观点，“美是指物体中能够引起爱或类似的感情的一种或几种品质，而崇高则是指物体中能够引起恐惧或类似的感情的一种或几种品质”<sup>⑤</sup>。《远征记》中很多场景不是表现“爱或类似的情感的一种或几种品质”，当“乌鸦一面分啄着尸体，一面呱呱地叫个不停”<sup>⑥</sup>象征死亡时，作者表现的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暴力，以至于在出现日食<sup>⑦</sup>的情况下，他依然决定投入战斗。这种

① 《伊戈尔远征记》，第5页。

② 同上，第6页。

③ 同上，第17页。

④ 同上，第5、7页。另参见该译本第34页注释：古代罗斯王公赞歌常把王公比作太阳。

⑤ 转引自叶毓：“‘无形式’：康德对柏克崇高论的发展”，《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65页。

⑥ 《伊戈尔远征记》，第3页。

⑦ 日食在俄罗斯人看来是一种凶兆，“尝一尝大顿河的水——这渴望/蒙蔽了为他发出的预兆”。参见《伊戈尔远征记》魏荒弩译本第3页。

暴力美学在冷兵器时代是备受推崇的。《古史纪年》和后来的《伊万雷帝与库尔布斯基通信集》将这种暴力美学融入俄罗斯民族的帝国想象中，强调神正义之下的暴力具有合法性，是俄罗斯人政治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朗加纳斯看来，这种崇高是思想的包装形式，“如果在恰到好处的场合提出，就会以闪电般的光彩照彻整个问题”<sup>①</sup>。无边的沙漠、一望无际的天空等共同的外部形式特点是体积巨大，巨响、突然的寂静、模糊、晦暗、不和谐、不明朗的艺术形象也能产生崇高感。<sup>②</sup>这些元素恰恰是《远征记》作者所青睐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远征记》通过“能够引起恐惧或类似的感情的一种或几种品质”来表现伊戈尔、符塞伏洛德等人的战斗豪情，按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的那样，“我把现象中与感觉相应的东西称为现象的质料，而把能够使现象的杂多在某些关系中得到整理的东西称为现象的形式”<sup>③</sup>，换言之，是一种“无形式的形式”。对于早期具有游吟性质的文学文本而言，“鲍扬式”的创作范式决定了“他的方法的宽广、气势和迅捷，他以这种方式概括了世界”<sup>④</sup>。“崇高”在《伊戈尔远征记》中就是指俄罗斯人对武力的崇尚和在面对敌人时坚信的“两强相遇勇者胜”的理念。而且，经过时间的冲刷，“崇高”逐渐进入俄罗斯人的审美视域，用康德的话来表述就是，“而崇高感觉评判对象时却在它自身结合着心意的运动，而这种运动应判定作为主观合目的性的（因崇高使人愉悦）；这运动将经由想象力或是连系于认知能力，或是连系于意欲能力”<sup>⑤</sup>。这种对“崇高”的迷恋是《远征记》的基调，也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俄罗斯人坚信，只有强大的军队可以拯救俄罗斯，如亚历山大三世所言，“俄罗斯只有两个盟友：她的陆军和海军”<sup>⑥</sup>。

① 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15页。

② 参见叶毓：“‘无形式’：康德对柏克崇高论的发展”，第65-66页。

③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26页。

④ [俄]德·谢·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第168页。

⑤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第86页。

⑥ У России есть только два союзника: ее армия и флот. [https://dic.academic.ru/dic.nsf/dic\\_wingwords/2782/У](https://dic.academic.ru/dic.nsf/dic_wingwords/2782/У)

《远征记》是较早记录俄罗斯人多神教和基督教宗教体验的文本之一，其突出特征是在多神教和基督教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人在多神教的神祇和基督教三位一体上帝面前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多神教的众神频频出现在作者的叙事中，另一方面作者也清楚，在伊戈尔所处的时代众神渐行渐远：

度过了特罗扬的世纪，  
又度过了雅罗斯拉夫的时期，  
奥列格——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夫的  
那些远征也都成为了过去。<sup>①</sup>

此时的基辅罗斯是一神教和多神教相互交织并相互博弈的特殊时期，这一点在特罗扬（俄语中有 Троян、Троя и Троянь 三种写法）一词中得到反映。特罗扬在《远征记》中出现了四次，分别是“特罗扬的世纪”“特罗扬的第七世纪”“特罗扬的土地”和“特罗扬的道路”。俄罗斯学者对该词意义的理解一直争议不断，并持续到今天。索科洛娃（Л.В. Соколова）认为，对该词可能有五种释义：

第一，特罗扬是一个历史词汇，是指 1-2 世纪的罗马皇帝 Траян, Троян 不过是转写过程中的笔误。俄罗斯 19 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卡拉姆辛就提出过类似的看法。第二，特罗扬与神话有关，是希腊神话中的三头怪格利昂（Герион）的变体，持类似观点的有巴乔夫斯基（М. Бачовский）等。第三，是万物有灵论思想的概括性表达，持这种观点者以历史学家达尼列夫斯基为代表，他认为，Троян 是 три（三）的古斯拉夫语，代表智慧、情感和想象力。第四，后人在编撰《远征记》过程中向该词注入了自己的理解，所以造成了今天以讹传讹的后果。第五，是与鲍扬对立的反面人物。<sup>②</sup>因为年代久远、文字难以辨析等原因，使得解释特罗扬一词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索科洛娃的学术史梳理，虽然不能给该词提供一个相对确定的答案，但可以根据其所处的时代语境，对特罗扬这一俄罗斯文化密码背后的秘密进行符合逻辑的推断。

<sup>①</sup> 《伊戈尔远征记》，第 9 页。

<sup>②</sup> Соколова Л.В. Троян в Слове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Труды Отдела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д ред. Буламина и других. Л.: Наука, 1990. С.325.

在基督教尚未进入基辅罗斯、万物有灵论依然占据精神高地的时代，特罗扬有很大的概率是多神教的神祇之一。该词首次（根据现有文献）出现在 12 世纪的宗教文献《圣母苦行记》（*Хождение Богородицы*）中。作为神祇，特罗扬的威力逊于莫科什、罗德、庇龙等，但执掌之事则多于上述几位神祇。根据“屈辱在达日吉博格子孙的军队中站起，像一位少女，她踏上了特罗扬的土地”<sup>①</sup>。联系前文的“而自己/却为罗斯国土而牺牲”<sup>②</sup>，不难发现，“特罗扬的土地”指的就是“罗斯国土”。屈辱少女（*Дева-обида*）与多神教中的特罗扬联系起来，使得特罗扬获得三位一体性（智慧、情感和想象力）的象征意义成为可能。特罗扬不是威力最强大的神，他的价值不在于武力，而在于精神力量，他的出现使得基辅大公最终“用自己的雄狮/和钢剑把波洛夫人击溃”<sup>③</sup>。这也间接地证明了被神话化的精神力量在物质世界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如梅茹耶夫所言，“整个物质性的现实对我们来说存在于神话形式、艺术和科学之中，但这个现实实际上是被我们通过象征手段组织起来的现实，虽说这个组织过程是在特别的形式中完成的”<sup>④</sup>，洛谢夫的神话象征符号的功能就包括特罗扬所发挥的作用。同时，特罗扬也象征着多神教的时代即将过去，基督教的时代就要到来。作者用“就从这卡雅河上，斯维雅托鲍尔克命令把自己的父亲/用匈牙利的溜蹄马/运回基辅的圣·索菲亚教堂”<sup>⑤</sup>这样的诗行暗示，罗斯进入了基督教时期，即将在“组织起来的现实”中迎接多神教的最后时期。但实际上，多神教的诸神没有真正消失，只是以其他形式表现在《远征记》“轻灵的世界”里。

史诗完成于 12 世纪末，在信仰方面，正是基辅罗斯从多神教走向一神教时期。在政治上，基辅罗斯大公借助信仰的力量把诸公国统一起来，让信仰服务于国家政治和商业。《远征记》中的塞维尔斯基大公伊戈尔正是为了争夺黄金水道，与兄弟符塞伏洛德一道进攻突厥人的一支波洛夫人。值得关

① 《伊戈尔远征记》，第 11 页。

② 同上，第 10-11 页。

③ 同上，第 12 页。

④ [俄]瓦季姆·梅茹耶夫：《文化之思：文化哲学概观》，郑永旺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226 页。

⑤ 《伊戈尔远征记》，第 9 页。

注的是，在“度过了特罗扬的世纪”后，作品中的一些人物依然将多神教的诸神视为自己的保护神，故事结尾处的比罗戈谢伊圣母院被作者一笔带过，更像是关于信仰问题颇具深意的留白，目的是告诉后来人，是伊戈尔在耶稣基督的庇护下战胜了异教徒波洛夫人。“那卫护基督教徒、反对邪恶的军队的/王公们和武士们万岁”<sup>①</sup>的诗句，反映的不是将士们信仰的深度，而是一种被神祝福的正义。根据12世纪古罗斯历史文献《偶像论》，《远征记》中的故事发生在多神教和基督教并存、但基督教开始逐渐占据信仰主流的第四个阶段，即融合期。<sup>②</sup>

### 三、《伊万雷帝与库尔布斯基通信集》：领袖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虽然伊万三世迎娶拜占庭公主索菲亚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思想的确立提供了法理依据，但真正使莫斯科公国开始拥有与欧洲各国平起平坐资格的人是俄罗斯第一任沙皇伊万四世。历史学家往往关注他在宫廷斗争中超乎寻常的政治手腕，而忽略了《伊万雷帝与库尔布斯基通信集》（Переписка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 с Андреем Курбским）<sup>③</sup>（以下简称《通信集》）中伊万四世的艺术思维、残酷背后隐藏的温情以及该《通信集》中的政治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历史学家斯科雷尼科夫认为，伊万四世与其他沙皇相比，文化素养很高，“伊万四世自己撰写的许多政论文章足以证明，他在文学方面天赋异禀，在政治上有敏锐的嗅觉，是论辩的天才，受过完美的教育，在处于君主地位的人中，他绝对是凤毛麟角”<sup>④</sup>。克柳切夫斯基（В.О. Ключевский）直接把伊万四世称为“16世纪莫斯科饱读诗书的人”<sup>⑤</sup>。《通信集》可以看作是书信体文学

① 《伊戈尔远征记》，第29页。

② 乐峰主编：《俄国宗教史》（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③ 库尔布斯基作为伊万雷帝在位初期的一位亲信，原是沙皇麾下很有军事才能的统帅。在对利沃尼亚的战争中，库尔布斯基战败，逃往立陶宛（利沃尼亚），并被任命为立陶宛的军事统帅。为了给自己的背叛行为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从1564年起，库尔布斯基和伊万雷帝开始了长达16年的通信。

④ Скрынников Р.Г.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церковь на Руси 14-16 веко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91. С.177.

⑤ Ключевский В.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ортреты. М.: Правда, 1990. С.101.

作品（*послание*），这一点得到了利哈乔夫的肯定，“我们只要关注如下事实，就可以断定这些书信所传达的社会实践意义对文学产生了影响”<sup>①</sup>，而且这种影响附带了强烈的莫斯科公国的专制属性。“雷帝给库尔布斯基的这两封信否定了以库尔布斯基为代表的阶层对君主审判的可能性”<sup>②</sup>，就是说，这些书信体作品恰好证明了“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也证明了“神圣罗斯”“莫斯科第三罗马”存在的事实和被合法化的过程。两人的信件既可以看作私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也是两种观点的交锋，其中伊万四世的治国思想对罗曼诺夫王朝乃至今日的俄罗斯，都是政治遗产，具体来说，对外敌的容忍就是对自己的戕害，俄罗斯大地的完整需要通过强有力的专制制度进行维护与巩固。强人政治是俄罗斯治国策略的体现，这一特征至今依然可以在俄罗斯领导人身上得到验证。

《通信集》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追求庄严感，修辞手段夸张，库尔布斯基虽然用词谦卑，但试图以强有力的逻辑论证对自己的背叛行为进行辩解；伊万四世的两封回信除了强烈的谴责外，也有对自己和库尔布斯基之间的友谊和公爵当年所建立功勋的温馨回忆。两人之所以无法在意识形态、东正教的末日审判等方面达成共识，除了因为库尔布斯基撕不下的叛徒标签外，还源于两个人分别代表了俄罗斯思想中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

库尔布斯基是早期西欧派（拜占庭的人道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他在给伊万四世的第一封信里，开宗明义地表明写信的初衷，是想得到公正的审判：“因遭受你的政权的惨无人道的迫害和内心巨大的悲痛，我又不得不大胆说与你听，哪怕是只言片语。”<sup>③</sup>接下来他谴责了伊万四世的残酷：“为什么你要消灭以色列的强者？为什么要把上帝赐给你的军事统帅一个一个地处死？你首先背叛了无数个为你卖命的王公大臣，是你让他们的血在神的教堂里慢慢流干，是你让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教堂的门槛，他们把自己的灵魂交付于你。你为什么杜撰出创世之初就没有的苦难？为什么要捏造各种罪名致他

① Лихачев Д.С. Человек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М.: Азбука, 2015. С.37.

② Там же.

③ Первое послание Курбского. Переписка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 с Андреем Курбским.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79. С.8.



们于死地？”<sup>①</sup>

“以色列的强者”是指俄罗斯人和以色列人一样都是上帝拣选的民族，这与涅斯托尔在《古史纪年》里把俄罗斯人说成是雅弗的后代的政治策略有相似之处。正因为有这些强者，沙皇才能在神正义的旗帜下去讨伐所谓的异教徒，令库尔布斯基不解的是，为什么沙皇要以各种理由将为其立下汗马功劳的军事统帅一一除之而后快？库尔布斯基连续用 *истребить*、*предать*、*обагрить*、*измыслить* 四个动词来控诉雷帝的“罪行”，立于“正义”高地，疾言利语，层层递进，诘问沙皇的“非正义之举”。库氏逻辑清晰，表达准确，在稍后的大段叙述里，他故意不谈这种强权政治是否存在，而是直接质问沙皇为何对立下汗马功劳的王公大臣们如此不公。在这种逻辑框架之下，库尔布斯基预设了沙皇之所作所为“有失公义”，进而追问原因，完全忽略了沙皇是否已行不义，以己之心揣度沙皇之所为，并对这些臆想中的“不义之举”进行声讨。

沙皇陛下，你以为自己可以永生，你完全陷入异端邪说之中，因此你看不见耶稣的基督教之希望，看不见你面前还有金钱无法收买的法官。我要告诉你，耶稣必将显圣人间，来建立能够审判宇宙的正义法庭，他不会放过那些高傲的捏造谰言的人，必将对他们犯下的哪怕最微小的罪孽进行公开审判。这难道不是圣人的预言吗？……耶稣才是你我之间的审判官。<sup>②</sup>

库尔布斯基的第一封信传达的诉求有三点：第一，俄罗斯沙皇在国内对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实行杀戮政策使国家面临巨大危机，也让沙皇本人深陷不仁不义的境地；与其对叛徒库尔布斯基和他的同伙实施讨伐，不如反省自己的所为。第二，沙皇已经陷入异端邪说之中，以为自己代表了神的意志，而实际上耶稣必将审判那些哪怕犯下微小罪孽的人，更何况沙皇犯下了如此恐怖的罪行。第三，库尔布斯基明确告诉伊万雷帝，沙皇没有权力审判他的叛国行为，只有了解真相的基督才能审判他。

<sup>①</sup> Первое послание Курбского. Переписка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 с Андреем Курбским.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79. С.9.

<sup>②</sup> Там же.

按伊万四世研究专家斯科雷尼科夫的观点, 库尔布斯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正教徒, 而是拜占庭的人道主义者, 而“拜占庭人道主义是东罗马帝国存续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思想家们的精神遗产, 这些东罗马人追求的是纯理性主义哲学, 力图把唯理论和不可知论这两种大相径庭的思想结合起来”<sup>①</sup>。伊万四世是拜占庭主义的拥护者, 主张君权神授, 但人道主义不是拜占庭主义的核心要素, 他所拥护的是拜占庭主义的内核——不可知论和专制主义; “库尔布斯基则从东罗马帝国汲取了拜占庭主义的‘非拜占庭性’”<sup>②</sup>, 即人道主义精神。所以库尔布斯基在写给伊万四世的第二封信里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因为沙皇“对同宗同族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后代, 以各种理由实行镇压, 掠夺他们的动产和不动产, 这样的事情你的爷爷和父亲都没有做过, 他们的最后一件衬衣你都不放过……”<sup>③</sup>

站在库尔布斯基这样的人道主义者的角度来看, 沙皇的确是“上帝派来惩罚我们罪恶的人”<sup>④</sup>, 信件中这句话和他之前的话自相矛盾, 如果沙皇是受神的旨意惩罚罪恶 (грехи), 而施罪恶者不仅是人民, 也包括沙皇自己, 且沙皇之罪恶尤甚, 那么他要做的, 首先应该是放弃波兰, 以率先得到上帝的宽恕。事实上, 伊万四世不可能放弃波兰和自己的政治主张。此外, 库尔布斯基坚持认为, 如果惩罚是来自神的授意, 人就无法逃脱, 而且逃脱本身就是罪恶, 所以, 他并没有逃跑, 依然在著书立说, 宣扬自己的“拜占庭人道主义思想”。此处可以窥见库尔布斯基的矛盾而复杂的心理活动, 他把“伊万四世分成两个人, 一个是好伊万, 他攻下了喀山汗国, 能够听取拉达的意见; 一个是糟糕的伊万, 撕毁拉达的决议, 妄图以叛国罪镇压我 (库尔布斯基)”<sup>⑤</sup>。库尔布斯基的信表露了他崇尚已接受启蒙思想洗礼的西欧派价值观, 欣赏那个能够听取拉达意见的伊万四世, 因为那是尊重人的自然权利

① Экономцев И.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изантия. Россия.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2. С.174.

② Там же.

③ Второе послание Курбского Ивану Грозному. Переписка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 с Андреем Курбским.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79. С.163-164.

④ Там же. С.119.

⑤ Второе послание Курбского Ивану Грозному. Переписка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 с Андреем Курбским. С.171. 这里的拉达 (Рада) 是伊万四世时期国务会议的称谓。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права)的好沙皇；这也反过来证明，没收贵族财产是对神授权力的滥用。库尔布斯基捍卫人的自然权利，因为“不被控制的专制与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是相悖的……古代的专制者就是信仰撒旦的人”<sup>①</sup>。换言之，库尔布斯基捍卫的是人类的普遍价值观，而伊万四世完全无视民众疾苦，有悖于现代文明，对战功卓越的库尔布斯基更是有失公允。

沙皇当然不会同意库尔布斯基的观点，在第一封回信的开头就怒斥库尔布斯基，将其定性为俄罗斯叛徒，没有资格对沙皇妄加评议：

上帝虔诚的信徒，伟大的沙皇，伟大的俄罗斯暨罗斯大公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给背叛基督者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库尔布斯基公爵和他一样背叛基督的同伙的一封信。<sup>②</sup>

伊万四世回顾了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历史，追忆了弗拉基米尔大公的伟大功绩，指出一切都源自神的庇护，“我们赞美上帝，是因为他赐予我们无限的仁慈”，但这封回信的重点是回答库尔布斯基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耶稣是否会成为裁决两人是非功过的法官。伊万的回答是否定的：

公爵大人，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仁慈的，那为什么要排斥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在最终审判到来之时你用什么来赎回你的灵魂？就算你赢得全世界，死亡依然会将你吞噬。何必为了肉体而牺牲高贵的灵魂？难道你就是因为恐惧死亡而宁愿相信你那些所谓饱学之士和亲信吗？他们都是魔鬼。<sup>③</sup>

如果说涅斯托尔在《古史纪年》中站在历史的角度来阐释神正义的话，那么伊万四世则立足于统治者的角度强调基督教对国家政治的现实价值。伊万四世不认为耶稣可以成为审判他们的法官，原因是，库尔布斯基之所以叛逃，是因为他恐惧死亡，伊万四世认为，高贵的灵魂要比苟活的肉体更重要。但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无须浴血亲征的沙皇当然可以这样说，但如果肉体不在，灵魂也将无所依存，从这个角度上看，库尔布斯基公爵更像是脚踏潮

① Замалеев А.Ф., Овчинникова Е.А. Еретики и ортодоксы. Л.: Лениздат, 1991. С.203.

② Первое послание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 Переписка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 с Андреем Курбским.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79. С.53.

③ Там же.

湿土地食人间烟火的人，而沙皇从国家利益和宗教高度出发，斥责库尔布斯基的背叛，但他忘记了，“就算你赢得全世界，死亡依然会将你吞噬”同样适用于沙皇自己。

《伊万雷帝与库尔布斯基通信集》虽是私人通信，却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第一种价值体系：库尔布斯基代表立场保守的大贵族们的利益。沙皇强调君权神授，即俄罗斯人的弥赛亚意识，沙皇秉承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的意志，所以他永远战无不胜，是斯拉夫人利益忠实的保卫者。第二种价值体系：尽管库尔布斯基声称自己是坚定的基督信徒，但他更注重现实生活的重要性，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认同人类共同的价值，比如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对人类应心存大爱等，与当时西欧思想家们鼓吹的价值观接近或相同。伊万四世深信基督教，深信俄罗斯人永远站在神正义的一方，俄罗斯是“以色列的强者”，对敌人的讨伐（比如攻打利沃尼亚），是因为耶稣基督以神的名义赐予俄罗斯人能够战胜一切并世代拥有的神幡——十字架。

虽然《通信集》对菲洛费伊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的阐释略显简单粗暴，但因为伊万四世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这使得《通信集》中的政治话语通过沙皇的外交和军事实践对俄罗斯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所谓的“神圣罗斯”（Святая Русь）、“俄罗斯理想”（Русский идеал）、“俄罗斯思想”（Русская идея）、“聚义性”（Соборность）等构成俄罗斯民族心智的底层逻辑，均可以在《通信集》中找到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通信集》是俄罗斯重要的政治和文化遗产，对俄罗斯后世君主及当今政治生活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行为是思想的外化，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种种表现在《通信集》中都不难找到依据。

#### 四、结语

俄罗斯具有文学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学不仅承担着审美的使命，同时也具有记录历史并恢复历史记忆的功能。

俄罗斯民族的政治思维建立在《古史纪年》中历史的神正义基础之上。《古史纪年》是这三个文本中最早的一个，就所涉及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而言，

具有俄罗斯思想源文本的价值。涅斯托尔通过对俄罗斯历史的书写，确定了俄罗斯民族和挪亚之子雅弗的亲缘关系，这使得“对俄罗斯只能信仰”和“俄罗斯是特选民族”成为可能。

但如果没有强大的崇尚军事文化的传统，俄罗斯就不会产生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保尔康斯基这样把为国捐躯视为至高荣誉的英雄，也不会出现现实中将拿破仑驱逐出莫斯科的库图佐夫元帅，更难以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为赢得最后胜利，牺牲了两千多万人的悲壮之举。《伊戈尔远征记》虽然是俄罗斯的一个历史片段，但为俄罗斯民族以战争手段解决争端的行为模式提供了文学阐释。

《伊万雷帝与库尔布斯基的通信集》更是以军事将领和沙皇通信的直观形式，反映了俄罗斯从建国伊始便崇尚强人政治之根源。

换言之，《古史纪年》以神为名，为俄罗斯民族在世界版图及历史中确定了自我定位；《伊戈尔远征记》假史之名，确定了崇军尚武之民族精神；在《通信集》中，伊万雷帝则从君王角度将基督教世俗化、现实化，并将“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思想贯彻到俄罗斯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看到今日的俄罗斯。

---

**【Abstract】** Literary works have their inherent political thinking. The will of nations and countries penetrates into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 with the help of previous texts. The three source texts of ancient Russian literature, namely, *the Primary Chronicle*, *Igor's Expeditions*, an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Prince A. M. Kurbsky and Tsar Ivan IV of Russia* reveal the path choice of the Russian nation and state. In *the Primary Chronicle*, the poetic description of Kiev Rus show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nd the political correctness based on theological logic. The publication of *Igor's Expeditions* in the 12<sup>th</sup> century marks the birth of the Russian national epics. *Igor's Expedition* advocates martial spirits, sings the praises of glory of warriors, and further deepens the concept of “Rus Land” in a literary way. The identity of literary texts and historical texts promotes thought to become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Russian

literature.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19<sup>th</sup> century was at the center of the ideological field. Westernizers, Slavophiles and civilian intellectuals in Russia took literature as a tool to express their concern for the country's reality and future. Litero-centrism continued to flourish. Since the 20<sup>th</sup> century, although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Russia has changed several times, yet writers st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rena. The tradition of literature as the country's cultural soft power has been fully inherited. The recording and writing of history in ancient Russian literature embodies the imitation and shaping of reality by literature,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Russian nation, national cultural form and value orientation. "Russia's special mission" and political thought happen to be clarified and judged when understanding Russian historical memory.

**【Key Words】** Russian Political Thinking, Ancient Russian Literature, Russian State Building, National Will

**【Аннотация】** Литературны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м присущ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а воля нации и страны проникает во все стороны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с помощью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их текстов литературы. Три первоисточника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и «Переписка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 с Курбским» раскрывают путь выбора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и страны. Поэ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евской Руси в «Повести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показывает тесную связь истории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политкорректность, основанную на т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логике. Выход в свет «Слова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в XII веке ознаменовал собой рожд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эпоса.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пропагандирует дух войны и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воспекает воинскую славу 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литературы ещё более углубляется понятие «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 а тожде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текстов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текстов ещё больше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превращению мысли в важный элемент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IX века находилась в центре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поля,

западники, славянофилы и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 использовали литературу как инструмент для выражения своей заботы 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и будущем страны, литературоцентризм продолжал процветать. Начиная с XX века, хотя культурный контекст России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менялся, писатели по-прежнему играли важную роль на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арене, а традиц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как культурной мягкой силы страны была полностью унаследована. Запись и написание истории в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оплощает в себ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одражание и оформлени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даёт ориентир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русской нац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культурной формы и ценностн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спецмиссия»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име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быть прояснёнными и осмысленными в процессе осмысл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усск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древне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ус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воля

---

(责任编辑 宋羽竹)

# “神话”的祛魅与重塑 ——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

刘雅悦\*\*

**【内容提要】**由于意识形态的剧变，在苏联时期备受推崇的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家与哲学家别林斯基的思想遗产，在当代俄罗斯学界的研究与认知中经历了曲折的命运。从横向的主题维度上看，当代俄罗斯学界围绕别林斯基哲学思想及其影响，在三个不同的主题上均对苏联学界的观点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反拨，并倾向于借鉴白银时代及侨民哲学家们的“宗教内在论”“人格主义”等理论来解读别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从纵向的时间维度上看，苏联解体后的三十年间，以孔达科夫、吉洪诺娃、叶尔米乔夫等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在对待别林斯基遗产的态度上，逐渐经历了从批判否定到重新正视的过程；而若将当代的别林斯基研究与历史上的别林斯基研究联动考察可以发现，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看似是苏联解体后的“另起炉灶”，实则与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整个“别林斯基神话”之塑造、祛魅与重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别林斯基神话”在当代的命运，也折射出俄罗斯学界对于俄国革命以及苏联时期文化遗产的整体态度，即从否定、拒斥到将其接纳为“俄罗斯心灵”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词】**当代俄罗斯哲学 别林斯基 革命民主主义 苏联解体

**【中图分类号】**I512.0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3-0170(31)

在以“文学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俄罗斯思想与文化领域中，19世纪的著名文学批评家维萨里昂·格里高利耶维奇·别林斯基（В.Г. Белинский，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A018）、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2021年度区域国别研究一般项目“周边国家涉疆政策动态监测及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和编辑部老师的宝贵建议！

\*\* 刘雅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讲师。



1811-1848) 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绕开的一个名字。俄罗斯文学独特而典型的特征之一在于,它向来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文学。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文学一度是俄国知识分子“唯一的讲坛”(赫尔岑语),是最后的阵地,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表达。俄罗斯文学作品与文学评论的背后,往往另有所求——或者是一种哲学观念,抑或更进一步,是一种社会理想与政治诉求。而从哲学领域来看,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之前,俄罗斯也少有西方标准意义上的“哲学”与“哲学家”。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往往兼涉文学与哲学领域。而作为俄国文学批评的奠基者、撰写过千余篇评论文章的别林斯基,自然也颇具代表性地享有思想史及哲学史中的重要位置。《俄国哲学史》的作者、20世纪侨民哲学家瓦西里·津科夫斯基坦言:“别林斯基当然不是一位在完全和准确意义上的哲学家,但把他与俄罗斯哲学截然分开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在俄罗斯哲学探索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占据独特的、并且意义非凡的地位。”<sup>①</sup>

的确,别林斯基是俄国第一批从德国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也同恰达耶夫、赫尔岑等人一道,可看作是俄国西方派重要的代表人物。在他的文字中,既能见出19世纪前半叶西欧哲学在俄国思想界的映射,也能寻得19世纪后半叶俄国社会思想独特而充满争议的发展道路的开端。总体而言,别林斯基哲学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34年至1836年。该时期的别林斯基受到席勒与谢林思想的影响,在与其共事的莫斯科大学教授纳杰日金的支持下,研习并崇尚浪漫唯心主义。1836年,巴枯宁向别林斯基引介了费希特的哲学,为接下来别林斯基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接受奠定了基础。第二个阶段是1837年至1841年。通过巴枯宁的翻译与介绍,该时期的别林斯基深入了解了黑格尔哲学,从抽象唯心主义转向哲学现实主义。他将黑格尔主义中的“存在即合理”理解为“与现实和解”<sup>②</sup>的依据,表现出政治哲学上的短暂的保守主义倾向。第三个阶段是1842年至1848年。该时期的别林斯基开始信奉和宣扬唯物主义、启蒙

<sup>①</sup>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11. С.257.

<sup>②</sup> Тихонова Е.Ю. 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 Сост. А.А. Ермичев.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 С.1030.

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即逐渐转向对黑格尔左派以及费尔巴哈等理论的关注。尤其在 1846 年主持《现代人》杂志之后，别林斯基的文章与思想逐渐成为革命民主主义的生发摇篮。

别林斯基思想发展的历程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学者们对于每个阶段的划分各有详略，比如津科夫斯基的《俄国哲学史》以及苏联学界的传统一般都将别林斯基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而当代学者吉洪诺娃将其分为四个阶段<sup>①</sup>，叶尔米乔夫则更详细地列举了五个时期<sup>②</sup>，但对于别林斯基所接受的西欧哲学的影响路径——即从席勒、谢林到费希特、黑格尔，再至费尔巴哈——都已基本上达成了共识。然而，针对在此基础上别林斯基自身思想所形成的样貌与实质，不同时期学者们的观点却无法统一，甚至大相径庭。分歧集中体现在对于别林斯基后期思想的阐释与理解上，表现出了不同时代意识形态的具体特征。譬如，19 世纪后半叶的平民知识分子对于别林斯基后期的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相当看重和推崇，白银时代的“路标派”以及 20 世纪的侨民哲学家们则用“宗教内在论”来阐明别林斯基的无神论思想所蕴含的宗教性实质，而随着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人对于别林斯基思想中“革命民主主义”要素的总结与强调，别林斯基在苏联时期被官方赋予了神话般的崇高地位。

苏联解体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剧烈变化的背景下，别林斯基的思想遗产也在当代俄罗斯学界经历了曲折的命运。如今距苏联解体已三十余年，在此时回顾当代俄罗斯学界的别林斯基研究，既可为解读别林斯基的哲学思想提供更多样的视角，也有助于探究当代思想界对于苏联时期文化遗产的整体态度趋向，更可借此窥见当代俄罗斯知识界在如下方面的面貌特征——如别林

① 详见：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мысль России XVIII-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едкол. В. В. Журавлев (отв. ред.) [и др.] М.: РОССПЭН, 2005. С.41-44. 吉洪诺娃将别林斯基的思想历程划分为“谢林时期”（1834-1835 年）、“费希特时期”（1836-1837 年）、“黑格尔时期”（1838-1840 年）、“革命性时期”（1841-1848 年）四个阶段。

② 详见：Ермичев А.А.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 Сост. А.А. Ермичев.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 С.13-14. 叶尔米乔夫将别林斯基的思想历程划分为“谢林时期”（1834-1836 年）、“短暂的费希特时期”（1836-1837 年）、“调和的黑格尔主义时期”（1837-1840 年）、“带有聚合性的社会主义时期”（1840-1846 年）、“社会-现实主义时期”（1846-1848 年）五个阶段。

斯基的思想在当代俄罗斯知识界是否仍具有生命力，是否在当代俄罗斯国家与政治理念中有所体现，又如别林斯基在当代俄罗斯的文学、政治乃至日常生活领域是否仍作为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与文本出现，等等。

## 一、当代俄罗斯学界的别林斯基研究

苏联解体后的别林斯基研究在俄罗斯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低潮，这既与众所周知的意识形态剧变有关，也与文学和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文化的喧嚣中所面临的困境息息相关。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在虚无主义思潮的裹挟下，被苏联学界推崇备至的别林斯基首当其冲成为被冷落或质疑的对象，与其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急剧减少。1995 年，俄罗斯学者伊戈尔·沃尔金慨叹道：“如今有关别林斯基的讨论是毫无前途的。文学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且与之相关的一切事物都退到了不受重视的境地。如果说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其‘经典’的类型上——已经停止了存在，那么就意味着，别林斯基也应当停止自己的存在。”<sup>①</sup>这种情况直至 2011 年别林斯基诞辰 200 周年前后才逐渐改善，虽然此时别林斯基研究的规模与苏联时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在 2011 年围绕别林斯基的一系列纪念活动的前夕，学者娜塔莉亚·索罗金娜颇有微词地指出，此次活动的规模与别林斯基在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并不相称，且这些仅有的活动，还得益于一系列学者与社会活动家在 2010 年 9 月的《文学报》上所发表的致俄罗斯总统的公开信中所发出的呼吁。<sup>②</sup>

尽管如此，在近三十年来的当代俄罗斯学界，尤其在 2011 年与 2018 年（别林斯基逝世 170 周年）前后，还是涌现出了不少涉及文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等领域的别林斯基研究的成果，累计有近十部专著和论文集、两百余篇期刊与学位论文相继问世；另外在一些有关俄罗斯哲学史、社会思想史的

① Волгин И.Л. «Учитель на все времен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1995. №.2. С.98. 转引自：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 Сост. А.А. Ермичев.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 С.997.

② 详见：Сорокина Н.В. В.Г. Белинский: специфика творческой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и критика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новейш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естник Тамб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2011. Вып.10 (102). С.206.

著作和百科全书中，与别林斯基相关的词条和文章也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主题上看，当代俄罗斯学界围绕别林斯基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 1. 回顾并分析别林斯基与同时代人哲学思想的相互影响

此类研究往往聚焦于别林斯基与同时代人思想特质中的“激进与保守”之辩。在别林斯基以其激进的、革命性的思想与同时代果戈理、卡特科夫等保守主义思想家所展开的论战中，部分学者倾向于继续确认并巩固这种二元对立的基调，而另有不少当代学者则试图挖掘对立双方思想中的共同特质。

别林斯基与 19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相互交往与影响是频繁且深入的，这不仅在别林斯基在世期间与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人的通信中能够得到直接的证明，也体现于别林斯基逝世后同时代人对他的纪念与推崇。在当代学者的视野中，由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而引发的著名的“别林斯基与果戈理之争”仍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兴趣点，不少学者均撰文回顾过这场纷争。莫娜赫娃的《别林斯基与果戈理：双面肖像的特征》（2011）<sup>①</sup>以及尼日尼科夫在《果戈理与别林斯基：刻板印象之上》（2018）<sup>②</sup>一文中的观点，代表了当代学者看待两位思想家之纷争的一种典型的态度。不同于苏联时期将二者置于“进步与保守”的对立位置的刻板印象，莫娜赫娃认为别林斯基与果戈理无论在生活历程还是创作理念上都有许多共同的特质。二者最为相似的特质在于对人文主义道路的选择与宣扬，尽管他们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完善俄国现实之路径各有侧重——果戈理主张宗教-道德层面的个人提升，而别林斯基则主张社会-政治层面的宏观改革。尼日尼科夫也认为，看似两位思想家的遗产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逻辑上的后果，但此二者最为关切的问题，皆是俄罗斯在自身通向伟大的历程中所能实现的文化-历史意义。

别林斯基与屠格涅夫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当代俄罗斯学界对此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梳理和分析，譬如库里洛夫在文章《别林斯基与屠格涅夫》中追踪了别林斯基对于屠格涅夫创作的态度，并重点剖析了别林

① Монахова И.Р. Белинский и Гоголь. Штрихи к двойному портрету// Вестник Русско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академии. 2011. Т.12. №.2. С.133-142.

② Нижников С.А. Н.В. Гоголь и В.Г. Белинский: поверх стереотипов// Электронно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ние Альманах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и Время. 2018. Т.16. №.1-2. С.10.

斯基对于屠格涅夫作品的评价从热情赞扬到冷淡克制的转变。<sup>①</sup>2018年恰逢米哈伊尔·卡特科夫诞辰200周年以及别林斯基逝世170周年，因此也出现了一些同时纪念和研究二者的文章。比如卢布科夫在文章《卡特科夫与别林斯基：命运与观点的交织》<sup>②</sup>中回顾了这两位同一时代的著名政论家、出版家和文学评论家之间的论战。作者认为，二者所分别代表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倾向，实则影响并决定了整个19世纪俄国学术与文学讨论的不同方向，引领了俄罗斯社会政治领域的两种思潮。

别林斯基的逝世在当时俄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平民知识分子当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且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余波未平。通过当代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可以了解到，1850年代的涅克拉索夫是如何通过一组著名的以别林斯基为纪念对象的悼念诗，将这位伟大批评家的形象确立为典范的<sup>③</sup>；186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又是如何进一步接受别林斯基的左翼思想，并将其更加激进化的<sup>④</sup>；以及别林斯基有关艺术应当负有社会责任的美学理论如何成了俄国经典无政府主义的起源因素之一<sup>⑤</sup>。

## 2. 介绍并挖掘白银时代哲学家对于别林斯基思想的评价

此类研究往往聚焦白银时代“新宗教意识”视角下别林斯基的“功利主义”等思想所受到的批判质疑。当代俄罗斯研究者对于白银时代思想家普遍表现出的认同态度，也与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的转向互为呼应。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是俄罗斯哲学思想空前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该时期的哲学家们在发展和构建自身的哲学理论之外，也致力于更加自觉和系统地阐释19世纪俄罗斯思想中的一些经典人物与思想，这其中便包括别林斯基。而白银时代哲学家们所做出的这些阐释与评价，如今也成了不少当代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对象。譬如卡登的《米留可夫评别林斯基伦理学

① Курилов А.С. В.Г. Белинский и И.С. Тургене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18. №.44. С.72-97.

② Лубков А.В. Катков и Белинский: пересечение судеб и взглядов// Tractus Aevorum: эволюция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х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остранств. 2018. Т.5. №.1. С.26-49.

③ Вдовин А.В. Поэтические некрологи Некрасова о Белинском 1850-х годов: традиция и контекст// Карабиха: историко-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сборник. 2020. №.11. С.6-16.

④ Зеленцова М.В. В.Г. Белинский в восприятии эпохи 1860-х годов.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Череповец, 2003.

⑤ Кислицына И.Л.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В.Г. Белинского в генезисе русского классического анархизма// Acta Eruditorum. 2018. №.26. С.122-125.

与哲学之衍变》<sup>①</sup>、叶尔米乔夫的《索洛维约夫论别林斯基》<sup>②</sup>、克雷洛夫的《别林斯基在白银时代象征主义与宗教哲学批评中的接受情况》<sup>③</sup>等文章，均属于此类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切尔卡索夫的《霍达谢维奇论别林斯基批评（随笔“罗斯托普钦娜伯爵夫人：生平及其抒情诗”）》（2019）<sup>④</sup>一文代表性地介绍了白银时代思想家们对于别林斯基思想的一种不可忽视的解读视角与态度。《罗斯托普钦娜伯爵夫人：生平及其抒情诗》是白银时代著名文学家和批评家弗拉季斯拉夫·霍达谢维奇在 1908 年所写的一篇随笔。而该随笔所聚焦的对象罗斯托普钦娜，是与别林斯基同时代的俄国著名女诗人。别林斯基在世时曾撰写过多篇文章评价她的作品，但总的来说对其作品评价不高。而与别林斯基相反，霍达谢维奇对罗斯托普钦娜极为赞赏，认为其诗作将“日常”提高到了“存在”的高度，是可以与普希金归于同列的黄金一代的俄国诗人。正因为此，霍达谢维奇在随笔中强烈抨击了别林斯基的批评理论，将其视为“功利的且不正确的”。

而当代学者切尔卡索夫通过对霍达谢维奇这篇随笔的回顾，意图指出的是别林斯基的遗产在白银时代所面临的一种新的评价尺度。这一尺度已不再是 19 世纪后半叶平民知识分子所信奉的功利主义与实证主义哲学，而是象征主义美学与“新宗教意识”浪潮下的宗教哲学。“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革命民主主义哲学与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在当代俄罗斯哲学界的接受与评价，一度呈现出十分鲜明的此消彼长的态势。切尔卡索夫在此篇文章中介绍并挖掘了此前鲜被提及的霍达谢维奇对于别林斯基的评价，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这种白银时代思想在当代的“复兴”。

---

① Каден А.Г. Эволюция этических и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взглядов В.Г. Белинского в оценке П.Н. Милюкова// Известия Волгогра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8. №.3 (27). С.112-115.

② Ермичев А.А. Вл. Соловьёв о Белинском// Соловьёв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1. №.1 (29). С.4-13.

③ Крылов В.Н. В.Г. Белинский в восприятии символистской и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ой критики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Медиаскоп. 2011. №.4. С.15.

④ Черкасов В.А. Критика Белинского в освещении Ходасевича (очерк «Графиня Е.П. Ростопчина: ее жизнь и лирика»)// Вестник Волого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9. №.4 (15). С.81-83.

### 3. 再度聚焦别林斯基的哲学遗产

如果说上述的两个主题皆是围绕与别林斯基相关的影响及评价所展开的“旁的”研究，那么在这一主题中，当代学者们则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别林斯基的思想本身进行“再研究”，主要从社会政治哲学、宗教哲学、文艺批评与美学思想三个方面进行重新探讨与阐释。

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出于对苏联时期刻板印象的反拨以及对白银时代哲学的热捧，当代俄罗斯学界在分析别林斯基的哲学思想时往往会得出与苏联学界不尽相同的结论，并更倾向于借鉴白银时代及后来的侨民哲学家所运用的“宗教内在论”及“人格主义”等解读方式。

具体而言，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当代俄罗斯哲学界倾向于淡化别林斯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中的革命激进色彩，而将别林斯基的社会主义思想解读为一种建立在人格主义之上的社会主义，乃至带有宗教性内核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此类研究有尼古拉·托金的专著《别林斯基伦理学中的人格问题》<sup>①</sup>，以及叶尔米乔夫的文章《别林斯基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吗？》<sup>②</sup>等。

在宗教哲学方面，当代俄罗斯哲学界普遍反对将别林斯基看作单纯的无神论者，而是认为别林斯基的世界观在本质上具有宗教性，其在创作中所明确表达的对宗教的不满，实则主要指向的是现实中的俄国东正教会，而非基督教本身。别林斯基的宗教哲学致力于寻找教会外的真正的基督教，具有泛神论的倾向，并最终趋近于无神论的外在形态。莫娜赫娃的《别林斯基论宗教》<sup>③</sup>、格尔拉诺夫的《别林斯基论“人类的救世主”》<sup>④</sup>等文章，皆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在文艺批评与美学思想方面，一些学者主张批判性地看待与审视别林斯

---

① Токин Н.П.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достоинство в этике В.Г. Белинского. Сарат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ратов. ун-та, 2003.

② Ермичев А.А. Был ли Белинский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м демократом и социалистом?// Вестник Русско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академии. 2011. Т.12. №.2. С.116-125.

③ Монахова И.Р. Белинский о религии//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11. №.4 (1623). С.127-132.

④ Горланов Г.Е. В.Г. Белинский об «искупителе рода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Буслаевские чтения.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VII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участием.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Л.П. Перепелкиной. 2019. С.11-18.

基文艺理论中所包含的功利主义倾向及其对后继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现实主义批评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一方面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是伊戈尔·孔达科夫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表在《文学问题》上的文章《对文学的谋杀（论俄罗斯文化中文学批评与文学的斗争）》<sup>①</sup>。事实上，孔达科夫并非专门从事别林斯基研究的学者，但作为当代俄罗斯最著名的哲学家与文化学家之一，他对于别林斯基文艺理论遗产的评价与解读无疑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乃至权威性。

而在别林斯基的当代研究者中，还有两位有必要重点提及的人物。一位是叶莲娜·吉洪诺娃(Е.Ю. Тихонова, 1953–2008)。吉洪诺娃长期致力于研究别林斯基的生平与思想，她搜集运用了许多苏联时期少见的有关别林斯基的资料，试图更加全面地还原别林斯基的社会思想、美学观点和整体世界观。其代表作有专著：《青年别林斯基的世界观》（1998）<sup>②</sup>、《别林斯基与斯拉夫派的论战》（1999）<sup>③</sup>、《不戴面具的人——别林斯基：创作的边界》（2006）<sup>④</sup>；编纂文集《俄国思想家论别林斯基（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前半叶）》（2009）<sup>⑤</sup>等。可以说，吉洪诺娃对于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的别林斯基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另一位是亚历山大·叶尔米乔夫(А.А. Ермичев, 1936–)。在俄罗斯基督教人文学院(РХГА)的大型出版项目《俄罗斯道路：赞成与反对》(Русский путь: Pro et contra)中，叶尔米乔夫承担了《别林斯基：赞成与反对——俄罗斯思想中别林斯基的个性与创作（1848–2011）》（2011）<sup>⑥</sup>这一评论文集的编纂工作，并为文集作长序。该文集的出版，对于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而言，既是集大成式的总结，又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另外，正如前文中所列举的，叶尔米乔夫还有多篇论及别林斯基哲学思想及其影响的学术文章。

① Кондаков И.В. Покушение на литературу (О борьб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с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2. №2. С.75-127.

② Тихонова Е.Ю.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молодого Белинского. М.: УРСС, 1998.

③ Тихонова Е.Ю. В.Г. Белинский в споре со славянофилами. М.: УРСС, 1999.

④ Тихонова Е.Ю. Человек без маски. В.Г. Белинский: Гран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Совпадение, 2006.

⑤ Рус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о В.Г. Белинском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X в.) Сост. Е.Ю. Тихонова. М.: Совпадение, 2009.

⑥ В.Г.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 Сост. А.А. Ермичев.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



## 二、当代俄罗斯别林斯基研究的趋势及特征：从否定到正视

在“当代”的范畴内，苏联解体后至今的三十年仍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段。在相似的研究主题下，不同时期的当代学者们在对于别林斯基的研究上有着各自的侧重与思想倾向。因此在本节中，我们试着从历时的角度，分别考察孔达科夫发表于1992年的《对文学的谋杀（论俄罗斯文化中文学批评与文学的斗争）》，吉洪诺娃在2005年为百科全书《18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社会思想》所撰写的《维萨里昂·格里高利耶维奇·别林斯基》<sup>①</sup>的词条，以及叶尔米乔夫为2011年出版的文集《别林斯基：赞成与反对》所作的长序《维萨里昂·格里高利耶维奇·别林斯基：反对刻板印象》<sup>②</sup>。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三篇文章恰可代表和反映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头十年以及2011年以来这三个十年间俄罗斯别林斯基研究的一些趋势与特征。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学界围绕别林斯基的讨论中，能够见出一种明显的趋势，即对于别林斯基哲学思想、特别是其在抛弃黑格尔哲学、转向唯物主义的第三阶段的哲学思想的质疑与批判。与白银时代批评家艾亨瓦尔德（Ю.И. Айхенвальд）在引起巨大反响的《别林斯基》（1913）一文中的观点类似，该时期的俄罗斯学界对别林斯基的诟病主要集中于两点：其一是别林斯基哲学的非体系化，其二是其美学观点的功利主义倾向，即对于艺术的社会功用的强调。别林斯基的功利主义美学思想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即生活”的美学理论、皮萨列夫“皮靴好于普希金”的激进文艺观乃至列宁“两种文化”思想的影响都是显著而深远的。然而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影响对于俄罗斯思想文化的发展而言未必是积极的，孔达科夫甚至使用了颇为耸人听闻的标题——“对文学的谋杀”<sup>③</sup>——来描述别林斯基所奠基的这种批评传统的影响。

孔达科夫该文的核心论点，是指出了俄罗斯文学批评与俄罗斯文学之间

① Тихонова Е.Ю. 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мысль России XVIII-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едкол. В.В. Журавлев (отв. ред.) [и др.] М.: РОССПЭН, 2005. С.41-44.

② Ермичев А.А.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В.Г.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 Сост. А.А. Ермичев.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 С.7-52.

③ Покушение на литературу.

的对立关系，而这种关系在作者看来肇始于别林斯基。<sup>①</sup>孔达科夫认为，普希金所奠基的、有着“文学中心主义”传统的俄罗斯文学，毫无疑问是伟大的。当然，俄国文学本身，尤其自尼古拉一世的时代起，有其功利主义的一面，但这种功利主义主要表现在文学所额外肩负起的社会责任和伦理责任上，即“这种责任不单单是艺术-美学的，而且是道德-伦理的、政治的、社会-哲学的、认知-世界观的。”<sup>②</sup>而俄罗斯文学批评，在孔达科夫看来，自别林斯基创作后期开始，直至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乃至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其社会化和政治化的程度较之俄罗斯文学而言呈几何倍数地增长，频频触及了政论的范畴，致力于将文学变为政治的附庸，并最终带有了“反文化”<sup>③</sup>的特征。这种极端形态的功利主义不仅使得文学批评本身面目全非，更负面地影响到了其批评的对象——俄罗斯文学乃至俄罗斯文化。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关系不再是相互映照、相辅相成的，而是在文学批评不断地试图改造、掌控并指导文学，而文学在此境况下不断地进行坚守、躲避以及反抗的过程中，相互斗争并争夺话语权。这种斗争时常因文学批评的功利化而遭致外界“强力”的干预，比如孔达科夫称“苏联文化中的批评与文学的斗争……结合了极权反文化与国家恐怖主义的特征”<sup>④</sup>。作者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别林斯基所开创的文学批评传统在后世的延续，“无可挽回地把人们引向‘精神和政治的奴役’”<sup>⑤</sup>。但好在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在历经文学批评所带来的种种“危险与不幸”之后，却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每次文学批评对于文学的谋杀都仅仅是淬炼了它，使其能够迎接新的考验……”<sup>⑥</sup>

文学批评家可以看作是别林斯基最基本的身份。别林斯基的哲学思想，

---

① 类似的观点实则也曾出现在白银时代的文学批评家，如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我仇恨别林斯基和其他所有杀害俄国文学的凶手”）、德米特里·米尔斯基（“别林斯基在很大程度上应对那种鄙视形式和手艺的态度负责，这种态度几乎在六七十年代杀害了俄国文学”）等人对于别林斯基的评论中。参见[俄]德·斯·米尔斯基著：《俄国文学史（上卷）》，刘文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9-230页。

② Кондаков И.В. Покушение на литературу (О борьб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с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В.Г.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 Сост. А.А. Ермичев.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 С.976.

③ Там же.

④ Там же. С.977.

⑤ Там же.

⑥ Там же.

抑或作为哲学家的别林斯基，正是脱胎于他的一千多篇文学评论之中。然而孔达科夫的此篇文章几乎从根本上否定了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别林斯基对于俄罗斯文化所产生的建构性作用，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消解了别林斯基的哲学思想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而这种对于别林斯基的否定性态度，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的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学界并非个例。

进入新千年以后，一方面，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依然带有较强的“反拨”意图，学者们仍热衷于在研究中发掘并得出与苏联时期的观点截然相反的结论；另一方面，对于别林斯基的质疑与审视已不似 20 世纪 90 年代那般尖锐，学者们对于苏联时期别林斯基研究的价值抱有更加中肯的态度。这种趋势在吉洪诺娃对于别林斯基生平与思想的概述中可见一斑。

吉洪诺娃在阐释别林斯基的社会政治哲学、宗教哲学以及文学批评思想时，均试图突破苏联时期的刻板印象。尤其是她对别林斯基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解读颇为典型。在吉洪诺娃看来，对于“个体”（индивид）及其“个性”（личность）的捍卫，是贯穿别林斯基思想各个阶段的不变的诉求。别林斯基正是因为无法容忍黑格尔主义的“反人文主义倾向”<sup>①</sup>而与之分道扬镳：“在 1840 年代对于他（别林斯基——笔者注）而言，现实中最重要对象是人的个性；他反对以全体社会的进步为名牺牲个人，反对将一整代人看作幸运后代的福祉的地基。”<sup>②</sup>这也是为什么别林斯基在抛弃了黑格尔主义之后转向了社会主义，“他寄希望于在社会主义中获取个人主义的社会支撑，并宣称被拯救的对象不是人民或者贫苦阶层，而是个体。”<sup>③</sup>而在谈及别林斯基的政治哲学及革命观时，不同于苏联时期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标签，吉洪诺娃指出，别林斯基并不似 19 世纪 60 年代及之后他的追随者那般，对革命怀有狂热的期待。事实上，“甚至在沉迷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时期，别林斯基也从未想过在俄国进行革命的可能。”<sup>④</sup>别林斯基与同时代西方派的赫尔岑等人、斯拉夫派的知识分子，以及后来 19 世纪 70 年代的民粹派均不同的一点在于，他对于村社制度一直不抱有好感，并不青睐这种制度

① Тихонова Е.Ю. 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 Сост. А.А. Ермичев.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 С.1031.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С.1032.

④ Там же. С.1035.

所谓集体主义的乃至社会主义的一面，而是看到了其落后、无序和缺乏创造力的一面。因此别林斯基并不相信底层民众的社会改革能力，而是寄希望于受教育的知识阶层以及自上而下的改革，且一度非常“信赖尼古拉一世实现改革的能力而不是血腥的‘普加乔夫主义’，别林斯基期待尼古拉一世能够废除农奴制、社会阶层以及体罚制度。”<sup>①</sup>吉洪诺娃发现，在 1847 年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等文献中，别林斯基均表述过这种温和的社会改良计划。

但与孔达科夫等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论调不同，吉洪诺娃对于别林斯基为俄罗斯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贡献还是给予了较为积极的评价。譬如同样在评价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时，吉洪诺娃承认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文章所具有的建构性意义，称其十一篇围绕普希金所展开的文论是“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俄罗斯文学史”<sup>②</sup>。此外，她在梳理别林斯基研究史的过程中，充分肯定了苏联时期别林斯基研究的价值与深度，特别是“1940 年代末起，出现了富有成效的对于别林斯基遗产和生平的溯源性研究。在 1960 至 1980 年代出现了对于其文学观和创作方法的深刻研究。”<sup>③</sup>相反，吉洪诺娃对于 1990 年代的别林斯基研究评价不高，认为这一时期的政论界对于整个俄国西方派的思想都表现出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sup>④</sup>。这些论述都说明了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在 21 世纪初所发生的态度转向。

2011 年至今的俄罗斯学界的别林斯基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重新正视和肯定别林斯基遗产的趋势。学者们的观点既不是对于苏联观点的亦步亦趋，也不再执着于对别林斯基进行虚无主义式的解构，而是尽力在寻找一种兼有创新性与客观性的视角。2011 年是别林斯基诞辰 200 周年，可以看作当代学界对于别林斯基的整体论调的分水岭。这一年别林斯基研究界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文集《别林斯基：赞成与反对——俄罗斯思想中别林斯基的个性与创作》的出版。该文集选编了自别林斯基的时代至 2011 年近 200 年间，俄国思想界围绕别林斯基这一主题所写就的几乎所有重要的文章论著，具有总结过往、承上启下的学术意义。而叶尔米乔夫为该文集所作的序言《维

① Тихонова Е.Ю. 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С.1035.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С.1036.

④ Там же.

萨里昂·格里高利耶维奇·别林斯基：反对刻板印象》，不仅为这本文集作了提纲挈领的总结，也为别林斯基研究的发展奠定了新时期的基调。

由叶尔米乔夫这篇序言的标题所引申出的一个自然而关键的问题，便是作者所指的“刻板印象”是什么？一个想当然的断定是：此即苏联时期的别林斯基研究所形成的刻板印象。的确，叶尔米乔夫反对这种刻板印象。他列举了苏联学界赋予别林斯基的四个最著名的标签——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社会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俄罗斯文学批评的鼻祖——并在文中逐一进行审视与反驳。在这一点上，叶尔米乔夫与吉洪诺娃等人的倾向是一致的，且在论述的过程中对白银时代及侨民哲学家的阐释方法多有借鉴。比如在考察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别林斯基时，叶尔米乔夫同样看重别林斯基哲学中的“个性”（личность）问题，并由此将人格主义看作别林斯基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和动因。这种阐释方式与侨民哲学家津科夫斯基的观点颇为相似。津科夫斯基在其 1950 年所著的《俄国哲学史》中便已指出：“正是人格主义的主题促使别林斯基的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为了个性，为了个性正常的发展以及保障‘每个人’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别林斯基才站在了社会主义理想这一边。……在别林斯基这里，……社会主义乌托邦正是为了将个性从当代体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发展起来的。”<sup>①</sup>

但与此同时，叶尔米乔夫也在旗帜鲜明地反对另一种刻板印象，即刻意地站在苏联学说的对立面，对别林斯基及其思想做出与之截然相反的、过于绝对的论断。这一点明显区别于孔达科夫等人的立场，也是吉洪诺娃等人在研究中尚未明确道出的。叶尔米乔夫不仅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苏联时期的研究成果，而且也反对盲目地相信和倚靠白银时代思想家对于别林斯基的评价。比如，他对于在 1913 年轰动一时的艾亨瓦尔德的《别林斯基》一文中有关别林斯基是政治保守主义者的判定，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并顺带讽刺了当代俄罗斯学界的“反苏热情”：“如今，当几乎每一个知识界的读者都想要揭露一番我们历史中的苏联时期以及俄国的革命运动时，艾亨瓦尔德的论点便立即引起了人们必要的兴趣。但我想要提醒的是，沉迷于‘揭露’别

---

<sup>①</sup>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11. С.262-263.

林斯基的艾亨瓦尔德，并没有注意到那些如此无可争议的、有关别林斯基自由主义与革命主义倾向的证据。”<sup>①</sup>有趣的是，叶尔米乔夫在之后展开的论证中用以反驳艾亨瓦尔德的论据之一，正是学者鲍里斯·叶戈罗夫在苏联时期发表于《文学问题》上的文章《时代开辟的前景：当今革命民主主义批评研究》（1973）<sup>②</sup>，可见其对于前人的成果颇为不偏不倚的态度。

因此事实上，叶尔米乔夫所反对的是来自两个方面的刻板印象。针对别林斯基身上亦正亦反的四个标签，叶尔米乔夫分别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破除刻板印象的尝试。叶尔米乔夫认为，首先，别林斯基既不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所认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反过来与之针锋相对的、白银时代的艾亨瓦尔德等人所认定的保守主义者，而是信奉个性所具有的最高价值的自由主义者，以及在人格主义基础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从这一意义上讲，别林斯基的思想可以看作俄国革命的起始因素，然而并非革命思想本身。其次，别林斯基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也不是绝对的唯心主义者，而是可以看作后来俄国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先声。第三，别林斯基既不是苏联学者所认为的无神论者，也不像 19 世纪的波果金(М.П. Погодин)等人所断言的那样，是虔诚的东正教徒，而是真理的追求者和广泛意义上的“寻神者”。从这一角度看，别林斯基可以看作后来具有“新宗教意识”的“寻神者”，即宗教哲学家们的先驱。最后，别林斯基并不是一位足够专业的、无可挑剔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批评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他也不像白银时代的批评家阿基姆·沃伦斯基(А.Л. Волынский)以及艾亨瓦尔德等人所诟病的那样，在文学批评领域没有任何独立思想和实质性的贡献。别林斯基应当被视为一位能够代表俄罗斯文学批评之独特性的、符合其所处时代之民族自我意识需要的批评家。<sup>③</sup>

以孔达科夫、吉洪诺娃和叶尔米乔夫围绕别林斯基所展开的不同论述为例，我们历时性地回顾了苏联解体三十年来别林斯基研究的整体趋势。从中

① Ермичев А.А.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В.Г.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 Сост. А.А. Ермичев.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 С.30.

② Егоров Б.Ф.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открытые временем. Изучен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критики сегодня//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3. №3. С.114-136.

③ 详见: Ермичев А.А.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В.Г.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 Сост. А.А. Ермичев.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 С.29-51.

不难发现，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在对待别林斯基及其遗产的态度上经历了一个从批判否定到重新正视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因为对于任何一位思想家的研究与评价，都会出现赞成与反对的声音，并最终出现一种在亦正亦反间、更加客观中肯地接近其真实面貌的尝试。但与此同时，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仍有其自身的特征。特征之一体现在时代背景上。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起始于一场意识形态的倾覆，而别林斯基恰在该意识形态中获得过官方所认可的崇高地位。于是，与旧有意识形态相互捆绑的别林斯基，必定会在新时代面临格外尖锐且具有颠覆性的讨论与评价。特征之二则体现在作为研究对象本身的别林斯基及其思想上。别林斯基不仅在苏联时期被推崇为“别、车、杜”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中的首要人物，更在整个俄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中有着意义非凡的甚至“神话”般的地位。这使得其更易吸引研究者的兴趣抑或“火力”，从而成为人心所向抑或众矢之的。因而若从更广的时间维度上看，这种围绕在“别林斯基神话”周围的如火如荼的、“正与反”之间的讨论态势，并非仅是苏联解体后的产物，而是在别林斯基身后的各个时代均留有踪迹。

### 三、“别林斯基神话”及其命运：从历史到当代

1995年，学者伊戈尔·沃尔金曾在期刊《俄罗斯行省》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所有时代的导师》的文章。在文章中，沃尔金回顾并分析了自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末，别林斯基是如何成为某种意义上俄国知识分子的鼻祖，并作为“所有时代的导师”被奉入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之中，从而在俄罗斯社会与文学意识中获得几近神圣的地位的。2011年别林斯基诞辰200周年之际，该文被收录于纪念文集《别林斯基：赞成与反对》中。此外，沃尔金还再度以《作为神话的别林斯基》为标题改写文章，发表于电子期刊《媒体聚焦》上<sup>①</sup>，因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与关注。新版本的标题将别林斯基喻为“神话”，可谓既生动传神地形容了别林斯基在俄罗斯文学史与思想史中不朽而独特的意义，又暗指了“神话”背后所可能隐藏的、另一个“现

<sup>①</sup> Волгин И.Л. Белинский как миф// Медиаскоп. 2011. №4. С.23.

实”中的别林斯基，以及围绕二者的研究与讨论所富含的潜在张力。实际上，沃尔金并非唯一论及“别林斯基神话”的人。早在 1913 年，文学评论家和社会思想家帕维尔·萨库林便在《俄国公报》(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上发表过论战文章《别林斯基——神话》(Белинский—миф)，以回应艾亨瓦尔德在同年的《别林斯基》一文中对伟大批评家的质疑，并捍卫别林斯基在俄国知识界不可撼动的地位。萨库林在文中特别强调了别林斯基“神话”般的形象所具有的现实中的扎实基础：“难道事实上的零和空白能够凭空变为一位英雄、圣人，变为活生生的、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的传奇吗？神话的创造通常是具有某种现实的基础的。……他（别林斯基——笔者注）的精神回荡在整个俄罗斯文学之上，他是所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庇护人。他的地位早已被历史不偏不倚的裁判所确立：他的名字——是神圣的。”<sup>①</sup>

兼有人文主义的抽象理想以及社会改造的具体目标的“社会主义”理念，及其所引发的热忱的“革命”激情，可谓别林斯基思想中最为突出、影响最为深远的特质。而此二者亦可看作萨库林等人心目中的“别林斯基神话”的核心内涵。恰如著名的《俄国文学史》的作者德米特里·米尔斯基曾对“别林斯基精神”所作的鞭辟入里的概括——“即社会理想主义、改造世界的激情、对于一切传统的轻蔑，以及高昂无私的热忱。”<sup>②</sup>亦如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所言：“维萨里昂·别林斯基的名字是 19 世纪最大的俄罗斯神话，……他成为 19 世纪自由与革命运动的理想化的鼻祖。”<sup>③</sup>

然而不可回避的一种境况是，当一个人被奉上神坛，从而成为一种“神话”，那么他就必将面对和承受一系列有关“神话与现实”的比量与探问。而人性总是乐于寻找二者之间的强烈对比，乐于构想崇高与平庸、虚构与真相之间的戏剧张力。于是，在有关别林斯基的研究中出现了另一个值得玩味的字眼——祛魅(развенчать)。在我们上文已介绍过的一篇文章——当代学者切尔卡索夫发表于 2019 年的《霍达谢维奇论别林斯基批评》(随笔“罗斯

① Сакулин П.Н. Белинский—миф// В.Г.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 Сост. А.А. Ермичев.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 С.616-623.

② [俄]德·斯·米尔斯基著：《俄国文学史（上卷）》，刘文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28 页。

③ [英]以赛亚·伯林著：《观念的力量》，胡自信、魏钊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年，第 115 页。



托普钦娜伯爵夫人：生平及其抒情诗”）》中，作者曾提到：“霍达谢维奇祛魅了(развенчивал)对于别林斯基的评价，认为别林斯基对待罗斯托普钦娜笔下‘真正的’诗歌却抱有功利主义的、有失体统的态度。”<sup>①</sup>“развенчать”所对应的反义词“венчать”，最基本的涵义是指帝王的登基加冕礼中，为帝王戴上王冠的这一动作。相应地，“развенчать”则指使帝王失掉王冠，剥夺其地位。放置在别林斯基研究的语境中，这组相反的词义便可理解为将别林斯基奉上神坛，抑或拉下神坛；塑造“别林斯基神话”，抑或祛魅这一神话。同样地，切尔卡索夫远不是第一位提出这一说法的学者。在20世纪初围绕别林斯基的那场学界的争论中，“祛魅”一词已被反复提及。萨库林在《别林斯基——神话》中直言：“不能祛魅别林斯基。”<sup>②</sup>而1914年文学批评家尼古拉·布罗茨基发表题为《别林斯基被祛魅了吗？》<sup>③</sup>(Развенчан ли Белинский?)的文章，再次描述了发生在那个时代的“别林斯基神话”的危机，并几乎一一反拨了艾亨瓦尔德对于别林斯基“祛魅”的尝试，对题目中的设问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从历史到当代，“赞成与反对”的声音始终围绕着别林斯基，不断地有人试图将其塑造成神话，也不断地有人试图将这一神话的光环祛除。这一现象，其实在我们前文的论述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比如在当代的别林斯基研究中，“祛魅”的趋势曾十分鲜明地显现。而总的来说，如果整合别林斯基研究的主要趋势，我们会发现，“别林斯基神话”至少经历过两次“塑造”与“祛魅”的沉浮。

第一次“别林斯基神话”的塑造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这一过程从19世纪50年代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对于别林斯基的悼念和赞誉开始，经历了60年代的皮萨列夫等平民知识分子的推崇以及之后的俄国解放运动，在1898年别林斯基逝世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达到顶峰，完成了“别林斯基神话”的塑造。其实，在19世纪中后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40

① Черкасов В.А. Критика Белинского в освещении Ходасевича (очерк «Графиня Е.П. Ростопчина: ее жизнь и лирика»)// Вестник Волого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9. №.4 (15). С.81.

② Сакулин П.Н. Белинский—миф. С.623.

③ Бродский Н.Л. Развенчан ли Белинский?// Вестник воспитания. 1914. №.1. С.106-139.

年代人”与“60 年代人”在相互“争夺”别林斯基。两代人均将别林斯基看作自己时代哲学与思想的杰出代言人——贵族知识分子看重别林斯基思想中“自由主义”的特质，而平民知识分子则赋予了别林斯基思想以“革命主义”的标签。但最终，“别林斯基神话”的塑造者归属了民粹派等俄国左翼知识分子。别林斯基的遗产，尤其是其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滋养了年轻革命者们的心智与情感”<sup>①</sup>，从而获得了特殊而鲜明的社会意义。“别林斯基的人文主义思想被纳入了公开的革命斗争的语境中。他的名字……成了解放运动的旗帜。”<sup>②</sup>在这种气氛下，到了 1898 年别林斯基逝世 50 周年之际，对于别林斯基的热切崇敬与高度评价已经扩展到整个俄国知识界中，相关的纪念文字可谓数量颇丰<sup>③</sup>，且来自哲学界、神学界、科学界、文学界等各个领域。这种影响甚至渗透到了知识界之外的俄国社会中，用叶尔米乔夫的话来说便是，“技术学院的学生与神学院的学生都热爱这位伟大的启蒙家，而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和革命者西涅古布(С.С. Синегуб)也同样爱着他。……他们的溢美之词中当然有侧重点上的微妙差别，但关键并不在这里。”<sup>④</sup>言外之意是，关键在于，到了 19 世纪末，别林斯基作为一种文化与精神符号，俨然已在全俄拥有了广泛的认可度与影响力。

而第一次“别林斯基神话”的祛魅发生在 20 世纪初。1898 年既是“别林斯基神话”塑造的顶峰，也可以看作是其“盛极而衰”的起点，尤其在 1905 年革命发生之后，以“路标派”为代表的一批俄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俄国革命运动进行从现象到源头的反思与质疑，而对于别林斯基“祛魅”的最具轰动性、标志性的事件则是 1913 年尤里·艾亨瓦尔德的《别林斯基》一文的问世。其实早在 1893 年，文学评论家阿基姆·沃伦斯基就在发表于《北方导报》(Северный вестник)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过对于别林斯基世界观

① Ермичев А.А.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 Сост. А.А. Ермичев.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 С.23.

② Там же.

③ 据叶尔米乔夫的统计，仅 1898 年一年就有 20 部纪念别林斯基的书籍问世，12 种版本的别林斯基的作品书信集出版，另有 491 篇论及其生活与创作的文章发表于报纸和杂志上。详见：Ермичев А.А.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 Сост. А.А. Ермичев.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 С.24.

④ Ермичев А.А.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 Сост. А.А. Ермичев.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 С.24.

和文艺观的质疑。他认为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常常忽略了人们内在的精神需求，过分强调物质的福祉与眼前的社会利益，以至于他的文字完全无法与普希金、果戈理等人的精神世界相匹配。在沃伦斯基看来，别林斯基的贡献充其量只在于政论批评这一方面。1904年，象征主义诗人与文学评论家萨多夫斯科伊(Б.А. Садовской)意味深长地在书评中写道：“在我们的文学中，别林斯基的名字长久以来一直被神秘而美丽的传奇所环绕着。”<sup>①</sup>显然，似乎已经是时候打破这一传奇的迷雾了。1909年《路标》文集的出版，标志着“路标派”思想家对于俄国革命以及革命知识分子进行深刻反思的开始。在“路标派”的语境中，“知识分子”一词实则指代的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革命知识分子，而别林斯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认为是“俄国知识分子之父”的。到了1913年，现代主义文学已在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坛影响甚广，印象主义批评流派的学者艾亨瓦尔德在其著作《俄国作家剪影》(Силуэты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的第二版中增添了七个新的人物，其中便有别林斯基。艾亨瓦尔德自身的文学批评观念受叔本华学说的影响很大，认为艺术的本性即为直觉，而这种对于艺术之非功利本性的理解，显然与别林斯基的文艺观是格格不入的。在这篇名为《别林斯基》的简短却足以令人惊诧的文章中，艾亨瓦尔德直呼别林斯基为“叛教者维萨里昂”(Виссарион-Отступник)，意指其对于俄国文学与精神传统的背叛。艾亨瓦尔德几乎从根本上否定了别林斯基所具有的思想家与文学评论家的身份：别林斯基的哲学乃至整个思想都是非体系化的、前后矛盾的，他对于从西欧零散接受的他人的观点，只进行了囫圇吞枣与拙劣的模仿，这致使他的思想缺乏精神完整性，且无法达到普希金、果戈理等人的精神高度；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更是非专业的、称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他的评论文章不仅有如空心的洋葱一般流于表面，更导致了俄国艺术的倒退——即从唯心主义到庸俗的实证主义的倒退。<sup>②</sup>当代学者沃尔金对于艾亨瓦尔德此文做出过一种颇为有趣的类比，他认为“艾亨瓦尔德的文章是由皮萨列夫式的武断写就的，但他与皮萨列夫

① Садовской Б.А. Рецензия на издание «В.Г. Белин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 Весы. 1904. №.9. С.62.

② 详见：Айхенвальд Ю.И. Силуэты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Москва: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4. С.503-511.

的激情论断各自指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sup>①</sup>的确，如果说被称为“虚无主义者”的皮萨列夫曾经凭借《普希金与别林斯基》（Пушкин и Белинский, 1865）一文中对普希金的批判与对别林斯基的赞颂，将后者推举至神话一般的地位，那么艾亨瓦尔德则几乎用同样虚无主义的方式倒置了普希金与别林斯基二者的地位，将别林斯基拉下了神坛。也难怪艾亨瓦尔德此文当即在 20 世纪初的俄国思想界引发了空前的争议与讨论。1914 年，艾亨瓦尔德又撰写长文《有关别林斯基的争论：给批评家们的回应》（Спор о Белинском. Ответ критикам），重申且深化了自己“祛魅”别林斯基的立场与观点。事实上，若从更宏观的角度看，20 世纪初席卷西方学界的文化现代性的浪潮，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动了这场对于别林斯基的“祛魅”。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彼时所描述的：“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祛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sup>②</sup>

第二次“别林斯基神话”的塑造发生在苏联时期。这一时期从本质上讲，其实可以看作是第一次神话塑造的巩固和延续，因为在对于别林斯基及其思想的阐释方面，苏联时期的观点基本上与 19 世纪后半叶革命知识分子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论及别林斯基的文字——如普列汉诺夫在 1897 年发表的文章《别林斯基与理性现实》（Белинский и разумна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列宁在 1902 年出版的著作《怎么办？》等，成了后来苏联学界几十年间评价与解读别林斯基的标尺。也正是在苏联时期，“别、车、杜”之间的继承关系以及别林斯基的旗帜性地位被典型化地固定下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同时期的俄国侨民哲学家们尽管政治立场不同，对于别林斯基的阐释方式也迥然相异，但在对于别林斯基的推崇和认可上，却与苏联官方的态度有着出奇的相似之处。这些侨民哲学家中的许多人曾经是白银时代“路标派”的成员，他们随着 1918-1939 年的第一次移民潮侨居海外，一些人始终坚持对于苏联政权的

① Волгин И.Л. «Учитель на все времена»//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 Сост. А.А. Ермичев.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 С.994.

② [德]马克斯·韦伯著：《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93 页。

反对立场，另一些人则在漫长的旅居生活中逐渐转向认可故土上所诞生的这一新政权，更有一些人尽管并未明确赞同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却随着对于俄罗斯思想文化愈加深入的洞悉与反思，将革命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纳入“俄罗斯理念”的有机整体之中，将其看作某种“倒置的宗教性”的表达。因此，别林斯基在绝大多数侨民哲学家，如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等人的眼中，在某种程度上便属于“俄罗斯理念”与“俄罗斯心灵”的传奇性代表之一。叶尔米乔夫在梳理侨民哲学家对于别林斯基的观点时认为，总的来说，“除了德米特里·奇热夫斯基<sup>①</sup>，大家在写到‘疯狂的维萨里昂’（Неистовый Виссарион）时都带有明显的好感。”<sup>②</sup>这也是为什么在谈及 20 世纪的学者对于别林斯基的接受时，伊戈尔·沃尔金总结道：“‘疯狂的维萨里昂’有着两副面孔：一幅是应用于教科书中的，另一幅是形而上的、心智性的——他们融合为一种统一的形象，庇荫着同一个历史的神话。”<sup>③</sup>

第二次“别林斯基神话”的祛魅发生在苏联解体后（1991 年）至 2011 年前后。在这二十年间，十月革命后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观被推翻，“宗教热”兴起，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尤其是“路标派”的著作与思想在当代俄罗斯迅速受到热捧。因此同样地，第二次对于“别林斯基神话”的祛魅从本质上讲也可看作是第一次的延续与发展。在这次祛魅的过程中，“所谓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遗产自然受到了重新审视。在圣彼得堡，那些昨天还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们，今天便把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从公共图书馆的名称中抹除了，便想把以别林斯基命名的街道改名为西蒙诺夫斯基街道。”<sup>④</sup>在这种境况下的别林斯基研究所面临的否定性的趋向，我们已在上一节中进行过充分的回顾。然而这种所谓的“重新审视”，却时常缺乏审视的客观性，而具有“为反对而反对”抑或“为祛魅而祛魅”的片面性。正如叶尔米乔夫所一针见血

① 德米特里·奇热夫斯基（Д.И. Чижевский，1894-1977）是一位俄裔德国哲学家，自 1921 年起一直侨居西方，他的斯拉夫学研究在西方学界颇有名气和影响。他在名作《黑格尔在俄罗斯》（Гегель в России，1939）中对于别林斯基的评价不高，认为其既没有深刻且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又缺乏细致的艺术感受力。可以说，奇热夫斯基与白银时代的艾亨瓦尔德等人对于别林斯基的理解与评价是较为类似的。

② Ермичев А.А.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 Сост. А.А. Ермичев.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 С.26.

③ Волгин И.Л. «Учитель на все времена». С.981.

④ Ермичев А.А.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С.10.

指出的,如果说苏联时期的别林斯基研究仅透过俄国解放运动的单一镜片来看待别林斯基,那么“当代的别林斯基的反对者们同样也仅透过自己反革命的镜片来看待他。”<sup>①</sup>而无论是为别林斯基戴上光环,奉上神坛,还是褫夺其光环,使他跌落神坛,从本质上讲都是一种“一元论状态”<sup>②</sup>(монополь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即从一种非黑即白的刻板印象走向另一种刻板印象。“别林斯基神话”在历史上经历了两次这样的起伏,而通过我们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次过程由于有着相似的动机和内容,实则可以看作是同一种神话的塑造与祛魅,或者说是陷入了同一个“一元论状态”的怪圈。

因此在这一意义上,2011 年以后的别林斯基研究较之于苏联解体后不久的、以及历史上的别林斯基研究而言,或许有着更加特殊的价值与意义。近十年来的别林斯基研究,以《别林斯基:赞成与反对》的出版作为标志性事件之一,试图赋予新时期的别林斯基研究以更多的客观性、多元性与创新性。不同学者们在研究中从多样的视角对别林斯基的遗产进行新的阐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对其思想与创作的“一元论”描述与判定。换言之,别林斯基诞辰 200 周年以来,别林斯基的研究者们似乎在努力跳出“塑造神话”与“祛魅神话”两极间的历史宿命,并试图“重塑”这一神话,使其被重新塑造为一种更加稳定的状态——既不因被过度架高而摇摇欲坠,也不因无休止的祛魅和解构而被连根拔起。因而可以说,尽管“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在时间段上同属于苏联解体后至今——这一“当代俄罗斯”的范畴,但就“别林斯基研究”本身、亦即“别林斯基神话”的命运而言,却以 2011 年为分水岭,可以划分为“祛魅神话”与“重塑神话”这两个差异明显的阶段。这三十年中的前二十年,实际上更属于“历史上的”别林斯基研究,属于“别林斯基神话”宿命般地被塑造又被祛魅的历史过程;而后十年则属于“新时期的”别林斯基研究,即跳出这一宿命,以新的视角与方式勾勒别林斯基及其遗产的面貌的尝试。这就是叶尔米乔夫所说的:“对于历史上的活动家,最开始人们总是根据他为生活所带来的新东西来评价他;之后逐一开始清算他的疏漏与错误。厌倦了别林斯基‘遗产’的新宗教复兴便从

① Ермичев А.А.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 Сост. А.А. Ермичев.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 С.10.

② Там же.

后者着手。而在我们的肩头落下了这样的责任，即保持客观，将别林斯基视为俄罗斯民族文化成形时期的代表人物，以及独特类型的文学批评的创建者，而正是这种文学批评，连同与其不可分割的文学作品，成了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之表达的主要形式。”<sup>①</sup>

然而，在这种相对客观平和的认识中，“别林斯基”还能称得上是一种“神话”吗？毕竟连叶尔米乔夫本人都明确指出：“当开辟研究别林斯基的新方法时，应当避免将这一名字进行任何神话化。而这样的风险一直都存在着。”<sup>②</sup>的确，将本应作为理性研究对象的别林斯基频频与“神话”这一神秘而非理性的意象联系起来，似乎才是造成学界对其两极性评价的根源所在。但学者沃尔金对于能否真正消除“别林斯基神话”是存疑的。他直言：“人们热爱神话般的人物，不是爱他们的那些正确的论断，而是爱他们本来的样子。”<sup>③</sup>也就是说，似乎存在另一种形式的“神话”，即对于某一人物的神化与崇拜未必要与其学说是否绝对正确画上等号。显然，别林斯基及其学说的正确性与专业性，在当代俄罗斯学者的眼中，已不似苏联时期那般不容置疑。但难以否认的是，别林斯基独特的精神气质早已刻入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基因，在后世乃至当代的很多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都能找到别林斯基的影子。因而，“别林斯基”这一名字仍是无法抹去的符号与象征。且近十年来，尽管围绕别林斯基的思想有着不同的阐释与论争的立场，但别林斯基在俄罗斯文学史与思想史中所占据的关键地位却变得越来越稳固与不可撼动。叶尔米乔夫也特别强调过要超越“专业且狭窄的意义”<sup>④</sup>，将别林斯基的创作与个性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进行把握与认知：“别林斯基时代的文学批评完全不是专业的、‘欧洲’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家作为读者大众的代表，向文学家们问出一切困扰着他的问题。对于他的问题来说是没有边界和尽头的。他评判和谈论历史与人民、权力与罪恶、信仰与道德、农奴制与自由、哲学与宗教……的确，别林斯基正是这种包罗万象的文学批评的奠基者。这种批评的领域是自由的，一种领域与另一种领域没有明显边界地

① Ермичев А.А.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Белинский: Pro et contra. Сост. А.А. Ермичев.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 С.50.

② Там же. С.10.

③ Волгин И.Л. «Учитель на все времена». С.995.

④ Ермичев А.А.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С.19.

相互毗邻甚至渗透：文学渗透进哲学，哲学渗透进宗教，后者又竭力地在完成某种社会功能……事实上，我们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文学中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文学批评的产物。相应地，评价别林斯基与评价一名专业的批评家应当是不一样的。当然，别林斯基是文学批评家，但他的更‘首要’的意义在于别处——他是俄国社会的教谕者，是理性、善与人性之典范。”<sup>①</sup>或许正是这种在专业理性的研究之下一直普遍存有的、对于别林斯基的非理性的推崇与热爱，使得“别林斯基神话”并未在当今完全消失，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被尝试着理解与重塑。

因此总的来说，“别林斯基神话”自 19 世纪中后期至 21 世纪头十年，依次经历了两次性质相似的、被“塑造”与“祛魅”的过程。而自 2011 年起，当代俄罗斯学界对于别林斯基的研究逐渐归于较为中立客观的探讨，此时的“别林斯基神话”不再是一种非黑即白的形态，我们更倾向于称之为“神话的重塑”。从被塑造到被祛魅，再至被重塑——此即“别林斯基神话”自历史至当代的命运。

#### 四、结语

亚历山大·叶尔米乔夫在长序《维萨里昂·格里高利耶维奇·别林斯基：反对刻板印象》的结尾，回忆了 2010 年一次学术会议之后的晚会上，几位俄罗斯哲学家们的交谈。这段记述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代俄罗斯哲学家们对于别林斯基在俄罗斯思想史上的地位的认识：

来自伊万诺夫的索洛维约夫作品研究中心的主任米哈伊尔·马克西莫夫，将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称为俄罗斯思想的“关键人物”。

伊戈尔·叶甫兰彼耶夫对此提出反对，认为这一人物当属陀思妥耶夫斯基。而笔者则提出，若按照路标派将俄国革命看作我国 19 世纪历史的中心事件这一理解，那么这一关键人物应当是维萨里昂·别林斯基。

事实上，尼古拉一世逝世后及准备和进行农奴制改革期间，发生在俄国的一切思想会战都是为了一个问题的解决——关于俄罗斯往何处

<sup>①</sup> Ермичев А.А.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С.50-51.



去——遵循渐进的道路还是革命的道路。若潜心研究这些争论，就会完全清楚地看到，别林斯基在这段以 1917-1921 年革命作结的俄罗斯历史中具有怎样关键性的意义。

然而，在对此三位候选人一番讨论之后，晚会的参与者们以别尔嘉耶夫的方式，即关于俄罗斯心灵之二律背反性的学说，解决了这一问题。如果有革命，那么便有反对革命。如果有别林斯基，那么就应当有他的对映体；显然，这个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是讨论者们达成共识，俄罗斯意识中的关键性因素乃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二位一体。<sup>①</sup>

的确，别林斯基的思想与俄国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当代学者们在对其思想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因素提出质疑的过程中，已极力证明了别林斯基并不主张在彼时的俄国即刻开展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但他的思想仍可被视为 19 至 20 世纪深刻改变了俄国历史之命运的一系列革命思想的开端，或者用别林斯基自己的话来说，是“风暴的启明星和预言者，……是预示着思想革命临近的那些令人不安的现象之一”<sup>②</sup>。而曾在《群魔》等作品中对于俄国革命激进主义进行过深刻揭露与反思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最早发现别林斯基身上的革命性因素以及这种因素可能导致的破坏性后果的知识分子之一。在 1881 年的记事本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对别林斯基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别林斯基对于新思想有着非比寻常的渴望，且每一次在接受新思想时，他都怀着憎恨、唾弃和鄙视，非比寻常地期待着摧毁一切旧的事物。”<sup>③</sup>当代学者沃尔金认为，陀氏正是在别林斯基的身上，“首次发现了由善生恶的机制，而这种善乍看起来丝毫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sup>④</sup>但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在思想上也是惺惺相惜的。别林斯基在世时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给予过高度评价，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多次赞赏过别林斯基思想的道德性及其对于俄国社会崇高的教育意义。

对于这一对“二位一体”因素，沃尔金曾总结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同

① Ермичев А.А.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против стереотипов. С.51-52.

② Белинский В.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3 т.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4. Т.12. С.332.

③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4. Т.27. С.50.

④ Волгин И.Л. «Учитель на все времена». С.988.

他曾强烈批评过的那位（即别林斯基——笔者注）一样，都是‘好走极端的人’。”<sup>①</sup>而这种极端性抑或最高纲领主义，何尝不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及其历史进程的特征？苏联解体与当代俄罗斯国家的诞生，又何尝不可视作这一特征在现实中的映照？因而无论如何，别林斯基研究对于当代俄罗斯而言并不是过时而遥远的，反而是迫切的、必要的、具有持久而特殊的意义的。

本文对于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之研究，也正是基于这种意义而展开的。回顾全文，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看法：

其一，从横向的主题维度上看，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回顾并分析了别林斯基与同时代人哲学思想的相互影响；介绍并挖掘了白银时代哲学家对于别林斯基思想的评价；再度聚焦了别林斯基的哲学遗产，并主要从社会政治哲学、宗教哲学、文艺批评与美学思想三个方面进行了重新探讨与阐释。出于对苏联时期刻板印象的反拨以及对白银时代哲学的热捧，当代俄罗斯学界在分析别林斯基的哲学思想时往往会得出与苏联学界不尽相同的结论，并更倾向于借鉴白银时代及后来的侨民哲学家所运用的“宗教内在论”“人格主义”等解读方式。

其二，从纵向的时间维度上看，苏联解体后的三十年间，当代俄罗斯学界在对待别林斯基及其遗产的态度上经历了一个从批判否定到重新正视的过程。通过孔达科夫、吉洪诺娃、叶尔米乔夫三位学者在三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研究可以发现，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学界对于别林斯基哲学思想的态度多为批判与否定。而新千年以后，一方面，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依然带有较强的“反拨”意图，学者们仍热衷于在研究中发掘并得出与苏联时期的观点截然相反的结论；另一方面，对于别林斯基的质疑与审视已不似 20 世纪 90 年代那般尖锐，学者们对于苏联时期别林斯基研究的价值抱有更加中肯的态度。近十年来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重新正视和肯定别林斯基遗产的趋势，学者们的观点既不是对于苏联观点的亦步亦趋，也不再执着于对别林斯基进行虚无主义式的解构，而是尽力在寻找一种兼有创新性与客观性的视角。

其三，若将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与历史上的别林斯基研究联动考

---

① Волгин И.Л. «Учитель на все времена». С.987.

察可以发现，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看似是苏联解体后的“另起炉灶”，实则与自 19 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整个“别林斯基神话”之塑造、祛魅与重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其对俄国文坛与思想界的崇高贡献，别林斯基被 19 世纪后半叶以及苏联时期的研究界奉上神坛，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别林斯基神话”。然而在白银时代以及苏联解体之初，别林斯基的思想遗产也饱受过质疑与批判，这一神话的光环屡次遭到祛除。2011 年之后的别林斯基研究试图跳出非黑即白的“塑造”与“祛魅”定式，以更加中立客观的视角致力于“重塑别林斯基神话”。正是通过这种自历史至当代的回溯视角，近十年来俄罗斯学界的别林斯基研究才更加凸显其可贵而特殊的趋向与特征。

在 1913 年那篇著名的檄文《别林斯基》中，艾亨瓦尔德在列举了别林斯基批评理论的种种谬误与矛盾之处后，颇为旗帜鲜明地坦言：“在当今别林斯基众多的深切崇敬者之中，曾有一位以‘伟大的心灵(великое сердце)’一词来形容别林斯基首要的意义之所在，而我们更青睐的，则是伟大的智慧(великий ум)。”<sup>①</sup>显然，在艾亨瓦尔德的眼中，较之于看似宏大却无从捕捉的所谓“心灵”，专业的学识与过人的“智慧”是更加重要的品质。而后者正是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别林斯基所欠缺的。别林斯基的确并不是一位足够专业和智慧的学者，艾亨瓦尔德在学理上对于别林斯基的那些指责几乎无可辩驳。别林斯基缺乏高雅而广博的学术素养，其文字天赋与艺术感受力甚至不及作为其后辈的、贵族家庭出身的皮萨列夫；而在哲学方面，并不精通外语、未接受过系统性哲学训练的别林斯基，在奇热夫斯基等专业的哲学家看来，更是经常误读并简化黑格尔等德国哲学家的思想理论。

然而饶有意味的是，著名宗教哲学家瓦西里·罗赞诺夫在 1915 年与友人的通信中，用带有明显反讽意味的双引号称呼艾亨瓦尔德为“俄罗斯批评家”，并不留情面地形容道：“艾亨瓦尔德是一名诗人，但却是一名有着败坏的心灵(дурное сердце)的诗人。读着他那些‘优雅的篇章’……完全会觉得这种‘光鲜’与‘优雅’是十分危险的。……在俄罗斯文学中有着不可比拟的某种特质——即内在的真实性，……尽管它经常是莽撞的、粗糙的甚至粗俗的，是不智慧的(неумно)、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但事实上，正是从这种

<sup>①</sup> Айхенвальд Ю.И. Силуэты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Москва: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4. С.509-510.

粗糙中，后辈们能够制出精致的方糖，这种粗糙性是富有生命力的、不断成长的；而艾亨瓦尔德的‘优雅性’却仍是老样子，什么也变不成，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是停滞的、僵死的。”<sup>①</sup>罗赞诺夫认为优雅而“智慧”的艾亨瓦尔德却有着一颗“败坏的心灵”，缺乏俄国文学最宝贵的特质，称不上是真正的“俄罗斯”批评家。这一尖锐论断也算是间接回答了艾亨瓦尔德所抛出的“心灵”与“智慧”孰轻孰重的问题。显然，罗赞诺夫不但判定“心灵”重于“智慧”，且认为只有前者才是衡量“俄罗斯性”的某种真正的标尺。

很难说罗赞诺夫所言就一定是公允的，但借助他的观点，我们或可从一个侧面去延伸性地解读当代俄罗斯学界对于别林斯基态度的转变。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别林斯基险些被从圣彼得堡的街道中除名，到 2019 年以“疯狂的维萨里昂”命名的全俄文学批评奖的设立，人们在“重审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地揭露出别林斯基在“智慧”层面的不完美，却无论如何也难以推倒其在“心灵”层面的独特性、崇高性乃至俄罗斯性。而在更广的意义上，苏联解体三十年来，俄罗斯学界对于俄国革命乃至整个苏联时期的文化遗产，似乎均经历过类似地从在“智慧”上批判，到在“心灵”上接纳的过程。正如当代学者维克多·谢尔巴科夫在其 2016 年的专著《皮萨列夫与虚无主义时代的文学》中，通过援引屠格涅夫所言而表达的对于该时代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赞誉：“别林斯基和他的信件——这是我的全部宗教。……所有我所知的真正的否定者（别林斯基、巴枯宁、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斯别什涅夫等）——都毫无例外地……剥离了个人的愤恨和怒气，他们走上自己的道路，仅仅是因为他们更加敏锐地感受到了人民生活之需求。”<sup>②</sup>俄国革命知识分子所开辟的这条道路粗糙而曲折，却也热切又真诚，并代表了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及其对于俄国人民之命运的一种关切与探索。这条道路未必足够聪明，却足以被当今的俄罗斯学者接纳为“俄罗斯心灵”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① Розанов В.В. Письма к С.А. Венгерову// Рукописный отдел Института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РО ИРЛИ). Ф.377. Оп.4. №.1921. 16 л.: л.4 об. 转引自: Дмитриев А.П.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ая переписка В.В. Розанова с С.А. Венгеровым: исповедальные мотивы, споры о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и критиках «дурного сердца»// Соловьёв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9. №.2 (62). С.156.

② Тургенев И.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8. Т.5. С.58. 转引自: Щербаков В.И. Д.И. Писарев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эпохи нигилизма. Москва: ИМЛИ РАН, 2016. С.20.

**【Abstract】** Due to drastic changes in ideology, the heritage of V. Belinsky, a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literary critic and philosopher who was highly respected in the Soviet era, has experienced a tortuous fate in researches and cognition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academic circles. From the horizontal thematic dimension, contemporary Russian academic circles, revolving around Belinsky's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influences, have made amendments to varying degrees on views of Soviet academic circles on three different themes. They tend to interpret Belinsky's revolutionary democracy, socialism and other ideas according to theories of “religion internalism” and “personalism” either during the “Silver Age” or from diasporic philosophers. From the vertical time dimension, in the three decades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n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I. Kondakov, E. Tikhonova, A. Yermichov have gradually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critical negation to reconsideration in their attitude towards Belinsky's heritage. If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Belinsky studies are observed together, it could be found that Belinsky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Russia seems to be a “start from the beginning”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But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inseparably connected with the shaping, disenchantment and reshaping of the entire “Belinsky Myth”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sup>th</sup> century. The contemporary fate of the “Belinsky Myth” also reflects the overall attitude of Russian academia toward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Soviet Union, that is, from denial and rejection to acceptance as an organic part of the “Russian mind”.

**【 Key Words 】** Contemporary Russian Philosophy, V. Belinsky, Revolutionary Democracy,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Из-за радикаль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в идеологи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В. Белин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критика и философа XIX века, пользующегося большим уважением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испытало поворотную судьбу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и познании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кругов.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ного тематического измер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российские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круги, изучающие философскую мысль Белинского и его влияния, в той или иной степени опровергли взгляды советских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кругов по трём разным темам и склонились к таким взглядам философов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как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имманентность» и «персонализм» дл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социализма и других идей Белинского. Из вертикального временного измерения в тридцать лет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оссийские учёные в лице И. Кондакова, Е. Тихоновой, А. Ермичева и др. постепенно пережили процесс от критического отрицания к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ю свое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к наследию Белинского. Если связывать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Белинског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можно обнаружить, чт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Белинского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кажутся “новым началом”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ни неразрывно связаны с созданием, развенчанием и пересозданием всего “мифа о Белинском” с середины и конца девятнадцатого века. Судьба “мифа о Белинском” в современную эпоху также отражает общее отнош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к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культурному наследию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то есть от отрицания и неприятия до принятия его как органической части “русской душ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В.Г. Белинский,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俄罗斯研究》来稿须知与注释示例

《俄罗斯研究》多年来形成了以扎实的俄罗斯欧亚国别与区域研究为依托，有效服务中国外交政策的办刊特色。旨在刊发各领域、各学科中外学者在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尤其欢迎融经验性、理论性、时效性于一体的、有中国思想和中国关怀的研究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的论文，为推动国内外学界沟通，尤其是国内学界、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平台。常设议题主要包括俄罗斯及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国关系研究等。本刊议题不囿于上述方面，诚挚欢迎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向本刊提供新的议题引领。

### 一、来稿须知

1. 请使用信箱投稿或在线投稿系统：

投稿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在线投稿系统：<http://ru.ecnu.edu.cn>；

电话：021-62233816；传真：021-62238113。

2. 来稿字数 1.5 万-2 万字，需有 300-500 字的内容提要，3-5 个关键词。

3.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稿件一经采用，会向作者支付稿酬，邮寄样刊。

4.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 二、注释示例

1. 中文文献

(1) 著作：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 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6 页。

(2) 期刊文章：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18 页。

2. 英文文献

(1) 著作：R.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0.

(2) 期刊文章：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3, No.4, pp.7-8.

3. 俄文文献

(1) 著作：Замятин Д.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М.: Знак, 2006. С.86.

(2) 期刊文章：Лукьянов Ф.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Том 16. №.2-3. С.175.

完整版本请参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s://rus.ecnu.edu.cn/>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22年第3期(总第235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刘 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http://www.cnki.net)

ISSN 1009-721X



公开发行人

定价：30.00 元